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 新 孙思白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 国 人 物 传

第 二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3 1/2印张 271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300册

统一书号: 11018·873 定价: 1.25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

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

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廖仲恺	尚明轩 (1)
吴禄贞	李宗一 (12)
邹 容	尚明轩 (17)
陶成章	尚明轩 (22)
赵 声	黄德昭 (28)
许雪湫	杨天石 (33)
温生才	杨天石 (38)
倪映典	王学庄 (41)
吴 樾	尚明轩 (46)
林 文	张长茹 闻少华 (50)
杨笃生	杨天石 (53)
张文光	王学庄 (57)
席尼喇嘛 (乌力吉吉尔格勒)	赵相璧 (61)
何香凝	尚明轩 (67)
谭人凤	周天度 (78)
续范亭	田为本 (83)

司徒美堂	陈 民 (91)
于学忠	黄德昭 (99)
李烈钧	宗志文 (105)
张 继	黄德昭 (114)
林 森	娄献阁 (119)
邵元冲	黄德昭 (125)
谭延闿	李静之 (129)
王宠惠	郑则民 (139)
吴鼎昌	熊尚厚 (145)
白 朗	杜春和 (153)
黎元洪	张振鹤 (161)
冯国璋	李宗一 (170)
赵秉钧	李宗一 (181)
岑春煊	闻少华 (188)
张鸣岐	王学庄 (194)
吴佩孚	李宗一 (200)
王占元	张振鹤 (211)
汤化龙	曾业英 (216)
德穆楚克栋鲁普	卢明辉 (222)
巴布扎布	卢明辉 (235)
陈嘉庚	熊尚厚 (241)
聂云台	江绍贞 (249)
盛宣怀	朱宗震 (256)

陈光甫	江绍贞 (265)
李 铭	江绍贞 (271)
章太炎	陈旭麓 (276)
梁启超	耿云志 (289)
曾 朴	杨天石 (302)
张伯苓	宗志文 (306)
杜重远	陈宁生 (311)
沈钧儒	周天度 (321)
李公朴	宗志文 (334)
洪 深	查建瑜 (344)
张国淦	丁贤俊 (352) 杜春和
虚 云	王学庄 (357)
齐白石	奚 纯 (363)
阮玲玉	查建瑜 (369)
薛觉先	张 洁 (374)
马师曾	张 洁 (380)
林语堂	张 梁 (386)
陈焕章	郑则民 (393)
曾 琦	李义彬 (399)
张君勱	江绍贞 (409)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	(416)
------------	-------

廖 仲 恺

尚明轩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笔名“屠富”、“渊实”，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人。他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孙中山的战友。

其父亲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廖仲恺 1877 年 4 月 23 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至 1893 年十六岁时，陪同母亲回到祖国。

廖仲恺回国后，原准备应科举考试，入家乡私塾，从梁缉赓研读经史策论。1895 年中日甲午战后，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展开，他受到影响，遂放弃中国旧学，于 1896 年转赴香港，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手段。

1897 年 10 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 年秋，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 年 9 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服，从此，对中山发生了

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4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天津联络革命志士，筹设机关，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9月1日，经何香凝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为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的笔名，翻译了亨利·乔治(Henry·George)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同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8至1909年初，奉孙中山指派，又先后潜回天津及吉林，从事发展革命势力的活动。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广州。这时，他想借取得清政府功名的办法，“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①便于同年偕同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被清廷派赴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等工作。

1911年武昌首义后，廖仲恺脱离“清幕僚”身份，回到革命阵营。他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不久，被南方革命政府派为南北议和会议的代表。在1911至1912年间，廖仲恺和他的哥哥廖凤书(恩焘，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都参与了南北议和，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袁世凯派。兄弟二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谈判中形成鲜明的对照。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在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后，廖仲恺离广东去北京运动议员反袁，险些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同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成，廖仲恺被任为党的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4月，随孙中山回国。此后，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

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8年夏，“护法”失败，廖仲恺随孙中山离广州到上海。1919年8月，他和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此后两年内，他除把《进步与贫乏》继续译完外，又译了威尔科克斯 (Deles. F. Wilcox) 的《全民政治》，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

廖仲恺在这时期，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民权与民生了，因此，他这期间的著述中主要是阐述民权、民生两主义。

在传播“民权主义”方面，他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在于“国家权力失了他原本的位置”，“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②因此，解决此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认为，三大民权是欧美“政治上之防腐剂”，^③而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④他翻译《全民政治》一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在宣传民生主义方面，他探讨了许多问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交通建设、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把交通不发达看作“中国民穷财尽最普遍的原因”，^⑤认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他说：“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混得过去。但是这交通改

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那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煞的。”^⑥ 另外他还研讨了货币改革、合作化运动等与民生问题的关系。

从上看出廖仲恺在此期间，尽管试图从各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但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随着历史潮流的推进，他在思想中已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萌芽，朦胧地看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⑦ 末后终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希望：“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⑧

1921年，孙中山回粤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用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陈囚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于8月19日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

1922年8月，苏俄派代表越飞来华，越飞的代表与孙中山就“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会谈。为进一步商讨联俄、联共等问题，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9月与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东京，继续进行详细会谈，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做好准备。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宣言签订后，廖仲恺又奉派与越飞再次会谈，以便把联合宣言具体化。会谈

是在日本温泉地伊豆山海岸“热海饭店”进行的。这次会谈，是廖仲恺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他和越飞“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⑨他在每次谈判后，“都是满面笑容，表示出很得意的样子”。^⑩正是通过同苏俄代表的相处恳谈，他得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如对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的各项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开始明确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

1923年春，叛军陈炯明败退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廖仲恺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这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托和李大钊等五人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从事改订党章等工作。^⑪同月下旬，按照孙中山要求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商讨改组问题。后又和许崇清等九人接受委派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及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分别召开党务会议，讨论筹备改组等问题。11月底，他奉命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组织成立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工作。

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廖仲恺的积极参与筹划，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于1923年年底完成。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廖仲恺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指出：“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

乱源不能廓清，其故既〔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②“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倒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③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政党。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张继等公开反对孙中山改组的主张，抗拒三大政策，使用一切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廖仲恺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毫不妥协和动摇，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④他针对以“稳健”自称的国民党右派说“实在他们口中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⑤并提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⑥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除继续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国民党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地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无产阶级的好朋友”。^⑦他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服膺到底，并对其作了一些具体的阐述。

廖仲恺到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中国内部纷争不已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他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⑧“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全国人的公

敌”。^{①⑨}“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资本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②⑩}还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提出废除租界、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认为“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民族之耻辱”，主张租界“应由中国收回管理”，“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②⑪}1924年秋，当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暴乱时，他主张彻究严办，随后他担任镇压暴乱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平息事变，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早在1923年10月，当他参与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时，就遵照孙中山的意图，把筹办军官学校列为当时最重要的议决案之一。^{②⑫}1924年2月，他担任军校筹委会代委员长，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人力、物质等各种困难，使筹建工作顺利完成。同年5月，他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积极地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他讲建立革命军队之目的是“以武力为民众的保障，进而为民众全有的武力”^{②⑬}。

他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俄国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②⑭}；他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②⑮}他亲切地接待苏俄派来帮助中国革命工作的友人，诚恳地和他们共事。使苏俄友人们也都把廖仲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②⑯}

他又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排除了右派顽固势力的种种破坏，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起死复生的“一个新生命”^②，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单位中公开活动，并真诚地和他们维系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且本着与共产党热诚合作的精神，把领导工会的事情都交给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处理。

他在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也是认真的。他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③他以工人部长兼农民部长的身份，深入群众，积极地赞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维护工农利益。1924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广东工人国民党党员大会，作了鼓励推进工人运动的演说；5月，又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全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7月，他赞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的工作，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第一期工团军。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中，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他为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封闭烟赌馆作为工人住宿之所，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支援罢工工人。他也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④因而主张：“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⑤他曾经到中山、东海等县农村去访

问农民，支持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告诉农民说：“如果农民想获得解放，必须同工人齐心合力奋斗。”^①

廖仲恺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从他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上说，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自然是有差别的。尽管从个别论点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错误，但他是真实的革命者，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前进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地肩负起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责任，忠实地执行其遗言，更积极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斗争。是年3月，他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在东江前线上亲自鼓舞将士奋勇杀敌。6月，又参加了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给了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讲述廖仲恺当时的活动情况说：“我们又亲眼看见：为了东江战争，每天作十几点钟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杨刘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人还要由黄埔回到广州去办事。”^②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庭赞扬廖仲恺为革命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曾感叹地说：像“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正由于廖仲恺不屈不挠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战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他极端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的暗杀，为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廖仲恺牺牲后，遗体于同年9月1日安葬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左侧，1935年9月1日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

注:

- ① 乾甫:《廖先生事迹一斑》,《廖仲恺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1926 年印。
- ② 《三大民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后同),第 6 页。
- ③ 《全民政治论译本序》,同上书,第 31 页。
- ④ 《三大民权》,同上书,第 8 页。
- ⑤⑥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廖仲恺集》,第 28、29 页。
- ⑦ 《国民的努力》,同上书,第 92 页。
- ⑧ 《消费合作社概论》,同上书,第 258 页。
- ⑨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1947 年版,第 1590 页。
- ⑩ 廖梦醒:《回忆我亲爱的父亲——廖仲恺》,《中国工人》,1957 年第十六期,第 25 页。
- ⑪ 《广州民国日报》,1923 年 10 月 19 日。
- ⑫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16 页。
- ⑬ 同上书,第 44 页。
- ⑭ 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纪念册》,1927 年版,第 17 页。
- ⑮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廖仲恺集》,第 241 页。
- ⑯ 黄埔军校编:《革命军》,第八期,1925 年 9 月 20 日出版。
- ⑰ 《省港罢工委员会通告》,《工人之路特号》,第五十八期,1925 年 8 月。
- ⑱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同上书,第 241 页。
- ⑲ 同上,第 243 页。
- ⑳ 《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廖仲恺集》,第 174 页。
- 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95 页。
- ㉒ 同上,第 53 页。
- ㉓ 熊锐:《廖先生的生命与国民党的生命》,《革命生活》,第十六期,1926 年 8 月出版。
- ㉔ 《驱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廖仲恺集》,第 231 页。
- ㉕ 《追悼列宁大会演说》,同上书,第 123—124 页。
- ㉖ 鲍罗庭夫人:《悼廖仲恺先生》,《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7 年 6 月版,第 24 页。
- ㉗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一书第十二号中廖仲恺的发言。

- ⑳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廖仲恺集》，第213—214页。
- ㉑ 《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同上书，第169页。
- ㉒ 同上，第174页。
- ㉓ 廖梦醒：《回忆我亲爱的父亲——廖仲恺》，《中国工人》，1957年第十六期，第26页。
- ㉔ 广东黄埔军校：《悼党代表告我党同志》，《革命军》，1925年第八期。

吴 禄 贞

李宗一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生于1880年3月6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其父吴利彬是秀才，在武昌教书，1898年病死。

1897年，吴禄贞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在校期间，与第二期学生清室贵族良弼交谊甚厚。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学生参加革命。吴禄贞虽然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不同意反满学说。同时，他和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也保持友好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改良派认为推翻西太后使光绪当权的机会到来。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兵“勤王”，吴禄贞秘密回国参加。“自立军”以汉口为中心，分立五军，吴禄贞和秦力山等率领大通前军，于8月仓促起事，与清军巷战数日，因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吴禄贞逃到上海，不久返回日本士官学校。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更加倾向民主革命。

1902年4月，他毕业回国，在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担任教习，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主张，在他鼓励之下，后来参加革命团体的青年有刘静庵、胡瑛等三十多人。1903年冬，他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飏光等赴长沙，筹划在湖南发难。这时，

适逢清廷在北京创设练兵处，编练新军。经良弼推荐，练兵处调他入京。他“初不欲往，同志中谓君为当道注目，与其在外无所建树，不若投身中央，伺隙而动”。^① 吴禄贞接受了劝告，于次年4月抵北京。

1904年5月，吴禄贞被派署理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即科长），次年8月实授。在京时，他仍与湖北革命志士暗中保持联系。刘静庵被捕后，他通过良弼（军学司副使）和铁良（练兵处会办）向庆亲王奕劻说情，竭力挽救。1906年10月，他被派赴新疆伊犁考察新军。11月抵兰州，身穿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辞气之间未能谦和逊顺”，升允大怒，当即将他扣留，并诬奏他“冒充钦差”，沿途“需索供应”。^② 铁良奉旨查办，一面派员前往兰州调查，一面致电升允释放他。年底他回到北京。次年6月，铁良查办结案，复奏他“并未冒充钦差”，但“往谒督臣升允，便服请见，亦与体制未协，此实因该员游学外洋多年，于中国礼节律例均未深加考究所致，其轻率疏忽之处自应量予薄惩，俾资儆惕”。^③ 为此，将其监督差使立即撤去。7月，他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充军事参议。

吉林省延吉厅与朝鲜接壤，以图们江为界。日本侵占朝鲜后，即觊觎延吉地方，并于1907年秋制造借口，派兵渡江，侵占延吉厅所属龙峪、光霁峪等地，强立“间岛”名目，妄图吞并。吴禄贞奉命“密往确查”，^④ 于9月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常驻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⑤ 他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和文献记录，提出《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册，证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逐条驳斥了日本制造的“间岛”谬论。经他据理交涉，终于迫使日军退出侵占地方，因此得到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的赏

识。1909年4月，他升任延吉边务督办，授以陆军协都统，仍驻延吉。

1908年底，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和少壮亲贵铁良、良弼等人，企图重用留日陆军学生，以削弱袁世凯北洋派的军权。载沣罢免了袁世凯以后，于1910年初调吴禄贞回北京，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派赴德、法两国阅操。吴禄贞回国后，向黄恺元（同盟会员）借了二万两银子，馈送庆亲王奕劻，谋出任一省巡抚。结果于12月23日被任命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原由段祺瑞担任统制，协统李纯、周符麟及各标统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小站旧人。他们对非北洋派的吴禄贞自然心怀不满。加上吴禄贞又过于操切，一上任就试图通过人事调换，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先任命同盟会会员、留日士官生张世膺为参谋官，又以“烟瘾甚重，行同盗贼”为理由，将周符麟撤职。因此，各级军官“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⑥不久，他又呈请任命李书城为标统，但陆军大臣蔺昌不予批准。为此他写信指责蔺昌“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⑦语气十分凌厉。蔺昌怀恨在心，派陆军部检查官到第六镇秘密查访，罗织罪名，企图将他撤任。他“觉得第六镇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遂萌退志”。^⑧从此常住北京，与蒋方震、李书城等饮酒赋诗，“借以消胸中的积闷”。^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他一方面庆幸革命终于发生，另一方面又为未能控制第六镇而担忧。10月14日，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赴湖北，镇压革命。

他曾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廕昌所拒绝，未能成行。于是他便前往保定，掌握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倚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秘密会商，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与此同时，山西也爆发革命，清廷急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进攻山西。吴禄贞又由滦州赶赴石家庄，令第十二协停战，并亲自赴娘子关，一面与山西军密商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以山西军已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他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下令停战，北洋军退出汉口，严惩纵兵焚烧汉口的军官。清廷大惊，疑心他是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以假言假语嘉奖他，并于4日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已经出山，由彰德到达湖北孝感，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身份指挥北洋军对革命军作战。他侦悉吴禄贞的密谋后，立即派在湖北军中的周符麟携带巨款至石家庄，以两万元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字惠田）刺吴。^⑩

吴禄贞平生志大气豪，错误地认为警备是怯懦的表现，得知周符麟至石家庄谋害他，仍不加戒备。11月16日深夜，他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至次日凌晨，马步周率领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⑪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下令对吴禄贞以大将军例赐恤。1913年11月7日，遗体安葬于石家庄。有《吴绶卿先生遗诗》二卷行世。

注:

- ① 《吴君禄贞事略》，见《时报》，1912年3月8日。
- ② 《铁良奏请将吴禄贞冒充钦差详细电复由》，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 ③ 《奕劻等奏查复吴禄贞冒充钦差由》，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 ④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页9。
- ⑤ 同④。
- ⑥ 《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隆昌密呈》，宣统三年二月。
- ⑦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页450。
- ⑧ 同⑦。
- ⑨ 同⑦。
- ⑩ 关于刺杀吴禄贞的主谋人，另一说是良弼，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 ⑪ 张世膺字善飞，江西人。周维桢字干臣，湖北麻城人。两人都是留日士官生，同盟会会员。

邹 容

尚明轩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四川巴县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富有的商人。

邹容六岁进私塾，十二岁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因主考官出题刁难考生，他非常气愤，用拒考进行反抗。1898年，在重庆跟日本人学习英、日语，获得机会阅读资产阶级的书报，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吸收新的思想，打开了眼界。

1898年的戊戌变法，使邹容大为激动，他很同情维新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增长了民主要求，开阔了政治视野。变法失败，邹容悲愤异常，对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革新志士谭嗣同特别敬仰，常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

从此，少年的邹容便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宣布：“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①的疑问，勇敢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他在重庆吕翼文（搞考据训诂的学究）主办的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天画地，非尧

舜，薄周孔，无所避”^②，因而被吕翼文开除。此后，他更加鄙弃“旧学”，一心向往“新学”。

1901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张革新，清四川总督奎俊竟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在留学生临出国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

邹容被开除后，毫不气馁，更加坚定了到外国去追求新知识的决心。他于同年9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到日本留学。在广方言馆学习期间，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同学中某些人却只知升官发财、对祖国的安危无动于衷，他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的诗，借以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③

邹容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亲族的种种阻挠，他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以“将英文读好”，“吃着不尽”（意即当买办）相诱惑，要他放弃留学。邹容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意志，他认为刘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总总谬论，不堪入耳”；并果断地表示：“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④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1902年春，邹容到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他结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1903年的春节，留日学生

在东京举行团拜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学生开会，他每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觉悟，他还参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

当时，清朝政府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坏留学界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民愤甚大。1903年3月，邹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众怒的时机，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姚文甫，并称欲取其头，姚哀乞宽大，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辮。”将其辮发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辮”。事后，姚文甫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准备对邹加以谋害，他被迫回国。

这一年4月，邹容回到了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建立了友谊。邹容的志气和才能得到章的赏识，被亲昵地称为“小弟”。在章炳麟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5月，他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就反对沙皇俄国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问题，发表议论，滔滔不绝，深获与会爱国者的好评。之后，他针对保皇派组织所谓“国民议政会”，妄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歧途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据理驳斥了他们散布的谬论，并劝使受骗参加的爱国学生纷纷脱离他们的组织^⑤，狠狠地打击了保皇党人的反革命活动。同月，邹容为了团结全国学生“鏖战于中国前途”^⑥，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博得海内外爱国学生的广泛支持。

也就在这个月，他奋笔疾书，续写旧稿，完成了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全书约有两万言，分做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诸问题。序末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章炳麟为它写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这本书由几个革命党人集资，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

邹容在这本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明白流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朝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指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邹容在这本书中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学习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跟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宣扬的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当时，这种与改良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武装了革命者，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革命军》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震聩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一书问世惊惶万分，认为“此书逆

乱，从古所无”，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⑦1903年，因《革命军》而引起的所谓“苏报案”事件发生。6月30日章炳麟被捕。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会审法庭上，慷慨陈词，坚强不屈，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无理地对他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在帝国主义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狱中。时年方二十岁。“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⑧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狱中，犹念念不忘革命事业的成败。临终之前，他在《绝命词》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邹容死后，人们哀为“国殇”，很多人悼念他。《革命军》一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风行国内外，各地纷纷翻印，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注：

- ① 《邹容略传》，《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编著）第五册，第1241页。
- ② 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365页。
- ③ 因明子：《有感》，《清议报》第八十一册，“诗文辞随录”，第1页。
- ④ 《邹容第二十三次家书》，原件，藏四川重庆市博物馆。
- ⑤ 《复报》，第十期。
- ⑥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31日。
- ⑦ 1903年7月2日（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两江总督魏光燾电。故宫档案馆：《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
- ⑧ 邹容：《狱中答西狩》，《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

陶成章

尚明轩

陶成章字焕卿，笔名汉思、巽言，别号匍耳山人。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曾化名起东、志革、何志善。浙江会稽县（今绍兴）陶堰乡人，生于1878年1月2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陶正，字品三，是陶堰地方的小乡绅。

陶成章六岁进陶堰乡义学读书。十五岁时已通读了“四书”、“五经”，并读了一些史地书籍。1893年起，在家乡设馆任塾师，曾挺身痛击村中一欺压农民的土豪，为乡里群众所赞颂。任塾师期间，逐渐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益关心。由于对清政府统治下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不满，开始萌发了进行种族革命，以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陶曾打算趁混乱时机，刺杀西太后，他先后两次到北京进行活动，未得到下手机会。同年，赴奉天（今辽宁）和内蒙东、西盟等地，察看形势，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作准备。

1902年春，陶在北京寻找门路谋入陆军学堂，未成功。同年夏，离开北京赴日本留学，先后进东京清华学校、成城学校读书。这期间他与龚宝铨（味荪）同居一室，两人纵谈时事甚为契合，结为好友。由于陶成章在留学生中倡言革命，为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所察觉，汪诱以爵禄，骗其归国。他

考虑可以趁机掌握权力，便利进行革命，乃允诺回国。及抵北京，汪食前言，并捏造罪名开除其学籍，陶甚为愤怒，立即重返东京。从此，革命的志向益坚，更加积极地在留学生及华侨中进行反清宣传。

1904年初，陶成章自日本归国，抵上海后，参加了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积极地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曾徒步三次潜入金、衢、严、处等府所属之地，组织起义，但均被清政府所侦破而失败。但他愈失败愈振奋，在联络工作中，日行八九十里，经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至于废寝忘食。他曾四过杭州，与会稽只隔一江，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度岁，他答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①又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是年8月，联络各地会党的工作，略有头绪，他回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等计划于11月16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湘、鄂、闽、浙等省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他在拟定《新中国军政府檄文》中通俗地解释“怎样叫做革命？”他说：“革命就是造反。……《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不过他设想革命成功后的情况是“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从这段话中，流露出的是小生产者主观幻想的平均主义的世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不甚理解。后来由于条件不具备，起义未能实现。

同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

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②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担当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会党工作的责任，他深入各地，打进基层，收效显著，从而使他在会党中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1905年9月，陶成章和徐锡麟等为发展革命力量，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陶召集金、处、绍三府所属各县会党首领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并规定，凡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毕业后也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和节制。大通师范学堂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

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同时，陶成章提议革命党人捐官去日本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政府军事系统，掌握军政，以谋“中央革命”。这一倡议得到徐锡麟等的积极赞同。陶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徐锡麟、龚宝铨等各捐不同的官职，分填各科。他们办妥捐官和留学手续后，于同年冬季先后去了日本。后来，因清驻日本公使的刁难，不准他们学习陆军学科，计划未能实现。

1906年，陶成章再次从日本回国，积极团结福建、安徽各地的革命志士，进行准备武装革命的活动。不久，秋瑾成立光复军，陶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旋以谋事不密，为清政府侦知，机关被破坏，又东渡日本。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稍后担任留日会员中浙江省分会长，主管浙江留学生入会主盟工作。同年夏，他因徐锡麟在安徽活动著有成效，便回国到芜湖中学堂任教师，以便就近联系，共同推进革命工作。7月，徐在安庆击杀清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战败

被捕，惨遭杀害。不久，秋瑾响应起义，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捕，也壮烈牺牲。之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他被迫出国，潜赴南洋。再后，他曾参与新加坡《中兴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的笔政，同时在爪哇创办书报社，努力进行宣传及联络工作。

陶成章在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兼事撰述工作，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鼓吹种族革命，1904年在日本东京印行，1907年易名《中国民族史》，又在东京出第二版。编《浙案纪略》一书，凡三卷，记载徐、秋二烈士事迹。

1908年3月，陶成章在东京接替张继主编《民报》，该刊第20、21、22三期是由他负责编出的。曼华（即汤增璧）在《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一文中曾说：“《民报》之所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为事者，盖自陶氏编辑时始。”^③

同年秋，陶成章赴南洋，拟向华侨筹款五万元，在江、浙二省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④相告，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他认为孙中山措置失当，由此而对孙中山发生了隔阂与意见。1909年初他在爪哇创办光复分会，负气不再用同盟会，改用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印发捐票，单独向华侨筹款。这种狭隘的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到9月，他与李燮和等人，发布了一份攻击孙中山的所谓《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行》），诬指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藉革命肥家，他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恰好，这时章炳麟也对孙中山有了意见，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陶和章互相呼应，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在南洋和日本等地对孙中山大肆诋毁。不

久，陶在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均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与同盟会互争雄长。

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炳麟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大力扩展会务，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⑤，并“驳驳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⑥。陶成章这时期的表现，是把会党中的宗派情绪，带进了革命队伍；这种狭隘的门户之争，是小生产者的思想反映。他的这种分裂活动，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很不利的。

1911年3月，陶成章从爪哇回国，准备再次举行反清的武装起义，因为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形势不利而中止。6月，再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援国内革命。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归国，在江苏、浙江各地号召旧部起义，响应武昌革命。不久，上海、杭州、松江等地陆续被革命军攻克，这中间仍有陶成章多年努力的成果。浙江军政府成立后，他被举为参议会参议员。

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住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治疗。当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众议拥陶继任浙督，而沪军都督陈其美把陶视为政敌。陈派遣蒋志清（即蒋介石）设计杀陶。14日凌晨二时许，陶成章被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医院里。

注：

① 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未刊稿。

②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7页。

- ③ 《建国月刊》第七卷第二期。
- ④ 孙中山：致同盟会员王子匡函。原件，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藏。
- ⑤ 冯自由：《光复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18 页。
- ⑥ 新加坡《星洲晨报》，1910 年 4 月 19 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辑，第 235 页。

赵 声

黄德昭

赵声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县大港镇人。生于1881年3月16日（清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其父赵蓉是个廪生，在家乡教学。赵声幼年从父读书，又练武艺。稍长，魁梧多力，曾入狱救人，被视为“豪侠少年”。十九岁考中秀才。

1901年初，赵声到南京教家馆。时值义和团革命运动失败后，目睹国势危急，他感叹地说：“有文事必有武备，吾当为班定远，岂能于墨汁中求生活？”^①遂辞馆职，以第一名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入校以后日渐倾向反清革命，为学堂监督所不容。数月后他自动退学，寄居和尚庙读书。庙旁为江南陆师学堂，一次偶代某生作文，得到该校监督俞明震的赏识，特许其入学，至1902年底毕业。在此期间，他进一步受到国内革命思潮的推动，认真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学说，并决心从事革命活动。

1903年2月，赵声东渡日本考察，在船中对友人说：“生平最佩服孙文。”^②到日本见到黄兴等革命志士，大受鼓舞。不久赵由日本回国，先在本乡创办阅书报社、小学堂、体育会，积极宣传革命。后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内结员生，外联同志，秘草“七字唱本”，号《保国歌》^③，大量印刷，广为散发传播。

为了反对沙俄侵略我东三省，1903 年秋全国兴起拒俄运动。赵声参加南京学生在北极阁的集会，就拒俄事，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受地方反动当局所忌，乃去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不久他闻袁世凯扩练北洋新军，辞职北上保定，得见袁世凯，想通过投军进行革命活动。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闻赵有革命思想，乃虚与委蛇，名义上委赵办文书，实则形同软禁。赵知中计，设法逃离保定，往北京，出榆关观察东北形势。那时皖人吴樾正在北京谋刺清政府大吏，赵吴结识，互倾肝胆，成了莫逆挚友。赵南归过天津时，曾有诗寄赠吴樾，中有：“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④之句。其后吴樾果因炸清五大臣而殉难，赵得讯悲痛不已。

1905 年秋，北洋陆军将在河间举行秋操，赵声乘机潜入某镇为队官，谋相机策动革命，筹划未成，不久失望南归。当时江南初创新军，他到南京入督练公所任参谋官，旋至江阴教练新军。有道员郭人漳以新学自诩，好与革命党人往来，与赵也结成朋友。后郭调赴广西任巡防营统领，赵随同前去，任管带。在广西期间，赵不时向士兵灌输反清革命思想，还常借太平天国故事，激励本地人士，原想就此发动革命，因广西清吏防范严密，一直无从下手。于是，他应友人约，回到南京任暂编南洋陆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半年后被统制徐绍桢擢升为标统。其间他先后援引冷遹、柏文蔚、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等革命青年入九镇，任官佐。

1906 年春，赵声在南京加入同盟会，^⑤更加注意扩大革命行动。于营内设阅书报社，加紧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曾带士兵游明孝陵，借元、明故事启发他们的民族革命意识，士兵

深受感动。所部士兵因闻太平军故事，恨曾国藩，火毁其后湖神庙。江督端方得知，想借此事兴大狱，加赵以罪，得徐绍桢力保，才以免职了事。先是，孙中山派党人到南京与赵声接洽，谋划革命。到这年12月，江西及湖南爆发了萍、浏、醴起义。端方奉清廷电飭，派徐绍桢带兵前往“会剿”，徐绍桢欲赵回原任，端方不许；末后，赵以其他名义随徐往江西，准备相机行事。但到萍乡时，起义已经失败。徐军返防后，端方对赵猜疑更甚，随时准备加害。因此，他被迫离开南京。

1907年春，赵声至广东，任新军二标三营管带，不久升第二标标统。这时粤省新军中已布满了革命种子；而廉州团绅刘思裕统率万人会（地方团兵）发动抗捐斗争，孙中山又曾派人打入，有所接洽。粤督周馥急派赵声和防军统领郭人漳前往镇压。赵原准备相机举事，因联系失时，致刘思裕已先为郭部管带林虎所杀。但钦、廉两府的群众抗捐斗争，在同盟会员王和顺的联络和策动下继续发展，并请援于同盟会越南总部。7月张人骏督粤，续派赵声及郭人漳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前往镇压。孙中山前此已派黄兴等与赵、郭联系，赵、郭皆表示要反戈相应。于是王和顺率起义军进克防城并转至钦州城下。不料先入驻钦州的郭人漳动摇变节，对起义军不予响应。钦州不能下，起义军乃再进围灵山，受损失而败退。赵军在合浦，原定俟钦州一下，即举兵响应，及见此情况，遂无所作为。钦廉之役至此宣告失败。赵声经此两役，内心深为痛苦，率部回廉州后曾赋诗道：“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⑥

1908年冬，粤督张人骏改调赵声任新军第一标统带。赵愤郭人漳的背约，宣布与郭绝交。郭既为赵所不齿，便不时向

张进谗；同时端方也由江南密电戒张：“声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貽患。”^⑦张由此疏赵，削其兵权。赵声处境日益困难，知在粤已无能为力，遂于1909年3月弃职回江苏丹徒故里。端方下令缉捕，他乘夜逃往杭州。

赵声离粤前，倪映典已来广州，由赵荐任新军炮队营军官。赵声去后，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仍继续发展。1909年秋，孙中山派党人在香港设同盟会南方支部，谋划发动新军起义。其后，支部又暗设机关于广州城内，积极经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各方联系稍有头绪，倪映典请香港支部电赵声南来主持发动。赵得讯到来，群情振奋。于是议定于1910年元旦发难，由党人率会党攻城，倪映典率新军夹击。但因新军士兵先一日与警兵发生冲突，打乱了起义计划。倪映典仓卒入营指挥，亲率一部从沙河攻广州，至横枝冈被敌截击，不幸中弹死。军中无主，起义遭到失败。当时赵在城内，以事变猝起，与各方无法联络，后始脱险出城。

广州新军之役，清吏侦知主谋者为赵声，乃悬赏缉捕。赵声逃至香港乡间。居数月，闻孙中山自美抵日，就专诚到东京去谒见，深受器重。在全国革命形势鼓舞下，孙中山于11月间在南洋庇能（檳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共商大计，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计划取得广州后，军分两路北伐，赵声率东路军经江西，向南京推进，黄兴统西路军入湖南，向武汉进军。会后，赵、黄、胡等回港设立“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长，决定1911年4月13日发难，并通知各省党人积极来会。到4月8日，推定赵为起义总指挥，黄为副指挥，准备发动十路进攻，赵自率苏、皖党人百人攻清军水师

提督李准驻地。不料就在这一天,忽有新从南洋来的温生才谋刺李准,误击署广州将军孚琦事发生,粤督张鸣岐和李准加强了防范,原订起义日期,不得不因此推迟。又因广州熟识赵的人多,决由黄兴于23日率党人先入,赵续至。起义日期几经变动,到4月27日,由于情况紧急,黄兴被迫发动,于当日下午五时亲率党人攻入总督衙门,各路队伍和清兵巷战了一日夜,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赵等28日晨赶到广州,已无法参加战斗,只好撤退。这次起义伤亡很大,后得遗体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由于连遭挫折,特别是两次广州起义失败,赵声忧愤成疾,于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了表彰他的功业,追赠他为上将军。

注:

- ① 佚名:《赵烈士事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 ② 束世澂:《赵声传记考异》,《建国月刊》第15卷第5期。
- ③ 《保国歌》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的宣传品,辞气慷慨,可与《猛回头》、《警世钟》相媲美。全长一百三十四句,内容详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 ④ 赵声:《赵声遗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391页。
- ⑤ 《吴囑谷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第1448页。
- ⑥ 同④。
- ⑦ 柳弃疾:《丹徒赵君传》,《中华民国人物传》。

许雪湫

杨天石

许雪湫(一作雪秋),原名有若,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潮安)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富商。雪湫年轻时,随父住在新加坡。其父死后,获得大量遗产,曾出钱向清朝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的官衔。他懂武术,精技击,丈把高的墙可以一跃而上;又任侠好客,挥金如土,和江湖会党广有联系,因此被称为“小孟尝”。1902—1903年期间,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福州人黄乃裳,非常倾倒,立志“逐满兴华”。1904年秋,邀黄乃裳、陈宏生等归国。10月27日,与黄、陈及吴金铭、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集会,立坛歃血,相约召集同志,筹饷举事。经过几个月的经营,结识潮州府属各县三合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1905年2月15日晚议定,以许雪湫为革命军司令,陈宏生为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为参谋长,同时议定了联络学界、会党和各省同志的人选,并议派陈宏生赴福州,联络黄乃裳,发动闽省响应。当时,潮汕铁路正在建筑中,许雪湫以承办铁路工程为名,派余丑、余通、陈涌波为工头,召集会党七百名为工人;又由吴金铭以绅士名义呈请清朝政府地方当局,在海阳上七都祠召募团练四百名,均以会党充任;约定4月19日同时举事。但因李杏坡用人不慎,走漏消息,李被捕牺牲。不久,又有人告发许雪

湫为革命党首领，清吏派员密查。在这一危急情况下，许雪湫身怀手枪，单身到潮州衙门，侃侃自辩。清吏和许是旧识，又因他是地方大绅，没有深究。

初次举事失败后，许雪湫重赴南洋，准备筹款再举。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通过张永福介绍，许和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不久，许即回到国内，散发以鹰球为图案的票布，招揽会党。同年冬，偕余丑、余通、陈涌波等到香港，向冯自由表示，筹划已渐次成熟，要求致电东京，请孙中山派人回国相助。孙中山接电，派出了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到港，就近协助。其后，许雪湫即在宏安乡自宅召集会议，定期1907年2月19日（正月初七日）分头大举。一路由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等往饶平县浮山墟布置，进攻潮州；一路由方汉成、方次石等往黄冈发动，拟攻汕头；许雪湫则偕方瑞麟、谢良牧等三百人埋伏于潮州城边；另有六十人预伏城内，以为内应。届期，饶平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①；许在潮州东门外一直等到天亮，不见队伍开到，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数日后，薛金福等被捕杀。许雪湫即委托陈宏生处理善后，自己赶赴香港，向冯自由等报告起事中变情形。冯自由电告孙中山后，孙中山复电称：此后起义须与惠州及钦州、廉州义师同时并举，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即留在香港等候消息。

5月初旬（夏历三月下旬），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有会党二人为清吏捕去，当地同志极为愤激，要求立即举事营救。许

雪湫跃跃欲动，冯自由、胡汉民均劝其静候孙中山命令，并命余、陈二人返黄冈制止。5月22日（四月十一日），余丑、陈涌波等在黄冈提前发动起义，占领全镇。24日，许在香港得到确讯，即于次日率同志十余人赶赴汕头，与乔义生、萱野长知等研究，计划发动丰顺、揭阳、惠阳等县会党响应。27日，黄冈起义军失败。许等于极端懊丧之余，计议炸毁清水师提督李准的运兵轮船，因戒备严密，未能下手。返回香港后，许一面设立机关，召集同志，一面派人潜返内地，准备再次起义。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有关情况，孙中山电召许雪湫到河内报告。在见到孙中山的时候，许表示，土炮不敌洋枪，因此失败。如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运至惠州汕尾洋面，他可以预雇大船数十艘在彼接应，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赞同许雪湫的主张，即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10月8日，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得到萱野的电报：船械五日可到。许遂于9日赶赴汕尾。但在登轮时，发现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的侦探在船，许登岸折回，因此，延误了一日。10月13日，萱野的运械船幸运丸驶抵汕尾洋面，未见接应船只。等待多时，许才乘一小船前来探问。萱野责备许筹备不善，许答应数小时后大船必来，匆匆离去。由于准备起义，汕尾附近聚集了大量会党，早已风声四播，又由于日轮停泊时，沿岸观者无数，这样，就使得清兵加强了戒备。吴祥达派所属兵轮驶近日轮侦查。幸运丸原是三井洋行包租的运煤船，船主遂不听萱野将船暂移别处的建议，径自将船开往香港。不久，粤督又照会香港政府，要求扣留该轮。日本领事得讯后，命该轮启碇返日。

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妄言无实，不负责任”^②。从此，胡汉民对许的印象就一直很坏。雪湫初住香港，后来流亡南洋。因家产被清政府抄没，靠卖药为生。当时，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重点已转向广东西部的钦廉地区和广西、云南等地，无力协助许雪湫再举。黄冈起义失败后，有二三百人随许逃亡，同盟会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出路上也发生困难。这一切，使得许逐渐对孙中山和同盟会产生失望情绪。1908年秋，陶成章到南洋，因在筹款中得不到孙中山的充分支持，加上前此已经存在的思想、策略等方面的分歧，便在南洋另立光复会，与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分庭抗礼。许同情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并带进了一批潮州、嘉应人，光复会的势力因之一振。

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雪湫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到潮州，招兵数百人，组织南路进行军，收复饶平、海阳、惠来诸县。当时，广东各地类似的民军很多，它们大都各树一帜，派捐派饷，不相统属。仅潮汕地区就有十三个司令，雪湫是其中之一。1912年初，驻守惠州的岭东镇守府司令林激真觊觎富饶的汕头地区，以“就饷”为名，企图率兵入汕，受到汕头商会会长赖礼园等人的反对。3月，林军攻占汕头，纵兵抢掠。许雪湫支持林激真，曾带兵抄抢赖礼园家，勒索兵饷。^③事后，赖向广东省方提出控告。同时，士绅巨贾等亦以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呼吁。4月，广东都督陈炯明派清降将吴祥达率兵进驻汕头。5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湫设在汕头道

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湫。12日，奉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湫枪杀④。

注：

- ① 关于浮山一路未能集合的原因，说法不一。刘七辉等《潮州黄冈革命事实》认为是由于“丘松、薛金福等机谋不密”，冯自由《革命逸史》认为是由于“风雨大作，旋聚旋散”，“无法集合”，此据许雪湫《致孙中山电》，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 ②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
- ③ 《林澈真乱潮实纪》，《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
- ④ 《香港专电》，同上，1912年5月14日。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湫》，《革命逸史》第2集。
- ② 伯璜：《司令许雪湫传》，原载汕头《大岭东日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抄件。
- ③ 唯心：《许雪湫烈士事略》，同上。
- ④ 许无畏：《〈革命烈士许雪湫传记〉后序》，《革命烈士许雪湫传记》，1962年新加坡许氏自印本。
- ⑤ 张醒村：《潮汕光复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政协1962年版。

温 生 才

杨天石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家里很贫穷，又无依靠，幼年时就被诱到南洋荷属殖民地去做童工，^①后归国给人家作仆役，又曾投身行伍当兵。1903年左右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生活熬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某次，受当地技师无理鞭打，温生才瞪目怒斥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②1907年冬，同盟会在该地设立阅书报社，温生才读了《扬州十日记》一书，反清思想因之勃发。其后，又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说，非常信服，便托人介绍见面。他向孙中山表示，情愿为“排满”牺牲性命。不久，加入同盟会。^③1909年秋，与人在矿场开办广益学堂，白天汗流浹背地劳动，晚上聚会在学堂里讨论国事。由于觉得革命一时难以成功，温生才与华侨李佐汉等组织暗杀团，决心从暗杀着手，“誓除民贼”。^④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拟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底，他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⑤在给南洋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锡麟）、汪（精卫）二君事失败

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⑥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暗藏五响手枪一支，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到傍晚，见有卫队前呼后拥、喝道而来者，便从茶馆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开枪，连发四弹。卫队、轿夫见状，惊逃四散。孚琦毙命后，他向东校场缓步走去。途中，被巡警等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气宇轩昂，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说：“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声言“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伸气”。又讲：“以我一人，手枪一枝，便吓杀数十旗兵，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官兵无用，将来对待外人，必不可靠！”⑦清吏讯以同党，答称“十八省皆有，以广东为最多”；讯以何人主使，答称“出于自己”；讯以同党所在，答称“遍地皆是，惟伊额头无字，故不能识”；吓以刑法厉害，答称“何不取来试试呀”？⑧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再讯同党及主谋姓名，即闭目不言；施以严刑，不言如故。

4月15日，番禺县令再讯，温生才除痛斥官场腐败外，没有其他的话。县令喝令捆绑，温生才伸直两手，刽子手居然无法使之弯屈。赴刑场途中，温生才神色自然，绝无怯容，行至惠爱街闹市时，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

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⑩

温生才牺牲后,南洋华侨曾编演《温生才新剧》,以誌悼念。^⑪

注:

- ① 《温生才传》,杨仰子,《榕园琐录》卷6。
- ② 辟尘:《烈士温生才事略》,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4月18日;参见古真:《书温生才轶事》,《南社》第23集,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
- ③ 冯自由:《温生才事略》,《革命逸史》第2集。
- ④ 《李佐汉传》,《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北,1969年1月版。
- ⑤ 一说为谋刺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但证以下文“看满贱种太无人道”,“先杀满官”等语,谋刺对象应为孚琦。
- ⑥ 邹鲁:《温生才传》,《红花岗四烈士传》,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9月初版。
- ⑦ 《神州日报》,1911年4月16日。
- ⑧ 同上,4月18日。
- ⑨ 同上,4月22日。
- ⑩ 《光华日报》,1911年9月22日。

倪 映 典

倪映典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885年9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玉泉，是个乡村医生；映典自幼随父亲学医。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和约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年青的倪映典，他不愿再伏处乡里，想出外寻找报国的机会。

1904年，倪映典考入安庆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在学兵营里，爱读欧美革命史和宣传革命的书籍，与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学柏文蔚、孙棨等接近，加入了革命团体岳王会。1906年，他以术科优异成绩毕业，入军见习，因遭排挤，弃差至江宁，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将校科，结业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倪在江宁与赵声、吴春阳、柏文蔚、冷遹、龚镇鹏等相往还，经常在鸡鸣寺聚议革命进行方法。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第九镇被派往萍乡镇压，倪随队出发。他与赵声等密谋寻机响应起义，不果。次年返宁后，应同学邀，往安庆任新军炮队教练。两江总督端方、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以其私自离职，追回禁闭一月，事后又改授马队队官，加以怀柔。同年，经皖抚冯煦请调，倪映典始得回皖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他与该营队官熊成基、步队管带冷遹、薛哲等联络，共谋于次年春间发动起义。1908年2月11日，倪等正在薛哲营中议事，

冷遁匆忙来告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将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秘密逃往芜湖、合肥。由于端方严令通缉，他又偕方楚乔去沪，然后同舟赴粤，投奔赵声。

此时，赵声正在广州任广东陆军小学堂监督。倪映典向赵声报告了安徽起义筹备情况，表示愿得到广东方面的响应。赵声介绍倪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胡毅生等相识，并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云南河口起义开始，缺乏军事人才，倪应召前往，但正待离开香港时，起义已告失败，只好折回广州。于是，他改名倪端，由赵声介绍入新军任炮队见习排长。同盟会在广州军队中的活动，这时已逐渐展开，倪也对部属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宣传种族革命思想。因言语不通，他冒险在黑板上大书“汉亡二百六十余年”八字，士兵大半表示领会。倪喜出望外，继续口讲笔授，介绍岳飞抗金、清兵入关、扬州十日等事迹，启发反清觉悟。同年冬，安庆来信告知将乘太湖秋操起义，约广州响应，倪认为粤军起义条件尚不具备，密电劝暂缓发动，但很快就传来了熊成基起义失败的消息。

1909年春，广东新军步、炮、工、辎各营次第建立，成为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军队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夏，他们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会议，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工。倪是干事员之一，他发给每人二百张同盟会盟票，在军队中扩张组织。当时，他任炮一营右队二排长，旋调任左队二排长。该营管带齐汝汉是安徽人，知道倪一点底细，见倪行动可疑，便借故将他斥革，倪只得在军外继续活动。赵声也因受当局怀疑

被解除督练公所提调职务，不久去槟榔屿。运动新军的责任便由倪映典独力担承。倪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他破除省府县籍贯不同的乡里界限，通过下级官佐、士兵罗激扬、巴泽宪、赵珊林、谭瀛、黄洪昆、王占魁等与士兵广泛接触。他们利用野操和假日，不断将各营士兵带到白云山，由倪演说革命道理，“言至忿际，拍桌几烂，各人则鼓掌赞和”。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军中同盟会员增加到三千余人。

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等报告运动军队情况。南方支部决定次年发动起义，将决定电告孙中山，并电请黄兴、赵声、谭人凤等来港主持。南方支部还发布了倪手订的《运动军事章程十条》，指导活动。在南方支部主持下，起义准备作了明确的分工，倪映典负责新军，张醅村、姚雨平运动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会党，陈炯明、邹鲁、林云陔、莫纪彭、郑赞丞、方楚乔等都参加了活动，筹款、筹械、调查、通信、宣传、联络，均有专人负责。不久，赵声回到广州，住华宁里遇兴隆客栈，主持全部军事。为使赵声无后顾之忧，倪映典与胡汉民相商，将赵声家属从镇江接到香港。

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12月28日发生了突然变故。一标长官发现了同盟会盟票，为此，排长巴泽宪逃亡。这件事虽没酿成大案，却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于是倪映典赶赴香港，将起义时间定为庚戌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元宵节。为避免遭受敌人破坏，起义机关又增加了雅荷塘、清水濠等九处，贮藏枪枝、弹药、旗帜、文件。有的机关由妇女驻守，以掩人耳目。

1910年2月7日(己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借迎接赵声父亲抵港的机会,赵声、倪映典等领导者均赴香港会议起义军事。行后,广州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2月9日(己酉除夕)傍晚,新军二标士兵因细故与店家争执,警察上前干涉,相互交哄,新军包围警局。消息传至香港,倪映典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紧急磋商,认为新军可能因此被遣散,那样就将失去基本队伍,不如孤注一掷。于是,决定正月初六日(2月15日)起义。倪迅即于2月11日(正月初二日)晚赶回到广州。

这时,广州形势更加紧张。庚戌元旦(2月10日),二标士兵结队入城,捣毁警局多处。粤督一面布置镇压,一面派人安抚、压制。新军协统张哲培到二标训话,并将枪机、弹药运进城,宣布全协初二日不放假,初三阅兵。初二日,驻北教场的二、三标已被防营监视,驻燕塘的一标因不放假大哗,又因传有兵来攻,纷纷夺械出防。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到各处夺取枪械子弹,协统、标统均逃避。当晚,奉命安抚士兵的军官黄士龙回城时又被旗兵打伤,新军群情更加激愤,跃跃欲试。

该晚,倪映典了解到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次日起义。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上午,倪映典来到燕塘炮一营,这时,齐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倪用枪将齐击倒,号召士兵们起义,炮工辘四营响应,推倪为总司令。倪率队到一标,击毙队官胡思深,士兵响应。倪分兵攻城,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清军早有防备,水师提督李准坐镇东门,派统领吴宗禹率二千余人分路进攻。下午,两军相遇,吴部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新军进入阵

地。清军管带童常标(倪旧部、同乡)、李景濂(同盟会员)心怀不良,施毒计谋害倪映典。他们伪装调停,诱使倪上前会面,倪未加怀疑,当面晓以大义,以争取防营一同行动。童等佯装赞同,推此事须请示统领,驰回阵地即下令开枪。倪还在巡视战场,受伤堕马,被清兵抢去,砍头而死。

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奋起猛攻,激战一小时有余,终因伤亡惨重、弹药不继而退却。延至次晚,起义军的反抗全为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倪映典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过去习惯称之为“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吴 樾

尚明轩

吴樾^①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县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父亲吴尔康，先官后商，经常在外。吴樾七岁丧母，靠二哥抚养。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十二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十九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②从此，他放弃了由科举进身的道路。1900年到上海，打算进“广方言馆”，因其过份偏重外语，自己不喜欢，便离开上海北上，到了直隶（河北）保定。1902年，经乡前辈吴汝纶（时长莲池书院）指点后，在清苑县报名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这时他所抱的志愿，还只是将来获得“出身”，当一名教习。入校后，交游渐广，眼界日开，在当时革命思潮影响下，他更加喜欢议论时政，思想上在起着变化。

1903年是吴樾政治认识上起伏激荡的一年。据他自己回忆说，这年他先从朋友那里得到《革命军》一书，反复阅读，受到启发，“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警传，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③但是，他不久又受到《清议报》宣传的影响，反而一度推崇起改良主义者的康、梁来，曾说，若“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又过了不久，他接连

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及《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报刊，思想上又起了变化，“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④是年暑假，吴樾与同学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相偕南旋省亲，道出沪上，探西牢访问章炳麟、邹容，会晤陈仲甫、张继，并购读上海所出版的《廛书》、《仁学》、《嘉定居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进一步发展，从此，毅然与改良派决裂，斥康、梁等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认定他们是些“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敌”的人。^⑤他反对康、梁的“立宪”主张，痛恨保皇党人，“念念欲杀尽此辈”。^⑥

从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起到 1905 年离校前，这四年中间，吴樾还和当时一些爱国志士有直接交往或通信联系。他和在南方的陈天华、蔡元培曾通过消息；和杨守仁（笃生）共同推进过军国民教育会的工作，吴负责该会保定支部；和赵声在保定相识，并结为好友；还到上海和秋瑾接洽过。^⑦他怀着满腔的热忱，日益关怀国家民族的安危，每与友人“谈及国亡种削之势，辄饮泣不止”。为了宣传反清排满，他在保定创立过两江公学，自兼教师，并办过《直隶白话报》。

当时，一些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策动起义迭遭挫折之后，转而接受虚无党的思想，热衷于搞个人恐怖活动。他们幻想杀几个、几十个满族权贵，使反动统治者畏惧走避而取得反清的成功。有些革命派报刊也不断倡导冒险暗杀，宣扬暗杀活动的“神妙”作用。暗杀之风一时大盛。吴樾耳濡目染，也笃信此说，并成为这种冒险事业的一个积极鼓吹者与实践者。清户部侍郎铁良是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满族亲贵，遂成为暗杀猎手们共同追踪的对象。1904 年一年内，有在南京下

关和河南顺德两起谋划狙击铁良的案件发生,但都没有成功。吴樾也把铁良作为自己暗杀的目标,他特为走访曾参与暗杀铁良的胡瑛,慨然以后继自任,倡言:不杀铁良,不足以言革命!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暗杀时代》,说明要杀铁良的意义与决心,以备自己牺牲后留传给后人。同年,吴樾与赵声在保定酒楼谈论反清革命行动时,还谈到军事行动与暗杀活动的难易问题,他对赵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⑧又说:“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者,必吾子也。”^⑨

1905年,吴樾在保定师范学堂临近毕业时,未参加考试即离校去东三省,将欲有所作为。7月,他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绍英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认为这是清政府欺骗人民的手段,如果得逞,会麻痹人民的反清情绪,延长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于是他决定把暗杀铁良改为暗杀载泽等人,借以揭露清政府的阴谋。为此,吴樾从东北潜入北京,寄居前门外桐城会馆,多方侦探五大臣的出国日期,并写好绝命书数封,待机行动。9月24日,考察宪政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车,准备出发。吴樾怀揣炸弹,^⑩赶往车站,但站上戒备森严,不能靠近。他急忙买了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的专车,正准备投掷炸弹时,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突然震动,炸弹引发,五大臣仅绍英与载泽受轻伤,而他本人反不幸肢断腹裂,以身殉难。

吴樾牺牲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陈骨骸数日,也没有人认领。后侦缉员史某到桐城会馆,才查清这桩震动一时的刺杀案的发难者是吴樾。一年多后,1907年4月,《民报》临时

增刊“天讨号”在刊载吴樾的《暗杀时代》时，将他在死难前致章炳麟与致其未婚妻的信件同时收入。这几封信，明白地表露了吴樾自我牺牲、以身报国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吴樾遗骨营葬于安庆平头山。

注：

- ① 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据潘赞化私拟之《吴樾别传》谓：“樾，潘传作越，谓名本越也，樾乃清吏惩罚人加偏旁如孙汶云。”另据姚瀚《吴樾烈士之略历》谓：吴越是原名，“弃前名加木傍为樾，在烈士意思，无木傍之吴越为专制政府之小奴隶，有木傍之吴樾，为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
- ② 邹鲁：《吴樾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48页。
- ③④⑤⑥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
- ⑦ 吴樾与蔡元培、杨守仁、赵声、秋瑾的交往关系，散见于一些回忆著述中，片言只语，缺乏具体材料。
- ⑧ 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 ⑨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
- ⑩ 吴樾使用的炸弹，章士钊推断是由杨守仁供给的，时杨隐于北京译学馆。（见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林 文

张长茹 闻少华

林文，黄花岗烈士之一，字广尘，初名时埙，福建侯官县（今闽侯）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①。幼年丧母，靠姐姐抚育长大。父林晟是个举人，曾在浙江做过官。林文十五岁随父到浙江，进了学堂，能诗文，善书法。在校中和林尹民（黄花岗之役另一烈士）最友好，后林文赴日，使林尹民“有失侣之感”。

1905年林文到日本留学，开始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后改学法科。他到日本后，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痛恨清廷的腐败，决心参加革命，挽救祖国的危亡。8月，同盟会成立，他参加同盟会，积极工作，担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还参加《民报》的经理工作。林文自参加革命后，和黄兴、赵声等人往来密切。因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在革命党人中，大家都称之为“林大将军”。林文二十岁后，有人劝他娶亲，他曾说：亲爱的祖国就要遭到瓜分了，人民也快要当奴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追求小家庭的幸福？！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林文多半参加了。他频繁地往返于南洋、香港之间，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深为孙中山所器重。

1909年，汪精卫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决计到北京冒险刺摄政王载沣，林文不赞成这种行险侥幸的活动，曾“极力谏阻”，无效^②。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林文住在香港，因经济来源断绝，和黄兴、赵声等人“佣耕自给”^③。以后他同赵声等返回日本，日本警吏知道林文是革命党的重要分子，非常注意他的行动，但他满不在意。同年夏，谭人凤、赵声、宋教仁等初步提出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组织中部同盟会进行革命的主张，林文很赞成这个意见，参加了酝酿。

同年11月，孙中山从美国到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黄兴、赵声等人开会。号召革命党人不怕失败，继续斗争。会上，决定筹集巨款，集中力量，挑选革命党五百人组织“选锋”（敢死队），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起义。当时，林文在日本，正生病。第二年春接到黄兴、赵声等人来信，要他集合留日同志前往广州参加起义。林闻讯感奋，于3月5日同林觉民、陈可钧、陈更新等人一道赴香港。临行，他对同志们说：“我辈行军，志在‘弔民伐罪’，慎勿戮及无辜”，即使对满族人，他也主张“亦仅当歼其抗我者”^④。

起义日期统筹部原定于4月13日，不料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署广州将军孚琦事件，敌人加强了戒备；加上起义准备工作也未就绪，急需的军械款项又未能完全运到，因而起义时间一再变动，林文等于4月23日才得以潜入广州。

原定起义队伍分十路进攻，临时又改成四路：第一路由黄兴亲自率领，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领，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新军进城。第三路，由陈炯

明率领，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则率领第四路起义军，把守南大门。由于种种原因，有三路起义队伍未能及时发动；所以，实际行动起来的只有黄兴领导的一百多人的队伍。4月27日下午5点20分，起义开始。林文随同黄兴率领队伍，自小东营出发，他左执号筒，右挟小枪，身怀炸弹，腰佩短剑，走在最前列，杀了路上的巡兵，攻到总督衙门，和战友们一起用炸弹炸死门前守卫数人，攻入督署。黄兴率领十余人也由侧门攻入。他们由投降的清兵引路，直入内院，总督张鸣岐已闻风逃遁，没有捉住。于是黄兴、林文等就放火烧总督衙门，又从里边冲杀出来。接着，起义军到了东辕门，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林文曾听赵声、姚雨平等人说过，李准的部下有很多是革命党人。他就上前去打招呼，高喊：“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不要打，不要打！”^⑤不料话还没有喊完，头上已中了敌人的子弹。这位年青的革命党人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那时，他还不足二十五岁。

注：

- ① 林文的生年没有直接记载，他死于1911年，林文传的作者天啸生说他这时二十五岁。据此推算，去掉虚岁，他应生于1887年。
- ② 谭人凤：《石叟脾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0页。
- ③ 天啸生：《林文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第8页。
- ④ 同③，第8—9页。
- ⑤ 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辛亥革命》（四），第271页。

杨 笃 生

杨天石

杨笃生原名毓麟，号叔壬，湖南长沙人。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十五岁中秀才，后肄业长沙岳麓、城南等书院，泛览文学、历史等各类书籍，尤其留意于经世致用之学。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失利，杨笃生感愤时事，作《江防海防策》，痛诋清朝政府中投降派的误国。1897年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后，以知县分发广西，没有去上任，被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与梁启超等一起倡言变法。戊戌政变发生，清朝政府查拿改良派人士，杨笃生逃到乡下躲藏起来。

1900年之后，杨笃生在湘绅龙湛霖家教馆，常私购禁书，于深夜中偷读，思想境界随之大为开阔。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具有“世界之知识”。1902年东渡日本，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这时，他交游渐广，思想逐渐转向革命，曾与黄兴等共同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又曾写作并出版《新湖南》一书，批判康、梁等的保皇言论。他呼吁湖南“中等社会”（指知识分子）奋起“排满”，热情地讴歌“破坏”，认为世界各国中“破坏”精神最强的要数俄国的“无政府党”^①。1903年拒俄运动中，他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后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为江南一带的“运动员”，负责筹备经费与联络同志。为模仿俄国“无政府

党”从事暗杀的做法，他与苏鹏等在横滨秘密设立了炸药制造所，学制炸药。一次，因失慎炸伤一目。1904年夏，他与苏鹏、张继等潜入北京，计划在颐和园至西直门的路上炸毙慈禧太后。一直窥伺了四五个月，终因无隙可乘，带着失望与愤懑的情绪离京赴沪。

杨笃生到沪后，和蔡元培、章士钊等设立秘密机关，继续研制炸药，同时联络各省留日同志，策应黄兴等在长沙发动的起义。10月，长沙起义因事机泄漏失败，黄兴脱险来沪，在新闻路余庆里设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被推为会长。次月，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被搜查，杨笃生被列入追捕名单，但幸得脱走，自此改名守仁。

在几经挫折后，杨笃生认为在边远地区发难不如在首都收效快。因此，他再次入京，以任译学馆教员为掩护，计划从事“中央革命”。不久，应赵声要求，到保定与吴樾等共同组织北方暗杀团（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当时，吴樾等只知道用手枪，杨笃生向他们提供自制的炸弹，并一起入山进行试验。1905年7月，清政府准备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一消息传出后，杨笃生与吴樾策划对他们施以暗杀。于是，先由杨笃生活动，谋得载泽随员职务，以为内应。9月24日，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清政府大肆搜索，但没有怀疑到杨笃生。12月，五大臣启程出洋，杨笃生随行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张继等见面商量，决定辞去随员职务。其后，杨笃生回到上海，设立江海交通机关。1906年6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4月，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

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有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②。同年5月，报社被邻近火灾延及，仓促中杨笃生从楼上攀缘电杆而下，幸免于难，但机器、财物大部分损失。灾后，于右任离社，剩下杨笃生辛苦支撑局面。他有时就睡在铅字架旁。

1908年春，杨笃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书记，随行至欧洲。1909年冬，蒯回国，杨笃生改入苏格兰的爱伯汀大学学习，同时任《民立报》欧洲特约通讯员，为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工党、社会党、无政府党的活动情况。经过考察，杨笃生终于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国家，排斥爱国论”，“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③。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时杨笃生适患头部浮肿病。他听说黄兴战死，非常悲伤。后来，得到确讯，知道黄兴无恙，才略感安慰。不久，又传闻列强有瓜分中国之说，他深受刺激，病势加重。正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同在爱伯汀留学的章士钊与保皇党人有来往，因而和章发生冲突，关系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到刺激^④；同时，又因服用硫磷类药物过多，遍体炽热，痛苦难忍^⑤。他便买票至利物浦，想觅一手枪，乘船归国，“寻一民贼死之”^⑥。但又觉得海天万里，非旦夕可达，于是，就遗书给在伦敦的吴稚晖，告以“脑炎剧发，不可复耐，有生无乐，得死为佳”^⑦，嘱他将自己所存英币百镑代为捐献，作为革命党人开办小型炸弹厂的基金，或寄给黄兴，解决他经济上的困难。

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注:

- ① 《新湖南》第5篇。
- ② 骚心(于右任):《吊杨笃生文》,《民立报》,1911年8月8日。
- ③ 耐可(杨笃生):《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民立报》,1911年6月14日—7月8日。
- ④ 孤桐(章士钊):《与杨怀中书》,《甲寅周刊》第1卷第33号。
- ⑤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甲寅杂志》1卷4号。
- ⑥⑦ 《杨君笃生绝命书》,《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张 文 光

王学庄

张文光字绍三，亦作少三，云南腾越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五月）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自幼读书不成，随父亲张纪三经商，往来于腾越和缅甸间。文光生性刚强，不畏势，不吝财，路见不平，尽力相助，在乡里间颇有威信。他目睹英国在边地的侵略掠夺和清朝的屈辱卖国，非常激愤。1906年，中国同盟会会员杨振鸿来腾越任清军巡防营管带，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张文光在杨的启导下加入了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他积极散发文件，发展会员，进行联络，并拿出家产来做革命活动经费。

1907年，杨振鸿因革命嫌疑被解职，离滇他去，张文光继续活动。他公开创立了自治同志会，以拥护立宪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08年12月，杨振鸿回滇发动永昌（今保山）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病死于蒲缥，张文光便独自担负起滇西革命的领导责任。他广泛进行宣传与组织，同活跃于当地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1911年春，张文光预备响应广州起义，被叛徒出卖，他先期闻讯逃走，自治同志会被强迫解散。张文光流亡缅甸，继续指挥滇境的革命活动。他将注意力转向军队，通过同盟会员与会党分子联系当地驻军。在这些活动中，哥老会首领、新军排长陈云龙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缅境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认为滇西起义的时机已到，便赶回腾越布置。他在城外宝峰山宝峰寺召集党人会议，决定从夺取军队开始起义行动。10月24日，又借野操机会，集合各支军队中的革命党负责人在叠水河五皇殿开誓师会，议定起义的军事部署。10月27日下午，张文光亲率党人一队，袭击巡防队第四营，同盟会会员李学诗内应，击毙该营管带，夺得指挥权。同时，陈云龙在新军第七十六标第三营、彭冀等在巡防队第五营，也分别裁决抗拒的军官，率队起义。经过一昼夜激烈的战斗，夺取了腾越全部城乡，清朝腾越镇总兵张嘉钰自杀，迤西道宋联奎投降。腾越街头飘扬起九星旗，四处张贴着起义军告示，告示上大书“皇汉纪年”和“发起人张文光”，宣布禁令：“民军擅入人家者杀毋赦，民军抢夺人民财物者杀毋赦，民军奸淫民间妇女者杀毋赦，妨害外国人生命财产者杀毋赦。”^①

11月11日，起义军的首领们在腾越自治公所会议，决定设立政府，扩充军队。张文光被推为滇西都督府都督，陈云龙为都指挥。原地方諮议局议长寸开泰等议员、绅士也参加了政权。张文光还亲自登门，邀请当地学堂的进步师生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并特地组织了“士林营”。起义后，腾越秩序稳定，但是，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却心中无数。他在一封电报中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②

杨振鸿生前拟定的云南革命方针是“滇西首义，推动全省”。张文光按计划派出三路军队，由彭冀、李学诗、刘德胜率领，分别向永昌、顺宁（今凤庆）、云龙进军，陈云龙率队为各军后援。滇西军主力攻克永昌后，由陈云龙率领进逼大理。这

时,昆明已有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滇境出现两个并立的革命军政权。大理新军反正后站在昆明一边。滇西军的东进引起了两个政权的冲突。蔡锷通电要求腾越服从省城,撤回军队。滇西军沿途收容会党,已经扩充到二十三营三万余人,军纪涣散。陈云龙不听张文光的命令,其他将领也不受陈的节制,先后攻占了大理的几个属县。11月24日,哥老会头目刘竹云恃胜进攻,被训练有素的大理新军击败,全军退回永平。这次冒失的进攻造成了滇西政权的困难处境。11月30日,蔡锷派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兼任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率军赴大理,准备进攻永昌、腾越,迫使滇西军就范。为了防止冲突扩大,张文光力排众议,强令军队撤回永昌。李根源也是腾越人,与家乡革命党人和士绅都有关系,也力主和平解决。12月17日,李到大理,张文光派代表前去欢迎,双方进行谈判,议决滇西裁军,地方官由省任命,惩办刘竹云等肇事将领等九项条件,张文光通电赞成。1912年2月1日,李根源抵腾越,张文光撤销了滇西都督府,交出权力,由蔡锷委以协都督名义,统辖腾越、永昌、顺宁驻防军。腾越随即改名腾冲。陈云龙离军出走,后来在北京被段祺瑞杀害。

蔡锷督滇时,实权操在部将、原同盟会会员李鸿祥、谢汝翼手中。李、谢攘夺权力,排除异己,对张文光很看不起,联合省城士绅大肆攻击。1912年底,李根源离滇,张文光在省方更失去了唯一的支持。次年4月,被调任徒具空名的云南提督,驻大理,谢汝翼以师长身分兼迤西镇守使,统辖腾冲。李、谢支持大理驻军竭力排斥张文光。对此,张郁愤地说:“今共和名成立,根本未固,瞰吾隙者正多。若辈攘窃权位靡已,宁非

衰亡清余气，自献于异族乎。我不忍与共事。”^③于是辞职归里。张家旧称腾越富室，由于接济革命，至此已无余财。二次革命后，许多旧日党人流亡日本，张也拟赴日留学。这时，唐继尧接替蔡锷任滇督，大理会党杨春魁等起兵反唐，用张文光、李根源名义为号召。谢汝翼找到了铲除张的机会，便借此告发。唐将谢的状子报给袁世凯，袁宣布张为“叛逆”。但是，僻居腾冲的张文光并不了解外界政情的变化，依然在准备起程。1914年1月14日，张文光与卸职部将黄安和到腾冲硫磺塘温泉沐浴，谢汝翼派官兵二十余人冲入浴室，乱枪齐发。张身中十余弹，当场遇难。黄以身躯护张，夺枪击毙三个暴徒，但寡不敌众，亦遭杀害。

注：

- ① 曹之骥：《腾越光复纪略》，《复滇录》，1924年上海泰东书局版。
- ② 张文光：《致黄炳成电》，《永昌府文征》。
- ③ 李执中：《张文光君传》，《李执中先生传》附录。

席尼喇嘛(乌力吉吉尔格勒)

赵相璧

席尼喇嘛本名乌力吉吉尔格勒(又作乌勒吉扎尔噶勒),1866年(清同治五年)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父亲奥其尔是伯斯哈拉劳赖台吉的牧奴;乌力吉吉尔格勒刚满七岁也被父亲送到牧主马什家去放牛。

1879年,乌审旗爆发了反抗封建领主、抗拒差徭赋税的“独贵龙”^①运动。这次群众性的“独贵龙”运动,给当时年幼的乌力吉吉尔格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81年起,乌力吉吉尔格勒被抓到乌审旗王爷府里服了五年差役。在王府服役期间,他从一些见习“笔帖式”(即文牒人员,相当于文书或秘书)的青年人那里学到了蒙文,1889年充任了王府的“笔帖式”,由于他富有才干,不久又晋升为“京肯笔帖式”。从此,他有了参与王府政务的机会,亲眼看到了该旗封建王公勾结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残酷地压榨人民的真相。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10月清朝反动统治者西太后从西安动身回北京,乌审旗王府派乌力吉吉尔格勒为随驾侍从人员,从西安护送到北京。从此,乌力吉吉尔格勒在北京住了数年之久。这使他增加了见识,开拓了眼界,对他以后的革命活动有很大帮助。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暴行，看到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丑态。与此同时，他知道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英勇事迹，以及革命党人谋求推翻清廷的消息。

乌力吉吉尔格勒从北京回内蒙不久，1905年乌审旗爆发了以抗垦为中心的“独贵龙”运动。领导这一次运动的是白音赛音和王喇嘛。他们先后在各地组织了十二个“独贵龙”，参加的群众约有二千多人。乌审旗人民的“独贵龙”运动，使乌力吉吉尔格勒感到极大的鼓舞，他断然辞掉“笔帖式”职务，参加了这一运动。乌审旗的王爷察克都尔色楞听说乌力吉吉尔格勒参加了“独贵龙”，大为惊慌，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乌力吉吉尔格勒就范。但是，乌力吉吉尔格勒不为所动。相反，他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自己的身份，于1907年出家当了喇嘛，从此人们尊称他为席尼喇嘛，即新喇嘛。

乌审旗的这次“独贵龙”运动，由于群众坚决斗争，逼使清政府和蒙古王公暂时停止了对乌审旗土地的放垦。影响所及，伊克昭盟各旗的抗垦斗争也相继兴起了。这对清政府是一个沉重打击。因此，清政府随即改变策略，实行武装开垦政策。但是，乌审旗的“独贵龙”群众并没有被清政府的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斗争，坚持到1910年。后因领导人的被捕被杀而失败了。

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席尼喇嘛团结了六十个安达（盟兄弟）作为核心，在乌审旗组织了十一个“独贵龙”，再一次举起了抗垦反王公的大旗。他被群众拥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乌审旗的“独贵龙”群众，杀死了哈屯（王爷之妻）娜仁格日勒，赶走了王爷察克都尔色楞，接着他们又

宣布废止一切差徭赋税，沉重地打击了该旗的封建特权制度。这标志着“独贵龙”运动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同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起来了。

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发展，惊动了袁世凯政府，1915年袁政府指使北京蒙藏院下令革除了乌审旗扎萨克贝勒察克都尔色楞的旗扎萨克及其贝勒的职衔，委派其子特古斯阿木古郎继任旗扎萨克；同时还下令给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和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宾巴雅尔，要他们对于“独贵龙”之首领乌力吉吉尔格勒“联衔缉捕，归案惩处”，并“立即解散所聚蒙众”^②。

1916年，伊克昭盟盟长派官员到乌审旗来镇压“独贵龙”运动。当时席尼喇嘛领导着“独贵龙”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挫败了伊克昭盟盟长的官员们企图逮捕他和解散“独贵龙”运动的阴谋。1917年，伊克昭盟盟长再次派官员到乌审旗进行镇压，当时“独贵龙”群众为了保护席尼喇嘛，就对那些官员说：“我们共同要求有水供我们饮用、有牧场供我们放牧的法规，要求严惩奸狡贪婪的官吏，摆脱苦难。所以同心合力，组织‘独贵龙’，一致申明怨恨，并非乌力吉吉尔格勒一人所为。”^③奉命而来的官员，见群众团结一致，无机可乘，只得颓丧而回。

1919年，伊克昭盟盟长亲自率兵到乌审旗镇压“独贵龙”运动。席尼喇嘛等数十人被敌人诱捕。1920年，席尼喇嘛越狱逃到北京，在京住了四年。这个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受到了党的影响。

1924年，席尼喇嘛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在那里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了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1925年冬，席尼喇嘛参加了在张家口举行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春，席尼喇嘛在乌审旗重新组织“独贵龙”，并积极宣传了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思想。于是，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火焰又重新点燃起来。全旗组织起七个“独贵龙”。他们在嘎鲁图店召开“独贵龙”大会，准备成立全旗性的“独贵龙”组织。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几百人。不料在大会进行期间，遭到王爷府军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同年夏，席尼喇嘛建立了乌审旗保卫队。冬天改编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席尼喇嘛任团长。从此，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进入了武装斗争的阶段。

1927年春，乌审旗的“独贵龙”组织，在席尼喇嘛的领导下，已经发展到了十七个，参加的群众更多了。他们把乌审旗王爷旗扎萨克特古斯阿木古郎及其官员和一部分王爷的军队逐出乌审旗，并建立了乌审旗人民自己的政权——公众委员会。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被逐出乌审旗之后，就逃到陕西榆林，与陕西地方势力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勾结在一起，对乌审旗的“独贵龙”组织进行过多次反扑。

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从它建立起，就同陕西封建土著势力和蒙古封建王公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7年正月初五日，当革命军在莽哈图刚刚度过春节，乌审旗王爷的军队约三十余人，由“独贵龙”运动的叛徒丹达率领，偷袭革命军。幸席尼喇嘛先有所闻，作了准备，给来袭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初七日，席尼喇嘛主动出击，包围了丹达的反动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彻底把这部分反革命武装打垮，迫使丹达

走投无路而自杀了。

2月13日，革命军一百余名，在乌拉干托落盖庙驻防。时乌审旗王爷勾结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派骑兵二百余名，包围了人民革命军，企图消灭这支人民的武装力量。但是，人民革命军的战士，在席尼喇嘛的指挥下，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终于把敌人击退。

9月，几方面的敌人对内蒙人民革命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进攻。这次敌人动员的反动军队有乌审旗王爷的军队，伊克昭盟盟长派来的军队，还有陕北井岳秀的军队，共一千五百余人，分两路向席尼喇嘛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夹攻。席尼喇嘛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没有被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相反，他指挥人民革命军采取游击战术，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于沙丘蒿草丛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次战斗，由于席尼喇嘛等人的正确领导，广大牧民的支持，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联合进攻，保存了革命力量。

1928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原先和席尼喇嘛一起战斗的赛音巴雅尔投降了国民党，而席尼喇嘛继续领导着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在乌审旗坚持斗争。

7月，陕北井岳秀又有两次派兵侵入乌审旗境内，被人民革命军所击退。8月，井岳秀和乌审旗王爷的反动军队联合起来分兵两路向革命军进攻，席尼喇嘛也分兵两路去迎击。第一路在塔玛嘎大道与敌人遭遇，杀敌三十余名，击退敌军；另一路在芒哈图地方与敌人相持，塔玛嘎大道取胜的革命军赶来增援，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之后，敌人在革命军的痛击之下，乘夜逃窜了。9月，井岳秀派出马步兵两千余人，携带数门

大炮和机枪，伙同乌审旗王爷的军队，侵入乌审旗。席尼喇嘛当即派出军队袭击了敌人，粉碎了敌人对革命军的“围剿”。

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在席尼喇嘛的领导下，四年当中，前后与敌人进行过数十次战斗。在许多次战斗中，常常以少胜多，取得辉煌战果，保卫了乌审旗人民的利益。1929年春，席尼喇嘛为叛徒所杀害。

注：

- ① “独贵龙”——是近百年来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参加“独贵龙”群众到约定好的地点坐成圆形，共同研究讨论当前的斗争问题。他们在讨论通过的决议上，或是在给王公官府呈文上的签名，亦写成圆形。以这种形式表明参加的人都是平等的，且有掩护领导人的作用。“独贵”在蒙语中是圆的意义。
- ② 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给伊克昭盟盟长公函。乌审旗蒙文档案资料（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藏，并有译稿）。
- ③ 乌审旗蒙文档案资料（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藏，并有译稿）。

何 香 凝

尚明轩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人，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

何香凝的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并经营地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资本家。何香凝1879年7月16日（清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香港。童年时爱好读书，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设法学习文化，尤其喜听人们讲述反清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以太平天国的女战士为榜样，反对缠足，曾多次剪掉母亲强给她裹的缠足布，表现了反抗封建束缚的精神。

1897年10月底，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他俩志趣相同，感情很好。1902年秋，廖仲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拟赴日本留学。何香凝变卖妆奁，为之筹集费用，以成其志。同年冬，她也东渡日本，于1903年初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06年秋，再次考进目白女子大学，攻读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在高等科学习绘画，并向当时的名画家田中赖章学画动物。1910年秋，在美术学校毕业。

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人往来密切，加上受到当时

革命思潮的推动，勃发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从此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她的东京寓所，是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经常和党人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如收转信件、看守门户、照料茶饭、掩护同志等等。同时，还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廖仲恺等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驳斥康、梁的谬论，和保皇派进行斗争。她热情洋溢，不辞劳苦，踏实工作，深受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敬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奥巴桑”（日语，意为老管家、老太婆）。

1911年2月，何香凝在“黄花岗之役”前不久回到香港。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在广东省军政府工作，何香凝随同到了广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离开广州，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为了反袁，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联络活动。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1917年她又在上海从事海军家属的发动工作。

1921年夏，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时，何香凝同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宋为会长，她担任总干事，带领慰劳队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变前夕，廖仲恺于14日应陈电邀前往惠州，甫抵石龙即遭扣留，旋被囚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四出奔走，多方营救。廖仲恺于8月19日脱险后，两人设法离开广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失败以后，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了

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毅然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何香凝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忠实执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妇运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她积极推进妇女群众运动，一面开办劳工妇女日校、夜校及贫民妇女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一面又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旬刊，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革命，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同年秋，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武装暴乱。在平乱斗争中，她组织人民救护队，赴广州西关区救护伤员；并筹措经费，抚恤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家属和慰问受伤的工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兼程入京护理。孙中山病危时，她含着眼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①孙中山当时紧紧握着她的手，以断续的声音向她道谢。孙中山临终口授遗嘱，她是当时在场的证明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于同年5月回到广州，和廖仲恺一起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6月，为了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阴谋叛乱，她奔走各地，筹募经费，慰问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广州沙基“六·二三”惨案发生后，她领导广州妇女组织救伤团及慰问队，亲往现场救护和慰问伤员；还组织演讲团，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7月，她专为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女工和工人家属，创办了“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日作

工,夜学习,既保证了生活,又提高了政治思想,引导大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坚决贯彻三大革命政策的廖仲恺等极端仇恨。这年8月20日,何香凝伴同廖仲恺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反革命暴徒的狙击,廖仲恺当场遇难。何香凝目击一切,悲愤已极,“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②,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③。

廖仲恺牺牲以后,何香凝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志而勤奋工作。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宣布:“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④并明确指出:“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⑤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进行对东征军人的救护工作,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她号召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同立于一条战线之上”,才能求得解放;并指出,妇女“唯一的生路”,就是努力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工作。^⑥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地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积极地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她组织

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军出发，先到南昌进行慰问与救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她同共产党人邓颖超等共同制订了妇女运动的规约，并经过共产党人和大家的努力，把规约中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及男女都有遗产继承权等项，在汉口地区一度付诸实行。此外，她还同宋庆龄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恐惧不安，阴谋策划一系列的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早在北伐战争以前，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就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何香凝听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⑦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指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⑧她和彭泽民、柳亚子等向右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之后，她继续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⑨她把切实贯彻“扶助农工”政策，视为当时“刻不容缓之要图”，指出：“农工占我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⑩她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何香凝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的罪行，极为愤慨。她既不参加邓演达组织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也坚决拒绝加入汪精卫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的“证婚人”，并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不久，她回到广州，专心创办仲恺农工学校，“思树立解放劳动群众运动之基础”^①；并曾在1928年亲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以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随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于1929年离开广州出国，先赴伦敦，后到法国，居留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于同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权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并郑重宣布：“此后坚决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努力尽“国民一份”应尽的责任。^②她和几个不肯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的战友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组成了“寒之友社”，经常在一起作画题诗，抒发积愤。她还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为办理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③。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兴奋得热泪满襟，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日战争。她不顾身体多病，积极向市民宣传抗战；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亲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给抗日将士发军饷；四处奔走，为十九路军征募军用品和慰问品；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

工作,创办了伤兵医院,并经常到医院去进行慰问。

经过“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何香凝更清楚地认识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丑恶面目。1935年,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如下的一首诗:“杜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⑭强烈地鞭挞了他的卖国行径。

何香凝始终是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的忠诚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数千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⑮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1937年2月,她同宋庆龄、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⑯同年春,她热诚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救国会的理事。这年6月,又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并在所发表的宣言中严正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也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⑰1939年3月,她在香港著文明确指出:只有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⑱此时,她常对人说自己是“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员”,表示她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而不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员。1942年

在桂林的一次民主人士集会上，与会者约定每人留言纪念，她写的一句话是：“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⑩

何香凝爱国情深，抗战信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制造分裂的罪恶活动。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就在这个民族败类发出艳电的次日，何香凝立即写文怒斥这个卖国贼“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严加惩办，并指明他的所谓“防共”，“就是灭华，……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请人灭华”。她认为汪投敌后，“敌友之界线既明，抗战之信念益坚”^⑪。与此同时，她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启发下，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不仅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⑫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何香凝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坚决拒绝到重庆去。1937年冬，她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从上海迁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同年7月，迁居桂林；1944年夏，再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不论流亡到何处，她总是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并为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及款项。她带着一家妇孺，靠卖画度日，备尝艰苦。尽管如此，她从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任何馈赠。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送去一百万元支票和请她到重庆去的信，她在信封后面写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

退回^②。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何香凝从1942年定居桂林起，就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柳亚子、蔡廷锴、李任仁、陈此生等人接触，要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1944年移居八步后，仍继续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对蒋介石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更加积极地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和陈此生等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11月，她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着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1946年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正式成立。不久，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这时，何香凝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她说：“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③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场所。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何香凝在大会开幕的讲演中，宣布奋斗的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④。1948年1月，她终于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员及组织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

月，她由香港到达北平。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何香凝能作旧体诗，擅长国画，尤工画虎和松、梅。她写诗作画，署名“双清楼主”^②。她的诗词和绘画作品，有相当多的数量反映历史的重大事件。她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她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全国解放以后，何香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职。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侧，与廖仲恺合墓。

注：

- ① 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页。
- ② 同上书，第59页。
- ③ 《廖夫人香凝女士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三民出版部1927年版，第29页。
- ④⑤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省港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记》（1925年8月27日），《工人之路特号》，第六十五期。
- ⑥ 何香凝：《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的生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编《妇女之声汇刊》，1926年版，第20页。
- ⑦ 陈此生：《回忆香凝老人》，稿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⑧ 参见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香港朝阳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 ⑨ 《廖夫人训话》，黄埔同学会1926年8月印《黄埔潮周刊》，第三期。
- ⑩ 《何香凝提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文华印务局1928年版，第160页。

- ⑪ 《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 ⑫ 何香凝：《对时局之意见》（1931年12月19日），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 ⑬ 同⑪。
- ⑭ 《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1935年），《何香凝诗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 ⑮ 《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61页。
- ⑯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 ⑰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 ⑱ 何香凝：《“三八”我要说的话》，香港《大公报》，1939年3月8日。
- ⑲ 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广西日报》，1962年11月8日。
- ⑳ 何香凝：《斥汪兆铭》，香港《星岛日报》元旦增刊，1939年1月1日。
- ㉑ 《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 ㉒ 同⑲。
- ㉓ 据本文笔者访问陈此生的记录。
- ㉔ 参见《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记录》，《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记录（一）》，原件，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 ㉕ 当年廖何婚后，无力自立，寄居廖的兄嫂家中，但他们不给房间，只好在屋顶晒台上面搭一小屋居住。因在屋顶赏月、读书最为适宜，故名其小屋为“双清楼”。“双清楼”，乃人月双清之意。廖牺牲后出版之《双清词草》，也具有同样含义。

谭人凤

周天度

谭人凤，号石屏，湖南新化县人，生于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十三岁中秀才，爱读《船山遗书》。十六岁参加洪门组织。甲午中日战争后，接触新学，思想眼界渐开，对时局日益表示关心。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涨，谭人凤决心从事反清革命。1903至1904年间，曾在新化县城创办革命机关福田小学，自任校长，召集江湖党友，活动于湘西一带，待机起事。由于走漏了风声，被当地官府追捕，于1906年冬逃往日本。

谭人凤到日本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委派，和宁调元、胡瑛等回国策应。到湖南后，起义已失败，他只得重返日本。1907年初到东京后，入法政学校学习。

1907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河内，在南方策动起义，谭人凤曾于1908年1月由日本到安南协助进行。同盟会在粤、桂、滇边境的几次起义相继失败，他于同年8月返回东京。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鉴于同盟会在南方的武装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在中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同年夏间，由谭出面在东京召集十一省区同盟

分会长会议，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谭极表赞同。

11月，孙中山和黄兴、赵声等在南洋槟榔屿集会，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11年1月，黄兴和赵声到香港设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招谭人凤前往参加。谭于2月初由日本到香港，询悉起义计划后，向黄、赵建议在长江各省筹设机关，联络军人起事，与广州相呼应。他说：“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①黄兴、赵声问他的办法，谭答称两湖同志很多，且积极，因经费缺乏，难于进行，如能给予援助，“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而定也”。^②黄、赵表示同意，交谭二千元，派他前往联络策应。他随即离香港到上海，和宋教仁取得联系，然后到武汉和长沙，将携款分予居正、孙武和湖南同志。在与两湖和上海等地区党人共同商议部署后，返回香港。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谭虽年过半百，体弱多病，仍要求参加敢死队，于起义队伍出发前，整装待命，为黄兴所劝阻。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于这年6月从香港到武汉，恰遇湖南党人焦达峰、杨任等因广州起义失败，到汉口来与孙武、居正等商讨以后进行办法。谭人凤与两湖同志开会商议，并在焦达峰、孙武等的推动下，决定在长江流域继续策动武装起义。为此，他促进了当时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和统一，接着往长江下游进行联络。谭到上海后，7月31日（阴历闰六月初六日）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湖州公学召开同盟会中

部总会成立会。会议宣读了由谭、宋分别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议决于宣统五年（1913年）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8月2日，谭被推为总务会议议长。总会成立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设立分机关，并以两湖为活动中心。谭、宋秘密往来于沪汉间，策动起义，并与当时在香港的黄兴取得联系，得到黄兴的赞同和支持。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即于10月13日由上海赶到汉口，在湖北军政府协助工作。10月22日湖南起义胜利，焦达峰被推为都督，但实权很快被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夺去。26日，谭人凤回到长沙，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焦达峰成了立宪派的“笼中之鸟”，主张取消立宪派所把持的参议院和民政、军政两部，由都督掌握一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斗争尖锐化起来。立宪派随即策动了谋杀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的流血政变，谭延闿被拥戴当上了都督。不久，谭人凤离长沙回武昌。11月下旬，武汉战事失利，汉阳失守，总司令黄兴离武昌去上海，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同年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开第一次会议，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并被推为议长。12月3日，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谭认为当时南京集中了民军十万，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正打算继续出兵，总的形势对南方有利，因此，表示反对当时举行的南北和议，主张继续举兵北伐，曾组织北伐机关于上海。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为了推行他的政党政治，于8月间将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抛弃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吸收大批官僚政客入党。谭对宋教仁此举持怀疑态度，因此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③但他也认为辛亥武装起义成功，民国成立，反满种族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秘密会党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因此，他提出的改进社团书中，企图把会党变成一种改良主义团体。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任川粤汉铁路督办和长江巡阅使等职。

1913年3月，宋教仁为袁世凯指派的奸徒所杀害。接着袁又违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举办了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对南方国民党的战争。6月，谭人凤受黄兴之命，到湖南策动反袁独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派汤薌铭督湘，大肆迫害革命党人，谭逃往日本。

他到日本后，住在福冈县，改名林泉逸。1914年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东京期间，由于在革命和组党问题上意见分歧，加上陈其美从中挑拨，曾一度不和，各行其是。孙中山筹建了中华革命党，黄兴拒绝参加，离日本去美国。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同情和支持黄兴的人，在东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团结现象。谭人凤双方均未参加，和周震鳞等奔走于两方之间，竭力促进民党的团结，为孙中山所称许。黄兴到美国后不久，也写信给谭人凤等说：“以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④

1916年春，谭人凤回到上海，参与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曾到汉口和山东等地进行活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曾往来于闽粤间，联络党人。以后寓居上

海养病。1920年4月24日，病逝于上海。

注：

①② 均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第811页。

③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④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续 范 亭

田为本

续范亭，名培模，字范亭，号恕人，1893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生，山西省崞县西社村（今划归定襄县）人。家庭是个中农。高小毕业后，于1910年春入太原陆军小学，随即在族兄续西峰^①的引导下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山西新军响应革命，组成军政府，陆军小学学生编为学生军；11月初，续范亭随续西峰回乡组织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训练人马，计划攻取大同。续范亭先任公团总部亲随副官，负责传布命令和联络事项；后任远征队队长，11月29日，他奉续西峰密令，率领一支仅由二十人组成的队伍，从繁峙间道奇袭大同，在城内同盟会会员策应配合下攻入城关，从而成为公团进占这座重镇的先锋。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窃取了山西胜利果实，1912年将忻代宁公团强行解散，并对续范亭加以排斥，续遂赴直隶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继续学习军事。1914年他因参加倒袁（世凯）反阎（锡山）活动，遭到通缉，乃离校去陕西省华阴县，与陕西胡景翼、山西续西峰、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聚会于华山下的杨家花园，共同策划讨袁，时人称为“华山聚义”^②。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从陕西夜渡黄河攻袭山西，一度攻下荣河、猗氏、万泉等县。但进军

到虞乡时遭到晋军的夜袭，队伍失散，续范亭被迫进入中条山中，历尽艰辛，后暗渡黄河，重返陕西。6月，袁世凯死后，续范亭随续西峰到北京活动，后进入直隶漕河军官教导团（后迁保定改名保定军官学校），一面攻读，一面任教。其间曾返乡探亲，因又遭到阎锡山通缉，再度奔赴陕西。1918年陕西靖国军兴起，胡景翼在三原举义，续范亭参加靖国军随胡与北洋皖系党羽陈树藩、刘镇华部队作战，也曾在杨虎城所在部队襄赞军事，并为胡景翼和孙岳两部奔走于北京、保定、天津、洛阳之间，进行对外联络工作。

1920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为了对奉系作战，直系军阀力图分化与收编靖国军。靖国军也因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又受到入陕直军的威胁，各部均希图自谋出路。1921年胡景翼部接受改编并进驻京汉线。此后，续范亭就到京、津及察、绥、冀、鲁各地，联络能够参与反北洋军阀的地方武装，准备待机再起。1922年他因四处奔波，积劳吐血，在北京养病年余。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各部组成国民联军，续范亭出任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次年任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诸将领因互相矛盾，行动混乱，又遭北方军阀的联合围攻，有的覆灭，有的败退，有的投降。1926年4月奉军入据北京后，续范亭率部退守南口，力主攻晋，自任前锋，一度攻克广灵、灵邱，后因敌众已寡，援军不至，遂率部撤至五原。9月，冯玉祥自苏联归来，在五原誓师。续率部与冯部会合援陕。其后因宿疾复发在三原休养年余。1927年续在西安受冯委托担任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次年回乡探亲，继则闲居北京几年。1932年他

应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之约，与邓宝珊共赴兰州。续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后改任中将总参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华北又面临沦亡的危机，时任第一军中将总参议的续范亭悲愤异常，起而奔走呼号。1935年11月初，他从兰州到西安找杨虎城面谈抗日救国问题，旋即经太原、北平赴南京。恰值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续范亭与原靖国军老友于右任共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事与愿违，蒋介石拒不“纳谏”，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方针^③。续范亭在极度苦闷中谒中山陵，并赋《哭陵》一诗，抒发自己的悲愤：“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腴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④他日夜忧国忧民，遂萌绝念，决以一死惊醒国人，竟于12月26日下午5时在中山陵祭堂前用短剑剖腹自杀。幸经汽车司机及时发现遇救。自杀前他曾写下一份《告民众书》，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等语^⑤。他还留下了五首绝命诗，其一是：“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意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⑥他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慌忙封锁消息，并造谣中伤，但消息毕竟还是传开了，许多友人和爱国人士纷纷来电来函慰问。在他住院期间，张学良亲来晤谈，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等都派代表前来探望。旅日侨胞也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钦敬。

续范亭自戕遇救，伤愈出院后，往苏州、杭州、无锡等地去疗养。在此期间，他已决心与国民党决裂，但今后方向是什么？他曾表示：“今后或出家为僧，或投奔共产党。”说明他还有

一个探路的过程。的确，他曾拜访过苏州报国寺的印光大师，一度热心研究佛学，但结果是从中寻不到救国之途。他在杭州西湖疗养期间，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由此而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对于如何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夙愿，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之后，绥东抗战的消息传来，他心情激动，赋诗以明志：“故人血战风沙里，愧渡苏堤第一桥。”他在健康情况逐渐好转后，适得杨虎城相邀，遂于1936年11月经郑州、洛阳前往大西北。

12月初，续范亭来到西安，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争取冯玉祥旧属冯钦哉部和进行联络工作。这时他遇到老友南汉宸，通过南的介绍，拜访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过这些接触，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有了深刻的领会。1937年初，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一到太原，就和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团结抗日工作。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他在山西威望很高，阎锡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借以号召晋绥地区的上层人士。9月，续范亭亲往平型关前线视察，曾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其亲信郭宗汾避战观战，违反了与八路军分兵合击的作战计划。

续范亭从平型关回到太原前，山西各阶层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已经成立，公推他为主任委员。他尽管病体羸弱，仍以炽烈的热情与共产党合作，在党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策划发展动委会组织，建立动委会直辖的抗日武装，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动委会武装在敌后蓬勃发展，活跃于晋西北二十九个县，

全在阎锡山意料之外。阎对此惊恐不安，下令动委会只准在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五县活动，并不得发展抗日武装；已有的十个支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在岢岚成立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任命续范亭为保安司令。

1939年初，阎锡山召集秋林（在陕西省宜川县）会议，大肆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续范亭在会上朗读孙中山遗嘱，义正辞严地批驳阎锡山及其同伙的反共谰言和投降主义论调。阎锡山曾对其核心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秋林会议以后，续范亭绕道延安返回晋西北，专诚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阎锡山的反共阴谋和晋西北抗战情况。此后，山西局势急遽逆转。3月，阎锡山又悍然下令解散动委会，取消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原辖各支队改为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改任师长，阎锡山还派自己的亲信来担任参谋长，并取消了续部的供应基地，有意制造难题。但续范亭坚毅地说：“只要我续范亭不死，我还是要抗战到底！”^⑦当年秋，阎锡山电令续范亭攻打日军占领的五寨县城。这时续范亭身边仅有一营兵力，而五寨县城内却盘据着大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但他在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民支持下以寡敌众，用两个连迅即歼灭了从五寨县城出动的日本侵略军。

当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十二月政变”。其部署是先令其旧军在晋西、晋东南攻打新军，与此同时，又在晋西北令其骑兵司令赵承绶召集各地旧军，举行临县军事会议策划反共。赵承绶是续范亭二十多年的老友，认为续这样的老国民党员不会得到共产党的真正信任，仍让续参加了

这次十分机密的会议。会上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的命令：要在“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拖死八路军”的方针下，进一步消灭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彭绍辉部，消灭地方抗日武装，控制晋西北，把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续范亭在会上不动声色，会中即借口外出，策马飞奔岚县中共晋西北边区党委所在地，立即向党委作了详尽报告。彭绍辉三五八旅当时比较分散，不足以应付阎锡山的进攻。续范亭当即决定把自己的暂一师开上去阻击阎军，帮助三五八旅布置集结。暂一师、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队，抢先占领临县、方山、岚县交界处的军事要地赤尖岭，并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作战方案，成立了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临时总指挥。此后，原在晋西南的八路军陈（士矩）林（枫）支队和决死二纵队、政卫二〇九旅也都向赤尖岭靠拢。从1940年元旦开始，在续范亭与各方协同指挥下，新军英勇作战，终于在1月14日攻克赵承绶司令部所在地临县。这次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晋东南和中条山地区八路军各部的战斗，取得了粉碎阎锡山“十二月政变”、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大胜利。

临县战役胜利结束后，1月16日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续范亭连任总指挥。不久，贺龙师长率一二〇师主力部队自冀中返回，和新军胜利会师，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月，晋西北边区行政公署在兴县成立，续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并被延安总部任命为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山西新军也正式编入八路军的战斗行列。

1941年5月，续范亭因戎马辛劳，痼疾复发，病情沉重，从晋西北转到延安治疗休养，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怀照顾。从

此，续范亭长期生活在革命中心的延安，经历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党的“七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从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化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几十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真正的革命道路，如今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格外的舒畅和活跃。他参加了延安的怀安诗社，经常与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及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互相唱和，写下了许多令人淬砺奋发的诗篇，后结集为《延水集》和《南泥杂咏》^⑧。

1942年和1945年，续范亭先后两次被晋绥边区参议会推选为行署主任，1945年他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在这期间他因疾病缠身，已不能重返前线实地，担任日常领导工作。不过，他对晋绥边区的工作和人民生活仍时时关怀，每当形势变化的时刻，虽伏枕咯血，犹振笔疾书，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1944年8月，他在病床上口述了著名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淋漓尽致地揭露阎锡山祸国殃民、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并晓以大义，劝其悬崖勒马。1946年11月，胡宗南将要进攻陕甘宁边区时，续范亭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的临县。1947年1月，他的病势不断恶化，但看到阎锡山伙同胡宗南进犯解放区，仍愤然发表了《号召山西人民推翻万恶无耻军阀阎锡山》的战斗新篇章。他晚年的文章后结集为《诤声》^⑨。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临县逝世。病危之际，他致书中共中央，申请入党。13日，党中央复电宣布：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续范亭的逝世，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同声哀悼；毛泽东

还亲书挽词，盛赞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给以很高的评价。

注：

- ① 续西峰原名桐溪，是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写信申请加盟的早期会员之一。“华山聚义”之际，他系广东军政府任命的陕西省划界议和专使，并曾亲赴日本面见孙中山，商讨革命行动。
- ② 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
- ③ 黄既：《回忆续范亭同志》，《中国青年》1948年12月号。
- ④ 南新宙：《续范亭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2月版。
- ⑤ 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12月30日。
- ⑥ 《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三号，1936年2月。
- ⑦ 南新宙：《抗战初期的续范亭同志》，《红旗飘飘》第五集，1957年12月。
- ⑧⑨ 续范亭1921年至1936年的诗结集为《湖山集》，1941年至1947年的诗结集为《延水集》和《南泥杂咏》，1943年至1947年的文章结集为《净声》，全都辑入《续范亭诗文集》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司徒美堂

陈 民

司徒美堂是美洲爱国华侨领袖。他从1880年出国到1949年归国，在美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①

司徒美堂原名羨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濠堤洲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他四岁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时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后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

1880年，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希望，随同乡亲经香港乘轮船去美国。船票龙洋五十二元，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得来的。他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②。此后，他在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帮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工资仅得十二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先后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他激于种族义愤，加入洪门致公堂，^③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即吃饭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居异国，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了格斗武术，所以遇上这类流氓，他就挺身而出，把对手

打翻在地，抛到街上。有一次，因把一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了十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说开了。

1894年春，司徒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子，随军舰到过南北美及欧洲各地，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物。1898年春，因“美西战争”爆发，司徒辞职不干，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猪肉，走街串巷。

早在1894年冬，司徒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涣散，作用不大，经同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商议后，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总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四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38年他七十岁时才退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活动，“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二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曾经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北美大陆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司徒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颇为赞许，并曾给予指导。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的

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十五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经司徒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了出去，才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司徒“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④。他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从本世纪初到五十年代，司徒除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会，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过问，深为广大侨胞所拥戴。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约。致公堂和安良堂一贯同清朝驻外官员、保皇党相对立；其后则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立，用司徒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⑤。如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到美国进行欺骗华侨的宣传活动，华侨在一次宴会上，就对他镇压广州公社、屠杀华侨子弟的罪行，严加责问，搞得他狼狈不堪，中途逃席。再如1943年，国民党CC分子肖吉珊赴美“募捐”骗钱，当他出席“七七”纪念大会时，就遭到致公堂的反对，开始是嘘声，继而是喊打，国民党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陶行知等人赴美宣传抗日，由于得到司徒美堂的关照和保护，使蒋帮特务无法捣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

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⑥。

1941年冬，司徒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回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二百多里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蒋介石对司徒颇为重视，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还叫吴铁城拉司徒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断然拒绝，并于次年经印度飞返美国。

1945年初，司徒及致公堂其他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3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这是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致公党还只是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钱、出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国前夕，曾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家族也正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司徒在记者招待会上沉痛地说：“数月居沪，曾亲睹国内实际情形，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⑦

10月23日，司徒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后，周恩来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这几次会晤，对司徒教育很大。

1946年11月，国民党伪国大开场前夕，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放在眼里，只给五洲洪门伪国大代表一席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表示不接受。蒋介石、陈立夫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进行“劝驾”。他们向司徒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⑧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面“调解”，并邀请司徒到南京美国大使馆吃饭，声称是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这位“半个美国人”的老华侨。宴会上，当司徒雷登大肆吹嘘所谓美国对华援助时，司徒美堂当场严正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掀起中国内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不是什么“援助”。⑨结果不欢而散。司徒美堂拒当伪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他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香港。

这时，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他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因此留港期间，闭门谢客。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

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是个很大的鼓舞。他于8月12日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⑩。这是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公开发表政见。当时香港各报都作为要闻刊出。

司徒返美前夕，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连贯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经过深入交谈，司徒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⑪随后，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郑重地签名盖章，嘱留港秘书俟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10月30日司徒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同日在香港各主要报纸上登载出来。《声明》中说：“美堂于1946年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⑫

司徒返回美国之后，在进步华侨人士的支持下，到美国西

部各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道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思想,打击蒋介石集团在洪门中的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回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邀请他吃饭,假惺惺地“劝告”说:“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③司徒断然拒绝这种“劝告”,严正指出自己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归国。

1949年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毅然离开居留了将近七十年的美国,于9月4日到达北平。9月21日,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④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侨乡的土地改革,扩大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注:

① 廖承志:《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司徒美堂先生悼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第一版。

②③ 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转引自《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出版,

第45、94页。

- ③ “洪门”是明末抗清人民群众的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习称为“洪门致公堂”。
- ④ 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1946年1月版，第16页。
- ⑤ 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第六章附注，《光明日报》，1950年12月5日第三版。
- ⑥ 同①。
- ⑦ 上海《文汇报》，1946年11月15日第三版。
- ⑧⑪⑬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243、252、255页。
- ⑩ 香港《大公报》，1948年8月13日。
- ⑫ 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出版，第1页。（“八十有二”是本人习惯按虚岁说的）
- 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949年版，第218页。

于学忠

黄德昭 王 秦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人，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日）生于旅顺^①。其父于文孚曾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军营中，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于学忠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曾任职毅军，原隶于文孚部下，因此关系电召于学忠至襄阳，任为炮营营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于随赵旅参加对皖系吴光新作战，将吴部包围缴械。1921年秋，川鄂战起，熊克武、刘湘进攻湖北。赵荣华旅防守宜昌，战事失利，准备放弃。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至宜昌督战，于往见吴，面陈反攻计划，吴即采纳。后激战五昼夜，击退川军。于因此被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的战争，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不久，赵荣华因抗拒军令被撤职，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24年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在山海关指挥作战，冯玉祥在前线倒戈，直军大败，吴逃至湖南岳州。当时于学忠率部驻施南。1925年10月吴佩孚再至武汉，经孙传芳、肖耀南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整编直系各军，授于为第二十六师师长，仍驻施南。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北伐，席卷湖南，直指武汉。10月10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狼狈逃入河南，部下大部分溃散或投靠他人。于学忠当时任长江上游副司令，驻宜昌，因不愿背吴，便率部北撤。1926年冬，于撤至老河口，接吴佩孚电令，任为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嗣再撤至河南邓县。1927年5月，吴佩孚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已逃到河南邓县于学忠军中暂住，不久去四川暂依杨森、刘存厚。于学忠表示随吴佩孚同进退，遂于1927年6月下野，返回蓬莱故里。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冯玉祥统辖。不久，于部师、旅长因不满冯玉祥吞并异己部队的措施，又将队伍拖至安徽蒙城，并派人找于想办法。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即邀于到北京商谈，于学忠从此转入奉系，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仍统原部。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任于学忠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驻山海关。12月29日东北“易帜”（改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关内外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三派军阀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关外，颇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多次派代表拉拢东北

军出兵进关，未有结果，便阴谋分化东北军。此时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负责戒备山海关一带。蒋介石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是留日士官学校同学）两次给于来信，表示拉拢；又派参议石某带给于亲笔信一封，劝于举兵西向，并表示愿以华北地位为交换。于表示唯张学良之命是从，未允。蒋又遣何成濬用重金收买于部下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叛张。于闻讯，急告张学良，采取措施制止了这一阴谋。是年9月18日，张学良进兵关内。于学忠受命率第一军由沈阳出发，9月26日进驻北平。冯、阎联军失败后，经张学良保荐，南京政府发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7月，石友三反蒋。张奉蒋命，把在关外看家的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讨石，并发表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平汉线作战之责。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办石友三。于率所部与王树常所率第二集团军及南路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合力夹击石军。不到半月，在滹沱河畔深泽地区击败了石友三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图谋控制华北，平津时局紧张。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将于学忠的平津卫戍司令与王树常的河北省主席对调，于赴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将东北军大部分交于学忠指挥。日本侵略者曾用种种手段对于学忠进行利诱和威胁，于皆未为所动。1935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军阀的要求，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次郎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

定”，日方所提出的“觉书”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要求将于部五十一军撤出河北^②。为了迁就日本侵略者，何应钦几次亲自打电话逼于辞职，均遭于拒绝。5月31日南京政府乃命于将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往保定；6月6日又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发表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令其率部开赴西安（后驻天水），参加尾追徐海东率领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11月1日，于被任为甘肃省主席。~~1935~~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由兰州到西安，12月11日晚参加了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召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虽力主慎重，但同意张采取“兵谏”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12月12日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奉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12月16日，于学忠飞返兰州，以后不断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各种会议。

西安事变后，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于学忠奉张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于曾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在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③。蒋介石在无理判处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逼西安，并在1937年1月4日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1月5日，于学忠同杨虎城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

心？”1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西北军的甲、乙两案^④，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扣押张学良并对西安步步进逼形势下，东北军内部发生“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于学忠与杨虎城及两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接受乙案，准备东调。蒋介石、何应钦等便以处理善后为名，加紧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活动。1937年4月，蒋调于部五十一军往蚌埠、淮阴、宿县，发表于为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阴。

1937年7月抗战开始，蒋介石调五十一军到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于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25日退出青岛。次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济南和山东大片土地。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山东军队统交于学忠指挥，任于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于率部先后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于军和其他东北军一样，由于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的歧视，在战争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

1939年，于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

1941年底，于任山东省主席。1944年，卸去苏鲁战区总

司令职务，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于任南京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胁迫于去台湾，于藏在四川乡间未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和信任。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

注：

- ① 于学忠出生时间众说不一，本文根据黄曾元《毅军沿革谈》，并经于学忠家属核实。
- ②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019——1020页。
- ③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原百十师在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于将此部编入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这批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④ 甲案规定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沿线；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乙案规定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

李烈钧

宗志文

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日）生。其父骏兴曾投身太平军，事败后潜回故乡，耕种自给；后兼营茶叶运输，家境逐渐富裕。李烈钧自小读书习武，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到东京后先入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时，他结识了在日本鼓吹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员张继、王侃等人，经常阅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年12月，他听了孙中山在日本阐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倾服之念，油然而生”^①。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先后加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组织的“武学社”、“丈夫团”等反清团体。

1908年李烈钧在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有向士兵宣传反清思想之嫌，被上级借故拘捕，经原江西武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大力开脱，始获释放。于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不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仍兼兵备道提调。曾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夏，李烈钧奉派北上参观永平秋操。他从云南到

上海，然后溯江西上，途经武汉时，武昌起义已三天。到北京后，吴禄贞邀集数十人宴请他。这些人都是支持武昌起义的。李烈钧也决心响应武昌起义。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又有电报促他速归，乃迅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返回九江。这时，九江已光复，他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及马当炮台，把长江拦腰截断。停泊在九江的北洋舰队主要舰艇仓惶下驶，企图逃往上海，被金鸡炮台截住。经李烈钧与林森等人联络动员，舰艇宣布起义。李烈钧又被都督府任命为海陆军总司令。这时，安徽、南京、武昌都先后来人或来电要求支援，李烈钧率舰队先往安徽，到安庆后被推为安徽都督。随后因北洋军攻武昌，武昌告急，乃率舰队西上。到武昌后，黎元洪任命他为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一面命舰艇防守长江江面，一面亲率陆军迎击北洋军，从而稳定了武昌的阵势。

1912年年初，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正式任命，李烈钧乃回江西赴任。他在江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改革。首先整编部队，扩充为两师一旅，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同时，改组都督府，罗致了好些同盟会会员担任各司、厅、处长。又整理财政，成立民国银行，活跃地方经济。此外，还处决了几个洪门会（地方封建势力）的首要。至此，江西秩序逐渐恢复。同年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莅临南昌巡视，军民举行盛大欢迎。袁世凯对此颇为嫉视，曾派大员邀李往北京面谈，并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遭李拒绝。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4月初，孙中山派张继、邵元

冲等到江西动员李烈钧发动反袁。5月5日，李烈钧与湘督谭延闿等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又免除了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这月中旬，李烈钧赴上海见孙中山筹商反袁事宜。7月8日回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12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斥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并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②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入江西，接仗后，讨袁军初战获胜；但终因力量悬殊，连连失利，两团长阵亡，援军不继，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8月10日李烈钧退守南昌，不久转移丰城。8月底率千余人退驻临江，在此又与袁军激战数日，毙袁军数百。后以敌军大集，败局已成，退离江西。是役在民国史上称为“二次革命”。当时响应孙中山号召者，虽有湘、粤、皖、闽等五、六省，而敢于兴兵举义者，除黄兴在南京有所动作外，只有江西一省。

同年9月李烈钧亡命日本。当时，因“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多约七、八十人，李烈钧创办了一所法政学校及一所军事训练班——浩然庐，收容上述军官，加以军事训练，以备再起。

1914年春，李烈钧与张继、陈炯明赴欧洲。乘船经过南洋时，曾在檳榔屿小住，多次在欢迎会上演讲，鼓吹讨袁革命。抵巴黎后，与张继等寄寓巴黎郊外，学习法语。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孙中山已要李烈钧赴云南策划反袁；这时，李烈钧遂决定回国。10月启

行，船到西贡时，原拟假道入云南，为法国海关所阻，不得已转赴香港，又侨居新加坡。1915年2月，袁世凯与日本洽谈“二十一条”时，李烈钧曾与黄兴等两次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独裁卖国。12月初，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即将开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偕熊克武乘船至海防转河内，在老开等候入云南。时唐继尧尚怀犹豫，李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③唐继尧立即派其弟继虞迎李入昆明。随后，蔡锷亦到昆明。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宣告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主持后方。李烈钧于12月下旬率滇军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进发，1916年2月间，在广西百色附近击溃袁世凯派来的龙觐光部。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李烈钧部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经三水、芦包，沿粤汉路北进，6月初到韶关，与伪称独立的广东都督龙济光部发生战斗，迫使龙部纳关投降。接着回师南下，指向广州，7月初在源潭附近又与龙部相遇，大败龙军。时桂军莫荣新部也乘机攻入粤境，龙被迫退回广州困守。

6月6日袁世凯死，段祺瑞继承了袁的家底，成为北洋派的首领。他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自任国务总理。为了收拾时局，除与护国军方面讨价还价外，在处理广东滇粤军冲突问题上，他故意压制李烈钧，甚至授意北洋军阀，叫嚣讨伐李烈钧。为分化西南实力派，他还故意委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

陆早存觊觎广东地盘之念，立即带兵入粤。李烈钧感于形势压力，遂于8月通电解职，离广东转赴上海，其部队仍留粤北，成为后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一支力量。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合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军政府成立后，南北对峙，从此进入护法战争时期。1918年3月，段祺瑞委退据琼崖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命令他渡海进攻广州。李烈钧奉命率滇、桂、粤军迎战，大败龙军，迫使龙济光逃往香港。与此同时，段祺瑞复派兵从江西直下广东南雄。李烈钧又奉命移师抵御。5月3日自韶关出发，6月3日克南雄，正欲乘胜前进，夺取赣南时，忽奉军政府召返回韶关。原来这时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准备离开广州赴上海。在此情况下，前方战斗不得不收束。李烈钧回韶关后，为防止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着手兴建韶关要塞。1920年2月，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粤督莫荣新利用李根源争夺滇军领导权，与李烈钧在韶关、南雄之间打了一仗。4月，李烈钧赴港转沪，奉孙中山命往云南与唐继尧会商消灭桂系势力的办法。这时，李烈钧所属驻粤滇军数旅，已取道湖南到达四川边境，他从云南到四川与他们会合，原想驻扎四川，为四川军阀所拒，不得已移驻贵州镇远。

同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赶走了桂系军阀，孙中山再到广州。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成立中华民

国政府，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李烈钧仍被任为参谋总长。7月，孙中山命粤、赣、滇、黔各军讨伐岑春煊与广西陆荣廷的联合势力，李烈钧率部出镇远到广西，8月下旬，击溃桂系沈鸿英部占据桂林。12月，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军大本营，部署北伐。李烈钧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积极作北伐准备。他原拟定的计划是从桂林出衡阳，先取江西，相机东下南京，西定武汉。但到1922年3月，传来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被刺，陈炯明勾结北方军阀的消息，李烈钧遂不得不急率滇桂两军回师广东。4月，他从桂林出发，经梧州，顺西江东下，抵广东三水，听说陈炯明要在那一带布防，急赴芦包，转向韶关。5月6日，孙中山到韶关研究北伐步骤，决定改道韶关出发，继续执行北伐计划。李烈钧会同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分途北进。部队经南雄，出大庾，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19日，孙中山电令李烈钧等入赣的北伐各军迅速回粤，讨伐叛逆。北伐军班师回粤，仅留赣军保持现有阵地，防止北军反击。李烈钧因病留在南雄。不久，陈炯明军向粤北推进，李烈钧率赣军退驻湖南，他本人随即转赴上海。

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海陆军大元帅职。李烈钧也回到广州，仍任参谋总长。当时，陈炯明部盘踞在东江惠州及潮汕一带。3月，许崇智从福建率东路讨贼军到达闽粤边境，陈炯明所部洪兆麟、赖世璜、林虎等亦通电宣布“独立”。孙中山以林、赖等过去是李烈钧的旧部，乃命李兼闽赣边防督办，赴潮汕收编洪兆麟等部，并与许崇智换防。6月，李烈钧收编完上述

诸部赴闽驻防。许崇智回防广州时，在揭阳、兴宁一带突然遭洪兆麟等的袭击，损失很大。李烈钧救应不及，离闽去香港。

7月，奉孙中山命仍回广州。11月，陈炯明对广州进行反扑，孙中山亲自指挥滇、桂、粤军进行抵御，李烈钧辅佐孙中山很快打败了陈炯明，防卫了广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烈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表示拥护。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李烈钧极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向孙中山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④9月，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筹备北伐，并设大本营于韶关，亲往督师，发表《北伐宣言》，举行誓师典礼。北伐军分两路向湘赣出发。这时，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军阀内部分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被囚，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接着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电邀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动身前派李烈钧往日本了解大局的演变情况，李于24日到达东京，与各方接谈后，11月中旬回到上海。下旬，又随孙中山经日本往天津。不久，北伐军已进入江西，孙中山乃命李烈钧南下部署军事。1925年1月下旬，李烈钧在上海闻孙中山病危，又复北上，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李参与主办丧事。不久，应冯玉祥邀请，往张家口晤冯，“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概”^⑤，被冯聘为国民军总参议。年底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时，李亲往张家口指导。当时，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对他们的决议曾通电表示赞许。

1926年5月，国民军因受直奉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北京。接着与直鲁联军大战于南口。8月国民军战败，李烈钧离开国民军南下。这时，北伐战争开始了，同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1927年初，李烈钧到南昌见蒋介石，被蒋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李烈钧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右转，向蒋介石靠拢。接着国民党内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李烈钧与谭延闿由南昌赴武汉进行所谓“调解”。3月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大会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李烈钧对此大为不满，没等会议结束就回南昌向蒋汇报，指责武汉会议，并向蒋建议从速攻取南京，定为新都。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李烈钧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底，孙传芳利用国民党新军阀蒋桂矛盾发动攻势，在南京东面的龙潭一带渡江，李烈钧坐镇南京指挥联络，打败孙军。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在一致赞成清党反共的反革命基础上统一起来，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

1928年以后，李烈钧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长期住在上海养病，没有担负实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李烈钧主张对日抗战，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尊重言论自由，改良政治，“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不到一个月，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蒋介石、汪精卫大为恼火，调集十余万中央军包围抗日同盟军。李烈钧十分支

持冯玉祥的举动，曾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冯委员玉祥，举义张垣，志在复失地”，“请授大权，俾当大任”。^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李烈钧同情蒋介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主帅”，致电敦促他们“立送蒋委员长回京”，“并肉袒负荆请罪”。蒋被释返南京后，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烈钧被任为审判长，曾出席审判。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张继在提案上签了名，后来又要抹去。冯玉祥找李烈钧说了此事，李马上研墨提笔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并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⑦

卢沟桥事变后，李烈钧移居昆明，后迁居重庆，一直患病休养。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

注：

① 《李烈钧将军自传》，1944年8月版，第6页。

② 《民立报》（上海）1913年7月18日，第10页。

③ 同①，第38页。

④ 同①，第81页。

⑤ 同①，第90页。

⑥ 《李烈钧之言论》，第7页。

⑦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七十年代杂志社1977年版，第55页。

附记：写作中曾参考卓仁机：《李烈钧》一文。

张 继

黄德昭

张继字溥泉，河北省沧县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①。其父以南曾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张继七岁入塾读书，十六岁随父就读于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本留学，先学于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不久改为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由于目睹清朝的腐败，受到法国卢梭政治学说（民约论）的影响，开始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1902年参加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同年由秦力山介绍在横滨得识孙中山先生。1903年与邹容等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逐回国。至沪，与章炳麟、章士钊、邹容结为兄弟，并任《苏报》参议。《苏报》被封后，与章士钊、陈去病等在上海续办《国民日报》。1904年初至长沙参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的活动。同年受万福华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与黄兴等被拘于上海。获释后再赴日，被推为留学生会总干事。

1905年8月张继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张任《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他为《民报》拟订的六大宗旨，^②对同盟会的纲领做了具体化的宣传，但也表明他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1906年春赴东南亚联络华侨，同年冬又回东京。1907年10月，梁启超组政闻社，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宣扬其“君宪”

谬论，张继和一批同盟会员当场赶走了梁启超。1908年赴法国，参与李石曾等办《新世纪》杂志，思想上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为此曾至沙利威耳附近“鹰山共产村”，居留三月余。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到南京，张继回国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他就任参议。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宋教仁案发生后，受孙中山命，于7月赴九江参与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继赴欧美，鼓动华侨反袁。1916年6月袁死张又回国。1917年段祺瑞为解散国会，指使“公民团”包围众议院，张继向议长吴景濂献抵抗之策，未被采纳。1919年再赴欧洲考察，明年归国充广东军政府顾问，并受孙中山命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1年春，改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不时受孙中山派遣与国内各实力派联系。

当孙中山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变革自己的主义和政策时，张继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支持者之一。1922年11月他曾带了孙中山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苏俄使者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使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时无法得到军火援助，他对联俄联共政策的态度开始冷淡下来。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张继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但他随即反对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来了。6月18日，他与谢持、邓泽如联名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25日又同谢持找鲍罗庭顾问谈话，表

示反共。8月间竟直接要求孙中山分共，结果受到了严厉斥责^③。之后，他只好离开广州跑往上海。11月间，他由上海到北京，又找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继续声言反共。他的这些活动，成为后来“西山会议”派反革命策划的前奏。

1925年，全国革命形势猛进，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剧增。11月，谢持、邹鲁等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猖狂地进行反共活动，张继适患病，虽未能出席会议，但他也签名表示参与。他对邹鲁和林森说：“君等之主张，即余之主张也。”^④由于他积极参与“西山会议”的活动，受到广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书面警告^⑤。

1926年3月，“西山会议”分子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张继主持了开幕会议，并被推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9月间宁、汉、沪三方在共同反革命的基础上召集特别委员会，张继被推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从此成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元老”之一。

在蒋介石反动统治期间，张继尽力于国民党的反革命事业。1928年10月，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及北平政治分会主席。次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6月参加国民会议，任主席团委员。同年7月，为了合力“剿共”，他与吴铁城联电粤方，谋国民党内之“团结”。“九一八”事变后，张继与蔡元培赴粤交换意见，结果产生了10月间的谋求宁粤联合的上海“和平统一会议”。11月出席国民党（宁方）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被选为立法院院长，辞未就。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他任西京筹委会委员长。

1933年2月任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驻新乡，以观察北方形势变化。此后常往来于北平、洛阳、西安间。

1935年11月张继至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毕摄影时汪精卫被刺，张急起拉住刺客摄影记者孙凤鸣而使其就逮。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及冯玉祥等联名提案，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张继先签名赞同，随后又退出反对^①。1939年他任国民党中央慰劳团总团长，北赴榆林，途经延安，对解放区的一切表示“愈觉厌恶”^②，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1945年夏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主席团委员，被选连任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叫嚷“修正”政治协商会议及军事三人小组协议条款，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同年冬，出席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任主席团委员。

张继晚年曾主持国民党党史和民国史的编纂工作。1937年初兼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国民党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任主任委员，1947年1月就任国史馆馆长。同年12月15日病死。

注：

① 据张继《先府君哀述》自称：“吾家为津南望族，以忠信传家，耕读为业。”

② 《民报》第1号所载的《本社简章》第一条说：本杂志之主义如下：（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

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 ③ 据张继《回忆录》自称：“与总理谈此事，甚不悦”云。
- ④ 张继：《回忆录》。
-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
- ⑥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文化供应社 1949 年 10 月版，第 51—52 页。
- ⑦ 张继：《回忆录》。

林 森

娄献阁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1867年3月16日（清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随父道炳移居福州，六岁开始读书。1877年入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校读书，1881年入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884年学业结束后离开福州，赴台北电报局工作。

1895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林返归大陆。1898年复去台湾，一度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仍回福州。

1902年，林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因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的影响，他与林述庆等组织了福建学生会，被选为主席。不久，学生会同闽籍留日进步学生林文、方声洞等建立了联系，进而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林森与学生会会员均入会。

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九江关任职员，曾与吴铁城等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还着手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和进行联络新军的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即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建立联系，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便立即策动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23日宣布独立。随后成立九江军政府，马为都督，林任民政长，吴任总参议官。他们曾联系海筹等海军舰艇起义，并共同商定了统一

江西和援鄂、援皖等决策。

同年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后在沪、汉、宁开会，林为江西代表，曾参加上海、南京会议，同其他代表一起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林森是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会议，被选为议长。2月上旬开始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不久清帝退位，袁世凯假意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被迫向参院提出辞呈，荐袁自代，但要求把首都设在南京，袁必须服从《临时约法》并到南京就职。参院很快选袁继任临时大总统，4月又在袁的要挟之下决定将临时政府和参院迁往北京。在迁都问题上，参院内有过激烈的斗争，林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反对北迁，因而辞职。是年秋，林回福建设立国民党支部。

袁世凯为加强独裁统治，1913年3月指使其爪牙暗杀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又作为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被举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面对袁世凯的种种反动行径，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少数国民党议员南下参加起义，多数人（特别是所谓法律派）仍继续委曲求全地呆在国会中，林也是呆在国会中的一个。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国会进一步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10月选袁为正式总统。而袁世凯实行专制的野心仍不满足，11月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缔国民党议员，随之国会也停止活动。林事先取得了出国护照，随即东渡日本。

林在日本东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4

年春转赴美国旧金山，任民国维持会会长。该会是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为起兵讨袁而设立的筹饷机关。民国维持会曾派员巡游美洲各埠开展工作，林亲往古巴进行募捐。同年冬美洲总支部改选干部，林当选为支部长。在他任职的三年间，该总支部在阻止袁世凯借款、召开全美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显著，被孙誉为“领袖支部”^①。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皇帝梦破灭，恚恨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8月，国会复开，林森自美赶回北京与会。在国会中张继等原国民党议员曾组织“宪政商榷会”，与原进步党议员，即后来的研究系对立。研究系主张中央集权，拥护段内阁；商榷会则主张地方分权，省长民选。国民党议员中除入阁的谷钟秀、张耀曾等人外，多对段内阁持反对态度。林属于商榷会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即“丙辰俱乐部”系。

1917年6月，黎元洪为张勋等所迫，再次解散国会，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东，揭举护法旗帜。林森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号召，聚集广州，8月，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孙为军政府大元帅。林曾一度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长。这时，西南军阀多借护法以自重，而非常国会则为实力派桂系军阀所操纵。1918年5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孙愤而辞职赴沪，专门从事著述。8月，护法国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林是拥孙的少数议员之一。稍后他又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并以议长名义募捐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20年春，桂系军阀为了谋求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停

发国会维持费，大部分议员离粤，林森亦于4月去上海。在赴沪途中，他写信给海外友人，谈到广州情况，谓今武人违法，南北皆然，桂系压迫国会更毒于袁氏，表现了对桂系的极端愤懑。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孙中山再至广州重整军政府。1921年1月，国会复在广州开非常会议，林为议长。4月，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孙于5月5日就职，林代表国会授印并致词。10月，孙中山开始计议北伐，林曾为此致书海外筹款。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10月，许崇智回师入闽。11月，林森接任福建省长。1923年2月，许率军回粤，福建为北洋政府控制，林被迫辞职。同月，陈退走惠州，孙中山返广州就大元帅职。7月，林被任命为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11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纠集同伙，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党籍案”、“俄人包尔丁（鲍罗廷）顾问解雇案”、“中央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决议。^②参加这次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又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从而背叛孙中山，走上了反共反苏反革命的道路。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成员受到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处分

(林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们不承认广州大会，同年3月仍继续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林再次当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林森是该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分派斗争加剧，到11月底特委会无形解体。特委会成立前，蒋介石本已下野，1928年初重新上台，随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林任“国府”委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林任副院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林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他是陵墓建筑的主持人和迎柩专使之一。

1931年2月下旬，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扣，3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由林森任立法院长。事前他已出国考察，院长职务由邵元冲暂代。4月，邓泽如等四监委弹劾蒋介石，林列名四监委之内（当时他尚在国外）。5月，一些国民党政客与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非常会议，同蒋分庭抗礼，由于林和粤方几个要人关系较密，粤方曾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10月林从国外回来，这时宁粤双方正在和谈，他采取超然态度。“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粤方乘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林被推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粤联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选林森为“国府”主席。林于1932年元旦就职。

林森任主席不久，发生“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国民政府”暂迁洛阳。同年3月，蒋介石东山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又迁往重庆，林于11月入川。1943年5月因车祸受伤卧病，到8月1日死去。

注：

① 石映泉：《林森》，《林森纪念集》，第92页。

② 佚名编：《清党实录》，第51页。

邵元冲

黄德昭

邵元冲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一个商人的家庭^①。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加入同盟会，十七岁进浙江高等学堂。1909年举拔贡，次年考得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不久即辞去。

1911年邵元冲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凶犯应桂馨匿居租界，邵据法理与租界当局力争，使应犯得以引渡^②。在孙中山反袁的号召下，邵于7月赴江西湖口参加讨袁之役，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民国》杂志编辑。后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奉命回国同夏尔璜图浙江，以事泄走上海。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参与讨袁的肇和兵舰起义；1916年又在山东潍县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举义，均遭失败。

1917年9月，广州成立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大元帅，邵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事。1919年冬赴美留学，先后肄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奉孙中山命，视察海外党务，周游美、英、法等国。1923年11月，经苏联去德国游学，在莫斯科晤蒋介石。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

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邵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年夏，由欧洲返国，抵上海，9月与张默君结婚。后入粤，被推为国民党代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北京《民国日报》社社长。孙中山逝世，他是遗嘱证明人之一。

1925年邵南下返粤，任潮梅海陆丰行政长。是年，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剧增。他于11月至北京，参加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召集的“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后主持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创设“中山学院”，向青年进行反动理论的宣传。由于他积极追随“西山会议”派，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受到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书面警告^③。

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邵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5月，经蒋介石拉拢入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次年，随北伐军赴浙江，任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三个月，因将杭州市工务局公款十余万元汇存沪行，为杭人责难，乃辞市长职^④。

在蒋介石反动统治期间，邵元冲大力从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工作。1928年初，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同年4月，到上海创办《建国》周刊，使成为国民党反革命喉舌之一。他提出要在反共的“军事进展中为政治之建设”，“先建设自己理

论”，“严密组织、统一意志、团结感情、集中力量为党之建设”^①一类的反动主张。次年，《建国》周刊由上海迁南京，改名《建国月刊》，邵任社长。他打着阐发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发表一系列反革命言论。他诋毁马克思主义、诬蔑共产党、曲解阶级斗争，主张强化国民党“党治”，大力宣扬专制独裁及孔孟之道，极力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涂脂抹粉。

1929年3月，邵元冲在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兼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12月，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次年发表孙科为院长，邵提出10人要孙同意提为立法委员，孙因此拒绝就职，邵仍代理院长。是年冬邵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会议委员、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33年解除代理立法院长，仍任副院长及所兼各职。至1935年春，因对日外交问题与汪精卫有矛盾，辞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后赴陕祭黄帝陵，周游陕、甘、青、宁、绥、晋各省。是年冬再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工作。

1936年10月邵元冲赴桂考察，12月应蒋介石电召入陕，适逢西安事变，被围于西京招待所，12日晨因跳窗逃走，被士兵开枪击伤，两日后在医院死去。

注：

① 据邵传志《哀翼叔之死国》云：“元冲父大昌曾开设邵天成银楼于山阴县

下方桥。”(见《建国月刊》第16卷第2期)。

- ② 据邵元冲《治学自叙》，自称：“癸丑宋渔父被戕案作，租界当局认应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据法理，以犯事地在沪宁站属中国，应犯为中国人，杀人为刑事犯，故应交中国法院讯理，乃卒得将应犯引渡。”
- ③ 据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 ④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 ⑤ 《建国月刊》本社同人：《敬悼邵翼如先生》，参见1928年4月其亲撰《建国》周刊发刊词。

谭 延 闿

李静之

谭延闿，字组庵、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生于1880年1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其父谭钟麟曾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7年为优贡，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到湖南。当时，清政府正举办“新政”，一些较开明的湖南官绅纷纷倡议兴办学堂，谭也积极投入这些活动，他因此广泛地交结了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物，猎取了相当的社会地位。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并从1907年起，在京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省会筹设谘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这时，谭延闿和一些立宪派分子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进行立宪活动。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煊委他为筹办省谘议局的会办之一。第二年10月，省谘议局正式成立，谭任议长，成了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湖南谘议局成立不久，便屡与督抚发生齟齬。1910年4月，谭延闿等不满湖广总督瑞澂为处理长沙抢米案参办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认为瑞澂诿过于人，有意为湘抚岑春煊开脱罪责。谭以谘议局议长名义，电请军机处代奏，请旨复查，结果受到清廷严厉申斥。由于遭受这次打击，加上谘议局

有名无实，屡受督抚轻侮，他逐渐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

1910年冬天，谭延闿到北京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结果清政府仅允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谭延闿坚持1911年召开国会的原议，并滞留在北京，与川、鄂等省代表谋划组织第四次请愿。不料清廷竟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其他人见势不妙，纷纷离京，谭也回到湖南。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昏庸贪鄙著名的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大为失望。恰在这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谭延闿入京参加，并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谭延闿被推定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先后两次上书清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朝廷另简贤能，重新组织责任内阁，结果受到清廷严词申斥。谘议局联合会关于借债、禁烟等问题所上各书，也都未获结果。这时湖南、四川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兴起的群众运动已渐开展，全国临近革命高潮。谭延闿等预感时局将有急剧变化，遂纷纷离开北京，各回本省。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力量。但革命派活动是秘密的，主要在会党之中进行；而立宪派的活动是公开的、合法的，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且受到绅商各界的实力支持，因而在政治力量上拥有相当的优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也顺风转舵，投机附和革

命。但是他却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所谓“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①。与此同时，立宪派开始策划抢夺政权的活动，预定“举事后大会于谘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②。当新军发动起义，攻进长沙城时，立宪派就曾擅用“都督谭”名义发布告示。10月22日，长沙起义胜利，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立宪派夺取政权的目的未遂，于是便一面造作谣言，对焦达峰、陈作新等进行中伤，挑拨绅商、新军与都督府的关系；一面借口“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一个“湖南参议院”，推举谭延闿为院长，议员几乎全部都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府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根据这个规定，参议院便成了凌驾都督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接着，他们又借口“军民分治”，进一步设立了军政、民政两部；他们除让黄鸾鸣任军政部长外，又由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总揽一切民政事务。民政部下设六司，其负责人也都由立宪派担任。这样，正、副都督便被架空，以谭延闿为头子的立宪派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

10月26日，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来到湖南，他鉴于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由立宪派把持的参议院和军政部，集权力于都督府。立宪派得知这个消息，深夜秘密集会，制定了由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杀害焦、陈的阴谋计划。30日，焦达峰召集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通过了谭人凤等的建议，谭延闿被迫表示辞去参议院院长等职。第二天立宪派便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焦、陈牺牲后，谘

议局推举谭延闿继任都督。紧接着，他们又夺取了湖南各级政权，镇压了各地的人民起义。这样，谭延闿等立宪派向清廷跪求多年而不可得的政治权力，现在用阴谋和暴力手段从革命者那里夺到自己手中。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谭首先通电表示拥护。7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新旧官僚政客。湖南支部在9月改组成立时，也把谭延闿拉了进来，并且推他当支部长。这时，谭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惯用手腕。黄兴于这一年10月回到长沙，谭组织盛大欢迎，称颂黄为“开国元勋”，还把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但是，他与立宪派仍保持密切关系，在他控制的权力机构中，仍然以原来的立宪派为骨干，同时又拉进许多官僚、政客、在野军官为己用。他既注意联络国民党，也同袁世凯拉关系，对湖北的黎元洪、广西的陆荣廷以及其他方面，都极尽拉拢之能事，有“八面玲珑”之称。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湖南的下层国民党势力较强，成立了反袁的“湖南公民联合会”，要求湖南当局脱离袁世凯宣布独立，并声称，如果谭延闿敢于违背众意，将给予“相当之对待”。谭延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即派人秘密到武昌对黎元洪表示：“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劝以“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合，徐图救平”^③。谭按照黎元洪所授机宜，便在7月25日宣布“独立”。宣布“独立”前，他故意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

焚烧了军装局所存的军械子弹，以使革命党人在独立后赤手空拳，无所作为；宣布“独立”后，谭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讨袁军。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闿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他曾通电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④

湖南取消“独立”不久，黎元洪即致电袁世凯为谭延闿开脱说：“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⑤袁世凯虽表面声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⑥，但终视谭为异己。为了平定西南敌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他必欲将湖南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便在10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芑铭为湖南都督，把谭赶下了台。此后谭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从云南揭幕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1916年5月29日，汤芑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政府脱离关系。但是由于他罪恶昭著，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通过其兄汤化龙，请在上海客居的谭延闿出面调停。谭用“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到长沙，为汤“赞襄大计”。在此之前，程潜奉孙中山命已由日本东京回到湖南，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参加讨袁驱汤。7月，程潜率军大败汤部于道林，进迫长沙。汤芑铭仓惶逃走。赵恒惕、陈复初等乘机拥谭延闿回湘。当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由于湖南军民及西南军阀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湖南，北洋政府不得不在8月任

命谭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程潜愤而离长沙往上海。

谭延闿二次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瑞政府要由北洋军阀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利用黎、段矛盾，另方面又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使段不敢轻易下手。谭更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军侵入。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直系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肆意推行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统一政策，又一次废弃了《临时约法》。8月6日，下令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湖南人）为湖南督军，北军再次入湘。谭延闿鉴于形势不利，不愿做空头省长，遂于9月初辞去省长职务，离湘赴沪。行前，他任命一向反对北洋军阀、同他关系密切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又调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湘南地区安置自己的力量，以作异日回湘的准备。

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9月18日，刘建藩、林修梅分别在零陵、衡州宣布湘南独立，打响了武力反段的第一炮。程潜也回到湖南，被推举为湘军总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任前敌总指挥。傅良佐派兵讨伐，湘南战争发生。10月初，陆荣廷出兵援湘，组织湘桂联军北伐。11月14日，傅良佐兵败，弃职逃回北京。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兼理湖南军民两政。1918年3月，北军大举反攻。3月27日，段祺瑞政府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北军犯湘主力、第三师师长、直系军阀吴佩孚在4月占领衡阳后，因为没有得到督军职务而不愿再战，按兵不动，湘军得以

退守零陵、郴州。6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到零陵重任湖南督军。他利用直皖矛盾，与桂系军阀一起商定联直倒段、联吴驱张的策略。但是这时，程潜还驻在郴州，不承认谭是督军。谭又利用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矛盾，伙同吴佩孚、陆荣廷制造了一个诬程潜通敌的事件，逼程离开了湘南。7月，谭由零陵移驻郴州，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等职务于一身。赵恒惕任湘军总指挥。

1919年冬，湖南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驱张运动。1920年5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酝酿战争，吴佩孚从衡阳撤防北归。按照事先的协议，吴军一面撤防，湘军便一面接防。张敬尧于6月11日仓惶逃走，谭延闿随即顺利进入长沙。从此，湖南境内北洋各系军阀均被赶走，湖南完全落入本省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的统治之下。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阀官僚政客，还利用湖南人民深受南北军阀混战之害而激起的强烈自治要求，打着“湘事湘人自决”、“还政于民”的幌子，在1920年7月22日向全国发出“禡电”，宣布“湖南自治”，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民选省长，采取联邦制统一全国。接着便开始了官办的“自治”和“制宪”活动，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地方军阀的割据。

驱张以后，湖南军事实力操纵在湘军总指挥赵恒惕手里，但程潜在湖南仍拥有相当势力。1920年11月，由于权力分配的矛盾，发生了平江兵变。程派军人以士兵闹饷为名，枪杀了谭派军官萧昌炽。这次兵变成为倒谭运动的序幕。谭为谋求与各派妥协，声言废除督军，民选省长，请赵恒惕任湘军总司

令。赵恒惕利用反谭势力逼谭下台，坚不就职。11月22日，程派军官李仲麟等又通电逼谭去职，赵恒惕也不表示挽留，谭延闿只好辞职，于11月27日第三次离湘赴沪。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不久又任临时省长。

谭延闿在上海走投无路，通过湘籍国民党国会议员周震麟的介绍，于1922年投奔孙中山，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谭延闿跟随前往，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和建设部长，逐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这时，他仍不忘伺机夺回湖南地盘。6月，湘西镇守使蔡巨猷起来反赵恒惕，指责赵“甘心附北，背叛西南”。7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湘军”，入湘讨赵，赵亦组织“护宪军”迎战。谭赵战争爆发。赵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击败谭军。恰在这时，陈炯明反攻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回师救粤，谭便率领所部湘军共五个军于11月底由湘南入粤，谭赵之战因以结束。

陈炯明部反攻失败、广州解围后，孙中山任谭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湘军遂驻广东为客军。谭有了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作为资本，更能见重于孙中山。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乘江浙战争之机派兵入赣北伐。10月，任命谭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又令谭全权办理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谭率部进入江西，被方本仁军战败，退驻北江。1925年5、6月间，谭曾参加讨伐驻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起，谭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谭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谭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兼任军长。1926年3月汪精卫出国，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政治会议主席。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集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谭延闿这时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甚至改号为“左庵”，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使宁汉双方对他竞相拉拢。当时，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地主豪绅在农运高潮中受到清算斗争，许多人跑到武汉谭延闿那里造谣诽谤，攻击农民运动过火，谭的家成了地主豪绅谋划反攻倒算的大本营。谭延闿代表官僚地主豪绅阶级，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汉开始合流。8月，蒋介石被桂系军阀排挤，暂时下野。9月，谭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往南京与李宗仁等协商宁汉合作问题。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合作后过渡性的党的最高执行机关，谭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并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委。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甘做蒋的傀儡。同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全国，10月，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五院，蒋自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谭便退居行政院长。在1929至1930年历次新军阀混

战中,蒋率师督战时,由于谭恭顺听话,便让他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一生以圆滑著称,晚期主持政务,继续施展八面玲珑的手腕,周旋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胡汉民比之为“药中甘草”。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症死于南京。

注:

- ①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第7页。
- ② 同上,第9页。
- ③ 《黎大总统政书》卷二十六,第3页,上海晋益书局,中华民国五年六月版。
- ④ 《湖南省志》第一卷,第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⑤ 同③。
- ⑥ 子虚子:《湘事记》政党篇,第22页。

王 宠 惠

郑则民

王宠惠字亮畴，原籍广东省东莞县。自其祖父起，把家搬到香港。父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王宠惠 1881 年（清光绪七年）在香港出生，家住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与孙中山早年学医之西医书院为近邻，因此，王从少年时就和孙相识。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英文，继入皇仁书院肄业。1895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0 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1901 年往日本留学，研究法政问题，并曾参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任英文记者。随后转赴欧美留学，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的会员。他将《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被英、美各大学采用为通行的教本。

1904 年孙中山到达美国纽约。王宠惠见着孙中山，听孙谈论有关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王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文章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王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

1911 年 9 月王宠惠由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

发,即赴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1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开始议和谈判,王受派为民军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接着孙中山自美洲归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分出席会议,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1912年1月3日王宠惠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袁世凯政府成立,王任唐绍仪第一届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唐绍仪忿于袁世凯的独裁,辞职出走,王也继唐绍仪之后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改当外交部顾问。不久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13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当年著有《宪法平议》,随后又著《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他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①

1916年护国运动发展,5月西南方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命王宠惠为外交副使,他在上海曾有所活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总统。1917年王宠惠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20年改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于12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

这时,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加紧侵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注意支持和培植亲美的政治势力。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

口号,要求“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②。他们草拟了“政治计划”,争取美国公使芮恩施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支持。6月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入京取代徐世昌,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王任司法总长。8月初国会开会后,黎正式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名单中王改任教育总长。因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激烈反对,唐阁没有组成,便由王宠惠兼代总理。9月19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字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入阁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操纵在直系军阀手里。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帝国主义乞讨借款,为军阀筹措内战经费,引起人民的不满。当时直系内部分为以曹錕、曹锐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王宠惠倾向洛派,对其提供较多的军费。保派对王宠惠内阁十分不满,企图通过推倒内阁,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錕早日夺取大总统的“宝座”。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事件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錕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只得屈从于曹,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的支持,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由汪大燮署理阁务。

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有些名气,1923年国际联盟选他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他曾往荷兰赴任。1924年1月被任命为孙宝琦内阁司法总长。1925年改任修订法律馆总裁。

此时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准备进行北伐，北洋军阀的统治日渐面临困境。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5月北京政府颜惠庆内阁重新复活，任王为教育总长，但他没有到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党反动政府。6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长。1928年8月王当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效劳。1929年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国际联盟再次选他为海牙法庭正法官。11月兼任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初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命王宠惠等草拟《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选任”，严重地剥夺了人民的合法权利。1931年2、3月间，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等为争夺权力，发生冲突。在蒋扣押胡汉民后，又触发了两广的反蒋行动。王宠惠的态度倾向于两广方面，4月他和孙科一起离职，从南京赴上海。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台，王宠惠不愿深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起程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职务。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曾选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他未就职。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庭法官之职。这时正当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他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

人物。西安事变后，他们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日之后，于1937年3月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代行政院院务。当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平津后，又于“八·一三”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时，王宠惠等在全国抗日洪流的压力下，曾于1937年8月14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抗日声明，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改变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但又不敢顺应人民的要求，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而为以后的“和谈”以至妥协投降保留退路。同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会议上，英美政府企图牺牲中国，为日本传达所谓和平条件，促蒋介石集团放弃抗日，外交部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指示出席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说：“我国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③表明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中国恢复九国公约维持下的半殖民地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以英美利益为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王宠惠也从外交上加以配合。1941年蒋介石集团阴谋制造了包围新四军的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王宠惠等歪曲事实真象，颠倒是非，通过胡适等人在国际上造舆论，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吹嘘国民党军事部署周密，“即令共军续有异动，必可立予制止”^④。1941年4月王调离外交部，后来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2月王宠惠随蒋介石访问印度，1943年11月又随蒋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4月中国派出有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王宠惠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代表之一。

1946年11月蒋介石非法召开了反共反人民的伪国民大会，王宠惠参加了大会并参与伪宪的制订工作。伪国大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内战“合法”化。宪法规定大权集中于总统的一身，它可以不受刑事追究，任期六年连选连任。与此相反，人民、地方和议会处于无权的地位。王宠惠还赶忙写了《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一文，吹嘘伪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⑤。竭力掩盖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随后，王宠惠再次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前夕，王宠惠逃往香港，不久转赴台湾，1958年3月15日病死于台北。

注：

① 谢瀛洲：《王宠惠先生传略》。

② 《努力》周报，第2期。

③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第016号，分档第2号，案卷目录第472号。

④ 《王宠惠、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2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3辑，第94页。

⑤ 中华丛书《困学斋文存》（王宠惠著），第139页。

吴 鼎 昌

熊尚厚

吴鼎昌字达铨,1884年4月(清光绪十年三月)生于四川绥定(今达县)。吴家原籍浙江吴兴,世代作“师爷”,他的父亲吴赞廷在绥定府署作幕十余年,退休后定居成都,置有田宅。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后中华阳县秀才。1903年4月,他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普通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任本部评议员。但吴为人工于心计,矢志作官,虽加入同盟会,仅只挂名,并未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06年6月,吴鼎昌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与留日学生胡霖(政之)、张季鸾(炽章)相识。1910年6月,他毕业回国,是年秋在北京应游学生毕业考验,得学部赏给商科进士。1911年春又经廷试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习。其后经他的族伯、山西藩台吴匡涛举荐给东三省总督锡良,先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同年8月,经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介绍入大清银行任总务科长,不久转任大清银行江西分行监督。

辛亥革命时,吴鼎昌由江西到上海,参与上海大清银行清理处事务。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应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商股股东的要求,派员改组为中国银行,吴又参与了中国银行的筹备事务。2月吴被派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拟订中国银行条例,

推行他的改革计划。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银行总行移往北京，吴的监督职位未变。同年5月，黎元洪、熊希龄在北京成立共和党后，吴鼎昌加入了共和党。11月，他任袁世凯政府工商部临时工商会议副议长兼工商部顾问。1913年5月，梁启超等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为进步党，吴任进步党政务部财政科主任。同年，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意见不合，吴离开了中国银行。1914年1月，吴鼎昌任造币总厂总裁。同年又经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引见袁世凯，未被重用。1915年2月，袁世凯授吴上大夫衔，12月，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办事员。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4月吴被任为农商部次长，他未就任，仍任造币总厂总裁。袁世凯死后，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投靠了段祺瑞，6月被任为中国银行总裁，7月兼国务院参议。1917年5月，周作民和王郅隆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吴为发起人之一，任董事。7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张镇芳拨银行资金二十五万元资助张勋复辟，张勋失败后张镇芳被捕。经王郅隆向段芝贵推荐，派吴鼎昌入盐业银行，以清查复辟用款名义攫取了该行领导权。不久，经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梁启超正式任命，吴担任了盐业银行总经理。1918年3月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吴为院外评议员。同月，吴鼎昌经徐树铮的推荐担任财政部次长。12月被派赴欧美考察财政。1919年2月至5月，南北政府在上海举行和会，吴鼎昌为北方代表。在和议期间，他参与密议，往返奔波传达消息，极为活跃，成为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的智囊人物。他和朱启钤一起主张另行选举国会，在和会破裂之前，奉段祺瑞密令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要求中山先生放弃恢复旧国会的主张。1920年7月

安福系失败，10月吴鼎昌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列为祸首，撵出“政坛”，免去财政部次长。此后，他就只剩下了盐业银行总经理职务。

吴鼎昌在政治上虽然失势，但仍能利用手中的盐业银行进行活动。1922年初，中南银行为发行钞票充实准备，请周作民出面发起，联合金城、盐业、大陆三行组织四行联合准备库，吴被推任主任。7月又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吴兼主任。1923年创立“四行”储蓄会，亦任主任。所谓“北四行”集团，就此形成。“北四行”及其储蓄会，以北方数省为营业重心，发行钞票，主要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投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库券，为北洋军阀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为自己攫取高额利润，营业畸形发展，一时居北方银行业的首位，吴也就成了金融界的首脑人物之一。

吴鼎昌懂得办银行捞钱，也懂得抓舆论工具和搞政治的诀窍。1924年，他以资金津贴胡霖在上海所办的《国闻周报》。此后，他以“前溪”的笔名在该刊发表财经方面的文章，以图捞一个“经济学家”的头衔。1925年9月，吴鼎昌出资五万元，由胡霖出面从王郅隆的后人手上盘购了天津《大公报》，另组《大公报》新记公司，以胡霖任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吴自任社长。

1926年9月《大公报》续刊，《国闻周报》亦由上海迁至天津出版发行，吴鼎昌又兼任《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社长。从此，他就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作舆论工具，作为投靠蒋介石新军阀集团的敲门砖，并巧妙地为新主子的反动统治服务。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革命势力迅猛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11月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建立了反革命中心，吴鼎昌即由张季鸾介绍前往南京会见张群，并通过张群的引荐而与蒋介石在南昌相识。12月，吴回到天津，一面联络各地资本家组设“全国生产协会”，妄图扼制工人的罢工斗争；一面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大公报》上公开制造反革命舆论。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和《敬告学生》等一系列反动文章，充当了当时北方反动势力叫嚷“政治南伐”的主要角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吴鼎昌大为赞赏，夸奖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拥蒋反共，公开吹捧其后建立的南京反动政权，号召拥护这个“唯一之中心势力”^①，而对武汉地区蓬勃高涨的工农群众运动则大加攻击。1928年到1930年的新军阀混战中，吴鼎昌等以小骂大帮忙手法在《大公报》上为蒋介石效劳。1930年到1934年间^②，又积极拥护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东南四省的匪祸》、《共祸果足畏耶》、《剿共与灾民》、《匪区之追击与清理》和《消灭残匪还须努力》等等反共文章。同时，吴鼎昌还在《国闻周报》发表《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张建立所谓“好政府”，拥护“好领袖”^③，为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涂脂抹粉。

1931年吴鼎昌前往上海做公债投机买卖。“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形势下，《大

公报》曾对国民党的对日屈服与妥协态度有所批评。但在上海抗战被破坏、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遭到镇压后，1932年5月，吴鼎昌即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四团体，发起所谓“废止内战大同盟”。声称“外侮纷来”，“源于内乱”，“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无从说起”。“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其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现于全国”，故“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以期安内对外”^④。实际上吴鼎昌是以“安内对外”为号召，支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7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吴鼎昌，多次相与密谈，对他大加赞赏，吴从此跨进了蒋介石政权的门槛。11月，蒋任命吴鼎昌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1934年政学系首领张群、杨永泰分任湖北省主席和秘书长时，吴与张、杨二人往来甚多。1935年10月，吴鼎昌配合蒋介石的对日绥靖政策，纠集平、津、沪、汉等地工商金融界首脑人物，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任团长，前往日本进行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亲日媚日活动，同日本大财阀组成了“中日贸易协会”。同年12月，蒋介石为了欺骗全国人民，组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的所谓“名流内阁”，以吴鼎昌为实业部长。吴鼎昌辞了《大公报》社长，前往南京就职，但仍保留《大公报》新记公司董事长职务。吴鼎昌在其实业部长任内，极力替蒋介石拉拢四川大小军阀；帮助劝说段祺瑞离津南下，将孔丘的后裔孔德成接到南京；并帮助四大家族扩展官僚资本势力，创设了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官僚资本企业。吴鼎昌由安福系旧政客一变而为国民党政学系新政客，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显赫起来，博

取了不少头衔，如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第一组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以及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鼎昌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管民营工业，负责京、沪工厂内迁任务。11月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并在组织上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他在贵州极力加紧推行蒋介石的法西斯保甲制度和新生活运动，同时大肆搜括。他先大量贱价收买鸦片，然后以严禁种烟吸烟为名，从提高鸦片烟价中大发横财。1939年，吴鼎昌吸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农民银行等官僚资本，在贵州组成贵州企业公司、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以贵州省银行为金融机关，建立起从工矿业、商业到农林业无所不包的贵州省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到1945年止，办有化工、玻璃、火柴、烟草、面粉、丝织、电气、水利、水泥、农业机械、煤矿、木业、林牧及井盐、垦殖、商业等公司十六个，投资总额达法币二亿二千六百余万元。

1945年1月，吴鼎昌调往重庆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的幕僚。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蒋介石听从政学系的献策，伪装和平，玩弄阴谋诡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谈判，14日由吴鼎昌起草电文拍发延安^⑤。他们预料毛泽东不会到重庆去，正可借此宣传共产党不愿和谈；

如果应邀去了，则利用国共谈判的时间抢受降，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在蒋介石幕内，吴也是一个“宠信历久不衰”的政学系策士。9月，吴鼎昌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蒋介石自任该局总裁）。

1946年春，蒋介石极力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全国各地制造法西斯恐怖，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动一些职业学生，举行反共、反苏游行。2月2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的特务学生举行所谓“重庆市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国民党特务和部分反动学生乘势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然后到蒋介石的“官邸”请愿，吴鼎昌以文官长身份代蒋接见，“与各校院领队师生握手，并致慰问之忱”^⑥。是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这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引起各地人民的普遍反对。6月23日出现了上海各界反内战高潮，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欢送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请愿，当晚发生了请愿代表在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的“下关惨案”。26日，请愿和平代表到蒋介石官邸问吴：“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吴鼎昌答：“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⑦暴露出他坚持反共又无可奈何的顽固立场。同年6月，他与宋子文拟订“战后经济事业制度”。8月吴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积极从当时的第三方面势力中间进行拉拢、分化工作，为蒋介石拚凑伪“国大”卖力。

1948年5月，伪行宪“国大”召开后，吴鼎昌改任蒋介石

总统府秘书长,11月底,熊式辉、张群等在上海筹备组织新政学系——“笃行社”,他前往参加筹备会。“笃行社”筹备会只开了三天,因当时蒋军在淮海战役中遭到惨败,赶忙草草收场离散。^⑧

1949年1月,蒋军兵败如山倒,美国采取换马术,支持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蒋介石宣告“引退”,吴鼎昌趁机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将其财产变作黄金、美钞,逃往香港作寓公。1950年8月22日,吴鼎昌病死于香港。

注:

- ① 1927年4月29日《大公报》社评《党祸》。
- ② 1931年9月至1935年11月期间,因张季鸾生病在家,所以《大公报》许多社评由吴鼎昌执笔。
- ③ 1933年《国闻周报》第十卷一期。
- ④ 1932年《国闻周报》第九卷二十二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一页;王芸生、曹谷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
- ⑤ 王芸生、曹谷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
- ⑥ 1946年2月27日新华社记者评吴国桢关于学生游行的撒谎谈话。
- ⑦ 阎宝航:《揭穿敌人反革命的两手》,1962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
- ⑧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

白 朗

杜春和

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薄，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1908年夏，白朗与一个叫王岐的地主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非刑拷打，使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①。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以赶牛车（拉官盐）和开炉场（冶铁）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他经常尽其所有地帮助别人，因此，群众对他很有好感，遇事都爱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呼他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1911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又遭受了严重的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饿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白朗也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②。

白朗最初只聚集了二、三十人，手中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笨炮队”或“袄

片队”。他们的活动开始不久，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依然如故，因此，白朗军的斗争矛头便又指向了袁世凯的统治政权。1912年4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得快枪二十余支。到5月下旬，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③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鲁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焦灼，他指使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在敌人许以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被敌人全部杀害^④。白朗没有受骗，他率领全队穿过郟县，攻占了禹州的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队伍很快增加到五、六百人。

1912年冬到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敌人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声称“打富济贫”，到处号召饥民参加，并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除一部分留充军饷外，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⑤因此，他们到处受到穷人们的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无以为生的人，纷纷加入，白朗军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

1913年的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

白朗这支农民武装，不断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派人到白朗军中进行联络，并委任白朗以“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等名义；^⑥有的还以参谋、顾问的身份帮助白朗策划军务。孙中山曾派一名姓沈的参谋帮助作战，^⑦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⑧以牵制袁军的南下。白朗接受了孙、黄等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进行“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过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⑨标志着白朗军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13年6月，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举攻克唐县县城，打垮守敌近一个团的兵力，7月又攻克以富庶著称的禹州，先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和财物。他的队伍扩大到六、七千人，半用快枪，并有机关枪数挺，大炮数尊，声威大震。同时分兵袭击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有力地牵制了袁军从河南南下。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曾报导：“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⑩。这时白朗军的斗争，已象插进袁政府管辖区的一把尖刀，搅动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9月下旬，当白朗军攻克湖北枣阳时，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白朗军在五、六千敌人的围攻下，坚守枣阳达十天之久，焚烧了帝国主义的教堂，扣押了与起义军为敌的传教士十三人，使中外反动派为之震惊。10月初，白朗军退出枣阳，返回河南。11月攻克宝丰，白朗回到故乡大刘庄，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二次革命”失败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军，张镇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

内”把白朗军全部消灭。白朗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要经历更大的战斗考验。正在这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①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12月下旬越过京汉铁路,挥军东征。

1914年1月间,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并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进入安徽,26日攻下安徽的六安,随后又攻克霍山等地。当白朗军攻克六安时,把衙署、监狱、天主教堂等焚毁;并出示安民,开仓济贫,与六安人民共度春节。由于一路上各地饥民纷纷加入,白朗军大发展,“共有四十个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②总计约二万人左右,这是白朗军的最盛时期。

白朗军的纵横驰骋与迅速发展,使得中外反动派都非常惊慌,驻华各国公使有出兵代为剿办的表示,北京的“国会”和中外大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对张镇芳镇压白朗军的失败大加指责,逼得袁世凯不得不把张镇芳撤职,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二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数万人进行四面包围。又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阻截白朗军南下,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妄图把白朗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③。

但是,段祺瑞的围歼计划落空了。行动快速的白朗军,于2月中旬又由豫、皖交界的叶家集折回河南,并在商城以东的鄧家集等地给王占元两个团的部队以重创后,突破重围,日夜

兼程，经光山、罗山县境，由信阳以南的柳林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湖北。3月8日攻克湖北的商务重镇老河口，打垮守敌一个团，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并没收了一批外国经济侵略企业，如亚细亚煤油公司、美孚洋行等，商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白朗军的流动作战，把袁世凯政府搞得手忙脚乱，大丢其脸。袁在给段祺瑞的电中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殊损威信。”段在回电中承认：“劳师糜饷，貽笑中外。”^④袁世凯为此枪毙过弃城逃跑的县长，调动了十多万军队，撤换过许多将领，后来又把段祺瑞调回，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

白朗在攻占老河口后，曾召开过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他本想由老河口直接进入四川，建立一块根据地，使军队得以休整。但因蜀道险峻，川军已有防备，不利攻取，遂决定西进陕、甘，由西北再相机入川。3月中旬，白朗军由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陕西都督张凤翔赶紧调兵堵截。白朗军出其不意，打得张凤翔大败而逃，躲进西安向袁世凯呼救。白朗军连克商南、商县、山阳等地，并公开电告袁世凯说要攻取西安，要袁世凯作好准备。袁世凯吓得赶忙派遣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第七师昼夜不停的赶往西安，纠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反动军队近二十万人，前堵后追，并由北京派飞机四架前往助战。白朗军忽南忽北，使北洋军顾此失彼。不久，白朗军出子午峪攻克郿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北渡渭水，又连克武功、乾县、麟游、凤翔、陇县等十余县，于4月下旬由固关进入甘肃，攻占通渭、陇西。5月4日击毙秦州（天水）镇总兵马国仁，占领甘南重镇秦州。接着又攻下徽县、成县、

武都(阶州),准备南下渡白水江进入四川,但因川边已有重兵戒备,乃转克岷县、临潭(洮州)等地。

在进军西北的过程中,白朗建军号为“中原扶汉军”,有时又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声称自己是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⑤。说到西北来的目的是找寻根据地,扩兵囤粮,“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⑥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设立完美之政府”。几年的流转作战,白朗军声势越来越强大,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⑦。同时,随着力量的成长,白朗对部队的纪律也逐渐严明起来,后期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地主给予打击外,对于开城迎降的官绅不再杀戮,并宣称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有时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入城”^⑧。因此,和那些淫掠烧杀、残民以逞的官军对比,群众是宁愿欢迎白朗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群众“现〔视〕兵如仇讎,视匪如家人”^⑨。有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白狼(朗)过秦川》的版画^⑩,描写了白朗跨马杀贼的英雄形象,据说当时就曾在陕、甘、豫等省广为流传。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一方面由于川、甘交界的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川军又有重兵防堵,不易通过;另一方面当他们深入甘肃后,部队已过于疲劳,岷、洮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甚至饮水也很困难,加上时疫流行,又有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主力损失日渐严重。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在临潭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不愿再奋战入川,要求立即返

回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率众退出临潭，经漳县、宁远(武山)，6月上旬克秦安，接着就由清水长驱进入陕西。一路上虽然有敌人前截后追，但由于白朗军发挥了“善走”的特长，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除在宝鸡、郭杜镇、子午峪等地和拦截的敌人发生过几次战斗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通过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就到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到河南故乡，补充兵力，取得喘息的时间；但不料一入河南境，战士们就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无法制止，沿途星散，不复成军。就这样，这支历时四年，纵横五省，攻克过五十多个县的农民队伍，终因缺乏坚强的领导，无法克服农民的落后思想，而迅速解体。最后，追随白朗的只剩下百数十人。8月中旬，他们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交界的虎狼爬岭时，遭到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和敌人血战两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注：

- ① 《白朗起义调查简记》，《史学月刊》1960年第2期。
- ② 同①。
- ③ 《张镇芳藏札》，1912年5月22日王汝桂致王祖同探报。
- ④ 同上，1912年10月24日张镇芳、雷震春致陆军部电。
- ⑤ 同①；又见《白狼猖獗记》，《时事汇报》1914年第5号。
- ⑥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 ⑦ 同①。
- ⑧ 《大公报》，1913年8月21日。

- ⑨ 1913年7月5日雷震春致陆军部电。
- ⑩ 《民权报》1913年7月14日、16日；《民立报》1913年7月31日。
- ⑪ 1913年11月30日张镇芳致袁世凯电中说：“黄兴刊刻豫都督印送与白狼，无数青年混入贼中代为筹划。湘人邹永成、豫人刘怀锡等皆在其内，此外，粤人、浙人、闽人尚有数名……。”
- ⑫ 王仲霖：《麻黄支队防匪记》（稿本）卷三。
- ⑬ 1914年2月22日段祺瑞致袁世凯电。
- ⑭ 1914年3月21日袁世凯致段祺瑞电及22日段祺瑞复电。
- ⑮ 1914年3月31日开封邮政分局邮务总办阿杜能（意大利人）致北京邮政总局总办柏利（法国人）函中所附中文抄件。
- ⑯ 王士藹：《白匪陷害陇南见闻录》（稿本）。
- ⑰ 1914年5月29日吴中英致参陆两部电。
- ⑱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第二十八卷。
- ⑲ 1914年7月14日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致田文烈等电。
- ⑳ 《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板画》，《文物》1964年第10期。

黎元洪

张振鹤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生。他的祖籍原系安徽宿松，从祖父起即经商湖北，遂入籍黄陂。父名朝相，参加过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役，后又转直隶练军，由士卒升为游击。元洪十四岁时随家北来，先进私塾，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于1888年被派往海军服役。1890年，经水师提督丁汝昌调广东广甲兵船上充当三管轮，次年晋为二管轮。1893年，一度应调去湖北任炮厂监工，后又回广东。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从广州北上增援威海卫，遇敌于渤海口，所乘战舰被击沉。黎飘流海上，后在大连附近得救。

战后，黎元洪脱离海军，往南京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先奉命监修新式炮台，后为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习，深受器重。1896年1月，张回湖广总督本任，又把他带到湖北，委以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预训练新军。1898年，黎东渡日本考察军工生产。1899年秋，再次赴日考察陆军教育及军纪。第二年夏回国，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1901年，第三次去日本，参观陆军大操演习。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张之洞遵照练兵处新章，改编湖北常备军为两镇，黎元洪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

官。1906年4月，练兵处将该镇拟定名称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黎任该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同年秋，清政府于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分编南北两军，南军由湖北第八镇和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黎元洪以第八镇统制官名义，率军参加了这次演习，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①。

湖北人民为收回利权，发起粤汉铁路收回自办运动。1909年，各界推派代表组成“湖北铁路协会”，共谋筹款，黎以军界代表参加。这一年，湖北水灾严重，遍地饥民，成群结队四出吃大户，抢夺地主富商存粮。黎元洪奉命派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官兵去江陵县驻扎，“随时认真弹压”^②。1910年夏，他亲自带兵去沔阳州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同年，陆军将校讲习所改为讲武堂，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办，黎元洪和邓成拔任会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的领导者多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了扩大影响和提高革命军的声望，黎元洪被抬出来充当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其实，他对革命活动一贯惧怕和仇视，早在上年11月间，他即借故把倾向革命的队官潘康时撤职，而以亲信施化龙代替。施秘密侦探军队内部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活动情况上报，黎据此下令开除了大批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的那天晚上，他还亲手杀死革命士兵。之后，他又惶惶不安，逃匿不见。

11日黎明，起义军的领导人群集武昌阅马厂谘议局，通过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派人赴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觅黎，黎已匿避；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穿短狭

不适体的便服，默坐一室中。派去寻找他的人说：“请统领当都督！”黎瞪目而视，答道：“谁同你们造反？”即起身出走。后又逃往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某家躲藏，并以身后事托付刘某。当起义军把他从刘家找出来时，他还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⑤直到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他当都督，他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等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他才勉强就职。

黎当上都督后，继续施展破坏革命的伎俩，密派前大清银行监督黎大钧，暗中和清大臣柯逢时勾结，约定：如革命成功，黎保柯之身家；如革命失败，柯保黎之身家。11月，他又假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的手残害鄂军第一协统领宋锡全于长沙。宋系四十二标一营队官，早几年曾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平日对“文学社”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革命后遂被推为协司令。黎和军务部长孙武忌“文学社”，对宋亦怀恨在心，故借刀杀人，从此埋下湖北各革命团体间互相仇视和分裂的种子。

革命军继汉口战事失利之后，11月26日，汉阳又陷敌手。清将冯国璋坐镇指挥，自汉阳架炮轰击武昌，都督府中炮弹。黎元洪恐惧，私自乘所备垂帘小轿逃往距城六十里的王家店，一时城内秩序大乱。12月初，双方停战，他经多人劝驾，才返回武昌。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仍兼鄂督。2月，南北和议成功，改选

临时总统和副总统，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黎元洪选连任。他为从事政党活动，参加竞选，组织“民社”，自任理事长。“民社”的主要成员多湖北人，如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他们鉴于南京临时政府部长、次长席位都被别人夺去，心怀不满，大肆中伤孙中山，煽动武昌和南京分裂；又借口反对建都南京，以讨好袁世凯。黎元洪为向袁献媚，2月间，通电南京政府，叫嚷“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乐得挟黎以对抗革命派。袁、黎之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恢复旧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是他们之间结合的基础。黎为加强实力，开始在湖北实行恐怖政策。文学、群治二社社员组织“群英会”，以反孙武为号召，于2月28日举行暴动，被黎镇压。事后，黎还发布停止集会结社的通电，以限制革命团体活动^④。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势力遭受严重摧残。黎元洪借缩编军队，排除异己，将原来八师的军队，改编为三个师。

黎又借口汉口《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于8月8日，派兵将该报查封，并下令缉拿该报主任何海鸣、编辑凌大同。何等闻风先逃，凌大同被捕。14日，上海《民立》、《民权》、《民国新闻》等七报社联名致电黎元洪，抗议他“违背国宪，蔑视人权”^⑤。黎不顾舆论激烈反对，9月把凌大同处死。16日，他伙同袁世凯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先是，他以卑鄙的手段把张、方等人骗往北京。随后密电袁，诬称张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主动”^⑥。张、方遂被袁世凯逮捕并遭杀害。这是民国成立后袁、黎合谋制造的一件著名的政治谋杀案。

与此同时，湖北境内不断爆发的革命斗争，也都被黎元洪以极为残酷的手段一一镇压。报载他“妄诛无辜之人甚多，武汉间几日有杀人之事”⑦。

1913年黎投向袁世凯，成为袁扑灭“二次革命”的有力帮凶。在他的同意下，北洋系李纯部队得以早在革命爆发前预先进入湖北，为袁日后击溃江西湖口李烈钧的讨袁军提供了基地。他又勾结湖南立宪派官僚谭延闿等，分化了该省反袁的力量。当宋教仁被刺后，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准备发动讨袁战争时，他为袁世凯辩护，说袁世凯是“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⑧。

“二次革命”失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10月6日，袁挟持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黎也当上副总统。随后，黎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

袁世凯对黎元洪继续留在湖北并不放心，于12月间，派段祺瑞以“磋商要政”为词⑨，把他从武昌“迎到”北京，住南海瀛台，进而结成儿女姻亲，表示公谊私情都超过一般关系。从此，黎的行动都处于袁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无异政治俘虏，黎意态渐趋消极。

袁世凯为独揽大权，阴谋复辟帝制，1914年6月成立了御用的参政院，任命黎元洪兼参政院院长，黎勉强就职。此后，黎请辞副总统未准。1915年，袁准备称帝时，黎由瀛台搬进东厂胡同寓所，这是袁特意为他购买的一处住宅。12月15日，袁又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受。他对袁的帝制闹剧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

1916年6月6日，袁死，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是日晨，日、英、法、俄、比、意六国公使闻袁病危，共聚日本使馆策划继承人问题，一致同意由黎元洪任大总统。随后，将上述决定通告段祺瑞。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段于6日晚间表明了态度。7日，黎宣布就职，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29日，黎宣布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8月1日，国会复会，黎在会上正式宣誓就任。

黎、段之间的利害冲突很快趋向表面化。袁世凯当权时，大小事都听命于总统，当总理的毫无实权；段祺瑞当了总理，却把总统看成签字盖章的傀儡。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更不把总统看在眼里。黎元洪为此愤慨地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⑩他周围的重要成员丁世峰、哈汉章、金永炎、黎澍等人，联结反段派议员、政客共同对抗段、徐，由此演成“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1917年，因对德宣战案，导致双方的公开冲突。

赞成或反对宣战，不仅反映国内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亲日的段祺瑞于4月25日召集各省督军到京开会，企图借督军团的势力，向黎施加压力，要他同意宣战。到会的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有：曹錕、倪嗣冲、孟恩远、王占元、李纯、阎锡山、张怀芝等，陆海军总次长和参谋总长都列席会议。段祺瑞在会上提出对德宣战案后，经多数与会者赞成通过。5月1日，国务院也开会讨论，正式通过。段即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则坚持等国会表决通过后，才能核准。安徽省长倪嗣冲偕督军团代表面见黎，要求对德宣战，黎当面加以训斥，责其擅离职守，干涉外交。

5月8日，众议院开始讨论对德宣战案。10日，段祺瑞的亲信率自称“公民请愿团”的打手数千人到国会前示威，强迫议员通过参战案，并打伤议员十多人。暴行发生后，引起公愤，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内阁阁员相率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亦出京，以示抗议。19日，众议院以现内阁仅剩总理一人，不足信任，拒绝讨论宣战案。段祺瑞因而大怒，他唆使吉林督军孟恩远领衔，联合各省督军呈文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黎不允，召见孟恩远、王占元，告以约法上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解决时局最好办法，惟有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

23日，黎下令免去段的职务，任命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29日起，在段的授意下，安徽省长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錕等纷纷宣告脱离中央，造成“九省督军皆反，连兵请解散国会”的混乱局面^①。黎元洪束手无策，于6月初同意调长江巡阅使张勋来京调解。不料张率兵到天津后，突然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要挟他。此时黎已引狼入室，欲罢不能，遂于13日同意下令解散国会，并通电全国承认违法。张勋于国会解散后入京，7月1日，导演了一幕“大清帝国”复辟的丑剧。3日，黎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并电请身居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

段祺瑞利用张勋解散了国会，又利用全国人民维护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在马厂起兵，迅速击败了张勋，重任国务总理。段于14日回到北京正式办公，并把黎从日本使馆迎回，黎表示不再回任。于是冯国璋担任了大总统。黎元洪回到东厂胡

同寓所，开始段祺瑞不许他离开北京，怕被人利用。一天，黎宅突然发生了行刺案，在汤化龙等人的说合与保证下，8月27日，黎元洪始获准回天津英租界寓所。

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战胜了皖系军阀段祺瑞，1922年4、5月间又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曹、吴控制了北京政府，他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在打败奉系不久，于6月间，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又把黎元洪拉出来复任大总统，并召集民国6年（1917年）旧国会，搞所谓“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黎于11日到北京就职。

曹、吴拥黎元洪再次上台，目的是想借此恢复国会，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当总统，又可用“法统”名义抵制南方的护法政府，统一全国；而黎及其周围的人物则是想分享政权。所以，黎复位不久，为了任期问题便和曹家党徒发生争论。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直接唆使他的弟弟曹锐出面收买议员，为“驱黎拥曹”做准备。1923年6月6日，他们迫使国务总理张绍曾辞职，陷政府于瘫痪；7日，又指使北京军警官佐数百人，向黎索饷请愿；10日以后，连日雇用流氓和便衣军警出动，游行示威，围困黎的寓所，割断电话，破坏水源，并让警察罢岗罢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又联名以辞职相威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逼黎让位。

黎元洪这个总统实在混不下去了，13日下午，才偕同陆军总长金永炎、美国顾问福开森等十余人，乘车赴津。他的专车抵达天津车站后，又出现一场夺印闹剧。直隶省长王承斌带着军队把他围困了十多个小时，向他索取总统印章。直到他用长途电话通知北京，把藏在法国医院的印章交出，才被允

许下车回家。

黎回天津后，各派政治势力都想利用他当作反直系的招牌。张作霖邀他去奉天；一部分聚集上海的议员邀他南下，皖系政客力促其行。9月11日，他偕陈宦、李根源、金永炎等人从天津秘密抵沪；但各反直派势力意见难以统一，使他组织政府的计划流产^③。10月，曹锟在北京贿选为总统，粉墨登场。黎元洪感到已无再留上海的必要，便于11月，买棹东渡，到日本别府养病。1924年5月，再返津门。

黎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黎家早在该矿有巨额投资，据1921年《山东矿业报告》公布的数字为六十万元，占第一位。他在武昌油坊岭等地还购有大量田产出租。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患脑溢血死于天津。

注：

- ①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41。
- ② 《枵腹陆王弹压灾区》，《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 ③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44页。
- ④ 天竺生：《武昌军队内哄详报》，《中华民国大事记》，有正书局，1921年版，第3册，第31—36页；《时报》，1912年3月3、5日。
- ⑤ 《民国新闻》，民国元年八月十五日。
- ⑥ 《黎副总统政书》，武昌官印书局，1914年8月版，卷13，第11页。
- ⑦ 《民立报》，1912年8月19日。
- ⑧ 同⑥，第20卷，第15页。
- ⑨ 同⑥，第34卷，第8页。
- ⑩ 韩王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 ⑪ 章炳麟：《黎公碑》，《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4页。
- ⑫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泰东图书局1924年版，第170页。

冯 国 璋

李宗一

冯国璋字华甫（符），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人，生于1859年1月7日（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其父冯春棠务农，家境不很宽裕，荒年常不能自给。冯国璋在家乡读私塾渡过童年，青年时代到保定莲池书院求学，一边读书，一边谋生计，后因贫困辍学。

1884年，年已二十五岁的冯国璋，经其族叔介绍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挑选淮军各营兵弁入学。由统领刘祺保荐，冯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在学堂学习期间，曾于1888年回原籍应科举。时功令特设数学附生额，冯以通晓算术补诸生。嗣后，又应顺天乡试落第，仍返原校继续攻读。1890年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留堂充当教习。

当时淮军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轻视武备学堂学生，学生毕业得不到重用。冯国璋为谋升迁，急于想取得军功，于1893年入淮军将领聂士成幕，奉命赴山海关外考察地形，甲午战争中又随聂军转战于东北前线。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由聂推荐担任中国驻日本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他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等结识，留心考察日本军事，日积月累，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初回国，先呈送聂士成，未

被重视；又转呈袁世凯。袁大喜，视为“鸿宝”，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①当时，袁在小站创办新建陆军，遂留他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他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1899年，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武卫右军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冯国璋随军前往。到济南后，他奉命改编山东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因参预镇压义和团有“功”，次年由袁奏保以补用知州升为补用知府。1901年底，李鸿章病死，袁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编练北洋常备军，袁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和教练三处。冯为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将弁学堂、武师范学堂及测绘学堂等。当时，李纯担任教练处提调，是他的得力助手。

清政府于1903年底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作为督练考察全国新军的机关。经袁世凯举荐，冯国璋担任练兵处军学司司长，仍常川驻保定，督理北洋各武备学堂，兼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督办。经他之手，培养了一大批有浓厚北洋派系观念的军官，被输送到北洋六镇及北方各省新军中，对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②。

1906年，冯国璋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堂专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并附设王公讲习所，听讲者皆世爵懿亲。在此期间，冯和满族亲贵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这是他后来能够掌握禁卫军的重要原因。从1907年7月至1911年，他一直担任军谘使，负责办理军谘处（后改为军谘府）的日常事务。

这期间，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1908年底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监国，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壮亲贵集团企图削弱北洋集团的势力。为了分化北洋集团，载沣对冯极力加以笼络，然而冯却始终效忠袁世凯。1909年初，载沣以袁“患足疾”为借口，命他开缺“回籍养病”。冯亦惴惴不安，便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吴氏病丧为理由，屡次请假，均未得准。此后遂“箝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③。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清廷派陆军大臣廕昌率领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派冯国璋组织第二军增援。但冯和北洋各镇将领不愿服从廕昌指挥，心里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催令“火速”，而冯的动作却很缓慢。清廷迫不得已，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以“足疾未痊”为借口，作势不出，而要求清廷给他军政大权。10月23日，冯到彰德见袁。袁奏请他接替廕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并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④他到湖北前线后，按照袁的指示布置第一军“暂作守势”^⑤。当清廷被迫授袁军政全权以后，袁由彰德南下督师，命冯进攻汉口。第一军的协统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都是冯的亲信。在冯的指挥下，第一军与革命军激战四昼夜，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冯纵兵烧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繁盛之区变为一片瓦砾，居民死伤甚多。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各阶层人民纷纷通电声讨冯国璋及北洋军的罪行。

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袁世凯派人向革命党人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和平了结”，遭到革命党人的拒绝。为迫

使革命党人就范，袁命令冯军进攻汉阳。冯指挥第一军由蔡甸和驼罗口渡过汉水，于11月27日陷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使新成立的武昌革命政府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为酬冯“战功”，赏给二等男爵。当时，冯欲乘胜渡江攻取武昌，袁世凯亲以电话止之。这时，革命军虽在武汉暂时失利，但在南方各省进展迅速，江浙联军光复南京，长江海军也宣告起义，一时成相持局势。袁世凯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攀请帝国主义出来“斡旋和平”，企图通过“南北议和”绞杀革命，攘夺政权。11月30日，冯奉命与革命军商洽停战，很快达成暂时停战协议，规定12月2日至5日停战三天，以后又不断延长。然而，此时冯对袁的真正意图，尚未完全了解，所以仍不时致电内阁请派援军，鼓吹继续使用反革命武力，扑灭革命火焰。于是，袁便命令段祺瑞代替冯统率湖北各军，而调冯为察哈尔都统。12月15日冯离汉口北上。抵京后，奉命留京统筹近畿防务，兼充禁卫军总统。

禁卫军是满族少壮亲贵载涛控制的一支重要武力，官兵共一万二千人，大都反对清廷退位。冯国璋以支持清廷的姿态出现，顺利地掌握了这支武力。此后他便按照袁的旨意，对满族少壮派军官进行恫吓和利诱，终于使禁卫军官兵大都同意清廷取得优待条件后“逊位”，而由袁世凯组织所谓“临时政府”。

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后，一步一步地实行独裁统治。冯国璋仍统领禁卫军，兼充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次年3月，由于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激起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抗。冯采

承袁的意旨，串通各省军阀发表通电，攻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危害民国”、“破坏共和”，叫嚣武力解决。^⑥当袁世凯所派北洋军第六师攻入江西境内时，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7月23日，冯奉命担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指挥北洋军沿津浦路南下，他从兖州韩庄出发，连陷宿县、蚌埠、滁县，8月16日到达浦口。在南京参加讨袁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冯的女婿）过江向他投降。他得悉南京讨袁军陷入群龙无首的紊乱状态后，于25日挥军渡江，猛扑下关，与张勋所部辫子兵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扑灭了“二次革命”以后，冯于9月10日返回北京。袁世凯为酬劳他，特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与他订婚^⑦。12月16日，袁命他接替张勋担任江苏都督，次年又授以宣武上将军，仍坐镇南京，督理江苏军务。这时，冯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军队共二万余人，成为雄踞东南的大军阀。

从1913年底至1915年初，冯国璋发出许多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攻击责任内阁制，主张实行总统制，使袁“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⑧。然而，当中外盛传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时，他却感觉到了政局动荡的危险，担心袁将失败，而且即使帝制能成功，皇位将由袁的子孙去世袭，妨碍自己的继承希望。因此，1915年6月他进京打听内幕，22日谒见袁时试探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矢口否认自己想当皇帝。冯又进一步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这

是什么话？假如有人用这等事逼我，我只有远走国外了。”^⑩

经此番试探，冯以为帝制暂不会发生。7月9日他回南京，可是8月14日北京就成立了筹安会，敲响了帝制的锣鼓。开始冯尚不敢相信，密电总统府机要局长张一麐探询，张答“事出有因”。不久，段芝贵、张镇芳等帝制干将纷纷派人到南京来游说，冯始恍然大悟，深感自己受了袁的欺骗，从此，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了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的“腹患”^⑪。后来，为了和缓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⑫；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直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12月18日下令调他担任参谋总长，表面上说是让他进京主持军事全局，实则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他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他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⑬。

云南护国军于12月25日发动讨袁以后，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响应。冯国璋眼看袁的大势已去，出于自身利害考虑，遂暗中串通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联名请求袁“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⑭。这就是哄动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在全国人民反帝制运动的压力下，袁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过仍想回过头来做大总统。但南方独立各省非要袁退位不可。袁便派人赴南京示意冯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发一通电，挽留他继续做大总统。冯认为此刻通电已无济于事，反而会引起南方独立各省的反感，不利于“和平解决”。他婉言加以拒绝，而表示愿意从中调停。4月18日，他提出“和平解决”八条，其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

位”^⑭。这种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南方独立各省的严词拒绝。于是，冯即致电徐世昌、段祺瑞和王士珍，说明“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要求他们劝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⑮。同时，他将八条略加修改；于5月1日通电各方，其第一条改为：暂时承认袁为大总统，另组新国会，由袁提出辞职，再选举继任大总统^⑯。结果，南方独立各省仍然反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冯的主张是“名为保袁，阴实自重”^⑰。与此同时，袁又要求冯对南方“说强硬的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⑱。冯一面应付袁，一面则与南方独立各省周旋，信使往还不断^⑲。同时，又极力主张未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以实力调解“四省和中央”冲突^⑳。他企图趁人民反袁怒潮高涨的时机，独树一帜，操纵南北政局，使自己成为时局的重心。这正和袁在辛亥革命时玩弄的手法一模一样。

5月5日，冯国璋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11日，这三个地方实力派联名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18日，十五省区将军巡按使代表齐集南京开会，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退位的问题。一派主张让袁退位，一派则坚决反对，双方争持不下。冯将其5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八条稍作修改后提交会议讨论，作为折衷方案，仍不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会议开了五天，毫无结果。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南北各方关于他退位的争执随之烟消云散。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洋政府大权。10月30日国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冯不愿意放弃地盘，乃于11月8日在南京

就职，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2月间他曾一度到北京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7月张勋复辟失败以后，黎元洪下野，冯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阁员大都是段的亲信。冯、段本来各有自己的派系，“关系始终未融洽”^④。冯见以段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北洋政府，本不想进京就职，后来经过多方疏通，段又派其亲信靳云鹏到南京“欢迎”，他才答应北上。但为了维持以他为首的直系军阀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实力地位，入京前他断然拒绝属于皖系的倪嗣冲接任江苏督军，而安排自己的心腹李纯担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并通过李纯、南京交涉署交涉员兼督署顾问温世珍与英国驻南京领事馆和广西陆荣廷等保持联系。

冯于8月1日抵京就职，不久和段祺瑞的矛盾便尖锐起来。当时，段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依靠日本的援助，派兵攻入川、湘，决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而冯由于受英美策动，主张以维持西南军阀的地位和地盘，换取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承认，美其名曰“和平统一”，并暗中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10月，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在湖南通电主和，并自动撤兵，段的亲信湘督傅良佐仓皇失措，弃长沙出走。同时，入川的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损兵折将，败退下来。紧接着，直隶曹錕、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等督军相继发表主和通电。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严重受挫，乃于11月先后辞去陆军总长和国务总理职务。冯派王士珍继任。但是段不甘罢休，唆使皖系督军团要挟冯继续对南方作战，奉系军阀张作

霖也派兵入关，支持皖系。冯见势不妙，即托词至南方巡阅，于1918年元月突然南下，当他的专车行抵蚌埠时，却被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截住，逼他返京，下令作战。冯不得已折回北京，在内外形势的压迫下，只得派曹錕兼两湖宣抚使，率第三师等北洋军主力进攻湖南，并准王士珍辞职，复任段为国务总理。

1918年3月段重新上台后，“武力统一”叫得更响。冯表面支持段的政策，暗中却唆使李纯、曹錕等与西南军阀接洽和谈。8月，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首先发难，公开通电主张罢战息兵，并对皖系人物徐树铮等进行斥责。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以冯代理期满为由，于10月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实际是把冯国璋撵下了台。冯遂通电全国，以报告代理总统一年经过情形为名，发泄自己对皖系的怨怼，他说：“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政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人非木石，宁不痛心？”并表示今后“绝无希望出山之意”^②。冯失去政治地位，同时段也自动辞去国务总理，直皖两系的利害冲突表面似乎缓和下来，实际上却日趋剧烈。为了平息冯的不满，徐世昌特准冯仍节制北洋十五、十六两师。这两个师是由禁卫军改编的，冯代理总统时一直担任公府警卫。师长刘询、王廷楨都是他的亲信。

1919年春，冯归河间故里，由十六师的两个连更番随护驻守。这时，他已变成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兼大官僚资本家，在诗经村一带就有土地千余亩，在苏北又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七十万亩，在北京、天津和南京拥有几个钱庄，其中较为

著名的有华通银行、华充银号。此外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还有大量投资。当人们指责他“善自封殖”时，他还口说：“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用骗人的鬼话来掩饰自己的贪欲^②。

同年10月，冯由河间抵北京，表面说是为十五、十六两师争陆军部所欠月饷，实则是联络直系，企图东山再起。但12月初“忽感风寒，医治不愈”，于28日死于帽儿胡同冯宅。临危召张一麐等口授遗言给徐世昌，仍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完成。1920年2月2日葬于河间诗经村。

注：

- ① 《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
- ② 见《河间冯公荣哀录》第一册，页20。
- ③ 同①。
- ④ 《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清政府陆军部档。
- ⑤ 同④。
- ⑥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页70。
- ⑦ 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天津女子师范教习，袁世凯的家庭教师，1914年初与冯国璋结婚。
- ⑧ 《爱国报》，1914年2月8日。
- ⑨ 《申报》，1915年7月9日。
- ⑩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
- ⑪ 同⑩。
- ⑫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2月21日。
- ⑬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页320。
- ⑭ 《东方杂志》第13卷，第9号，页29。
- ⑮ 志恢编：《再造共和新文牍》，1916年6月版，页44。
- ⑯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149。
- ⑰ 同⑯，页152。
- ⑱ 同⑫，1916年5月4日。

- ⑮ 详见《唐绍仪、赵凤昌、汤化龙致冯国璋函》，1916年4月26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8册。
- ⑯ 同⑮，页148。
- ⑰ 《张君勱致梁启超函》，1917年7月13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521。
- ⑱ 同⑮，1918年10月1日。
- ⑳ 王树楠：《陶庐文内集》卷3。又同①。

赵秉钧

李宗一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今临汝县）人，生于1859年2月3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初一）。1878年，他考秀才不中，投入左宗棠所部楚军，随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犁充当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①。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二年后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0年至1901年，他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委派他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认为他“才长心细”，^②于1902年初派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创办巡警，并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和袁世凯的警务顾问三浦喜传（日本人）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迅速地成立了一支有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治安”，“成绩昭然”^③。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新军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然后率领巡警一千五百人进入天津城，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在伊藤和原田的指导下，他又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他将天津和保定两所巡警学堂合并，更名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④以推行“猛治”，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3年3月，袁世凯奏保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10月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奏保，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由于他的特务才干出众，袁世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对北京的警政，他“事皆躬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⑤。次年1月，他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抓到手，使原来在北京办巡警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⑥。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地送到袁世凯手里。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工头子。

1908年底，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满族少壮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激化。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河南彰德“养病”。善耆乘势夺取北京的警权。3月，赵秉钧被撤职。从此他闲居天津，时常往来彰德，与袁世凯暗通消息，窥测时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彰德参与袁世凯的窃国密谋。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他担任民政部大臣。当时，八旗兵多调入北京城内，扬言要屠杀汉人。人心惶惶，局势混乱。他奉袁世凯之命先入北京，利用自己在巡警界的潜势力，在姜桂题所部毅军的支持下，把新调进的旗兵“一律资遣回城外汛地”，撤出旗籍巡警，减免捐税，强令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袁世凯为了逼迫清帝退位，从1912年1月中旬就称病不复入朝，内阁所有奏折及请旨都由赵秉钧和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往来传述。1月19日，他们代表袁世凯列席亲贵王公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赵秉钧提出内阁解决时局的方案，即清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当场遭到激烈反对。他很不耐烦地说：“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之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纳，除了袁内阁全体辞职，别无办法了。”说罢扬长而去。以后，他和梁、胡多次逼宫，最后隆裕太后曾哭着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他又陪着大哭，并“誓言保驾”^⑦。

清帝被迫退位以后，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组织内阁，赵秉钧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深知袁世凯和同盟会的妥协只是一

种策略，当唐绍仪提出在内务部司员中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时，他坚决反对，说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他便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而且从此拒不出席由唐召开的国务会议。问其理由，则说：“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

不久，袁世凯逼走唐绍仪，赵秉钧暗中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威胁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国务员名单，他仍连任内务总长。8月间，陆征祥因受参议院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奉命代理。此后，为了骗取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请人代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同时对应邀进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极力表示亲热。9月，袁世凯准陆征祥辞职，提出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当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企图通过赵秉钧实现“政党内阁”主张，便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中极力疏通，使赵内阁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仍兼任内务总长。与此同时，外交总长梁如浩、农林总长陈振先、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来已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恢复党籍。因此，赵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但对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当时“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⑧。

内阁组成不久，赵秉钧就变了腔调。当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

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使内阁变成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赵秉钧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权位有被夺走的危险，便和袁世凯一起策划暗杀宋教仁的阴谋活动，但在表面上他却对宋教仁特别友好。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伤势很重，延至22日逝世。不几天，正凶武士英及谋杀犯应夔丞被捕，在应夔丞家中搜出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及叮嘱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之密函一件，还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而且在洪致应的函电中，有多处提及袁世凯和赵秉钧指挥暗杀事，如：“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又：“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颜色喜，说弟颇有本事”；又：“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等。这些证据被公布出来，宋案真相大白，举国人心震动，舆论哗然。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上海法庭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秉钧拒不出庭，装出一副无享受累的样子，抵赖说：洪致应函电从未阅过，完全是洪假托名义，“招摇”或“隐射”。又装腔作势地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才出来帮忙。后来，南方国民党人坚持要他出

庭，他便凶相毕露，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要我“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血口喷人”。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发动特务机关制造假案，反诬黄兴组织“血光团”，派遣团员来京暗杀政府要人，授意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尽管赵秉钧使用了这些鬼蜮手段，终不能掩盖事实真相，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官。袁世凯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他一再续假，直到7月16日袁世凯才准他辞职，而让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21日又担任了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对京津一带反袁的国民党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以后，赵秉钧于12月16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脱逃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⑨袁世凯装作不知内情，2月19日又让他兼直隶民政长。但是，没过几天，即2月27日，他在天津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⑩。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对于他的死，袁世凯假装非常痛惜，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

克文赴津治丧，特发治丧费一万元，并送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1915年底袁世凯作皇帝，又追封他为一等忠襄公。

注：

- ① 《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 ② 袁世凯：《道员赵秉钧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 31 年 8 月 13 日。
- ③ 同②。
- ④ 同②。
- ⑤ 《大公报》，1907 年 2 月 6 日。
- ⑥ 《汤睿致康有为书》，1903 年。
- ⑦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 111 页。
- ⑧ 黄远生：《远生遗著》卷 2，第 153 页。
- ⑨ 《孤愤数袁氏罪恶之种种》。
- ⑩ 《陆锦致袁世凯电》，1914 2 月 27 日。

岑 春 煊

闻少华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1861年3月2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生于广西西林县。其父是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岑幼时随父在昆明；1879年入居北京，与瑞澂、劳子乔有“京师三少”之称，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1885年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①。

1894年中日战争发生，岑被派至钦差大臣刘坤一处差遣委用，时刘坤一在山海关督师，不久岑被派驻扎山东黄县。次年因病开缺回广西。1898年因送幼弟赴礼部试到北京，受光绪召见一次。当时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岑迎合光绪的心理，说了些“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的话，受到激赏。8月特授岑为广东布政使。两个月以后，又调任甘肃布政使。

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时岑正在兰州，闻讯后亲率马步兵二千余人，长途奔驰，赶到北京“勤王”②。7月抵北京。不久通州失陷，慈禧、光绪仓惶西逃。岑率所部赶到南口“护驾”，慈禧派他为前路粮台督办。由于这番“勋劳”，岑升任陕西巡抚。

1901年3月，正当八国联军侵入山西边境时，岑春煊被

调任山西巡抚。岑上任伊始，即下令撤走娘子关、固关守军，“以示讲和诚意”。为了讨好侵略者，他迅速“清理”教案，预拨银两发给教堂教士，并以此配合主和派奕劻、李鸿章在北京的乞降活动^③。

翌年，慈禧、光绪自西安回北京途中，特命岑春煊随同回京。7月岑奉调任广东巡抚，未及成行，又调署四川总督。他9月到成都，血腥镇压了四川义和团余部及哥老会会众。

时广西官逼民反，群众纷起反抗贪官污吏，全省动荡。岑于1903年4月改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督师梧州，前后三年，屠杀了大批反抗群众。后来成为两广军阀的龙济光、陆荣廷就是岑此时提拔起来的。次年，慈禧命岑兼任粤海关监督，他派员“认真整理”，一年中征得税银六百六十万两，超过户部规定每年五百万两的定额。

岑深得慈禧信任，比较“敢于言事和参劾官吏”，为当权的庆亲王奕劻所忌。时袁世凯正与奕劻结纳，力助奕劻排斥岑。奕劻与袁合谋，于1906年10月调岑为云贵总督，以便攫取两广财富之区。岑知其谋，乞假往上海就医，延不赴任。1907年3月岑忽奉旨改调为四川总督，他知仍系奕劻与袁图谋，乃径入京，面见慈禧，密陈奕劻贪庸误国，自称愿为慈禧“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命岑为邮传部尚书，留京办事。

奕劻与袁必欲设法离间慈禧对岑的信任。1907年5月以钦州地方“扰乱”，广东请兵，再外调岑任两广总督。岑甫抵上海，即闻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政治上益感孤立，正在南下途中，奕劻与袁又伪造岑与梁启超合照，称岑与康、梁勾结，欲谋归政光绪，慈禧信以为实，遂将岑开缺。

1908年，慈禧、光绪同时死去，岑在上海私寓闻讯，“举哀成服”。不久，他的政敌袁世凯也被罢斥，于是岑乃暂居上海，以观时局变化。

1911年，革命形势高涨。四川掀起保路风潮。清廷令岑立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他正准备前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又任他为四川总督。他还打算“征兵选将，筹集饷械”，取道陕西入川，对抗革命。但是眼见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于是见风转舵，电请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④。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1912年任岑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袁又任岑为汉粤川铁路总办。“二次革命”发生前，岑适在上海，曾和王芝祥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袁世凯拒绝。于是，他便与黄兴、陈其美、章士钊等联系，随即加入到倒袁行列，被推为大元帅。袁世凯把岑的汉粤川铁路总办免职。接着岑到广东去活动龙济光倒袁，无结果。国民党人反袁失败后，岑亦被袁通缉，乃逃亡南洋。

1915年底，蔡锷等在云南起义，揭开反袁序幕。时岑春煊尚寓居南洋，广西都督陆荣廷密谋反袁，派员迎岑回国。1916年1月岑由南洋抵沪，与梁启超等密商后，偕章士钊、张耀曾赴日本活动。时日本大隈内阁认为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日本应乘机确定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而“袁世凯在中国的统治已成日本达到上述目的的障碍，为执行帝国的方针，最好使袁退位，其继承人应远比袁世凯更有利于日本帝国”^⑤。为贯彻上述方针，在日本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直接策

划下，用所谓“民间有志之士”的名义，由日本资本家出面给中国国内反袁势力以援助。在上述背景下，同年3月20日岑春煊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借款日金一百万元合同，作为护国军行政费用^⑧。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宣布“独立”。接着，龙济光也被迫宣布“独立”。岑春煊则于4月21日由上海绕道香港抵肇庆。他和梁启超等认为袁世凯“非退职无由息兵”。主张“南部各省应挟决心以为之后盾”^⑨，策动南方各省独立，迫袁退位。5月1日陆荣廷率各将领通电拥岑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8日又在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军务院是进步党和一部分国民党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岑恰是与三方面都有联系的人物，故军务院成立后，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兼领政务委员长。唐不能远离云南，由岑摄行抚军长职权。6月6日袁世凯死，随着南北妥协，7月14日军务院用抚军全体名义宣告撤销。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但陆、唐都没有宣誓就职。陆荣廷和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分子相勾结，把岑春煊抬出来与孙中山对抗。

在桂系陆荣廷以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政客们就着手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把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借此排挤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于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8月21日经军政府政务会议推为主席总裁。

岑春煊名义上是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实际上不过是听命于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陆荣廷一贯主张反段联冯，南北妥协。岑则和直系头目吴佩孚通电倡和，响应吴的“停战呼吁”。^⑧孙中山不愿和岑春煊沆瀣一气，1919年8月7日辞军政府总裁职。10月4日，唐绍仪也向军政府辞议和总代表职。10月27日，广东的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会议案，并有人对岑春煊提出不信任案。军政府已呈瓦解局面。

1920年3月，唐继尧公开揭露岑春煊与北方直系军阀接洽和平的内幕。国民党一致斥责岑出卖上海和会。留在广州的政务总裁之一的伍廷芳，于3月29日携带文件印信与关税余款离粤到香港，并声明对外交、财政两部仍负全责。伍廷芳的出走，使岑处境狼狈。

伍廷芳随后到上海，非常国会事实上分为沪、粤两方。岑与桂系军阀操纵广州的议员于5月4日补选熊克武、温宗尧等为总裁，支撑军政府门面。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改任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与北方军阀政府直接谈判。

7月中旬，直、皖战争爆发，8月桂系军阀乘机向驻闽南粤军进犯。粤军陈炯明部决心趁此打回广东。10月，陈炯明一举攻克潮安、汕头。岑春煊于是又打着军政府的招牌，劝告双方停战。粤军不听，10月下旬攻占惠州、石龙，迫近广州，桂军败退广西。岑见大势已去，于10月24日和陆荣廷等通电宣布撤销军政府。并于27日离开广州，11月2日到上海。从此在上海租界作寓公。

岑春煊居上海期间，与杨永泰、李根源等政学会分子不断往还。1930年完成自述稿《乐斋漫笔》。1932年一·二八淞沪

抗战时，曾捐款三万元^⑩，表现了爱国心。1933年4月27日病死于上海。

注：

- ① 1885—1892年岑春煊履历，故宫档案《履历单》。
- ② 参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III，第409页。
- ③ 见光绪二十七年中《有关义和团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IV，第100—103页。
-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6页。
- ⑤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18页。
- ⑥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S232，广东借款之部。
- ⑦ 岑春煊、梁启超致许世英等电，1916年5月4日。《护国之役文电未刊稿》。
- ⑧ 岑春煊：《乐斋漫笔》。
- ⑨ 沈琼楼：《岑春煊及其有关人物》，《广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123页。

张 鸣 岐

王学庄

张鸣岐字坚白，一作健伯，号韩斋，山东无棣人。1875年8月29日（清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张家系“无棣望族”，其父凌云，屡试不第，供事北京衙门，积贵捐官县丞，曾任湖南湘潭朱亭丞^①。张鸣岐于1894年考取举人，次年会试落选，留南学（国子监的一部分）读书。

1898年，张鸣岐被荐入岑春煊家就馆。岑应诏陈言，由张代拟的奏折受到光绪帝的嘉奖，特授广东布政使，张因此受到岑的器重。张能言多谋，善于揣摩逢迎，与东家相处异常投机。岑春煊说：“坚白与我，同而不异，可作耐久朋。”^②不久，岑由广东布政使改授甘肃布政使，张随充幕僚。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岑率兵“勤王”，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升任陕西巡抚，随后迁山西巡抚，再升署四川总督。张鸣岐均在幕中画策，被保举至候补道，号称岑的“智囊”。

1903年4月，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张任总文案，兼管两广学务处，不久又兼管练兵处，襄助岑推行清廷的“新政”，被目为通达时务之才。1904年5月，因为广西民变蠢起，岑入桂督师，张总理两广营务处。广西巡抚李经羲是首席军机奕劻及袁世凯一派的人物，而岑则与另一军机大臣瞿鸿禨沆瀣一气，跟奕、袁不和。李为了与督臣沟通关系，请求岑让张兼

充他的幕僚，张每日出入督抚之门，成为桂林第一号红员。同年，李保举张任广西太平思顺道；次年，岑又荐张署理广西布政使。岑在密折中称赞张的才干“胜臣（岑自谓）十倍”^③。1906年12月，清廷任命张鸣岐为广西布政使、署理广西巡抚，次年6月实授。

广西在陆亚发等大股“游勇”被扑灭后，民变仍然时起时伏。张鸣岐一面指挥提督龙济光、总兵陆荣廷等镇压民变，一面大举推行“新政”。^④他先后开办了农林试验场、农业学堂、优级师范、法政讲习所，设立电报局、审判厅、检察厅和警察，续办富贺煤矿，筹建桂全铁路，还按清廷规定设立了广西谘议局，一时搞得热热闹闹，在朝野上下都颇著虚名。

张鸣岐为编练广西新军，聘请了大批留日陆军士官生和国内军校毕业生。同盟会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尹昌衡、陈之骥、耿毅、何遂等都在军中担任大小职务。张鸣岐为了利用这些人，不时宴请，以示亲近。张对他们说：“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本人立志刷新广西的政治和军事，即是革命，也就是广西革命的领袖。”^⑤年青的军官们以为巡抚非常开明，在他面前侈谈革命，并且在军队内外加强宣传组织活动。张见势不对，调蔡锷、蒋尊簋入桂接替革命党人担任的要职。在控制住军权之后，张立即抓了两名党人，声言“要砍几个脑袋给大家看看”。^⑥结果，许多出头露面的党人被驱逐出广西。

凭借岑春煊的力量，张鸣岐在短短几年里平步青云，由一个困顿的书生变成了封疆大吏，成为光宣之际最年青的疆吏。1910年，署粤督袁树勋因控制不住局面，地位动摇，张鸣岐眼前又出现了晋升的良机。但这时岑春煊、瞿鸿禨都已失势，张

便转面通过李经羲，向奕劻报效大量钱财。1910年9月，清廷派张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看到这个亲手栽培的心腹与自己的政敌勾搭，异常忿愤，从此结下了怨隙。

1911年1月，当张鸣岐到广州上任时，同盟会在广州的一次起义正在紧张准备。黄兴、赵声等在香港设统筹部，并在广州设指挥部，暗聚同志，联络新军、防营和“绿林”，定期起事。4月8日，署广州将军孚琦突然被华侨工人温生才刺死，全城震动。清廷闻讯，任命张鸣岐署广州将军，接着又实授两广总督。他在惶恐中得到党人即将举事的情报，立刻与水师提督李准等会商，派出大批侦探，抽调防营进城，实行戒严。4月27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起义。督署被黄兴率队攻破，张仓皇丢下老父妻妾，登屋越墙，逃到水师公所，指挥军队镇压。革命党人起事仓促，势力孤单，步调不一，迅即失败。次日，清军继续搜捕起义者。革命党人李德山等退入高阳里源盛米店，堆米袋据守，并抛掷炸弹，清兵不敢接近，张鸣岐竟下令纵火烧街。起义者被俘六、七十人，经张先后下令杀害的，有林觉民、喻云纪等四十三人。^⑦响应起义的顺德民军，也同时被张派兵镇压了。

镇压起义的清兵主力，是李准所部。李长期在粤带兵，多次镇压革命起义，声势赫赫，自成系统。张鸣岐见李不易驾驭，便奏调桂军入粤。不久，龙济光率二十营抵穗，至此，广东水陆巡防队共达一百零四营。张命龙主持广州城防，并将李准的部分兵力划归广州协统辖，李被迫回驻虎门。张还将新军十一营整顿成协，调蒋尊簋为混成协协统，随即又提前成立第二十五镇，奏派龙济光任统制官，严加控制。加强了对军队

的控制后,张布置李准、秦炳直(陆路提督)等在全省清乡,企图消灭经常响应革命的“绿林”。清乡成了百姓的灾难。李准在顺德纵兵劫掠,开炮轰击村庄。潮州清乡,“亦日以滥杀平民为事”^⑧。此外,张鸣岐搞的“新政”以及禁赌、禁烟,都成了官吏军警借机贪污舞弊勒索的机会。广东社会动荡不安。6月,因反对铁路国有,广州市民拒用纸币,挤兑现银,迫使张借外款维持市面。8月,李准又被革命党人炸伤。“省城官民纷纷迁徙,十室九空,商业萧条,金融停滞,大局岌岌可危”^⑨。这时,张鸣岐和李准之间的矛盾,却因各自袒护亲信部将更加激化,张准备上章参劾,将李除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革命党人和民众也闻风而起。张鸣岐急命龙济光派人回滇桂招募军队,企图保住广东。10月13日,苏抚程德全请张会銜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以挽回局面,他答以“时机尚未至”^⑩,观望形势。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抵穗赴任,被革命党人炸死,五羊城风声鹤唳。同日,地方绅士在文澜书院会议,力劝张与革命党人稍事妥协。张急忙奏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还请求将被特赦的党人汪精卫、陈景华调粤差遣。他的应变措施不合民众要求。10月29日,广州商学各界集议爱育堂,公决承认共和政体;下午又在文澜书院讨论满汉融合。这时,书院门前树起有“广东独立”字样的白旗,并鸣放鞭炮。各商店也张旗、悬灯、鸣鞭炮庆贺。二万多民众拥至督署前请愿独立,张避不敢见。当晚,张得汉阳清军获胜、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之讯,又强硬起来,命龙济光派兵将旗灯扯去,巡街捕人,布告要“尽法惩办,以昭炯戒”^⑪。次日,全城罢市。这时,各地民军蠢起,进逼广州。李

准已暗中与革命党人联络，准备反正。龙济光态度也日益暧昧。张鸣岐见军队动摇，知道已无法抗拒。11月5日，各界在谘议局商讨组织新政府时，张派代表表示愿意交出政权。经绅士提议，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民众代表将都督大印送到督署，扑了个空。原来，张鸣岐不肯附从革命，已于中午逃往沙面租界了。各界代表改推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胡未到任前，由蒋尊簋为临时都督。11月6日清晨，张鸣岐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广州光复。

不久，张鸣岐又从香港逃到日本。袁世凯执政后，他回到北京闲居，挂名为袁的高等顾问。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为监视西南军阀，袁世凯于1913年10月派张为广西民政长。张于次年4月抵任，后改官名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广西都督陆荣廷对这个老上司敬而远之，使张无法干预广西军政。1915年7月，张调任广东巡按使。广东都督龙济光也大权独揽，张只能出面为龙搜括民财，镇压地方。这年底，袁世凯阴谋称帝，张与龙上表劝进，后来袁封张为一等伯。张还与辫帅张勋暗通音讯^②，给自己在他日清朝复辟时留条后路。护国战争爆发后，龙济光迫于军事压力，于1916年4月伪装独立。同月，在广州发生了谋杀护国军方面人士的“海珠事件”，张被龙派赴广西陆荣廷处解释，留桂作质。5月，张回穗，旋因母丧离职。这时，护国军在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代理抚军长就是岑春煊。因为龙军与护国军屡屡冲突，龙想找个说客去转圜。他以为张出自岑的门下，是个理想的代表，便请张前去。不想张却大受岑的冷淡，一无所获。很快，张即辞去巡按使职务，脱离了政界。

张鸣岐离粤后，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移居天津英租界，绣佛长斋。1928年，梁启超企图组织新的政党，张不甘寂寞，表示响应，但终因政客们之间矛盾重重，未能兑现。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12月，他参加了汉奸王揖唐等发起的中华佛教会。1942年3月，张与王克敏、靳云鹏等被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諮议会议委员。1945年3月，张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之必胜”^⑬。同年8月，日本投降。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死。

注：

- ① 刘乃勋：《张步堂先生事略》，《一斋存稿》。
- ② 孟和：《岑春煊与张鸣岐》。
- ③ 刘乃勋：《我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期间之阅历见闻》。
- ④ 瞿宣颖：《记张韩斋督部语》，《补书堂文录》。
- ⑤⑥ 黄绍竑：《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478—490页。
- ⑦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引张鸣岐电奏。
- ⑧ 《资政院副总裁李家驹等奏摺附片》，《辛亥革命》第七册，第264—266页。
- ⑨ 《内阁总协理大臣寄军谘府陆军部两广总督张鸣岐上谕》，同上，第266页。
- ⑩ 黄炎培：《辛亥革命中之一人——程德全》，《人文月刊》。
- ⑪ 《广东辛亥革命资料》。
- ⑫ 温肃、温必达：《温文节公（肃）年谱》。
- ⑬ 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3月28日。

吴 佩 孚

李宗一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著名的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生于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七日）。他的父亲在县城里开设杂货店，是个小商人。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学兵，兵事余暇仍继续读书。二十二岁时（1896年）考取秀才。次年因得罪了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秀才，并遭到通缉。他遂逃到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

1898年，吴佩孚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被派在一个姓沈的管带手下当戈什哈（即勤务兵），传送文书，为文案郭绪栋所器重，当年被选拔入开平武备学堂肄业。1899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次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吴回武卫前军，担任后路炮队队官，驻防北塘。10月随军赴马兰峪驻扎。1901年2月，武卫前军中、后两路裁并减员，吴被裁减。次年9月改投直隶总督袁世凯，被批准入保定武师范学堂，后转入测绘学堂，1904年1月毕业。^①

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北洋督练公所与日本军队在烟台秘密合组侦探队，吴佩孚被选为队员。他和冈野增次郎（日本人）等扮成肩挑小贩，赴东北各地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日俄战后，他奉调回保定，拨归北洋陆军第三镇差遣。1905年10月担任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次年升为第

一营管带，1907年随第三镇至吉林省长春驻防。当时，第三镇统制曹锟对吴很器重，1908年调吴担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奉调入关。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吴遂受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

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镇改称师，标改称团。吴佩孚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团长，驻扎南苑。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于1914年4月以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吴佩孚改任师部副官长，随军南下，1915年晋升为第六旅旅长。随后，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运动兴起，第三师于1916年初奉命入四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吴率第六旅先至綦江，2月下旬与护国军战于纳溪，因攻占纳溪有“功”，袁世凯于3月7日申令授吴为陆军中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帝制，袁世凯的皇冠迅速落地，并于6月6日忧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第三师奉命撤回保定。1917年7月，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充当“讨逆军”西路先锋，由保定进攻北京，与张勋所部“辫子军”战于天坛。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下台，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首领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北洋政府大权。由于段拒绝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抗。段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随军驻汉口，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这时，冯国璋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张与西南军阀议和，不肯公开下讨伐令。在直皖两系的矛盾中，

曹錕和吴佩孚都属于直系，附和冯国璋。

1918年春，护法湘军攻克岳阳。由于皖系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冯国璋不得不下令派曹錕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指挥，反攻湖南。当时，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三个混成旅，由鄂入湘，连陷岳阳、长沙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他满以为凭“战功”可以得到湖南督军的职位，没想到这个据有地盘的实际竟然落到皖系张敬尧手里；他只赢得“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空衔，因此十分气愤。这件事是他此后反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年4月，他攻占衡阳后，即按兵不动，并于耒阳公平墟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所派代表商洽停战。段祺瑞屡次急电飭令进攻两广，他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8月21日，更公开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而主张南北议和。^②为了哗众取宠，他还大唱“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的高调，并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标榜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迸发出来，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吴佩孚乘机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摆出一副“爱国军人”的姿态，颇博得一般舆论的好评。^③11月，吴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代表在衡阳秘密签订“救国同盟草约”，结成反段的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錕、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的首领地位。

1920年5月，吴得到西南军阀供给的军饷六十万元，自衡阳领兵北撤，抵汉口时，赋诗言志，斥皖系为“妖孽乱京畿”，

自己是要“摧狂虏”，“扬国威”，并且是“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的大人物，还令军士沿途唱他自编的“满江红”军歌。随后，他把军队布置在京汉铁路保定至郑州一段沿线，即通电攻击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亲日卖国，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其首领徐树铮，对段进行直接挑战。由于皖系的卖国政策丧尽人心，人们对吴的反段，寄予很大的期望，甚至把他视为“革命将军”。7月，段强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免曹、吴职。吴即挥兵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和杨村一带，一举推翻了段祺瑞控制的亲日派政权。同日本敌对的英、美大喜过望，看中吴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在报纸上对他大捧特捧，誉之为“强者”、“英雄”、“中国模范之统将”。^④此后，北京政府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8月，吴通电发起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企图利用“国民大会”这种形式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另外组织一个合乎他胃口的政府。但他的计划遭到张作霖反对，未能实现。9月，曹锟升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为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练兵”。

1921年7月，吴佩孚以援助湖北督军王占元抵抗湘军为名，派萧耀南进兵湖北，镇压了湖北自治军，并把湘军赶回湖南，夺得了王占元的地盘。8月，吴升任两湖巡阅使，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完全暴露了吴“不做督军”的伪善嘴脸。^⑤

吴佩孚权势的增长，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这就激化了他和受日本扶持的张作霖之间的矛盾。1921年底，张作霖支持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企图压制直系势力。次年1月，吴率领直系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卖国媚外，向奉系回击。双方通电互相攻击达三月之久，至4月终于爆发了第

一次直奉战争。吴率领直军在马厂、固安和长辛店等地击败奉军。张作霖退到关外。

自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政治野心大为膨胀。当时，一帮政客倡议“恢复法统”，即恢复民国初年的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吴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因为南方政府是借护法成立的），又可赶走徐世昌，因此立刻接受了这个主张。黎元洪于1922年6月复任总统。吴曾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计划，而曹锟则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从而直系内部发生了“保”（定）“洛”（阳）的分化，使吴利用“黎”的计划落空。于是吴进一步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⑥他一心步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后尘，追求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吴升任直鲁豫巡阅使。曹吴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始终没有决裂。当时，吴的巡阅使署所在地洛阳，实际上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巡阅使署机构庞大，除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等八大处的办事人员外，谘议厅拥虚位而列名顾问、谘议、差遣者有千余名。政务处为公署的重心，吴的心腹白坚武担任处长。各省都有代表常驻洛阳。英美帝国主义又对他大力扶植：美国运给军火价值三百多万元，英国给他贷款，英人莫立斯（H. E. Mooris）和格林（O. M. Green）做他的政治顾问。此外，还有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总长、次长以及英、美、日本等国军政要人肩负着秘密的或

公开的使命，络绎不绝地奔走于中州道上。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显要人物至洛阳祝寿者达六、七百人。当时康有为想拉拢他支持清室复辟，也献上手撰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⑦。

这时吴佩孚的直属部队有五师一混成旅，他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王汝勤驻宜昌，第十四师靳云鹗驻郑州和信阳，第二十师阎治堂驻潼关，第二十四师杨清臣驻开封，第二十六混成旅田维勤在河南，另外还有若干独立团，总计兵力十余万人，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陕西等省地盘。他一面积极准备对付要向他复仇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北伐政策，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地。

吴佩孚的军饷每月约八十万元，其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京汉铁路又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军事交通线。为了利用和欺骗工人，他曾发表过“保护劳工”的主张。但是，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时，他指使军警进行破坏，下令不准开会。为反抗他的专横统治，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就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命令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杀死四十多人，造成著名的“二七”惨案。他对工人的野蛮屠杀、赤裸裸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及支持曹锟贿选总统，这一切使全国人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从此他迅速地走向失败。

1924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指挥奉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应曹锟的急电，由洛阳到

达北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直系军队十余万，派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吴亲到山海关督战。正当两军激战时，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带兵由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錕，成立“国民军”，反戈讨吴。吴前后受敌，大败而逃。他由大沽口乘船南下，溯长江到达武汉，企图依靠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但未能得逞，即回洛阳。不久，国民军胡景翼部攻入河南，镇嵩军憨玉昆部也山潼关东进。吴在洛阳不能立足，退往信阳，准备入鄂。这时鄂督萧耀南为形势所迫，对他婉言拒绝，并请他通电下野。吴被迫退入鄂豫边界的鸡公山，其残部约四万多人多被胡景翼缴械或改编。当胡景翼军逼近鸡公山时，吴只得表示愿意下野，并于1925年春经过武汉，乘“决川”号军舰逃到岳州，托庇于湖南军阀赵恒惕。这时，赵正高唱“联省自治”，通电保护吴，并赠给养。

吴佩孚在岳州暗中联络旧部，伺机再起。1925年10月，孙传芳在江苏发动反对奉系的战争，并通电拥吴出山。吴即乘机到武汉，通电自称受十四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部于汉口东北之查家墩，任命张其铨为秘书长，蒋方震为总参谋长，派张联陞、寇英杰、陈嘉谟分任一、二、三路司令，攻入河南省。11月13日，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军和奉系军队分别沿京汉、津浦铁路南下。但不久奉系和国民军的矛盾尖锐化，张作霖派人联络吴以打击国民军。吴对国民军本来十分仇视，遂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而与奉军勾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3月，吴击败国民军岳维峻部，占领河南省。又沿京汉路北进，

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将国民军交其部下张之江、鹿鍾麟接管。张、鹿致电吴，请求停战议和。吴回电要张、鹿将部队交出。4月，直、鲁联军及奉军围攻北京，鹿鍾麟发现段祺瑞与奉军勾结，遂将段赶下台。段逃往天津。鹿释放曹錕，并再次致电吴，请入京磋商大计。吴坚持原来要张之江、鹿鍾麟同时下野的条件。张、鹿被迫率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吴支持王怀庆于5月8日入京，就任卫戍司令，颜惠庆组织内阁。5月27日，吴由汉口北上，30日抵石家庄，会晤山西军阀阎锡山。6月3日，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攻击国民军。稍后，又派张其锬、张志潭为代表与张作霖的代表郑谦在天津开预备会，双方议定“军事合作到底”。但奉方对颜惠庆内阁有保留。6月28日，吴和张作霖在北京会谈，经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双方表面上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宣布“合作讨赤”，继续对国民军作战，而暗中却仍激烈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直军攻击南口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开始，吴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仅派李济臣等督率杂牌军入湘，援助叶开鑫等。北伐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将敌军击溃，席卷湖南，直指武汉。这时，吴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才极为恐慌，一面严令李济臣等收集残兵两万多人坚守汀泗桥等要隘，一面让齐燮元代理总司令，留守长辛店。自己则率领刘玉春等主力军由京汉路仓皇南下增援，1926年8月27日到湖北咸宁，亲至汀泗桥督战，以“大刀队”分八路监视直军，据险顽抗，斩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九人，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他原想

守住汀泗桥，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以便向北伐军反扑。但是，北伐军以勇猛的攻击迅速夺取了汀泗桥要隘。吴退贺胜桥，扼险以守，革命军又来猛攻。他亲临督战，手刃后退官兵多人，可是仍阻止不住士兵溃逃。9月1日，他自己也狼狈败退到汉口查家墩。但仍命令刘玉春等收拾败兵，坚守武汉，负隅顽抗。不久，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他经信阳败逃郑州，企图组织援军反攻，也未能得逞。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俘虏刘玉春等两万多人。至此，吴的主力被北伐军打垮。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入河南，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望风溃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暗中向北伐军输诚，齐燮元以亲奉嫌疑离去。奉军以“援吴讨赤”为名，沿京汉路节节南下，妄图趁火打劫，夺取河南。吴众叛亲离，又处南北夹击之中，遂于5月13日偕其妻张佩兰等由巩县南逃。经南阳、兴山、巴东，抵达四川白帝城。先后托庇于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流寓于大竹、绥定等地。这时，他身边只有卫队千余人，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大旗，维持着“大帅行辕”的空架子，并不时与新旧军阀暗中勾结，伺机而动。但表面上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声明“入川游历，不问政治”。1930年，当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激战之际，吴企图乘机出川，自绥定起程至麻柳场，拟赴万县东下，为万县驻军王陵基部所阻，遂折回宣汉。次年7月至成都，与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会晤。这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拟聘请吴为高等顾问，借以拢络北洋势力，并派军舰入川迎接。但吴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不愿乘船东下，而以应蒋电召为名，率领卫队取道松潘北上，经过兰州、包头，于1932年1月底到达北平。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吴佩孚想趁全国动荡之际，借“抗日”旗号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东山再起；但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压力，未能得逞。当时，张学良正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月给他“补助费”数千元。国民党政府曾聘他为洛阳“国难会议”会员，他没有应召赴会，而一直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公馆里做自己的“大帅”。当伪满洲国出现时，他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溥仪。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企图把吴佩孚抬出来做傀儡。吴怫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⑧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亦严词拒之。当年底，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群汉奸在北平组成伪华北临时政府。吴的旧部齐燮元担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伪临时政府于1938年1月给吴“特高顾问”的空头衔，月送“车马费”数千元。6月，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极力拉吴下水，吴故意向他提出请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他也就拒不接受土肥原的策动，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馆。^⑨

注：

- ① 见《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吴佩孚銜名年籍三代详细履历清册》(第三镇统制曹錕造),宣统三年四月。
- ② 《时报》,1918年8月25日。
- ③ 《民国日报》,1919年6月4日、28日,7月8日、13日,1920年8月11日。
- ④ 《西报揄扬吴佩孚》,见《民国日报》,1920年8月21日。
- ⑤ 《民国十年之吴佩孚》,1921年版,第113页。
- ⑥ 冈野增次郎:《吴佩孚》,日本山梨县万圣阁1939年版,第830页。
- ⑦ 《吴佩孚先生集》下编,第315页。
- ⑧ 《吴佩孚传》,第202页。
- ⑨ 关于吴佩孚的死,有不同的记载:一说日本特务为了让他当傀儡,花了大批钱,他不出山,日本特务无法向日本政府交代,只有将他害死;一说拔牙时感染败血症或毒入神经不治而死;一说被汉奸齐燮元毒死,等等。

王 占 元

张振鹤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县人，生于1861年2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青年时代投淮军刘铭传部当兵。1886年被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1890年毕业，投入宋庆的毅军，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往天津小站投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委为工程营队官。1902年，袁世凯着手扩充军队，以小站旧部为骨干，于保定编练成北洋常备军，王占元任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二年晋升为步队第一标统带。1904年，袁世凯、铁良奉命开始编练北洋陆军六个镇，王占元被提升为第二镇步队第三协统领。1906年王占元由副将衔补用游击，准以“参将留直补用”。1910年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陆军协都统衔。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

长，驻保定。1913年春夏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3月，兼“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①4月，任湖北军务帮办。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授以壮威将军。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②这种为袁世凯称帝捧场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谈话的笑料。2月18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③

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王表面对黎恭顺，暗中附和实力派。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之后，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以冯国璋为首）皖（以段祺瑞为首）两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这时，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

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錕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暂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

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④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实力，总司令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做出“不入鄂境”^⑤的保证。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錕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附和曹錕、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錕为部署反皖系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錕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7月，王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

拉拢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錕、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⑥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錕、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錕、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⑦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

作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⑤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王占元曾经用搜括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⑥；在山东投资于纱厂^⑦、煤矿^⑧；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⑨、电力股份公司^⑩；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⑪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

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

注：

① 《时报》，1914年3月1日、3日、13日、23日。

② 《时报》，1916年1月17日。

③ 《民国日报》，1916年2月25日、26日。

④ 《大总统冯国璋命令》，《时报》，1918年2月14日。

⑤ 《李纯主张停战议和电》，《时报》，1918年2月5日。

⑥ 《章太炎致赵恒惕电》，《民国日报》，1921年5月10日。

⑦ 《申报》，1926年9月9日。

⑧ 《申报》，1926年9月14日、15日、16日、17日、26日。

⑨ 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⑩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4页。

⑪ 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矿业报告》，北洋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164页。

⑫ 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第130页。

⑬ 《保定工商界状况》，《工商月报》，1935年第7卷第4号，第65页。

⑭ 同⑤，第261—266页。《时报》，1921年5月12日。

汤化龙

曾业英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1874年11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生。其祖上数代经商，家境一直十分富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才由于战乱的影响而衰落下来。他父亲本为诸生，为了恢复祖业，弃儒经商，常年奔走于长江沿岸的九江、安庆等地。汤化龙出生之年，正是其家境恢复小康之时。

汤与他父亲不同，走的是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幼年从族父习章句，十三岁时，入塾苦攻八股文，积极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1892年，以县试第一，补县学附生。1897年，补廪膳生，并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黄州经古书院。1902年秋，汤考中举人。逾二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得中进士，并授法部主事。之后，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

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为了寻求“新知”，汤化龙自请资送留学日本。1906年，赴日入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联合孟森、孟昭常等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并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

1908年秋^①，汤毕业回国，由鄂督陈夔龙奏调还鄂筹备地方自治，任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在第一届谘议局常会后，又被举为议长。他目睹革命形势的迅

猛发展，坚信“速开国会为救时要略”^②。1910年8月，汤去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会议主席。会后他参与各界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第三次请愿。11月4日，清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同意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令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以此为满足，相继出京，但汤化龙不以为然。他联合谭延闿、蒲殿俊等人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原议，并继续留在北京，谋第四次请愿，直到清政府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才失望而去。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汤化龙再次赶往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与此同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汤为其重要成员，并任湖北支部发起人。这时，汤化龙已成为全国立宪派中有数的头面人物之一。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夜，汤化龙“潜匿私室”，次日晨，经起义士兵数次强迫，始出任事。他初任都督府秘书，负责民政，但却“垂头丧气，毫不事事”^③，偶然有所表示，就是要革命党人“严守秩序”^④。蔡济民、牟鸿勋、梅宝璣等革命党人无计可施，只好利用他的名义发表通电，力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脱离清政府。

至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汤意识到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他立即转而附和革命，以便窃取革命果实。他一方面主动告诉革命党人，清朝官员柯逢时家中有密码本，可用与各省通讯联络，借此争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施展种

种阴谋“图揽政权”^⑥。他先和胡瑞霖等私下拟好一个都督府组织条例，然后于17日通过都督府正式公布实行，集军政民政大权和战时总司令于黎元洪一身，从而夺了由革命党人蔡济民等控制的参谋部的权。接着，他又“串通宵小，由运动而得政事部长”^⑦，并“集旧日朋好”^⑧，将政事部下属内务、外交等七个局全部抓在自己手里。

汤化龙这样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势，引起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25日，都督府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原先通过的都督府组织条例，重新调整人事安排，只给汤一个编制部长的闲差。此后，他极力讨好当时正在武昌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离开武昌前往上海，从事新的政治投机。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汤化龙为法制局副总裁。他辞不就职，而与林长民、张嘉森、刘崇佑、孙洪伊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13日正式成立），拥尚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为领袖。汤化龙等曾积极运动袁世凯、黎元洪、蔡锷这些所谓“有力者”电梁归国。4月，他由上海入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同年5月，汤加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并被选为干事。他曾一度打算使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旋因不见信于共和党的民社派，遂于10月27日，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六政团合并，另组民主党。汤被举为干事长。他在成立会上说：民主党“不争政权，而注意于普及政治教育”^⑨。但它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刘崇佑私下密谈时则说：“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

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⑧可见，汤化龙等并非“不争政权”，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1913年1月，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在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这时，他的政治利益与袁世凯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对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4月5日，汤为民主党议员规定三条：一、对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问题，应主张先定宪法中“总统”一章，然后即选举总统；二、关于大总统有无解散议院权力的问题，应主张有解散权；三、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要国会同意问题，应持否定意见。汤化龙这些主张，不禁使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大自由报》为之发出“卓哉！汤氏之见识”^⑨的赞叹。

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后，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汤化龙为了给袁解围，联合原临时参议院议员四十八人发表通电，硬说“善后借款”并不“违法”。为了与国民党对抗，在袁暗中支持下，汤与梁启超等人于5月间，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汤出任理事。7月，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汤认为：“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⑩。他一方面联合孟森等进步党议员发表所谓“护国讨乱”的通电，另一方面，又于26日致电黄兴，要他“及早觉悟，歛兵效顺”^⑪。1914年5月，袁世凯于相继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之后，任汤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

1915年8月，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丑剧敲响了开台锣鼓，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制斗争更加高涨。汤化龙见袁已靠不住，遂于9月称病告假赴津。10月，辞职邀准。12月，他

密行赴沪，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其间，他曾与旧立宪派要人蒲殿俊、谭延闿以及旧官僚唐绍仪等，致力于策动江苏督军冯国璋独立，但始终没有结果。1916年3月19日，他电劝袁世凯退位。随后，又发表答帝制派王印川书，表示袁不退位，即不罢兵。他指使其弟湖南将军汤芑铭宣布独立，对袁进一步施加压力。

袁世凯死后，汤化龙认为收拾时局，非段（祺瑞）莫属。从此，他就积极投靠段祺瑞。8月，国会重开，汤复任众议院议长。9月，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组织的“宪法商榷会”，他在梁启超支持下组织“宪法研究会”。这时，国会内部为制宪问题展开省制订入与否的激烈争论，汤及其“宪法研究会”适应段祺瑞集权中央的需要，坚决反对省制订入宪法。10月20日，众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讨论省制问题，他攻击“宪法商榷会”主张将省制订入宪法是“不忠于民国”^⑩。

1917年春，段祺瑞为了取得日本更多借款，以加强自己的实力，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汤化龙认为这是“正当办法”，并呼吁国会停止一切政争，“予政府以后援”^⑪。当段与黎元洪为此争执得不可开交，段内阁动摇不稳时，他又在国会内竭力支持段内阁，并为段祺瑞支持下的“督军团”出谋画策破坏国会。汤希望在新的国会选举中，依靠段的支持，获得多数党地位。5月23日，段被黎免职，汤也具呈辞职。

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极”。汤化龙一面通电各省，宣布与张勋誓不两立，一面随段祺瑞赴天津马厂誓师，并任讨逆军总部参赞。12日，张勋复辟失败，由段祺瑞续组新内阁。汤因拥段有功，被任命为内务总长。为了抵制国民党议

员，他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尽速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便实现其取得议会多数党地位的宿愿。汤的反动行径，引起国民党议员的极大愤慨。10月，他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明令通缉。11月，汤随段祺瑞去职。

之后，段内阁虽然复活，但因为段所用的安福系政客集团已经崛起，汤不再受到重视。1918年3月24日，他与林长民、蓝公武等怀着失意政客的嫉恨心情出国，前往日本游历。6月，又赴美考察。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籍华侨理发师王昌枪击毙命。

注：

- ① 有几种材料说汤于1909年回国，均属不确。兹据《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汤被聘担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可断定他于是年秋即已回国。
- ② 汤用彬：《新谈往》，第72页。
- ③ 《湖北革命实录馆咨湖北稽勋调查会请转呈中央稽勋局指拨汤化龙得二等嘉禾章考语》（1913年1月10日），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 ④ 剑农编：《武汉革命始末记》，《民国报》第一号。
- ⑤ 同③。
- ⑥ 同③。
- ⑦ 《黎副总统历史》，《宪法新闻》第9期。
- ⑧ 《时报》，1912年10月31日。
- ⑨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第404页。
- ⑩ 《大自由报》，1913年4月5日。
- ⑪ 《时报》，1913年7月24日。
- ⑫ 《新纪元报》，1913年7月26日。
- ⑬ 《时报》，1916年10月21日。
- ⑭ 《新闻报》，1917年2月16日。

德穆楚克栋鲁普

卢明辉

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字希贤,1902年2月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生于察哈尔部正白旗。父那木济勒旺楚克,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1908年那木济勒旺楚克逝世,德王依制袭苏尼特部右翼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①。因他尚在幼冲,全旗政务暂由协理台吉主持。德王从小在王府的家塾读书,学习蒙古语文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

1912年,德王由北洋政府进爵为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

1919年,德王年满十八岁,在王府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开始亲执政务。

1924年,锡盟盟长杨桑因年近多病离职,副盟长索特拉木诺布坦(以下简称索王)继任盟长,德王升任副盟长。11月溥仪被逐出故宫后,次年2月逃往天津,德王偕同补英达赖先后暗赴北京和天津日租界张园拜会溥仪,对他被逐离故宫深表同情,并献一万银元,表示“忠君”之意。以后又精选蒙古良种马,赠溥仪弟溥杰。

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德王代表锡盟王公出席,被任命为善后会议委员、临时参议院参议。其间,德王接触了许多政界上层人物,学到了不少统治经验。返旗后

提出所谓“改革旗政”的措施：扩编蒙旗保安武装；兴办牧区学校；建立卫生机构；为扩大兵员，号召青年喇嘛还俗。他的这些举动，遭到老年王公和上层喇嘛的强烈反对，说：“苏尼特右旗如今出了个疯王，要改革祖宗留下的成规，还要喇嘛还俗哩！”^②。

1926年，德王扩编旗保安队后，又新建一支拥有五百余名兵员的“乌滂守备队”，担任张家口至滂江地区的护路任务，每年向察哈尔都统府领取兵员补充经费四千银元^③。

1929年，德王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秋，随同班禅赴沈阳要求张学良拨发武器，适与蒙古青年党党魁郭道甫（呼伦贝尔达斡尔人，时任齐齐哈尔蒙旗师范学校校长）相会。郭向德王献策说：“为什么外蒙古独立会成功？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就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现在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古地方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④经此启发，德王返锡盟后，即联络各盟旗王公，集资在锡、乌盟等地建起宏伟的班禅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久居。

1930年10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大战失败下野。冬，阎派亲信赵太东、仲跻翰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途经德王所辖旗的边境时，被旗防卡哨所扣留，从赵、仲身上查获阎锡山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信，内容为：阎想假道外蒙潜赴他方避难。德王当将此事连同查获的信件，向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和张学良等报告，由他们转报蒋介石，从而获得了蒋的重

视。

1931年夏，德王赴北平，日本特务盛岛角芳也尾随去平，并同在北平的日军教授英德佐等宴请德王，进行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日本和德王的内外压力下，称病离职，德王遂为代理盟长。10月28日，国民党政府颁发“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11月26日，德王联合哲、乌、伊三盟盟长，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⑤。并派补英达赖赴南京联络包悦卿（赛音巴雅尔，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等人，宣传德王是“素孚众望，洽顺舆情”的蒙古领袖人物，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他出任“蒙旗宣抚使”。德王亦亲自出马，到北平邀请班禅到他的旗里，以取得班禅的支持。

是年冬，日本关东军将官林銑十郎、松井石根等写信给德王，介绍日本特务笹目来苏尼特右旗，充当关东军和德王的联络员。德王掩护笹目冒充喇嘛，潜伏寺院，长期进行特务活动。

1932年秋，蒋介石派桂永清等由南京前来苏尼特右旗，德王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对桂等格外殷勤招待。桂向蒋打电报推荐德王说：“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⑥桂等返南京不久，蒋电邀德王到武汉会见，委德王为“蒙古保安统监”，德王欲取得统治蒙古军政大权，不愿受此虚衔。由武汉返北平后，就打出“团结蒙古各阶层，复兴民族”的旗号，与在北平的各盟旗王公、青年等联系，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并利用日军侵占东北的形势，乘机要求所谓“内蒙高度自治”。

1933年春，德王在他的旗王府成立蒙古干部学生训练队，将在北平等地招来的二十余名蒙古青年学生^⑦，同各旗遣送来的七十余名蒙古青年编队训练。委云继先、于福康为教官，

把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枪械拨归该队使用，为他培养军政后备骨干力量。7月，德王等赴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所在地），面见乌盟盟长云梯旺楚克亲王，共同倡导“内蒙高度自治”。7月26日，以锡、乌、伊三盟各旗王公名义向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军委、蒙藏委员会等发出请求“自治”的通电。10月，在百灵庙举行第二次自治会议。锡盟、乌盟、归化土默特等各旗王公和伊、察二盟、青海、宁夏所辖蒙旗部分王公代表，及旅北平、南京等地的蒙古王公、青年代表等出席会议。会上通过“推行自治真相通电”和“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决议。

国民党中央接到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后，即指令察、绥两省当局“恩威并用”，分化、劝阻各旗王公；继而派出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等入蒙宣抚，瓦解“自治”。

1934年1月，德王对黄、赵所拟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区的“内蒙自治办法十一项”深为不满，当派尼玛鄂特索尔、僧格林沁、哈斯瓦齐尔等赴南京请愿，坚持要求实行“统一高度自治”。

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接见吴鹤龄和请愿代表团成员，当责成吴鹤龄草拟“蒙古自治八项原则”，经蒋介石批准。3月7日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并指定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为指导长官，赵戴文（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为副指导长官，监督“自治”活动。

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宣告成立，由乌盟盟长云王任委员长，锡盟盟长索王、伊盟盟长沙王任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而实际上“蒙政会”实权完全操于德王之手。是时，日本关东军特务笹目由苏尼特右旗返日本，报告进行德王工作的情况。不久由日返回，向德王馈赠收音机、电台等物。接着东京善邻协会理事长前来访问德王，并在苏尼特右旗贝子庙（今锡林浩特）设善邻协会分会，以拉拢各旗王公，掩护特务活动。同年夏，日特盛岛角芳潜来百灵庙，代表关东军“赠给”德王步枪二千枝。^⑧

1935年夏，德王赴北平要挟何应钦拨发武器。^⑨何仅赠送银洋一万元。

此时，德王与日军的勾结活动愈加频繁。同年7月，日本关东军给德王送来飞机一架。9月，为实现侵绥西犯计划，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偕同渡边大佐等前来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与德王会谈。德王提出：“建立‘蒙古国’，希望日本帮助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坂垣当即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愿意帮助。但东部蒙古是满洲国的领土，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我无权答复。”^⑩10月，关东军特务中岛万藏、中泽大喜、陶克陶、金永昌等来百灵庙促德王“与日本正式合作，希望早日做出决定”。11月，德王偕同外蒙逃来活佛迪力瓦和日特宾浦、中岛万藏等飞往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坂垣征四郎等策划所谓“日蒙合作”。德王提出：希望日本帮助先在内蒙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实现蒙古统一建国。坂垣等答复：日本尽快帮助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搞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独立的“蒙古国”。德王

返旗后，即同日本特务机关长尖浦等策划在察北建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企图为“蒙古建国”开创“独立”局面。^⑩

1936年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科长云继先等，乘德王赴察北组织军政府、改元易帜之际，率百灵庙保安队官兵千余人起义，后被傅作义派武装包围，强制缴械改编。^⑪

4月24日，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于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5月12日，又在嘉卜寺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自任总裁，并将伪蒙古军扩编为两个军，分九个师和炮兵团、宪兵队等，军费、武器由关东军供给。

1937年5月，伪蒙古军取消第一、二两军的建制，改由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集中兵力进攻平、津等华北地区，对德王所占的察、绥地区暂无暇顾及。傅作义命董其武率军乘虚向商都、“德化”等地发动进攻。德王闻讯后下令伪“蒙古军政府”由“德化”撤往多伦，他即乘飞机溜回苏尼特右旗王府。8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机械化精锐部队由古北口向张家口以西地区沿平绥铁路西犯。德王、李守信整顿伪蒙古军配合日军向绥远地区进犯。10月，日伪军进占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德王、李守信、吴鹤龄率伪蒙古军政人员到绥。11月27日，德王等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东条亲临操纵，指定云王为名誉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1938年3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伪主席）。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伪蒙各级政权，特设日本顾问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下设总务、财政、保安、军事各

顾问多人。这些日本顾问实为操纵伪蒙军政大权的太上皇，德王、李守信等无不仰其鼻息行事。

德王为了使蒙古军由他直接掌握控制，除将伪蒙古军中由汉人编成的一、二、三师让李守信指挥外，其余六个蒙古人组成的骑兵师，统归他直接指挥。并对各盟旗伪保安武装大加扩充，拨发新式枪械装备，派遣亲信去充任教官居中控制。

同年11月22日，金井章二在张家口召集伪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代表开会，筹备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8年8月，日本进一步改组强化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使它由三个伪政权协商机构，变为高居于其上的领导机关，而蒙古、察南、晋北伪组织，则降为地方政府。对这个拼凑起来的“蒙疆”政权，德王深表不满。

同年秋，日本驻张家口军部决定让三个伪政权头目德王、李守信、于品卿、夏恭等由金井章二陪同赴日本访问。到日本后，德王在会见内阁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时，将他与吴鹤龄拟出的“蒙古建国”两个方案交给坂垣。但因此时日本正利用汉奸汪精卫诱降蒋介石，对原推行分割统治中国的策略暂有变更，故不许再提“蒙古建国”。在天皇召见德王时，金井章二事先告诫德王不准再提“蒙古独立建国”。为此，德王深为不满。返回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市）后，他便鼓动各盟旗王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要求实现“蒙古独立建国”。

1939年4月29日，日本军部通知德王到张家口就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德王与日本军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勉强就职，但又暗中与蒋介石联系，表示他想走向重庆。蒋复电嘱他“仍留蒙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⑬。

9月1日,日本军部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任命德王为伪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撤销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所辖巴、察、锡、乌、伊五盟,也直隶伪政务院。并制定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帜,为伪蒙疆政权的表征。

1940年春,德王等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被日本军部侦知,为争取主动,德王、李守信亲到日本军部坦白,取得谅解。2月,德王等再次赴日本访问。时日本陆军省告德王,要吴鹤龄回“蒙疆”担任伪政务院长,德王又与吴策划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方案。

1941年,在日本的导演下,伪“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代表周佛海等签订蒙、宁协议书:“蒙疆政府承认‘新中央政府’(即汪伪南京政府)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汪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高度自治’政权”。^⑭但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⑮

1942年,日军发动对华北地区的大扫荡。日本侵略军首脑东条英机乘专机由东京飞张家口给德王鼓劲,并赠他日式三八步枪五百枝,供他组织卫队。不久,日军对察、绥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大扫荡,实行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德王曾亲临前线督战,指挥伪蒙军积极充当帮凶,大肆烧杀、淫掠,对各族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德王长期以来梦想做“蒙古大皇帝”，他曾向驻“蒙疆”日军司令官莲治藩提出：要求把“满洲国”所属的呼伦贝尔、昭乌达、哲里木盟等蒙古族聚居地区，划归“蒙疆”统辖。莲治藩回答说：“满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军赫赫战果，不久就会结束在支那的战事，那时皇军就会替你收复外蒙，你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⑩德王与日本几番讨价还价，迨希特勒武装进攻苏联后，日本为适应它侵略政策需要，遂允许德王对内改称“蒙古自治邦”，对外仍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8月4日，“蒙古自治邦”宣告成立。但伪蒙机构改组后，大批的日本顾问由原幕后牵线人的地位，变为直接现身为前台的官吏，把原各厅、部、院、委的一批伪蒙官吏排挤出去。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伪蒙政权的控制，在张家口设立兴亚院联络部，作为统治“蒙疆”的最高指挥机关，联络部长官酒井隆等人，是其驻“蒙疆”的太上皇。

1943年1月17日，德王奉日本旨意，发布第二次“兴亚教书”，以追随日本力挽太平洋战争的厄运、“大东亚共存共荣”、坚决“反共剿共”为宗旨，对“蒙疆”地区六百余万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的反动统治和镇压，在经济上进行抽髓吸血的压榨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推行险恶毒辣的殖民奴化政策。

1944年秋，德王看到日本大势已去，为维护他今后的统治地位，极力充实伪蒙武装力量，并暗中与东蒙的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谋：待日本失败后，东西蒙即联合起来，趁机组织所谓“蒙古自治国”，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蒙疆”政

权也随之彻底垮台。德王又使出“狡兔三窟”伎俩，派遣代表分别向苏蒙联军和重庆国民党政权联络，企图暂保伪“蒙疆”的破烂摊子和残存的实力，俟机再搞他的“蒙古自治国”。当这个阴谋遭到苏蒙联军拒绝、而八路军已重兵包围张家口时，德王同国民党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等于9月19日夜随同日军撤离张家口，逃奔北平。这时，接到蒋介石来电，委他担任“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①

德王抵北平后，为谋求“东山再起”，9月末，与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一行到重庆。德王向蒋介石面呈报告书，“陈述内蒙危机状及拟具措置办法三项”。蒋介石拒绝德王再搞“蒙古高度自治”的要求，分别委李守信为第十路军总司令，吴鹤龄为“蒙古宣导团”主任等，命他们即返北平等地收罗伪蒙残余武装，配合国民党军进攻八路军。并告德王“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忍耐一时，徐图将来”，不要再喊“蒙古要求高度自治”，^②暂作“隐居”寓公。11月17日，德王接受蒋介石给他每月五十万元生活费和“不咎既往”的安置离开重庆，偕同陈绍武、策仁道尔吉、郭木布扎布等返回北平，表面上闭门谢客，不问政治，暗中却与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积极联络旧部伪蒙军政人员，等待时机，再搞“蒙古高度自治”。

从1945年至1948年底，德王在北平名为“隐居”，暗中却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他除亲自会见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李嘉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军政要员外，还委派迪力瓦等到美国等地为他呼吁“蒙古独立建国”。1948年秋辽沈战役时，蒋介石赴沈阳路经北平，德王去行辕见蒋，又提出“蒙古高度自治”。当时，蒋很颓丧地回答：“如果共产党

不消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德王见蒋情绪不好，便说：“是的，现在是戡乱要紧。”^⑩

1949年1月1日，北平解放前夕，经吴鹤龄的奔走，国民党派飞机接德王到南京。是时，蒋介石告退下台，李宗仁任伪代总统。德王当向李陈述当前内蒙“危机”说：“东蒙受共产党煽惑，已成立内蒙自治政府，近日渐向西逼进。现仅存西蒙各旗，宜速成立一个联合机构，以便收容不甘共产党宰割而西来的蒙古王公、军队及青年，共同抵御共产党。”^⑪李表示应允。

1月下旬，德王随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此时，野心勃勃的德王，认为国民党退缩西南，无暇顾及蒙古问题，趁人民解放军还未到达内蒙西部盟旗的时机，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到西盟再搞“蒙古自治”。1月25日，德王偕同达密林旺楚克等由广州飞往兰州，与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蒙藏委员会专员何瑞五（何兆麟）、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等人会晤，讨论“蒙古自治”，并分别拜会在兰州参加西北长官会议的各省军政头目马鸿逵、马鸿宾等，要求帮助“蒙古自治”。

4月初，德王等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打电报邀已逃台湾、香港等地的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扎奇斯钦等前来。4月13日，东拼西凑的“盟旗代表会议”召开，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推选德王等五人为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代表团。5月8日，德王等抵广州，提出“要求内蒙自治请愿书”，遭到伪行政院长阎锡山拒绝。转而找美国大使馆要求：“希望美国帮助枪械、经费、飞机等物，进行蒙古自治。”^⑫并密晤美国新闻处特务头子马滋，随即接受美制电台数部和七、八名经过特务训练的蒙古人，派往阿拉善旗中蒙交界地

区潜伏活动。同时美国大使馆也派白智仁等准备随德王到定远营活动。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阎锡山看到形势危急，转而想利用德王等在我国北部边疆进行反共活动。于是，由副院长朱家骅出面召见德王，允其试行“自治”，并让伪国防部、财政部拨发一万银元、二百枝步枪、五十枝手枪及弹药等，告德王速返阿拉善旗先组织蒙古武装，搞“戡乱”活动。8月5日，德王在阿拉善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宣布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德王始任伪“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名誉主席阿王病逝后，继任主席。不久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军，逼近兰州，德古来、扎奇斯钦、吴鹤龄等逃离定远营，德王嘱咐拟往美国的扎奇斯钦，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可以“相机办理，便宜行事”。

9月中旬，绥远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接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兰州、银川，向西北地区进军。德王不甘心失败，于20日凌晨带随员二人离开定远营西逃至拐子湖与李守信等会合，拟继续西窜青海、西藏活动，因酒泉、玉门一带已解放，未得逞。为摆脱困境，德王一面派亲信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联络，一面派陶布新前往银川与宁夏省人民政府谈判。不久阿拉善旗接受和平解放，德王通过其侄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于12月29日带随员四人，越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写信约李守信等旧部二十余人逃蒙。

1950年2月27日，德王、李守信等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同年9月18日，被引渡回国监禁。

1963年3月30日，德王获得特赦，并被安置在内蒙古自

治区政协文史馆工作。1966年夏,因病死于呼和浩特。

注:

- ① 《清史稿》卷二百九《藩部世表一》。
- ② 《德王承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前后几件事见闻》，卢明辉：《墨尔根巴特尔访问录》稿。
- ③④⑥⑧⑨⑩ 德穆楚克栋鲁普：《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稿。
-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245号。
- ⑦ 卢明辉：《孙元丰访问录》稿。
- ⑪ 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古军政府成立经过》（回忆录稿）。
- ⑫ 《云继先等率部脱离百灵庙》，《中央日报》，1936年2月25日。
- ⑬⑭⑮⑰ 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与瓦解》（回忆录稿）。
- ⑱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188号。
- ⑲ 陈绍武：《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的关系》，《内蒙文史资料》第一辑。
- ⑳ 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回忆录稿）。
- ㉑㉒ 德穆楚克栋鲁普：《我搞所谓“西蒙自治”经过》（回忆录稿）。

巴布扎布

卢明辉

巴布扎布姓韩，蒙古族，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蒙古真旗）。十来岁时，他的家庭由土默特左翼旗迁居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趁该旗土地放垦出荒之机，占据大量土地，成为当地暴发的地主之一。

巴布扎布从小不事劳动，常与地方的恶少歹徒结帮聚伙，年轻时就成为当地绿林中“马贼”头目。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军事间谍在南满、东蒙等地招募“马贼”、“红胡子”等匪帮，编为“洋队”。巴布扎布率其“马贼”伙众投靠日本，被编为后备的“永治挺身队”。其任务是以游击活动扰乱沙俄军队后方，切断俄军的粮食、武器运输线，截劫战略物资。当时，巴布扎布以“马贼”队长，助日军甚为得力，为日军所用。后又因“爆破（中东铁路）范家铁桥，切断俄军后路”，为日本击败俄军立了大功，深受日军头目的赏识。战后日军依约赠给他大批枪弹、粮食和金钱，充实了武力。^①后来，巴布扎布便率其匪徒驻扎在昭乌达盟北部的兴安盐湖边。

190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任命巴布扎布为彰武县警察局长。1911年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宣称蒙古“独立”。1912年8月，巴布扎布率领部下

三、四十人，带着妻子、儿女半夜逃离苏鲁克旗，奔赴外蒙古。沿途招纳小股“红胡子”，网罗匪众人马二千余，于1913年春到达库伦。受到哲布尊丹巴的嘉奖，封为“镇国公”，并任命为“镇东将军”。不久，又奉命率众窜犯内蒙古地区。从1913年7月至1914年11月间，巴布扎布多次入侵滂江、多伦诺尔等锡林郭勒盟南部地区和林西、经棚等昭乌达盟西部地区，大肆骚扰掠劫，都被北洋政府边防军击退。1915年春，退居外蒙古东边与呼伦贝尔交界的哈拉哈河（亦称喀勒喀河）沿岸。当时，追随外蒙古宣称“独立”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派遣帮办凌陞等前往慰问，“赠给巴布扎布牛、马、羊群和帐篷、粮食等支援”^②。3月，德国为了牵制沙俄远东的军事调遣，派特务八名，来找巴布扎布，赠给他一箱德国匣子手枪和大量金钱，要他炸毁中东铁路嫩江铁桥。这时，巴布扎布已投靠沙俄。因此他连夜派心腹到海拉尔向沙俄领事吴萨缔告密。吴萨缔令他八名德国人“全数谋毙，焚尸灭迹”，他照令执行，并缴获十余万元现钞和枪械驼马等物。8月，吴萨缔派人赏给巴布扎布手枪二十四支，并应诺为他由日本购快枪一万支和大批弹药。在沙俄的支持下，巴布扎布又搜罗叛匪千余人，加上他原有二千余人，扩编为十五个营。9月，哲布尊丹巴神权傀儡政府兵部参议达木丁苏隆同巴布扎布密谋再次窜犯内蒙古，并交给他俄币三万元。11月，巴布扎布率叛匪三千余人，再犯锡林郭勒盟南部地区，被北洋政府军击溃，率残部北逃。政府军追击，沙俄恐巴匪残部全被歼灭，指令其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停止追剿。此后，巴布扎布在沙俄庇护下又返回哈拉哈河沿岸盘踞。

191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暗助亡清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升允、铁良等,搜罗土匪武装,组织“勤王军”,阴谋武装复辟。为招引巴布扎布率部南下援应,派遣大特务头目川岛浪速的义弟川岛浪平,偕同日本浪人数名,前往哈拉哈河与巴布扎布勾结,并命他为“蒙古宗社党”首领。巴欣然同意,当派遣其妻弟塔萨赴日本联络,订立恢复清王朝密约,并获得日本大批枪械弹药。接着日本又派浪人及退役军官多名,到巴布扎布叛匪中担任指挥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巴布扎布与宗社党的活动,川岛浪速还将肃亲王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又名金璧东)送到哈拉哈河巴布扎布的家里,同时命巴布扎布将他的长子浓乃扎布、次子甘珠尔扎布二人,送往旅顺肃亲王官邸,“双方易子为质,以坚信誓”^③。后来,川岛浪速又把他收养的肃亲王女儿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嫁给巴布扎布的次子为妻。通过这种联姻关系,肃亲王善耆、巴布扎布、川岛浪速三者结成“共图大举”的诚信死党,妄图以巴布扎布的蒙匪南下与宗社党匪帮配合,一举占领长春、奉天(沈阳)等地,控制整个东北,然后合兵进关,攻打北京,复辟清王朝。

巴布扎布原有旧部三千人,至此以日本人资助,新招二千,共约五千人,编为三个梯队,举“同年6月27日祭祀讨袁之旗纛,7月1日开始南下”。^④7月下旬,进犯突泉县城。经奉军驻防营队两昼夜激战始退。是役巴布扎布匪军中的日本指挥官若林龙雄和蒙匪管带巴图巴雅等被击毙,奉军辽洮镇守使吴俊陞身负重伤。后巴布扎布率匪众迫近洮南,欲据洮南府为根据地,进而发军先占领长春,再南下攻打奉天城。8

月中旬巴布扎布率匪众取道东南，到达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线郭家店车站附近。此时，日本的一些报刊上竟发表文章，极力鼓吹巴布扎布是“成吉思汗再来，蒙古独立的英雄”^⑤。

巴布扎布率蒙匪渡过辽河窜犯吉、奉两省后，奉天督军张作霖一面急派军队火速前往郭家店阻截，同时与吉林督军孟恩远联络，共谋合兵歼灭。8月15日，巴布扎布为奉天二十八师冯麟阁的军队所击败，急退入南满铁路界内的郭家店。日人见蒙匪大败，便借口两方交战，“流弹落在铁路附近极端危险”，派日本军士张旗阻止奉军追击，迫令立即停战。并遣大尉福生田至二十八师声明，南满铁路附近不能开战，力阻二十八师进击。驻郑家屯的日本侵略军，并借机寻衅，制造了所谓“郑家屯事件”^⑥，挑起一场中日间的军事冲突。日本旋又派重兵威压奉军，使奉军不遑他顾，让巴布扎布乘隙退入郭家店一带铁路界内，由日军加以保护。日本帝国主义并不肯就此罢休，一面以严惩“郑家屯事件”的中国军队为要挟；一面又通过日本驻旅顺“关东洲都督”进行斡旋，要求奉天督军张作霖保证奉军对蒙匪不再加讨伐，令其如数安全撤返原哈拉哈河驻地。张作霖当“答以该匪如不扰害地方，我军即可不剿”^⑦。日军得此许诺后，乘机大施阴谋，“由大连宗社党勤王军二千人内，分派八百人，由南满铁路运至郭家店，参加蒙匪。更对于蒙匪及勤王军供应大炮、机关枪、步枪及多数弹药”^⑧。并派遣日本炮兵多人，加入巴布扎布蒙匪中，妄图以退为攻，出其不备，一举攻夺长春、奉天等地。不意因运送党匪不密，为张作霖所探知，张立即通知日本当局，“谓事变叵测，不得已从事讨伐”。日军接到讨伐通告后，急于应付，欲由驻奉天日

本领事与张作霖交涉，规定郭家店经杨家城子至郑家屯划为一线，其东不许中国军队行动，否则日军当取自由行动。但该日本领事恐这样会惹起国际干涉，未敢照行。日军方看到如“不能为停止讨伐之交涉，遂陷庇护之蒙匪于死地”^⑨。便由日本关东军驻公主岭骑兵联队派出一支小队，借“监视”蒙匪撤退为名，打着日本国旗，护送蒙匪和党匪撤退。

巴布扎布由郭家店出发时，吉林督军孟恩远根据既经发出的讨伐通告，“即于长春、伊通一带添队防堵，并派支队长任福元督率步骑炮各队，驰赴长岭迎头痛击”^⑩。奉督张作霖却以“奉军恐惹国际交涉”为由，极力阻止吉军剿击蒙匪。而巴布扎布因得日本关东军的保护，先于8月26日，炸毁绕阳河铁桥，切断奉军北调追击的去路。9月2日，在日本骑兵小队保护下，蒙匪沿途抢掠烧杀，向北撤退。匪众东西扩散数百里，致使奉、吉境内遍地皆匪，梨树、双山、怀德等县更惨遭蹂躏。面对这种情景，吉林督军感到束手无策，但各族人民却奋起还击。9月4日蒙匪、党匪行至怀德县朝阳坡地区时，当地驻守警团和“县民设卡堵截，与之接仗”^⑪。护送巴布扎布蒙匪的一名日本士兵受伤。日本侵略军即借机挑衅，调遣驻长岭日军联队和驻该地周围日军，直冲朝阳坡，企图与奉、吉军直接开战，再由蒙匪以退为进，夺取长春、奉天等地。因奉、吉军当即退避，阴谋未逞。其后日军又以朝阳坡战斗中“华军出击日军，凌辱日本国旗”等为由，制造了所谓“朝阳坡事件”。后因巴布扎布等蒙匪与“勤王军”党匪，在奉、吉两省各地恣意抢掠焚杀，社会秩序大乱，日本政府恐引起国际干涉，遂以勒缴“勤王军”武器，令党匪就地解散而告息。此时，吉林军重扼蒙匪

退路，巴布扎布蒙匪伤员逐增，战马疲惫，陷于孤立无援之地，“除撤退到原驻地以外，再无其他出路”^⑫。无奈，由日本复向中国交涉，允许不加追击，由日军护送巴布扎布等蒙匪渡过辽河，由原路返回哈拉哈河驻地。巴布扎布率匪众沿途与驻防政府军发生小型战斗，且战且退。9月中旬，又突然倒转方向，横断兴安岭，绕道巴林右旗，南下热北地区，欲攻取林西城。10月8日凌晨，巴布扎布于进攻林西城时，因头部中流弹堕马身亡。巴布扎布毙命后，蒙匪溃散四逃。有的投降官兵，有的继续上山为匪，只有少数残部返回哈拉哈河原驻地。

注：

①③⑤ 正珠尔扎布：《巴布扎布事略》稿。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军事机关档案》“黑龙江督军就伦署独立以来与巴布扎布等会谋情形折呈”卷。

④ 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巴布扎布军之侵入”。

⑥⑧⑨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郑家屯事件”。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军事档案》“吉林督军咨骑兵营剿击蒙匪两次配备图山”卷。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军事档案》“吉林督军孟恩远八月十五日致北洋政府国务院电”。

⑪ 同上，“吉林督军孟恩远九月二日咨北洋政府国务院折呈”。

⑫ 矢野仁一、鸳渊一、园田龟一著：《满洲的今昔》“巴布扎布之举兵”。

陈嘉庚

熊尚厚

陈嘉庚 1874 年 10 月 21 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父亲陈如松为南洋新加坡侨商。1882 年陈嘉庚就学于家乡南轩私塾。1890 年秋去新加坡随父习商。1892 年经营其父所开设的顺安米号，任经理。1893 年回到家乡完婚，次年在家从师补习。1895 年再去新加坡主持顺安店务，其间营业有所发展，除营米业外，还兼营黄梨（即菠萝）罐头和房地产业。1900 年冬，为了母葬回集美，曾留厦门营建房屋。1903 年 7 月再去新加坡时，顺安号等厂店因管理不善发生巨大亏损，不得不清理收束。

1904 年春，他自立门户，先后在新加坡开设新利川和日新黄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和谦益米店。1905 年秋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 年他得知种植橡胶树可获厚利，就买了十八万粒橡胶种子种在福山园，开始橡胶种植业。同年冬，他与人合办恒美熟米厂，1908 年改为独资经营。1911 年在泰国设谦泰黄梨厂。次年秋回到集美创办海产罐头蚝厂失败，即与人在厦门伙设大同罐头厂。1913 年秋，陈嘉庚复去新加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看到橡胶业和航运业利润丰厚，于 1915 年秋，一面将部分黄梨厂改作橡胶厂，一面租轮和购轮经营航运业，同时兼营白铁买卖，总计在大战时期的四

年内，获纯利达四百五十余万元之多^①。1919年到1922年间，陈嘉庚在南洋又增设橡胶厂十余处，并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业；在国内大城市则设立分店。1924年他扩充树胶制造厂，制造各种车胎、胶鞋、医生用具及各种日用品；又于马来亚及荷属印度各埠自设分店十余处。此外，还在国内厦门开办了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从1922年到1925年间，陈氏的企业发展到顶峰，他把橡胶厂扩建到爪哇等地，有橡胶园和黄梨园一万五千英亩，各种工厂三十余所，国内外分店百余家，职工二万余人，拥有资产一千二百余万元，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资本家。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1931年橡胶价格一再下跌，由每担叻币貳百多元猛跌至每担七、八元。在这种情况下，加以日货激烈竞争，陈嘉庚公司受到重大打击。1929—1931年卖出橡胶园一万一千英亩，公司负债日多。帝国主义银行团乘机以债权人资格派代表加入陈嘉庚公司，1931年8月他将陈嘉庚公司改组成有限股份公司。此时陈嘉庚的资产仅剩二百余万元充作股本。其后，又因英、美、日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国内货币与新加坡货币之汇率，由一比一顿时成一点五比一，致使国内数十家分店无法继续营业，1934年1月即相继收歇。此时，新加坡总公司的营业仍继续亏损，业务上则受到银行董事的无理干涉。对此，他宁愿歇业也不愿再受帝国主义银行团的欺压，乃于2月21日宣告结束了陈嘉庚总公司。

陈嘉庚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还热心于教育文化事业。他致力教育的动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旧中国“门户洞

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②从1913年起,他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他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年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

在新加坡,他先后创办了道南小学、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师范及水产航海等校。

陈嘉庚把他个人的收入用于办学的约有一千万元之多。而他自己一生却是生活朴素、自奉甚薄,即使在他的企业陷入困境时,也不愿停办学校。其后,企业失败闭歇,才迫不得已于1937年把厦大移交给当时的政府接办,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抗战胜利后,他筹款修复校舍。解放后,仍然继续关心集美和厦大的教学和建设。

陈嘉庚一向热爱祖国,曾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步而不断奋斗。1910年春,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毅然剪掉发辫,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1928年5月,“济南惨案”

发生时,他被新加坡华侨举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款赈济受难同胞,积极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新加坡华侨大会发出的通电中表示:“任何人应抱牺牲之决心,以与暴日抗”^③,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于8月15日发动华侨,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以进行持久和多量的筹款,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被举为该会主席。次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又被举为主席。南侨总会在陈嘉庚领导下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机器工人回国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10月,当汪精卫发表卖国投降言论时,他紧急发电质问,痛斥汪精卫卖国求荣,是秦桧,并以参政员名义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在“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严正主张,他的这一提案获得参政会通过,表达出广大华侨反对投降、要求抗战到底的民族革命精神。1939年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他再次声讨汪的卖国行径,要求通缉汪精卫“以正国法”。^④

1940年是陈嘉庚政治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此以前,他曾寄希望于那个标榜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南京蒋介石政府。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时,陈嘉庚曾为《南洋商报》手订规则,其中有“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条文,并把它张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办公处,以示拥护^⑤。其后,在国内发

生的地方势力迭次反蒋斗争中，他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⑥为理由，劝阻他们不要反蒋。对于中国共产党，他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信疑参半而“难辨其黑白”。1940年3月，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视察。此行先到重庆，经过亲身的观察，“见蒋介石狡诈独裁”，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专横，残民以逞”^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罪恶，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拉他入国民党，予以拒绝。他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⑧。5月，陈嘉庚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在延安，他亲眼看到那里的军政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辛苦合作，同仇敌忾”^⑨的种种事实，他又了解到八路军在敌后奋战的结果，“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⑩。于是他开始认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公忠爱国”者，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场所，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⑪。这次延安之行，使他转忧为喜，“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⑫。7月返回重庆，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讲演“西北之观感”，如实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兴利除弊，实现民主化等种种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陈嘉庚的言行极为不满，对他施展恐吓手段。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声称“陈嘉庚受了共产党的包围”。陈嘉庚对反动派的造谣恐吓全不理睬，表示仍要说实话，“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

必不同情”^⑭。在他前往云、贵、桂、湘、闽等省视察时，蒋介石曾派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以陪伴视察为名进行监视；当这个花招被识破遭到拒绝后，又命何应钦通令西南各省军政官员对陈暗中监视；并电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活动新加坡当局禁阻陈嘉庚回新加坡。之后还派其海外部长吴铁城去南洋破坏陈嘉庚的威信。陈嘉庚回新加坡后，和蒋介石的走卒高凌百、王泉笙、吴铁城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积极推动南洋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前进。

1941年4月，为了反对国民党福建省当局的祸闽罪行，^⑮他领导福建华侨组织了“闽侨总会”，多次致电重庆参政会及蒋介石吁请改善闽政，撤惩祸闽魁首。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负责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总会”，发动新加坡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时，他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躲过了日军的搜捕，避居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在此期间，他写了《南侨回忆录》一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陈嘉庚听到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不得收缴敌军枪械的消息，无比气愤。9月，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手腕举行重庆谈判，他识破蒋介石的花招，认为革命人民与反动派“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争取民主只能靠流血斗争^⑯。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9月，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及参众两院，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助贪污独裁的蒋政权，勿助长中国内战，撤退全部驻华美军，警告“如不停止援蒋”，将视“美国为

日本第二”^⑮。并揭露“蒋政府独裁腐败，任用小人，致民生惨苦，……无改善希望”；而赞扬“延安政治实行民主化，已获多数民众拥护”，“任何外来金钱武器，不能消灭”^⑯。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则利用其在南洋各地控制的报刊、商会和会馆向陈嘉庚进行百般攻击。为了斗争的需要，他领导“南侨总会”创刊了《南侨日报》，在广大华侨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展开了论战。从1946年到1949年，陈嘉庚在《南侨日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各地作报告、讲演，揭露美蒋的种种罪行，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他谴责蒋介石“一党专政，一夫独裁”，“媚外卖国，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声明“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件和伪总统伪宪法”^⑰。他号召南洋华侨投入国内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独裁专制卖国殃民的蒋政府，联合各党各派开展民主运动制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⑱。1947年5月，他领导新加坡华侨组成“星州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同时，他还领导南洋华侨向英、荷殖民当局展开了反帝反殖斗争。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伟大胜利。6月，陈嘉庚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邀请到了北京，9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被选为常委。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返新加坡刊行所著《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向广大华侨宣扬祖国的新面貌，促进华侨热爱新中国。1953年1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到1961年，曾任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

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陈嘉庚在团结海外华侨与关怀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他临终时还殷切关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盼望“尽早解放台湾”。

注：

- ① 当时新加坡币值与国币汇率为一比一，币值相等。
- ② 《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3页。
- ③ 郑良：《陈嘉庚》，第35页。
- ④ 同②，第1页。
- ⑤ 《南侨回忆录》（上册），第26页。
- ⑥ 同上，第41—42页。
- ⑦ 《南侨回忆录》（上册）“弁言”第3页；《陈嘉庚言论集》，第13页。
- ⑧ 《陈嘉庚言论集》，第31、36页。
- ⑨ 《南侨回忆录》（上册）“弁言”；《南侨回忆录》（上册），第3页。
- ⑩ 同⑧，“自序”。
- ⑪ 同⑧，第13页，《新中国观感集弁言》。
- ⑫ 同⑩。
- ⑬ 同⑤，第191页。
- ⑭ 时国民党福建当局以战时统制为名，施行种种苛政，并利用特权组织贸易公司、公沽局、旅运社等机构，残酷压榨福建人民。
- ⑮ 《南侨正论集》“弁言”。
- ⑯ 《陈嘉庚言论集》“自序”，第103页。
- ⑰ 同⑮。
- ⑱ 《陈嘉庚言论集》，第99页。
- ⑲ 《南侨正论集》，第160—161页。

聂云台

江绍贞

聂云台，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日）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槩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槩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帐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450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①。1904年聂缉槩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垵”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槩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学，没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槩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后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槩（时已任浙江巡抚）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旧习，现任

官吏不便出面经商)，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引起了复泰的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买的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须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材，废除了包工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气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象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16里，南北宽10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七四牌，其中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剥削“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它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统治农民的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人员，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农民进行逮捕和审判。

1917年，聂云台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这年，还曾往美国参观考察。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

两。由于投资踊跃，到 1922 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加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人搞投机买卖。1921 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 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 1921 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余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是家、厂不分的，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水平。

1923 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织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 1923—1924 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 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②。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 1924 年 8 月仅以一百五十余万两忍痛出售了，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它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在亏损中于 1927 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

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他不得不以退休为名,居于幕后,由聂瀚生出面活动。此后,聂瀚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从1920—1926年间,恒丰的工人约为三千人左右,女工占多数,童工也不少。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因忍不住工头的打骂和任意罚款,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取得满意的结果。这次罢工后,中国共产党员通过平民夜校,在恒丰建立了党的组织。自此,党领导下恒丰工人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大的罢工,而每次都是工人取得胜利。“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工人觉悟的提高与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聂云台、聂瀚生等非常恐惧。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对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进行恶毒的攻击,污蔑革命群众是“随声附和”的群氓^③。他为了诋毁共产主义的强大影响,极力宣扬孔孟之道和印度的甘地主义。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在恒丰纱厂仍保留总理的名义,但很少过问恒丰的实际事务。1926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痠锯掉一条腿,就更少过问世事了。而恒丰则在聂瀚生主持下,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

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了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恒
大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
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
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
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
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
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
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
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璐生因曾与日伪合作,担任过汪伪政
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
了。聂云台虽已体肢残废,不得不再次走出前台。当时,恒丰
已被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
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
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
员会”主任徐寄庾、“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
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
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
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璐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
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
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
理。

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
民党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

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死去。

注:

- ① 据曾纪芬记述:“初,中丞公在沪道任内亏空八十万,皆系因帐房徐某吞蚀所致,爰由内帐房汤癸生君经手陆续迫出各种股票,其中以汇丰银行及开平煤矿为大宗。此外则轮船一只名飞鲸及码头,亟以变卖,抵偿公款。有纺织新局者,因已数年不分股息,其股票五万四千两(即450股)竟一钱不值。”《崇德老人自述年谱》,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
- ② 恒丰1924年向恒隆钱庄借款60万两,次年到期,无力偿还,改向恒丰昌等四家钱庄借款100万两,1926年又无力偿还。便用机器、厂房作抵押,向沙逊洋行借款150万两。此款转期三次,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240万两后才归还。《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③ 聂其杰:《廉俭救国说》,国光印书局,1934年版。

盛 宣 怀

朱宗震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盛家是个世代官僚地主家庭。

1860年，清将和春的江南大营为太平军击溃，盛宣怀随祖父母从武进避至其父盛康湖北粮道任所。1866年，盛宣怀回籍应童试，补县学生。以后屡试不第。

1870年春，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经杨宗濂推荐，投李鸿章幕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的父亲和李的关系深厚，盛宣怀迅速获得李的信任。同年秋，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自此以后，盛宣怀不断受到李鸿章的提拔：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

盛宣怀是李鸿章举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早在1872年，他就向李鸿章建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①，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他参与了最初的筹划。翌年，李委他任招商局会办，直接经手具体业务，打破了官不经商的成例。1876年冬，盛宣怀为招商局活动到一笔官费，出高价盘进了濒于破产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并从中贪

污了一笔手续费，而招商局营业却更加困难，摇摇欲坠。盛宣怀因此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参，被迫在1881年离开了招商局。1883年，李鸿章重新派盛宣怀入局。1885年盛升任该局督办，全面控制了招商局，并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当时，盛宣怀以局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英磅来维持营业。以后又多次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来避免在竞争中倒闭。实际上，招商局只能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

盛宣怀又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筹办电报局，次年被派为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在主管电报局期间，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敷设电线，并在上海等海口登陆，控制中国沿海的电信。

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十年而开张才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毁，急派盛宣怀赴沪处理善后。盛重新招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担任该厂督办。当时，李鸿章经办的经济企业，多数归盛宣怀掌握。其中，华盛则被盛偷梁换柱，逐步变成了自家的私产。

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因兵败被撤销直督职务，失去了北洋地盘。盛宣怀的地位也跟着发生了动摇，不得不请假离开天津，前往上海，打算另谋出路。他曾企图弃官就商，在工商业上大干一番。恰好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空太大，束手无策，商请盛来接办。盛向张提出，如接办铁厂，须同时组织经办芦汉铁路的公司，以保证汉阳铁厂所产铁轨的销路。张之洞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1896年5月，

盛宣怀首先接办了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 1897年起, 又兼营萍乡煤矿), 改为官督商办。同年8月, 张之洞与直督王文韶会奏保荐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10月, 他又亲自进京活动。结果, 清廷委他经办的不只是芦汉铁路, 而是包括东南诸路的“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时, 他还获准主持开设中国通商银行。然后, 他才轻松地卸掉了津海关道的职务。

1897年1月, 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 不久, 通商银行也在上海开办。从此, 盛宣怀的活动中心便从天津移到了上海。此后, 他以铁路总公司为枢纽, 遥控汉、冶、萍铁煤矿, 近制轮电、纺织及银行业务, 声势十分显赫。张之洞、王文韶在保举盛的奏折中曾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 一身而兼“三长”^②。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 盛宣怀是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铁路总公司成立后, 盛宣怀一面开工建造芦汉铁路芦保段和淞沪铁路, 一面立即筹借外债。他的方针是“造成一段”, 就“抵借一款”^③。同年7月, 盛与比利时正式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 比在俄、法支持下, 寻找借口, 推翻合同, 进一步向中国勒索利权。盛不得不与比改订了合同, 使比利时获得贷款的高额利率, 并攫得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行车权。同年, 盛宣怀又与英国签订了沪宁、苏杭甬、浦信铁路的借款合同草约(浦信路约后来实际作罢), 与美国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后于1900年签订正式续约), 其条件较比利时的更为苛刻。盛宣怀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充当买办。

1900年, 义和团运动兴起。盛宣怀多次密奏清廷, 主张

对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八国联军入侵后，他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运动“东南互保”，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事后，西太后十分赞赏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中所起的作用，夸奖他是“不可缺少之人”^④。1901年1月，盛升任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同年10月，又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奉命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希望以出卖内河航行权、增辟商埠、裁撤厘金为条件，乞求列强增加关税。经几年谈判，终因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违背，遭到列强反对，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02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电报、轮船两局。虽经盛宣怀的极力拒绝，在轮船招商局保存了很大的势力，但在电报局的势力却完全丧失了。从此，盛、袁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03年7月，盛宣怀与英国把前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草约改为正式合同。其后不久，湘粤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前与美国订立的粤汉铁路合同，收回自办。1905年，张之洞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废除美约，而盛则反对废约。因此，盛宣怀与张之洞之间发生争吵，盛由此失去了张的支持。继而，江浙两省资产阶级也要求废除与英订立的沪宁铁路合同及苏杭甬铁路草约，并发展为声势颇大的收回利权运动。至此，盛宣怀不得不口头上赞成废约，而实际上却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废约运动。盛的卑劣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是年11月17日，经商部奏请，清廷派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不久，铁路总公司也被裁撤。盛宣怀在人民的唾骂声中黯然下台。

到1907年底,由于浙江地区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运动仍在扩大,西太后乃召盛宣怀进京,研究对策。盛在西太后面前攻击袁世凯属下主持的铁路政策,朝令夕改,失信中外。

1908年3月,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即被袁排挤出都。他在京时,曾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改为商办,于3月26日在农工商部正式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理。

先是,盛于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时,仅凑得股份二百万两,根本不足以扩大生产,只有依靠借债经营。为了使铁厂获得廉价的焦煤,他曾于1899年向德国贷款四百万马克购买采煤机器,扩大萍煤生产。1904年11月,他又以大冶得道湾矿山作抵押,以廉价供应日本优质矿石为条件,向日本预支矿石价款三百万日元,用以改造和扩大汉阳铁厂。他把这笔贷款看成是“无中生有,一线之生机”^⑤,而实际上,却是把日本财阀的势力引了进来。到1907年底,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夕,厂矿设备确已初具规模,但在盛的一手包办下,经营腐败,债务累累。公司成立时,盛声称“加集巨股,大举合办”^⑥,以扭转亏空局面,但实际集股仍然十分有限。由于营业上继续出现巨额亏空,公司濒于无法支持。1908年9月,盛宣怀去日本治病兼行考察,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与日本财阀相勾结。到11月间,由于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盛匆促回国。

1910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进京,回邮传部右侍郎原任,并要他“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清政府要他出面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盛立即与

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先后谈判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1911年1月，他补授邮传部尚书。不久，就和度支部尚书载泽一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同年5月，随着清政府宣布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命令，盛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把原先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奉送给帝国主义。

所谓“铁路国有”，是由盛宣怀策划奏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的。清政府通过铁路国有政策，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乞求帝国主义的贷款。但是，这一卖国政策立即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保路运动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0月26日将盛宣怀革职，盛的反对者们乘机要清廷将他“明正典刑”。惊惶失措的盛宣怀赶紧向其外国主子求救。革职后的第二天深夜，他在英、美、法、德、日五国驻京使节分别派兵护送下，经天津乘德国轮船逃往青岛。12月下旬，盛又被其日本主子接引，移居大连。

盛宣怀在逃亡青岛、大连期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演变。他消除了对袁世凯的宿怨，通过亲家孙宝琦的关系，一再为袁镇压革命、篡夺政权出谋划策，为袁的一举一动拍手叫好。

当时，盛宣怀在江苏等地的钱庄、房地产等被革命当局查封。为此，他曾无耻地恳求外国驻华使节出面保护他的财产。但是，外国使节并不为他的那些与外国资本无关的财产“启封”而出力。汉冶萍公司则因有日本的大量投资，革命当局受到日本驻华使节的阻挠而不能予以接管，在日本人的保护下，

继续维持经营。因此，盛宣怀认为，“商产恐非洋债，终难保全”^⑦。他打算重新组织汉冶萍公司，增强日本资本，来保护他的这一份财产。为此目的，他于1912年1月3日，抵达日本神户。

盛宣怀到日本后，日本当局看到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认为有机可乘，指使盛宣怀出面与南京临时政府接洽，提出愿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贷款五百万日元给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准许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这个办法，是要让盛宣怀与革命政府搭上线，改变他的卖国贼身份，也是让日本获得实际利益。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急于获得革命军事经费，同意了这一要求。1912年1月29日，盛宣怀指派其代表在神户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合同。但消息一经传出，一些党派和社会舆论即表示坚决反对，孙中山因此宣布取消前议。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于3月开会，一致反对中日合办，撤销了盛宣怀的公司总理职务。盛宣怀策划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图谋终于失败。

其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掌了权。盛宣怀以赈灾为名，独捐银元一百万元，向袁表示效忠。1912年10月中旬，他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回国后，立即要求发还财产。他在为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呈文中，公然气势汹汹地诋毁革命，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是年12月10日，在所谓“保护人权”的幌子下，以报效水利经费二十万元为条件，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的全部财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又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

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这次革命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⑧，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宣怀还乘机向袁表示忠心，吹捧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⑨。

但是，盛宣怀对袁世凯的献媚，并没有获得袁的青睐，袁不愿和这个已经无用的宿敌和解。盛在袁政府内部寻找靠山的目的既没有达到，他经营汉冶萍公司在政治上就缺乏依靠，因而不复享有从前的种种特权；而且，经济上还遭到中央和地方当局的侵蚀，使营业更为困难。于是，他一方面虚伪地提出了“国有”或“官商合办”的主张；另一方面，决心更进一步投靠日本，以便依靠日本的力量，来迫使袁世凯政府给予更多的特权，迫使袁政府不敢实行国有或官商合办。1913年12月，盛宣怀与日本财团签订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大借款合同，规定长期供应日本廉价的生铁和铁砂，并由日本派遣顾问来监督企业。这样，由于盛宣怀的引狼入室，中国这一煤铁联合企业，便深深地陷入了日本侵略势力的魔掌之中。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又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归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曾派人和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问题。但因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盛不敢贸然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的阴谋又一次破产。随后他又和日本策划搞一个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但是，这个策划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盛宣怀就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

注:

- ①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附录:行述》。
- ② 张之洞:《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四,第24页。
- ③ 盛宣怀:《寄张香帅》,《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五第29页。
- ④ 同①。
- ⑤ 盛宣怀:《寄京外务部张宫保、鄂端午帅》,《愚斋存稿初刊》卷六十二第7页。
- ⑥ 盛宣怀:《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愚斋存稿初刊》卷十四第15页。
- ⑦ 《盛宣怀致王子辰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 ⑧ 《盛宣怀致孙宝琦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8页。
- ⑨ 《盛宣怀致孙宝琦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1页。

陈 光 甫

江绍贞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

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9年转到邮局工作，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八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答应由中国银行向该行存款相助，在沪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①，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

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并向职员们灌输“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观念，以混淆劳资界限，笼络职工为他出力工作。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处。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行业之始。

1925年，陈光甫受北洋军阀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面人物密切交往，经常借款给孔祥熙、宋子文在上海搞投机事业。

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之初，陈光甫慑于革命声势，曾先后将十多个行处收束。不久，江浙资产阶级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陈光甫是参与这一活动的头面人物之一。是年6月，美国垄断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在上海逗留时，曾向陈刺探南方革命阵营的动向。1927年初，霍却特写信给陈光甫，表示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3月底，蒋介石由南昌到达上海，与大买办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通过他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了三百万元的政变经费。“四·一二”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大卖力气。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畀予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会影响银行的信誉，辞未就。1928年，国民党

政府建立中央银行，他担任该行理事。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时，他又分别担任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

1929年2月，陈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说什么这就“使行员皆成股东”了^②。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借救灾盘剥农民。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革命内战经费，还顺从蒋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

随着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的逐渐形成，民族金融资本日益受到威胁。陈光甫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虽然也有所不满，但权衡利害，还是不得不向官僚资本投靠。他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③。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党政府恢复北宁路通车。蒋介石为掩人耳目，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密谋，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白银协定”。他以中国货币固定对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换取美国收买中国白银。这一断送中国币制独立性的活动，博得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赏识。

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左右^④。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的一家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

“七·七”事变后，陈光甫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到香港，上海改称分行，同时把江浙等地一些行处撤销，在西南内地组设新的行处，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

1938年，陈光甫由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又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到美国借债，签订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国内设复兴公司，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由这两个公司负责购销桐油偿还债务。1939年10月，陈又奉命以滇锡作抵押，签订二千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0年4月，又以国内钨矿作抵押，签订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钨矿借款。由于陈光甫代表国民政府频繁向美借债，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目，他为保全沦陷区的产业，将“上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杨介眉代理。

1940年6月，陈光甫由美回国。是年他与章乃器在四川合组上川实业公司，以后陈退出，另组上川工业公司。

1941年8月，美、英各自从对华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平衡外汇的基金，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该会主

席。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进行买卖外汇投机;又通过上海银行在汉口建立的大业公司大肆购运出口物资和购回进口商品,获得了厚利。

1944年春,陈光甫遵照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将上海银行总行迁至重庆。这时,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便派员去美国订购设备,幻想在战后大办工业。同年10月,陈由国民政府派遣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各国对中国战后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投资。会后又与张嘉璈、李铭等亲自同美国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合办的中国投资公司在纽约开业。该公司资本额五百万美元,为中国工商企业在美国发行公司债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原计划在上海设分公司,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不仅分公司未能成立,其纽约公司的业务也未能真正开展。1946年,陈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上海银行通讯处,加强与美国银行界的联系。此后他将大量外汇转移到美国,上海银行并代理美国一些银行在华的收付事务。他由于在经济上与美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上也就更加投靠美国,上海银行最初标榜的所谓“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至此就一变而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1947年4月,张群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陈光甫当了国府委员。为协助张群、张嘉璈(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管理财政,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输出推广会副主任委员、美金公债监理会委员等职,参预国民党政府有关财经措施的策划。这一年,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

美资本家合办的国泰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陈光甫感到形势不妙,将他的大量资金赶紧移往香港。1948年,他去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天津解放后,他曾以“协助解放区经营进出口业务”为名,拨了十万美元给天津分行,借此试探人民政府的政策。但是,他由于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根深蒂固,终于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借口参加在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逃往香港。

1951年,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1954年陈去台湾省,在台北市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营业,并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死。

注:

- ① 陈光甫1920年12月与济南分行经理龚祥霖的谈话,《陈光甫先生言论集》34页。
- ② 1931年1月18日第一区武汉同人欢迎总经理开会记录,《海光》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 ③ 1933年1月28日陈光甫在管理会上致辞,《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37页。
- ④ 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

李 铭

江绍贞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在一个经营银钱业的商人家庭里。

李铭幼时先入私塾学习，1902年到杭州入美国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于1905年赴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习银行学，于1910年毕业回国。

民国成立后，李铭开始进入银行界，在浙江银行任稽核。该行原为1909年由浙江官钱局改组而成，官商合办，资本额一百万两，经理库款、发行钞票，为省银行性质。1915年7月，浙江银行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被派任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旋升任经理。1916年5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上海中国、交通两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袁竟下令停止兑现，李铭参加了以宋汉章、张嘉璈为代表的上海金融资产阶级抗拒停兑令的活动，这一行动，提高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声誉。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权则操于浙江省当局之手，李铭等商股股东深感银行由官府把持，前途发展不易，遂策动商股退出。嗣因增资问题，官商股东意见不一，乃于1923年3月协议，订约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由李铭出任总经理，资本额为一

百八十万元，设总行于上海。他认为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设立分行易于受累，而不易赢利，仅在汉口、杭州和上海设立三个分行。其经营方针着重外汇业务及投资实业，同时也办理押放及信托业务。总行设有国外汇兑部，聘外国人为顾问，与上海的外商银行、企业有广泛业务来往，得到外商的大量存款。该行又先后投资外商经营的众业公所、沙逊公司等企业。不几年，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江浙财团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李铭在金融工商界的地位也就更加提高，1926年起连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委员、主席等职务达九年之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李铭向蒋介石投靠。蒋介石刚到上海不久，李就向蒋进言，以“取蛋必先养鸡”之喻，要求国民党政府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助的政策，同时他们保证在财力上支持国民党政府，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这年，国民党政府为大量发行公债，建立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是金融工商界人士，李铭担任该会主任委员。这一内债基金保管权，正是金融资产阶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梦寐以求的，因而在内战期间，他们大力承销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巨额公债，浙江实业银行每年持有的有价证券（大部分为政府公债）数额均在五、六百万元以上。国民党新军阀与江浙财阀的勾结，使前者获得了打内战的资本，而后者则得到在内战期间的畸形繁荣。

1928年7月，李铭受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委派，任华俄道胜银行总清理处总清理员，并兼管上海分清理处事宜。10月，国民党政府建立金融独裁机构——中央银行，李铭被派任为该行监事会主席。11月，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

行，交通银行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李铭被任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交通银行董事。

翌年，中美合资盘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之发电厂和电话公司，分别组成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李铭担任美方顾问。上海电力公司成立后，需要资金从事扩充，适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国内筹资困难，李铭便在上海联合中外银行及英美在上海的投资经纪人组织银团，承销该公司所发行的优先股及公司债券，使这一殖民经济机构的资金迅速得到扩充。

浙江实业银行自1927年该行董事长胡济生去世后，李铭即兼任董事长，掌握了该行的整个大权，这年增资到二百万元。在往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该行的固定资本虽然没有增加，但存放款数都有较大的增长。自1927年至1930年，存款增加零点八倍，放款增加一倍，每年都有大批款项存放国外，1931年持有的有价证券达一千万元左右。

“一·二八”沪战爆发后，李铭与张嘉璈等人一起，推动各银行合组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用以巩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应变力量，李铭担任主席。1933年，又在该会属下成立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及票据承兑所。1932年李铭等人出面组织国民实业银团，收购杭州电厂，组成杭州电力公司，由李铭任董事长。1934年，他又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投资创办上海鼎新纱厂。

1935年发生全国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为垄断金融，乘机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修改该行章程，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负责制，宋子文攫取了董事长职务，

李铭与总经理张嘉璈同被排挤。

到1937年抗战前止，浙江实业银行的资本虽然仍为二百万元，但公积金则达三百五十余万元，存放款均在四、五千万元左右，连同它所投资的企业，资产总额达六千四百余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铭曾再次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国民党军队放弃上海西撤后，李铭经财政部长孔祥熙指派，留在上海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一起，以民间金融业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的金融事业。李铭利用这个机会，将浙江实业银行的大批存款以及上海电话公司的往来款，变换成外汇，作大量的外资逃避。汪伪政权建立后，曾拉拢他与之合作，由于他与英美有较深的关系，被他拒绝。1940年他被南京汪伪政府下令通缉，避往上海美国领事馆，于次年3月由美领事馆送往美国，与其家属一起居住在纽约。

李铭在美期间，继续担任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电力公司的职务，曾由国民党政府派为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4年李铭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他与张嘉璈、陈光甫一起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半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该公司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共同投资五百万美元，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1945年8月20日该公司正式在纽约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铭由美回国，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奖励发展私人企业等要求。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挑起反革命内战，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样，连李铭等原已组成的中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投资办厂的计

划也未能真正实行。

1947年,随着蒋介石对解放区进攻失败,军费浩大,通货膨胀,带来财政经济上不可克服的危机。这时,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张嘉璈任中央银行总裁,采用各种办法企图挣扎挽救,其办法之一是由中央银行建立输入管理委员会来控制外汇和物资,李铭任主任委员(后改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任副主委)。他们不但不能挽救危机,反而以此投机牟利,因此招致CC系官僚资本对这一机构的垂涎。李铭自知难敌CC,便将副主任一职自动让给宋系官僚资本人物霍宝树担任。这年,由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与美国资本家合办的国泰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李铭预感到蒋家王朝行将灭亡,除继续进行逃资外,将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铭逃往香港。他到港后招募资本开设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1966年10月22日李铭在香港病死。

章 太 炎

陈旭麓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蓊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燹，家境已中落。

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骥《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濬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晕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扎下了结实的根底。在这段

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预《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

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①。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诂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诂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

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会中宣布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②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③，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稽，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④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

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夏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满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⑤。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虺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保皇派也在大造舆论。康有为、

梁启超没有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仍坚持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办报著书，诋毁革命，挖兴中会墙脚。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原先充当革新首领的康有为，发了这么一大通混淆视听的议论，再加上其门徒翻印兜售，流毒极广。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章太炎革命论述中最光辉的作品，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6月29日，《苏报》刊载了此文的摘录。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请章润色。邹文浅近直截，疾呼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指出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强大、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文章多篇介绍。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

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燾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作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

和，互相砥励。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自此他深深地怀念着“邹容吾小弟”，多次撰写诗文，以志哀悼。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二千余人，章即席演说。他介绍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对今后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⑥，要人们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当时，《民报》正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和同盟会其他言论家无情地抨击了保皇派的谬误，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此时揭示的问题虽然面广而深化了，但他吸取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哲学，强调自我意志的作用，由早期的机械唯物论走向主观唯心论。文章艰深，用语晦涩，削弱了《民报》的群众性。他在办报之余，还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

《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受业生。

1907年4月，章太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一些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反对列强侵略，自保邦国。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章太炎径找唐绍仪算帐，唐已他去。章复至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己恨。

《民报》被禁后，章太炎专事讲学著书，撰写《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学术成果日富。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孙中山的活动已有隔阂，复因《民报》经费问题，大相龃龉。1909年，章太炎会同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章为会长，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①，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先是，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

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是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十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为。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七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

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章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和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又一次修订《馘书》，却将原书中具有战斗意义的文字大半删去，更名为《检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④

之概，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反动。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惊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

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注：

- ① 章太炎：《艾如张、董逃歌序》。
-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七七页。
- ③ 章太炎：《谢本师》。
- ④ 李希泌：《章太炎先生讲演录》。
- ⑤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 ⑥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 ⑦ 章太炎：《民国光复》。
- ⑧ 章太炎：《生日自述》诗。

梁 启 超

耿云志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在一个大乡绅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梁维清，太平天国时在乡中组织“保良会”，与农民军对抗；其父梁宝瑛，也曾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

梁启超幼时在家读书，1887年进广州学海堂就学，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没有考中。在南归途中，于上海见到《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他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回到广州后，他拜康有为为师，对康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他曾参与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后来，他与康有为一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

1894年，梁启超旅游京师，恰逢甲午战败，“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①。第二年入京会试时，又适值中日议和，清政府割地赔款，激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愤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一千三百多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说这是“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②。

这次上书虽没有被接受，但起到了激励士气，开新舆论的作用。是年8月间，梁受康指示，主办《万国公报》（不久改称

《中外纪闻》)。该报专主议论时政，鼓吹变法，每期印千份左右，分送朝贵，冀得其同情。在这同时，梁又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该会书记。梁启超后来回顾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③强学会的活动遭到顽固派的弹劾，没有多久即被封禁，《中外纪闻》亦随之停刊。

是年，梁启超在京师结识了许多同情变法的志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谭嗣同。梁对他非常敬佩，称誉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④。

1896年4—5月间，梁启超离北京到上海。8月，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旬刊)，担任主笔。他所发表的《变法通议》洋洋数万言，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力倡维新变法；由于他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对全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时务报》成了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而梁启超则成为维新运动中最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后来，梁的言论渐为资助《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所不容，遂不得已离开报馆，于1897年11月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甲午战败后，湖南的一批略通西学、倾向变法的志士如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黄遵宪等，即积极谋画先在本省筹办新政。到1897年秋冬至1898年春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实力赞助下，湖南新政已粗具规模：《湘学报》、《湘报》作舆论的鼓吹；南学会类似省议会，可供咨询；而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则一意培植维新人才。梁在学堂中极力宣传变法救亡的思想，批评清廷失政，并不时发表赞誉民权的言论。这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反对。顽固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群起攻击维新派，甚至提出了驱梁出境的要求，新旧党争遂日渐激烈起来，为以后

的戊戌政变预埋了一条伏线。

1898年1月，梁启超离湖南到上海，不久北上入京。当时，俄国强租旅大，梁随同康有为奔走呼吁，力图阻止清政府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梁还同麦孟华一起联络数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但此书没有上达。随后，他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在会中发表过动人的救国演说。他说：“使我国四万万入者，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盾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吾未之闻也。”^⑤这篇演说反映出了当时维新志士们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群众怀着某种朦胧的希望。

5月间，梁启超联合应试者百余人，上书请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当时有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光绪帝继6月16日召见了康有为之后，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赐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他还曾受军机大臣及总署的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大学堂规则，但却受到顽固派的嫉视。

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抵制，虽变法之诏屡下，而新政之实效却无所表现。“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斗争日益表面化。9月21日，西太后猝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并杀害维新志士，重行听政，撤废维新诏令，变法全归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夕出京，得英人救护经香港逃日本；梁启超则在日人救助之下也逃到了日本。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过于幼稚，过于软

弱，根本无力将政治改革坚持到底；在内外反动力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企图靠改良的办法，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却始终不认识这一点，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梁逃日本后，正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主动提出与康、梁联合反清的诚恳建议。但康有为以“受皇帝知遇”为辞，拒绝合作。次年3月，康离日本去加拿大，随后在那里开始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相对抗。梁启超仍留在日本，办起《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该报于1898年12月创刊，十日一出，共出一百号，至1901年12月停刊。

康有为离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续有往来。当时孙中山对康、梁保皇派的本质尚缺乏认识，对巧舌如簧的梁启超不存戒心。1899年12月，梁持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檀香山，在取得当地兴中会骨干分子的信任的情况下，积极展开活动。他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诡辩，淆惑视听，几乎使孙中山亲手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为之瓦解，给兴中会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损失。

梁启超在檀岛活动半年多，一面竭力扩大保皇会的组织，一面为国内的“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临近预定的“自立军”起事日期，梁离檀香山回国。但他刚到上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计划失败。于是梁启超转赴南洋与澳洲，继续从事保皇会的募捐活动。次年5—6月间，复去日本。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这时，梁启超放弃“斥后保皇”的口号，改以“稍从灌输常识入

手”^⑥，继续鼓吹改良主义。他宣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并保证“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⑦。

《新民丛报》早期，梁启超曾着力介绍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对国内青年不无启蒙的作用。而且由于对清廷腐败、改革无望而产生的愤懑，还曾一度高谈“破坏主义”。但其基本的改良主义思想立场从未改变。《新民丛报》是梁自认一生办报最得意的时期，曾自诩“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情感”^⑧，时人誉之为“新文体”，国内士子争相仿效，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风。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随后发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批判康、梁保皇派和其他立宪派。这时，梁启超以全力同《民报》展开论战，使早已开始的两党的思想斗争达到高潮。梁在《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论战文字将近百万言。如果说梁启超在逃居日本最初数年，他抨击清政府，怒斥西太后，以及介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言论，还曾起过相当的进步作用；那么，到他与《民报》论战时期，他的反动性一面就暴露得更清楚了。他宣扬，中国人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⑨，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⑩。这种反对革命的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派的批判。

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下诏宣布所谓“预备立宪”。梁启超马上响应，宣称：“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⑪不久，他便与康有为决定，将

他们惨淡经营的保皇会改名为宪政会，紧密配合清政府的步调。梁启超积极展开活动，与当时在日本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联络，筹划建立政党式的团体。后因杨度与蒋智由互不相能，且在策略上也略有分歧，杨遂别创宪政公会，梁启超则主使蒋智由、徐佛苏等出面做发起人，于1907年10月正式成立政闻社，并发刊《政论》杂志。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梁启超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⑩，企图求得清廷的容纳。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他明确提出了斗争的方针。梁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⑪这既反映了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的对立，同时也反映了，同以海外为基地，同以华侨为经济后援的这两党之间激烈争夺的情况。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内迁到上海，梁启超把徐佛苏、汤觉顿等许多重要骨干都派回国内，与各地立宪派联络，参与策动国会请愿运动。有些政闻社社员则竭力钻营幕府，争取官僚的同情。

尽管梁启超向朝廷做了忠顺的表示，但统治集团对康、梁的活动却始终怀有疑忌。特别是戊戌政变以来，与康、梁结怨甚深的袁世凯，对康、梁的活动尤有戒心。1908年夏，曾出现一次国会请愿的高潮，当时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朝廷一电，不但奏请定三年召集国会，而且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这激怒了朝廷及所有守旧大臣。袁世凯乘机进言，陈景仁背后有康、梁操纵，要求对政闻社采取严厉措施。当时，清廷正苦于无计应付请

愿运动，遂即下令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这一打击大出梁启超意外，他曾力谋挽救，终无效果，政闻社宣告解散。

但康、梁及其徒党并未就此停止活动。他们在继续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特别加紧进行倒袁和谋求开放党禁（即赦还康、梁）的活动。为此，梁启超曾决定以重金贿赂满人贵族和某些军机大臣，他还为某些朝廷大员代拟立宪奏折与说帖，借以加强同上层的联络。1910年2月，《国风报》创刊，梁启超又得以发挥其影响舆论的特殊作用。1910年秋，梁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汤觉顿以日本华侨商界国会请愿代表的名义进京，活动开放党禁。但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的“乞赦”要求，始终未得清廷的许可。而袁世凯的一度被罢斥，也只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非只康、梁活动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在日本闻讯，惶惶然不可终日，亟谋阻止革命军的进展。他与康有为抛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企图要革命党与清廷妥协，保住清廷的地位。他指使党徒在南北两方面进行活动，他本人也于11月间潜赴沈阳，窥伺时机，准备入京。后因时局对他不利，又折返日本，在一段时间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1912年2月，南北议和后，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的地位。这时，亟谋“出山”的梁启超，看到十几年前出卖维新运动的仇敌已成了控制时局的中心人物，遂不计宿怨，极力与之联络。2月23日，他致书袁世凯，称颂他“功在社稷，名在天壤”，“率土归仁，群生托命”；表示“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笔墨，以图报称”^④。信中详陈关于理财、治政、组党等项建议，并极力为其党徒谋

取地位。但那时同盟会的政治力量仍很大，许多革命党人反对梁启超回国搞政治投机。梁启超的党徒们有所畏惧，写信劝他暂缓回国。后来，同盟会的势力日趋散漫，而由一部分清末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团体所组成的党派，纷纷出现，它们虽然互有矛盾，但在对付同盟会的问题上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的党徒们加紧活动，争取到各党派首脑对梁的同情，袁世凯也想利用这一情况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表示欢迎梁启超回国。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到京后，曾受到官僚政客及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相当热烈的欢迎，袁世凯也以优礼相待，梁启超十分得意。他积极着手组党，为袁政府效力，得到袁的慷慨资助。12月，梁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实际很像给政府上的条陈。

梁启超在归国前，曾列名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回国后，他于1913年2月，又加入了以黎元洪、张謇等为首的共和党。5月，共和党与章炳麟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实际上，梁是该党的精神领袖。他直言不讳地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敌党，特别仇视其左派，诋为“乱暴派”，时时加以攻击。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一部分革命党人，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这时，梁启超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激烈地加以攻击。随后，就在镇压二次革命的硝烟未散之际，进步党人熊希龄为首的内阁出现了，梁当上了司法总

长,从此更加频繁地出入总统府,为袁世凯出谋画策。10月,在进步党支持下,袁压迫国会举他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议员资格。这时,袁自觉独裁总统的位置已经坐稳,接着便于1914年1月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也就形同敝屣,被抛到一边了。2月,梁辞去司法总长职务,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至12月也辞掉,于次年1月避居天津。

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阴谋复辟帝制。5月,袁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梁启超一方面不赞成变更国体,一方面对袁仍存幻想。7月间,梁还参加了袁所指派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帝制活动态度颇不明朗。到8月间,复辟帝制的丑剧由隐蔽而公开,各地反袁活动更加深入发展。这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已经如坐火山口上,再不能持以暧昧态度。他在致其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⑤于是他赶紧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抢过反袁的旗帜。紧接着,他邀蔡锷到天津密商反袁计划,决定借重蔡在云南旧部的势力,组织武力讨袁。梁启超打算在讨袁斗争中造成自己的武力和地盘,以便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蔡锷潜回云南时,梁启超也于12月离天津赴上海。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揭橥护国的旗帜,发兵讨袁。随后,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响应。梁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于1916年3月离开上海,在日本人帮助下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在陆的“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中任总参谋。广东“独立”后,5月1日于肇庆成

立“两广都司令部”，梁任都参谋。在此期间，他协助陆荣廷与假独立的广东龙济光达成妥协。5月6日，西南各省联合组织的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梁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务院初期所发的各种布告、文电等，大抵皆出梁启超之手。

5月中旬，梁启超离广东去上海，随即到南京与冯国璋协商迫袁退位等问题。不久，他以居父丧为名，辞去军务院本兼各职，留居上海，等待时机。

是年6月，袁世凯帝制破产，忧愤而死，段祺瑞成了北洋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梁启超于袁死的第二天，就致电南方讨袁的各都督司令，声称：“收拾北方，唯段是赖，南方似宜予以援助，毋使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即对袁，似不妨表相当之哀悼而揽同情。”^⑩这进一步暴露了他反袁的投机性质，同时表明他继续投靠北洋军阀的打算。为了讨好段祺瑞，他极力劝促西南军阀的首领唐继尧尽早解散军务院，免与北京国务院对立。

8月，旧国会在北京复会。这时进步党的政客林长民等组织宪法研究会，随后与汤化龙等人的宪法讨论会合并，结成了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研究系”政客集团，依附北洋军阀，从事政治投机活动。

1917年1月，梁启超到北京。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正围绕着“参战”问题展开权力之争。梁启超积极支持段祺瑞，要挟黎元洪和国会批准对德宣战。在黎、段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引起段派督军的激烈反对。6月，长江巡阅使张勋，借“调停”的名义，率领“辫子军”进北京，一手导演了

清室复辟的丑剧。梁启超遂又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为他起草讨张檄文。在驱逐了张勋之后，冯国璋就任总统，段祺瑞重行组阁，拥段有功的梁启超乃出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梁在财政总长任内两度向日本帝国主义乞得有损主权的借款，为段祺瑞充实军备，实行武力统一的反动政策效劳。同时，他还献策，拒绝恢复在张勋武力胁迫下解散的旧国会，而召集便于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以便排斥国民党，为研究系谋取有利的地位。但后来在四川内战问题上，梁启超支持原蔡锷的部下戴戡，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发生矛盾。当戴戡被段所支持的川军打败身死之后，梁启超便已完全失去了段的欢心，遂于是年11月辞职回天津私寓，深居不出。

1918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勱、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名义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去欧洲旅游，历时一年多，于1920年3月回国。那时，中国历史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决心放弃实际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宣称，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人类的前途要靠发扬中国的“固有文明”来拯救。这显然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梁启超回国后，立即与张君勱、蒋百里等着手组织以编译出书为主要业务的共学社，改组《解放与改造》杂志（1919年9月创刊，改组后，从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又派人接办中国公学，并设法向南开大学等校推荐人员，梁本人则不遗余力地撰文著书和到处讲学，全力以赴地争夺文化教育

阵地。1921年,他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1922年10月至是年底,他在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借题发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几年,他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处讲学,并发表了许多鼓吹尊孔读经的文章。但在这期间,他也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几本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梁启超晚年,正值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梁启超既恐惧又仇视,在给他子女的信中抑制不住地咒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

1925年9月,梁启超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同年12月,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春,又就任以美国退还庚款筹立的北京图书馆馆长;秋间,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1927年6月,在北洋军阀行将覆灭的关头,梁启超仓惶出京,跑到天津匿居。1928年11月,以重病入北平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病死。

梁启超生平著述极多。他死后,其友人林志钧编辑出版了《饮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

注:

- 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以下《饮冰室合集》之引文,皆简注《文集》或《专集》)
-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专集》之一,第114页。

- ③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专集》之二十九，第38页。
- ④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梁任公年谱长编》上册，第28页。
- ⑤ 见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 ⑥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文集》之二十九，第3页。
- ⑦ 梁启超：《本报告白》，见《新民丛报》创刊号。
- ⑧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 ⑨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文集》之十七，第38页。
- ⑩ 同上，第53页。
- ⑪ 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上册，第212—213页。
- ⑫ 见《文集》之二十，第28页。
- ⑬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同⑪第218页。
- ⑭ 梁启超：《致袁项城书》，见同⑪第380页。
- ⑮ 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芬、熊秩臣、刘希陶书》，《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
- ⑯ 梁启超：《致各都督司令电》，《专集》之三十三，第54页。

曾 朴

杨天石

曾朴字孟朴，又字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1872年3月1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1891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未中，他的父亲替他出钱捐了个内阁中书。1895年冬进入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法文。次年以所著《补〈汉书艺文志〉》及《补〈汉书艺文志〉考证》献给翁同龢，很受赏识。^①同年，应考总理衙门，没有录取，“决心舍弃仕途，别寻发展的途径”。^②

1898年，曾朴在上海经江标介绍，结识福州船政局船厂厂长陈季同。陈在法国侨居多年，熟悉法国文学。他常去陈处请教，此后三、四年内，读了不少法国文学和哲学书籍，自谓“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③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准备废弃光绪皇帝，曾朴曾经参与联名电谏。^④1903年因受人怂恿，和一杨姓丝商共同经营蚕丝，不久即因外丝倾销而破产。次年，与同乡徐念慈等在上海共同开办小说林书店，出版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译本。夏秋之间，从友人金天翮手里接过未完成的小说《孽海花》六回，加以点窜修改并续作。三个月工夫，完成二十回，于1905年初分为初集、二集出版。

金天翻写作《孽海花》的时候，拒俄运动正在高涨，他以清廷曾经出使俄国的洪钧为主角，洪妾傅彩云（即赛金花）为配角，计划写入“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广西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称为“政治小说”。^⑤ 曾朴接手以后，声称要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并改称“历史小说”。^⑥ 曾朴写出的小说，删去了金天翻原作中拒俄和反清的内容，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朝达官名士们的腐朽生活。书中虽然也写到了革命党人，但理想和热情则倾注在光绪皇帝和改良派身上；对列强侵略中国也表示了不满，但在具体描写时又美化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艺术上，曾朴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政治时事、掌故传说，都加以穿插剪裁，围绕女主人公的生平情节展开，自称是蟠曲回旋，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的“一朵珠花”。^⑦ 关于这一点，鲁迅曾评之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⑧

1907年，曾朴出版《小说林》月刊，陆续发表《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1908年因资金困难，书店停歇。同年，曾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第二年，应两江总督端方聘，任财政文案。^⑨ 一年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绿营营产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参加张謇的共和党，当选为江苏省议员。1914年以后，长期任江苏官产处处长，曾以财力支持过陈其美、钮永建的反袁活动。1924年底任江苏财政厅长，四个月后离去。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曾朴任政务厅长，不足一年称病辞职。

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一起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

拉拢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一批资产阶级文人，想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⑩ 11月，刊行《真美善》杂志，标榜艺术至上和趣味主义，宣称要使它“做成一切人共同的享受”；^⑪ 经过修改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五回和续作第二十六至三十五回即发表在该杂志上。接原先设想，曾朴是准备写到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后来又曾企图写到1900年或1901年，以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所谓“浪漫史”作全书的总结，但实际上写到甲午战争后便停止了。

1928年，曾朴对《孽海花》作了修改。由于思想上的进一步退化，此次修改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提高，对原作中批判科举制度等某些有意义部分又作了删削。1931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称为三十回本。同年7月，《真美善》杂志停刊，曾朴迁回常熟，在其父亲经营的私人园林虚籁村居里莳花种竹。1935年6月23日病故。

曾朴的著作除《孽海花》外，还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分六部，计划仿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加阿尔家传》，集许多各自独立的小说而成一有系统的集合体，表现从清末同治、光绪年代到北伐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横断面”，^⑫ 但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恋》。此外，还翻译过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多种。

注：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 《曾孟朴年谱》，《孽海花资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4月版，第161页。

- ③ 《复胡适之》，《真美善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 ④ 张鸿：《籀斋先生哀辞》，《曾公孟朴纪念文集》，常熟曾氏自刊本，第1—2页。
- ⑤⑥ 《萼海花资料》第134页。
- ⑦ 同上，第130页。
- ⑧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45页。
- ⑨ 《海虞曾氏家谱》，常熟曾氏义庄刊本。
- ⑩ 同⑤第179页。
- ⑪ 《编者小言》，《真美善》杂志2卷6期。
- ⑫ 曾虚白：《赛金花与小凤仙》，《东方杂志》复刊8卷1号。

张 伯 苓

宗志文

张伯苓，原名寿春，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父亲张云藻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1892年，张伯苓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五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1898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军港。张伯苓当时正在军舰上服务，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悲愤填胸，深受刺戟”，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①。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1904年4月，张伯苓随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8月回国后，仿照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逐年增加，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他也会积极参加清末立宪运动。1915年，南开

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1917年秋天，张伯苓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季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却“躲在家里，不到校，不支持”^②。这年秋季开学时，在全校大会上，他又责备学生不应该到社会上去闹，说：“大家要好好念书，爱国不是这样爱法”^③，当场遭到学生质问。但是，后来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学校负责人向他请示办法时，他则指示打开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他也曾设法营救。

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他赴东北各省调查，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伸入东北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南开中学教材。1928年南开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次年设化学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1936年，张伯苓又在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南开中学。

张伯苓曾把他所标榜的“教育救国”的宗旨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

病，其积极目的，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又制定办学方针五条：“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养救国力量。”^④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这个方针。

张伯苓于1909年开始信奉基督教，后来在天津办过教堂，还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体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张伯苓对此十分愤慨。他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⑤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校搞党派活动，还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是实际上，他一方面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中学活动，而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虽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去延安，却害怕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常常向人吹捧

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要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在参政会上，他也是为国民政府说好话，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⑥。同年，蒋介石派人拉张伯苓加入了国民党，从此对他更加重视。1938年和1940年，蒋介石曾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4年元旦，国民党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曾亲往其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蒋介石曾赠以医药费美金一万五千元。

1946年春季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但他仍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为之辩护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⑦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参加伪国大。1948年6月，张伯苓就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南京解放前，逃往重庆。四川解放前夕，蒋介石逃离重庆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仍留重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不久回天津。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嘱，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并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⑧。

注:

- ①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南开四十周年校庆特刊。
- ② 王守纲:《五四前后我在南开中学时的一点回忆》,未刊稿。
- ③ 同②。
- ④ 同①。
- ⑤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未刊稿。
- ⑥ 同⑤。
- ⑦ 同⑤。
- ⑧ 《人民日报》,1951年3月3日第三版。

杜 重 远

陈宁生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人。生于1899年3月1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父亲杜辉，务农，家境清贫。杜于小学毕业后，经亲友资助，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因学业成绩优异，享官费待遇，直至在此毕业。

1917年杜重远考取官费留日，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负笈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他认为要想振兴实业，可效法日人的“创造和努力精神”，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常于课后参观、实习，期望“就实地工作获得真切的经验”。^①

1923年春^②杜重远毕业归国，决心经营瓷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他求亲告友，凑集了六千元，在沈阳北门外买地盖房，掘井筑窑，开始办起了小型砖厂。经过三年奋斗，他创办的肇兴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

杜重远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他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功，继续借资、筹款，准备扩大企业。1927年，他借资三十万元，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又建成瓷器厂。他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该厂出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销路遍于东北各地。到1930年，该厂职工已达六百余人，

年产各种陶瓷器约六百万件，价值四十万元。在沈阳，它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杜重远热心社会活动，1927 年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的副会长。为了求得当局的保护，他在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里挂一个秘书头衔。先是，1926 年，为抗议日本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事馆，杜发动和组织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和进行抵制日货运动。日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官相诱惑，杜愤怒地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敌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③1929 年，他与阎宝航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各地的爱国运动。1930 年，他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其间，他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从此，他逐渐成为各界所熟知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沈阳。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实业，投进抗日救亡的事业中去。他的实业救国计划遂成泡影。

1931 年 9 月 27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它的宗旨是“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④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同年 11 月，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各界群众掀起了援马抗日的热潮。杜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给马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

上给予黑龙江省爱国将士以极大的援助和鼓励。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表了六十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发愤图强，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诚挚地向邹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⑤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创办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有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参加，共同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重重障碍，未能如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逼热河。杜重远率领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于2月中旬，赶到热河前线。他们不畏艰险，负囊担袋，翻山越岭，深入军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那时，杜重远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抱着一定的幻想，指望他们领导人民一道抗日，但不久，热河又成为“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杜目睹“国土日失，权利日丧”，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官僚买办”、“豪富大亨”；真正“救国的志士”是中国广大的劳苦百姓。因此，首先必须使大多数民众“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⑥

杜重远把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当作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积极参加上海厂商自保图存的活动。1933年至1934年间，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又在陕西组织国货公司，以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他原打算在上海办一个大规模的新式瓷厂，正在筹办时，

江西省政府邀请他赴江西改革瓷业。1934年9月，他赴江西景德镇考察，目睹在我国享有盛名的瓷器产地，因“技术陈旧，组织不良”而陷入衰败的绝境，十分痛心，遂改变计划，发起筹办江西光大瓷厂。同年12月，江西省政府拟设立江西陶业管理局，聘杜为局长。同时，在该局之下，附设一个“陶业人员养成所”以培养技术人才。杜重远主张教育要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教育要结合生产劳动，学生边学习，边劳动，既可补充学校的经费和学生的生活费，又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德。“陶业人员养成所”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培养学生。后来，这个所实际上成为培训抗日爱国青年的学校。与此同时，杜又与马相伯、卢作孚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助成会”，主张办流动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以普及教育。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生活周刊》为此发表了一篇胡愈之写的《民众自己起来吧！》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查禁了《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还在国外，大家都为这份抗日救亡刊物的夭折忧心如焚。杜重远不怕困难，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创办《新生周刊》，继承《生活周刊》的精神，在黑暗中继续战斗。他自任该刊的发行人和总编辑。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⑦他在每期的首页上特意开辟了《老实话》专栏，勇敢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他尖锐地指出：“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的掩饰，我们这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⑧他指

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动一场“自卫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⑨他相信中国人民“总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比五四、五九、五卅更汹涌的怒潮”。^⑩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了对人民的期望和信赖。

《新生周刊》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十万份，居全国杂志界第一位。^⑪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悍然判处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满腔怒火，愤激地喊出了“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⑫

“新生事件”轰动了全国。当“新生案”在法庭审判时，愤怒的群众挤满了旁听席，高喊抗日救亡口号。上海各界群众组织了“新生事件后援会”。杜重远勇气倍增，意志更坚，他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与读者共勉，号召群众“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⑬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

动据点。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同年10月11日，杜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了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杜把经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10月下旬，杜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丞，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杜重远异常兴奋，立即写了一篇题为《青年的爱国义愤》的文章，热情讴歌这一伟大的抗日民主运动。他认为“这次学生的运动表面上像激于目前的华北自治，而骨子里确是蕴藏已久的抑郁愤懑啊！”他鼓励青年们结成“民族联合战线”，“鼓起民族的战争”，共同奋斗！^④

1936年春，杜因病转到虹桥疗养院就医。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坚定其抗日反蒋的决心。同年春，张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经过周密的布置，与杜在上海郊外秘密约会，对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和杜重远经常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和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合作。

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把在狱中写的文章辑成《狱中杂感》一书，于同年11月出版。

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

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于12月19日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派团结、拥蒋抗日,认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⑮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东北救亡总会”^⑯推定杜重远为该会主席团成员。他活动于上海、武汉、西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造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十分高兴。他热情宣传八路军抗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说:八路军“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⑰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需要建设巩固的后方,因此,新疆的地位日益重要。1937年9月底,杜重远受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工作的人士取欢迎态度。杜与盛系同乡同学关系,到新疆颇受款待。杜自新疆返回内地后,把沿途写的通讯辑成《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很扼要而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因此,盛一再邀请他去新工作。从1937

年至1938年，杜曾三次去新疆，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但他却于5月17日辞却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参加于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各党各派集团的团体，所以应该站在整个国民民族的立场上，摒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⑩

1939年1月2日，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欣然同意盛世才的聘请，去新疆工作。为了发展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不少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译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到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他还延请了一批文化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学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对繁荣新疆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面对新疆民族和语言的复杂情况，他特别努力为各少数民族提供与汉族相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茅盾等人去该院任教。他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还在学院里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思想名叫《兴芒》的刊物。他在暑假里还带领一批文化人和学生到伊犁进行社会考察。不料，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在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

监视杜的行动。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表面的强大，迅速向右转，进行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旧日情谊，仍看不清盛的反动本质，多次对盛直言相劝。盛更忌恨在心。1941年冬，盛恶毒地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逮捕了杜重远，给杜加上“系受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①的罪名。由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亦多被罗织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别有用心地命周彬（毛泽民）主审。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盛的阴谋。审判结束后，周彬据理说明所谓杜的阴谋暴动案完全是捏造的。不久，周彬等人亦被逮捕。杜在狱中受尽折磨，几度诬服，又几度翻供。盛为了置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1943年10月中秋节后，杜重远终被盛世才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于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派爱国人士，为邹韬奋和杜重远的逝世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称誉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注：

①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293页。

② 同①。

- ③ 《新生周刊》1934年2月24日。
- ④ 闻宝琮：《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
- ⑤ 杜重远：《狱中杂感》第193页。
- ⑥ 《新生周刊》创刊号发刊词。
- ⑦ 《新生周刊》创刊号发刊词。
- ⑧ 《零卖与批发》载《新生周刊》1934年6月2日。
- ⑨ 《“九一八”三周年》载《新生周刊》1934年8月15日。
- ⑩ 《民族精神不死》载《新生周刊》一卷十三期。
- ⑪ 据1934年底统计，全国杂志共有2,068种。
- ⑫ 引自《新华日报》1945年7月24日第四版《纪念邹杜两先生》。
- ⑬ 《狱中杂感》第180页。
- ⑭ 《狱中杂感》第32页。
- ⑮ 杜重远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亲笔信原件。
- ⑯ 成立于1937年6月，是关内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
- ⑰ 杜重远《盛世才与新新疆》第12页。
- ⑱ 《新华日报》1938年7月6日第二版。
- ⑲ 周东郊：《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

沈 钧 儒

周天度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七岁从师读书，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阅读了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

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1905年9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在留日期间，他的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1907年沈钧儒学成回国，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时，曾延聘鲁迅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任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民国初年，沈钧儒起初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从事教育工作，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表示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出任段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他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主笔。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吴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他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儒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踞东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①。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亡。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北平学生开展了“一二·九”运动。沈钧儒目睹敌寇深入，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内心悲痛。他这时为忧时而写的一些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漓其难禁。”^②在一篇四首五言体诗中，由于爱国情深，他打破格律，一连用了五个“我是中国人”^③。“九·一八”以后的严酷现实，使他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无济于事，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④。1936年1月28日，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31日，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

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⑤。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进一步向党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沈钧儒在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进行了巨大而细致的组织工作，勇敢地承担起困难的任务。他虽然已是年过六十岁的老人，仍然象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市几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游行，他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同游行群众一道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在国民党军警马队的阻挠威吓面前，他毫不退缩。由于沈钧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上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的长处，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公认的救国会领袖。

沈钧儒对鲁迅十分钦佩。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

世，他和宋庆龄等参加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葬礼，他在素轴上亲笔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

同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进行反日斗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

救国会的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从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12月4日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同志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⑥，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⑦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5月，国民党由叶楚傖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向他们进行劝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入反省院，然后保释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戒备森严中，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

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⑧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邹韬奋等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审判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沈钧儒等人的入狱受审，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⑨，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订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⑩。由于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南京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沈钧儒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

亡总会，他任主席。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提出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作为它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全民抗战》从形式和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进，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党派，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从抗战开始，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的接触，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党的领导，因此有人攻击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对此，沈钧儒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正确，作这样的“尾巴”，也是光荣的^①。在抗战期间，他介绍和资助了不少青年前往解放区。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并曾往桂林推动宪政运动。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下旬，他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②。他认定抗日、民主、团结三者不可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③。以后，他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威胁和恫吓，但都毫

不畏惧，仍然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闭，邹韬奋被迫出亡香港，沈钧儒则仍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中旬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倡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怕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和救国会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亦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加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进步，起了推动作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为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屠杀昆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教师和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流血

惨案，他写了一首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诤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④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随后，他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该刊发刊词指出：“抗战胜利了，但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现实“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表示要站在人民方面，“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沈钧儒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同年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他和民盟其他负责人发表声明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随后，沈钧儒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他谴责美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并反对民盟内部的妥协倾向。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也加大，妥协性增长。同年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面前，民盟少数领导人动摇屈服，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同意自行宣布民盟总部

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反对向国民党妥协投降^⑤，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随后，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便恢复民盟总部的活动，并筹备召开三中全会。

沈钧儒到香港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汇集在香港及从内地来港的民盟中委，在他主持下，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⑥。三中全会严肃地批判了盟内右翼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行为，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沈钧儒等左派同右派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一、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和民主，必须“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一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二、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才有保障”。三、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指出为了彻底推翻南京反动集团及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四、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佩，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

作”。^⑦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以中常委负责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民盟这一历史性转变，受到人民的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提出的筹开新的人民政协的号召。6月中旬，民盟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⑧。9月，沈钧儒与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沈钧儒到解放区后，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定地跟共产党走。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主张。1月22日，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

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④。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初,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和民盟其他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十四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时期。沈钧儒能跟随时代的前进而继续不断地进步。他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为了跟上

时代的步伐,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经常勉励自己和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②周总理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注:

- ① 沈钧儒:《联省自治谈》,《浙江月报》第1卷,第2期。
- ② 沈钧儒:《寥寥集》,1946年艺术书店出版,第25—26页。
- ③ 同②,第29页。
- ④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 ⑤ 《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 ⑥ 《“七君子”事件》,1937年8月时代文艺社初版,第15页。
- ⑦ 同⑥,第27页。
- ⑧ 同⑥,第65、66页。
- ⑨ 《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 ⑩ 《救国无罪》第127—148页。
- ⑪ 范长江:《忆衡老二三事》,196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 ⑫ 1939年11月23日黄炎培日记。
- ⑬ 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 ⑭ 同②,第114页。
- ⑮ 1947年11月5日黄炎培日记。
- ⑯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印:《民盟文献》第三辑,第1页。
- ⑰ 以上引文均见《民盟文献》第三辑,第3—27页。
- ⑱ 同⑬,第51—55页。
- ⑲ 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
- ⑳ 《沈钧儒年谱》。

李 公 朴

宗志文

李公朴，江苏常州人，1902年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家境穷困，父亲给人家当仆人。李公朴小时候只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他的三兄李公愚在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做店员，他也跟随做学徒去了。学徒生活又苦又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一些新书报，借以增长自己的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公朴满师不久，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并揭发他的店老板贩卖日货的罪行，终于被解雇了。他失业后，幸得三哥的支持，于1920年秋季插班进入镇江润州中学念书。毕业后，1921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学习，但也只念了一年余，又因参加反对学校校医虐待学生的学潮被开除。

1922年李公朴转学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高中毕业后，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因为他很穷，只能一面读书，一面在图书馆工作，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学生的罢课游行，代表沪江大学学生任上海学联的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就在这时，他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政府原来

是一丘之貉。反帝爱国的激情，使他无法继续在课堂里呆下去，1926年初，他毅然抛开学业，到广东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随军经过福建、浙江，1927年初他又回到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公朴愤然离开了部队。他曾一度组织一个全球通讯社，搞新闻工作，因为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干不下去了。1928年，美国雷德大学(Reed College)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吸收中国学生入学，培养青年会干事。李公朴通过青年会应征入选。8月到美国，进了雷德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来维持生活。美国的“民主政治”对李公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也看到，“其政府之大权与政策，实际上仍操在资本地主阶级的掌握之中”^①。他一方面希望“中国的政治，不要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②；另一方面，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认为当时“政治方面究竟已上了轨道，南北究竟已算统一，……再过数年，社会现象自会逐渐进步，人民可以安居乐业”^③。这种种想法，反映了当时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和幻想。1930年夏，李公朴在雷德大学毕业后，乘坐一艘货船离开波特兰德(Portland)，靠在船上做工补偿船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了一次社会考察，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开始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起初他对国民党的抗日宣传还有些相信，一度办起一个环球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来看到他们破坏“一·二八”抗战，暗杀著名爱国人士邓演达等人，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等一系列事实，就对国民党失望了。他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

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2年初,李公朴和邹韬奋、杜重远、戈公振等,在上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出版。12月,李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其目的,在于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知识之机会”^④。经常来图书馆借书的,多数是学徒、店员、职工等自修青年。这个图书馆还设立了读书指导部,指导大家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于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中公开给予回答。通过这些回答,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负责回答问题的,主要有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等人。1933年2月,在流通图书馆阅览室,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8月,又增设补习学校分校。

1934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限制与刁难,“读书问答”无法在《申报》上继续办下去,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一起转而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这是一份通俗的理论性期刊,在上面开辟了各种学科的讲座,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夏征农的文学讲话,高士奇的科学小品,曹伯韩的算术讲话,以及“读书写作问答”等。许多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观点。后来(1935年),《读书生活》半月刊扩充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印了很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

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这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补习学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很大的压

力。但是李公朴没有退缩，他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于1935年秋，把图书馆和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继续办下去并得到发展。到1936年底，图书馆的书籍由两千册增加到三万册，补习学校由一个增加到八个，学生人数由开始的二、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其中许多学生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李公朴被选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救亡群众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他参与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起草，提出救国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的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

李公朴对鲁迅很崇敬。这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十分悲痛。22日举行葬仪时，他参加了送葬的群众队伍。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李公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之狱。12月4日，他们被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到了苏州，大家推李公朴向押送的人致“临别词”，说明当前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使那些押送的人大受感动。

“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团结一

致，宣传“七个人是一个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向七人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⑤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进行了劝降活动。5月，由叶楚傖出面，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等，要七人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后出狱；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了。接着，蒋介石又以请七人去庐山“晤谈”为诱饵，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又被拒绝了。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人进行了两次正式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他们严正地逐条驳回了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和企图强加的罪名，驳得审判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的迫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界人民纷纷发起援救运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前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一时响应者很多。宋、何等提出：“七君子”爱国无罪，应立即释放；如爱国有罪，则他们与七人同罪，也应该一起收押，并案处理。7月5日宋、何等并带头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请求入狱。这一援救运动，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接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于7月31日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8月底到山西

抗日前线，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12月他到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提出它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李公朴还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大家“各尽所能，去做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⑥，“克服一切的艰苦，争取最后的胜利”^⑦。7月，《全民》周刊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周刊。

抗战初期，阎锡山伪装进步，延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创办民族革命大学，约请李公朴任副校长。李于1938年初回山西后，看到学校的负责人全是阎的亲信，根本无意安排他负什么责任。而且在以后不久，阎锡山开始排斥李公朴和一些进步人士，李决意离开，再回到武汉。当时，武汉已有一些进步团体，如“蚁社”、“民先”等遭到解散。6月里，有一次李到汉阳兵工厂讲演，这个厂正在酝酿罢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抓了几个工人代表。李公朴去找陈诚，要他释放工人，两人发生了争辩。陈诚诬指李公朴是罢工煽动者，把他也扣留起来。经周恩来多次与陈诚力争，一个月后李始获释。

10月武汉沦陷，李公朴撤退到重庆，后与夫人张曼筠经成都转赴延安。11月24日到达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对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建议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从事抗战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的建议得到党的赞助，抗战建国教学团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的十几名青年组成。1939年6月，李公朴率领他们到晋察冀边区和晋

冀鲁豫边区一带去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就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或短训班，培训抗日宣传人才。蒋介石知道后，密电河北游击总司令部鹿鍾麟，嘱他对抗战建国教学团的活动“严予查禁”。后来又密令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将领朱怀冰，要他抓到李就地枪决。但在八路军的保护下，蒋介石的阴谋落了空。

1940年李公朴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出版，如实地反映了他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

同年12月，李公朴夫妇由解放区回到重庆。正反复考虑下一步去向时，皖南事变发生。他对当时的形势和工作环境进行分析后，决定把全家搬到昆明。在这里，他以青年会为活动基地，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2年底创办了北门书屋。1944年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把北门书屋扩大改组为北门出版社，在张光年、赵沅等人帮助下，邀请闻一多等组成编委会，出版进步书刊。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立即参加，并被推选为支部执行委员。从此，李公朴和闻一多经常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45年春，特务头子刘健群找到李公朴，自称是蒋介石派来的，希望李到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了。

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文件在《新华日报》上刊载以后，北门出版社立即协助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翻印了数千册，在各阶层中广泛传播。这时，李公朴还是民盟机关刊物《民主》

周刊的编委，因编辑部成员在编辑方针上意见不一致，他和闻一多等一部分编委商议，决定出版《民主》增刊，请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编辑工作，贯彻了坚持抗战、扩大民主阵地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公朴赴重庆出席民盟临时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被推为中央委员。他还和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这个学校是参照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办起来的，没有固定教员，由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内和党外的一些著名学者轮流到学校讲课。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从借房子到请教员，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办的。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流血惨案，杀害学生。消息传到重庆后，李公朴多次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破，伤口宽两公分多。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⑧

5月，李公朴回到昆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仍积极投入民主运动。6月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接近完成，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⑨6月下旬，昆明各界人民

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们就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于26日、28日、29日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们的暗害活动。7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⑩他没有畏惧，仍然天天为和平奔走。

11日晚10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至12日清晨逝世。

四天以后，15日，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不可遏止了。

注：

- ① 李公朴：《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生活》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1929年5月19日出版。
- ② 同①。
- ③ 李公朴：《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天的高兴》，《生活》周刊第四卷第十五期，1929年3月10日出版。
- ④ 李公朴主编：《读书问答集》第一集，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1934年版，第229页。
- ⑤ 《七君子事件》，时代文艺社，1937年8月版，第27页。
- ⑥ 李公朴：《民众动员论》序言，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

- ⑦ 李公朴：《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黑白丛书社，1938年版，第50页。
- ⑧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1974年12月。
- ⑨ 同⑧。
- ⑩ 同⑧。

洪 深

查建瑜

洪深，字伯骏，号浅哉，我国著名的戏剧家。1894年12月31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五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的一个官僚世家。1900年入塾读书。1906年至1907年先后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院读书。1912年下半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实科。他从小酷爱戏剧，进清华后曾多次参加“新戏”的演出，并从事文艺创作。

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流行的话剧大都是即兴演出，并无固定台词。1915年，洪深年21岁，开始创作剧本，写了《卖梨人》和《贫民惨剧》，以后长期从事话剧活动，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1916年夏天，洪深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想当个实业家来拯救中国，但同时，爱好仍驱使他学了一些文学与戏剧课程。当时，美国正在上演熊适逸所译的京剧《王宝钏》，但译本有损原著，而且就是原著故事的本身，也足以启外人对华的轻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洪深，看后很苦闷，极想改变美国舆论对中国人的观感。是年底，他组织了话剧《花木兰》的演出，受到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王宝钏》事件使洪深从反面领悟到戏剧能唤起民族觉醒，他决心改学戏剧。

1919年秋，洪深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同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得硕士学位。是年，他以中国题材用英文创作了话剧《牛郎织女》、《虹》，并积极组织同学到美国各地作巡回演出。他的老师、美国著名戏剧学家贝克教授十分欣赏他的组织才能和创作。

1920年至1921年，洪深参加职业剧团，在纽约附近各城市巡回演出。这时，为了筹款救济中国华北的水灾，他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在纽约多次演出，自任导演和演员。

1922年春，洪深回国，任职商界，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材料总管理处任理事，兼任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英文秘书。嗣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英文教授。是年冬，他采用了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的剧本形式，写成反封建反内战的舞台剧《赵阎王》。把二十年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集中在赵阎王身上，塑造了一个旧社会逼人为恶的典型。这时，洪深还曾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公司代拟征求影片、剧本的广告，文中规定海淫、海盗、神怪、表情迂腐等几条不予录取，反映了他急于改进社会风气的思想。

1923年，经欧阳予倩、汪仲贤介绍，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并和欧阳予倩、应云卫等主持该社工作。是年9月，他在“戏剧协社”第一次导演《泼妇》（欧阳予倩编剧）和《终身大事》（胡适编剧）。当时，“戏剧协社”仅有两名女演员，有些女角由男角扮演。洪深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男演男，女演女。他把

《泼妇》和《终身大事》两剧同台先后演出。前者男扮女装，后者男女合演，让观众去鉴别。观众看了男女合演的《终身大事》，觉得自然得体，拍手叫好，对男扮女装的《泼妇》则感到可笑。通过这次演出，结束了话剧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积习。

1924年初，洪深将英国王尔德著《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并自任导演。王尔德原著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作了强烈的讽刺，洪改编时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并使之更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4月，“戏剧协社”在上海公演《少奶奶的扇子》。这次演出建立了严肃认真的话剧舞台作风（包括导演、以及舞台艺术各个方面），树立了话剧舞台演出的楷模，表演也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许多剧团争相学习，洪深因此成名。同年，他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并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自1924年至1937年，洪深共编导了《早生贵子》、《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风雨同舟》、《夜长梦多》等十余部电影，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演《苏州夜话》和《名优之死》。这两出戏都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现实，洪深观后思想受到启发，曾对马彦祥说：“我演出《少奶奶的扇子》，观众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田汉演出的戏，观众主要是知识青年，我觉得他这条路走对了。”不久他就参加了“南国社”。从此，洪深和田汉在戏剧上一直是很密切的合作者。

1928年，洪深在明星电影公司编导《女书记》、《一脚踢出去》等无声片，并积极致力于电影事业的革新工作。他曾赴美买回第一部有声电影机，为我国首次引进了好莱坞有声电影

技术，并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剧本《歌女红牡丹》。

1929年，洪深结识了夏衍，同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思想开始靠拢共产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脱离革命，而洪深则在党的影响下从事进步的戏剧和电影活动。是年，美国梅华影片《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演，洪深看后，非常气愤，决心制止这部影片演出。他与田汉商议后，找好了辩护律师，带领三名南国社的社员到了大光明影院。他在那里上台演讲，激发了观众的民族义愤，观众纷纷退票，剧场秩序大乱。大光明洋经理高水清扭住洪深进行殴辱，他毫不屈服。后来，在上海舆论界的一致支持下，法院不得不开庭公审高水清。“洪深大闹大光明戏院”的新闻，一时传遍上海。他这种无畏的爱国行动，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3月，洪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任英文秘书，从事进步文艺运动。4月，洪深和马彦祥合译和改编德国雷马克著名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由艺术剧社在上海租界公演，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当局的刁难和镇压。4月29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百余名武装警察包围了艺术剧社，捕去社员多人，其中4人惨遭杀害。

同年8月1日，洪深与田汉、郑君里等发起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改组为“左翼剧作者联盟”），洪任总书记。

1931年，洪深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33年，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反帝大同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洪

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洪深到青岛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在这里写了十几个宣传抗日的优秀独幕剧，如《走私》、《女奴》、《劫后桃花》、《黑旋风》等，对宣传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洪深因不断作抗日宣传，引起了青岛日本人的注意，不得已仍回上海，与夏衍等合办《光明》半月刊，洪任发行人及主编。这时期，他写了许多有关戏剧的论文，后收入《洪深戏剧论文集》，他又写成《电影戏剧表演术》、《现代戏剧导演》、《电影术语词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等著作。

1935年，田汉等在南京成立“中国舞台协会”，洪深应邀从上海专程到南京导演了《械斗》（田汉、马彦祥合编）、《卢沟桥》（田汉编剧）两出戏。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洪深参加了《保卫卢沟桥》活报剧的创作。剧本歌颂了英勇抗战的士兵和人民，洋溢着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战斗激情，8月7日在上海正式演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不久，“上海文化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夏衍等人提议成立上海救亡演剧队，洪深积极响应，立即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参加“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队员有冼星海等十余人。他们从南京到徐州，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徐州的西乡与北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五个剧，用以激发观众的抗日热情。一周后，洪深率队赴开封、洛阳演出，观众越数万人。后经郑州抵汉口，一路上，没有活动经费，衣食住行全靠自理。11月12日，《飞将军》（洪深编剧）与《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在汉口上演，《飞将军》批判了对抗战胜利信心不足的失败主义情绪，在

国民党空军中引起了轰动，不少空军飞行员观剧后紧握洪深的手说：“洪导演，你注意看报吧！要是有这么一条消息：‘空军中尉×××击落日寇飞机一架……’，那就是你们这出戏给我的力量。”①

由于国共合作抗日，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洪深被任为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方面的宣传工作。当时洪深正在湖北随县一带农村演出，得讯后便奔赴武汉就职。

洪深在武汉与田汉一起，将各地“救亡演剧队”召回武汉，正式列入第三厅编制，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分配到十个战区的前线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在部队和民间进行演出，唤醒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激励了无数战士的抗日斗争情绪，也为后方戏剧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戏剧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第三厅撤退至长沙。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震动，周恩来指示洪深负责安排第三厅工作人员的撤退工作。11月13日凌晨，长沙大火，周恩来派洪深为善后委员会总指挥，负责灾民救济金的发放工作。洪深指挥队员们掩埋尸体，抚慰灾民，安插伤员，恢复交通，发放灾款，历时三昼夜，办得井井有条，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并受到周恩来的赞许。

1939年12月，洪深随第三厅经衡阳、桂林疏散至重庆。1942年寒假，赴桂林“新中国剧社”导演抗日话剧《再会吧！香港》（夏衍、田汉、洪深合编），遭到桂林反动当局的强行禁演。

1943年洪深担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为该社编导

了《鸡鸣早看天》，并导演了《黄花岗》（集体创作）。是年底至1946年，洪深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兼任军委会政治部文化研究班戏剧系教官，创办了教导团，自任团长，到各地巡回演出四川方言戏《包得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文化战线上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于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在重庆有计划的组织了大规模雾季公演高潮，洪深积极参与，他先后导演了《法西斯细菌》（夏衍编剧）、《祖国在召唤》、《春寒》、《草莽英雄》（阳翰笙编剧）、《黄金时代》（田汉编剧）、《黄白丹青》（洪深编剧）等剧。

1946年3月2日，重庆复旦大学《谷风》壁报主持人因刊登学生游行文章，横遭反动学生围攻殴打，洪深仗义前往劝阻，亦遭殴击。不久洪深住所四周出现武装宪警，对洪作精神上的迫害，几及一月，洪乃忿然辞职。全校职工激起公愤，五十余名教授集会，声言罢教；学生会也紧急集会，决议罢课，这才迫使校方同意留任洪深。同年8月，洪深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1947年5月6日，洪深积极参加上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并组织复旦教授罢教，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旋被释放。复旦当局趁机将他解聘。洪深被解聘后，生活较困难，他心爱的三岁小儿子不幸此时得了脑膜炎，因无钱医治而死亡。不久，洪深至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

1948年12月，洪深离厦门经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到北平，受到周恩来的接见。3月，洪深代表我国参加世界第一届和平代表大会。6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9月，出席全国政协代表大会。这年，洪深

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兼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

1953年，洪深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4年，洪深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是年冬，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先后签订了中德、中匈、中波《文化合作协定 1955 年执行计划》。

1955年2月，洪深患肺癌。临危，周恩来总理曾亲到医院探望。8月29日，洪深在北京病逝。其平生著作汇集为《洪深文集》（共四册）、《洪深选集》。

注：

- ①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三辑第18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4月版。

主要参考资料：

《洪深文集》（四）。

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关于演剧队的一些事实》（《人民戏剧》1978年第三期）。

沙新：《中国话剧史纲》。

《中国话剧运动史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张 国 淦

丁贤俊 杜春和

张国淦字乾若，一字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1876年7月7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六日）生。其父张学诚曾在湘军某营充文书，后被保举为县主簿，长期在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张国淦幼年随父侨居安徽，曾游学豫、燕。1902年中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后因母病返芜湖，一度在赭山学校任教习，并向上海《沪报》投稿，论述东北政务、边防。1906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后改名“宪政编查馆”），张的老师宝熙主持馆务，招张入馆任馆员。这时，他所写的关于辽、吉二省政务的文章，已在《沪报》刊出。论述黑龙江兴革的稿子，则改用“上书”方式径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得到程的赞赏。后由程专摺奏调，入程幕府。这是张国淦走上宦途的重要机缘。

1907年张国淦出关，在黑龙江历任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1910年经奏保以道员留该省补用。次年2月，又得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充交涉局总办。6月，调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授命袁世凯组阁。12月，南北议和，袁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命张国淦以“参议”身分，随唐赴沪，参与和议。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张

得袁器重，曾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1913—1916年间，袁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张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政治会议副议长、国务院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政事堂右丞、教育总长等职。这期间，张国淦因同乡关系与副总统黎元洪结为好友，深受信任，成为黎的得力谋士；同时也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官僚徐世昌等关系密切。张周旋于袁、黎、段、徐之间，左右逢源。1913年后，袁迫黎进京，他们之间嫌隙加剧。袁特任张国淦充总统府秘书长，以调和双方关系。袁称帝前后，与段的权力之争日益表面化，张国淦在袁、段间折衷调解。张的这些活动，对于弥合军阀、官僚间的矛盾起了息事宁人的作用。博得各方的倚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张国淦倍受重用，先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要职。当时，黎、段争权，形同水火。有人劝黎联冯（国璋）排段，张国淦力主调和。他以和事佬身分，奔走于府、院之间，劝说双方顾全“大局”，以便共同对付南方。后来，黎、段矛盾激化，黎元洪免除段的总理职务，政争陷入僵局。黎召张勋入京调停，张悍然拥废帝宣统复辟，黎元洪束手无策。张国淦向黎献计说：“为今之计，唯有通电南京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起用段祺瑞，责其出师讨伐。”“段之成功，即总统之成功。不然，使民国中断者为总统，恢复民国者为段，总统将何以自处？”^①段起初拟不受黎的委任，张国淦又向段疏通，请他接受任命。张国淦就是这样既为黎保全了所谓“总统名节”，又为冯、段取得政权提供了合法根据。

1917年秋，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恢复国务总理职务。张国淦也续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来，段妄图实行武力统一南北的政策，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向日本乞求“西原借款”，借以扩充军备。段曾飭令农商部出面，以中日合办浦口铁厂为幌子，出卖主权，换取日本贷款。张国淦拒绝签字。从此，失去段的信任。

1918—1924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任总统，内阁人事多变，张国淦却能始终连任要职，先后担任过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署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职。

1926—1927年间，直、奉军阀操纵下的所谓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时期，由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相继组阁。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内阁相标榜，再出摄政^②，张原系司法总长，遂继任该职。杜内阁时期，张改署内务总长。顾维钧组阁，张留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举行北伐，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至此，张国淦也结束了他的官僚政治生涯。去职后，他移居天津，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从事史地调查研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津迁沪。据他自称：“抗战期内，（湖北）伪省政府杨揆一屡以恢复武汉大学引诱鄙人回鄂主持，并以鄂中多数人士名义馈致多金，（余）严词拒绝，迄不为动。”^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曾聘张任“湖北省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④张辞谢任命，退还寄款法币三百万元，只表示“可以襄助”选编书籍。抗战前后，曾以卖书、撰稿维持生活，虽处

境窘困,但他没有阿附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据他1940年间致翁文灏信中说:“自顾十余年来,每日十二时,精力只销磨于故纸堆中。”^⑤

张国淦“晚岁专事著述”^⑥,著有《历代石经考》、《附汉石经碑图》(燕京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常熟瞿氏观书记》、《中国书装源流》(岭南大学学报印行)、《俄罗斯东渐史略》(丰润张氏印本)。此外,还有《中国方志考》、《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湖北书征》、《湖北文征》、《湖北献征》、《潜园文集·诗集》等著述,多未刊行。

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国淦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他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53年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曾就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经历写过一些回忆录和专题稿件,先后在《近代史资料》刊载的有:《对德奥参战》(署名许田,1954年第2期)、《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1955年第4期)、《近代史片断的记录》(1978年第2期)、《中华民国内阁篇》(1979年第3期)等篇。1954年张任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次年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专著《辛亥革命史料》于1958年3月刊行。1959年1月25日张国淦在北京病逝。他的遗稿《中国古方志考》于1962年在上海出版。

注:

①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 ②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商务1948年1月版第877页。
- ③ 张国淦：《致邓碧九（翔海）书》，
- ④ 张国淦：与万武樵（耀煌）的往来书信。
- ⑤ 张国淦：《致翁咏霓（文瀾）书》，
- ⑥ 张国淦：《谕瑞（儿），璵（媳）书》。

虚 云

王学庄

虚云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大和尚，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重兴名刹著称。

他原籍湖南湘乡，1871年9月14日（清同治十年七月三十日）^①生于福建泉州。其父肖玉堂曾任泉州知府，卸任后流寓该地。虚云是个独生子，兼桃两房，备受溺爱，很早就娶了两个妻子。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②，他突然离家，跑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次年，被其父侦知，勒令归家。过了一年，他又逃回寺中，从此脱离了家庭。他刚出家时，法名古巖，字德清，后来才改叫虚云，别署幻游。

虚云在鼓山修头陀苦行，静坐念佛三年余，然后离寺云游。他先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的名山大寺参禅听经，在江宁会见过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1897年，他返居扬州高旻寺。1898年，到镇江焦山寺听经，随后往安徽铜官山结茅安居。不久，他启程北上参禅，计划经泰山赴五台，然后再折往终南山。1900年抵北京，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往五台通路被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虚云随清朝帝后的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不少王公大臣。抵西安后，他往终南山结茅，改名虚云。

1902年，虚云离终南山前往四川峨眉山，并去西藏。因

见西藏教规不同，折至云南鸡足山。鸡足山历史上是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破烂子孙庙十余处。各庙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1903年，大理提督张松林邀请虚云往大理崇圣寺讲经。虚云不愿留居城内，张便教宾川知县在鸡足山钵盂峰找了一座破院供他安身。从此，虚云就在各式各样的反动统治者直接庇护下进行宗教活动。他将这座破院改成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院，至次年春，来求戒者达七百人之多。1904年，虚云出国前往暹罗、南洋讲经募款，并往台湾、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时，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因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其设法挽救。虚云回到上海，便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1906年，他得当年结识的权贵们的支持，获得一通上谕，“着各该督抚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③。虚云还在京活动为云南寺院请龙藏（清朝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清廷于同年夏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虚云赐号“佛慈洪法大师”，颁赐龙藏及各种佛教用具。清廷的青睐，使虚云陡然身价百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贪酷的宾川知县张某被起义民众围攻，虚云玩弄阴谋，将张救出。次年，民国建立，清室退位，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预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道：“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驳，终于折服了李根源。同年，他赴沪与寄禅等协商，将寄禅等倡设的中国

佛教会，重订章则，改为中国佛教总会。因政府的更迭，他在南京见过孙中山后，又赶赴北京去见袁世凯。回滇后，组织滇黔两省佛教总会滇藏支部。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

1920年春，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邀请，往昆明主持水陆道场，唐全家皈依佛教。这种水陆道场，在八年问启建了九次。他还应唐邀请，重兴昆明西山云栖寺，大兴土木。虚云按照古碑记载的庙产数字，由唐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四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为此，他在财产到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政府闽籍官僚林森、杨树庄、方声涛等和福州涌泉寺僧众，邀请虚云赴闽任该寺住持。虚云崇奉唐代高僧怀海的《百丈清规》，在所住持的寺院内，均按此建立僧团制度。他到鼓山后，竭力革除旧有陋规，实行十方丛林制，这种做法虽遭受该寺上层僧众的抵抗，但吸引了四方大批僧众。1931年，在涌泉寺设立佛学院，以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训练年青的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省官僚便成了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大批宋明以来经版，虚云聘请观本和尚前往整理，编成《鼓山经藏目录记》。1933年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要求抗日。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时常到鼓山听禅或躲避空袭，虚云亦与李结为友好。

1934年夏，国民党广东西北区绥靖专员李汉魂派人邀请虚云去曲江住持南华寺。南华寺最初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成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子孙庙。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

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货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权势、资财扩张佛教势力。李应允后，他立即扶病到粤北观察情况，当面向李索取“数十万金”。1935年秋，虚云正式由鼓山到南华寺主持重建。他用警察驱逐了住在庙内的贫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大小殿堂楼阁，在十余年内，共建成房屋三百余间，装塑佛像七百多尊，能容一二百僧众常住。由于工匠们辛勤劳作，精心制造，改建后的南华寺颇为壮观，重新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佛教胜地。此外，虚云还按照旧日该寺以周围四天王岭为界的记载，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农无家可归。其徒众荷枪向佃户收租，租谷由1935年的二十担激增至1939年的数百担。李汉魂也在寺边修建了洋房别墅。

南华寺自虚云来到后，达官贵人不绝于道。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及港澳的大批显要富豪前往观礼。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至日本军队占领韶关，仍未停止。1942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派屈映光等赴粤迎接虚云前往主持。虚云乘车经湘桂黔抵渝，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美国民党反动统治，说什么：“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⑤。虚云离渝前，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由林森等作陪。

1943年，虚云移居广东乳源云门寺，以本焕为南华寺住持，继续控制着该寺实权。本焕在山西五台山当和尚时，充当汉奸，遗有血债，住持该寺后，成为地方一霸。

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到广州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当时，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请求保释铁禅，并想乘机谋充该寺住持，但终因佛教内部的派系矛盾，受到当地部分僧众反对，未能成功。

1947年夏，宗教界一些人根据太虚（中华佛教会主持）生前的提议，在上海组成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虚云被推为该盟中央监察委员。同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振颓风”^⑥，表彰虚云等用佛教麻醉人民的功绩。

1948年冬，虚云收美国女子詹宁士为归依徒，法名宽宏。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严遵中央制定的宗教政策，予虚云以礼待。

虚云对在云门、南华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1952年，南华寺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虚云曾为之叫屈。同年，虚云应邀离粤赴上海参加和平法会，他的爱国表现受到了欢迎。冬，应邀赴北京参加发起中国佛教会会议。1953年夏，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了中国佛教会成立会，虚云被推为名誉会长之一。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给了虚云摆脱同华南残余旧势力瓜葛、从事正常宗教活动的便利条件。虚云旧友李济深劝他留在北方，但是他不愿意。同年，他应邀前往江西永修真如寺当住持，主持复兴古刹。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化不良症在真如寺去世。

注:

- ① 虚云事,因其自己和僧俗徒众的吹嘘、编造,充满荒诞不经的神话。仅其生年,就有多钟说法,虚云即曾自称生于1840、1846、1852年。较近情理的说法有两种。陈铭枢在1929年写的《云南西山靖国云栖禅寺募捐肩》称虚云时年六十六,据此则应生于1864年;五十年代,广东省韶关市有关部门在湘乡等地调查,虚云的舅父称虚云生于同治十年,即1871年。陈铭枢的《募捐肩》是在晤见虚云时应其请而作的,其说法仍出自虚云本人。因为虚云屡易其说,无法信任,此传暂采后一说。
- ② 虚云出家,一般记载均作十八岁,但因其生年说法不同,无从确定年代,比据前述调查结果。
- ③ 鼓山侍者:《虚云禅师事略》。
- ④ 虚云:《重兴曹溪六祖道场记》。
- ⑤ 虚云:《在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上堂开示》。
- ⑥ 《勅建曹溪宝林山南华寺同戒录(丁亥)》。

齐白石

奚 纯

我国著名的艺术家——画家、诗人、篆刻家齐白石，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滨生，号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贫穷农民家里。全家靠种田织布为生。齐白石六、七岁时，他的祖父用柴灰教他认字。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将辛苦积蓄下来的一点零钱，买些纸笔，送他到外祖父周雨若处读书，但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未满一年就停学了。回家后帮助父亲放牛、砍柴、耘田，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

齐白石从幼年就非常喜爱写字画画，但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纸，他拆下旧帐本上的纸来画画写字。他也很爱读书，劳动之余，总是抓紧时间读书，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本《千字文》背得烂熟。这样的童年生活，使他在学习上养成了一种坚毅不拔的性格。

1877年齐白石十三岁的时候，跟他一个叔祖父学木工，开始学的是粗木作；次年又跟村里的一个木匠学雕花木作。这种雕花木作，使从小就热爱画画的齐白石，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借鉴于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插图的艺术成就，使所雕的木器上的图案，不论是人物还是花卉，都显得层次分明，形神兼备。他创作出很多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雕刻作品，为当

地群众所喜爱。

自1877至1888年，齐白石做了十一年的雕花木匠，同时也练了十一年的绘画。这为他后来走上绘画和篆刻的创作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齐白石真正开始他的艺术生涯，走上专业绘画和篆刻创作的道路，是1889年他二十五岁的那年。那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他在农村为一家新娘子雕一张嫁床的时候，经主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位颇有才学的塾师胡沁园，通过胡沁园，又认识了另一个塾师陈少蕃。这两位热心的教育家，是齐白石走上艺术创作道路极其关键的人物。当他们发现了齐白石的才智后，就把培养齐白石作为一件十分慎重的大事来做，陈少蕃教他读书，胡沁园教他学画。他们还为齐白石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齐白石介绍了很多学识广博的学友。在他们的诱导和启发下，勤奋好学的齐白石，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能力。

从1890年到1901年，齐白石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创作了不少富有诗情画意的诗配画创作，如《琴书至乐图》、《浮想望岳图》等，都受到过师友们的夸赞。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和师友们组织了“龙山诗社”和“罗山诗社”，多次参加作诗、诵诗集会的活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创作生活，是齐白石由雕花木匠成为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的转折，是他的艺术生涯发生质的变化的开始。

齐白石最善于吸收前人和今人的长处。他不但努力向前辈名画家和民间画家的作品学习，还能虚心地向他朝夕相处的师友们学习。当时，他向胡沁园学习画工致的花鸟草虫，向

萧梦陔学习画人物肖象，向谭溥学习画山水。他不但注意临摹，而且十分注意对实际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经常看鸟兽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描写它们的动态。这一切，为他后来艺术上独创门户准备了成熟的条件。就这样，齐白石在劳动生活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自己艺术生活的道路。当时他的生活条件十分清寒，学习条件也十分刻苦，在没有油灯的夜晚，就燃起松枝来读书，为了练习篆刻，买不起印章，他总是把一枚印章刻了又磨掉，磨掉了又刻。

齐白石在1902年到1909年的七、八年间，曾“五出五归”，游历了南北各地，足迹遍及北京、西安、桂林、梧州、广州、钦州、香港、上海、苏州、南京等六七个省市的主要城市，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身行万里半天下”^①，使他结识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朋友，鉴赏了好多秘籍、名画、书法、碑拓，大大开阔了他的胸怀，扩大了他的眼界。

1909年暮秋，他暂时结束了游历生活，回到故乡，在风景明媚的茆家冲居住下来。这就是他的书画篆刻中每每提到的“寄萍堂”所在地。他在这里一住十年。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仅这一时期的速写或工笔画的毛边纸画稿，数以千计。每纸画稿都不出一张信纸那么大，有的画几只虫，有的画几只鸟，有的是打乱了的花瓣，有的是折下来的树叶，但都凝结着画家的心血。通过这十年的刻苦冶炼，基本形成了他那种明快而自然的独特画风。

1919年齐白石五十五岁以后，才在北京定居下来，以篆刻和作画为生。这时齐白石的艺术造诣已经成熟，很有名气了，但他并不自满。他不断地从当时名画家吴昌硕、陈师曾、

黄宾虹等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他总是长夜鏖印，晨起临池，经过千锤百炼，使他不论在篆刻、诗词、书法、绘画上都达到更高的境界。到抗日战争前的十多年中，他创作出一万幅以上的画，和三千方以上的篆刻印章。他的每件作品，都为艺术界人士所重视。

1927年齐白石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专专科学校聘为教授。他在教学中，奖掖后进，培育新生，后来成名的画家于非闇、王雪涛、李苦禅等，都是他的学生。“三千门客赵吴无”的一方篆刻^②，正是表达了他当时对自己培养一代青年画家的高兴和自豪的心情。

抗战开始时，齐白石已七十多岁了。他身处陷落后的北平城内，精神极其痛苦。他本来十分好客的，从此，他紧闭大门，减少交往，辞却了北平艺术学校教授的职务，公开告白不见客，不赴宴，不照相。为了不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有可乘之机，他贴出告白，声言“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③，这种具有反抗性的告白，充分表现了这位艺术老人的民族气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曾没收过他的存款，搅扰他的画室，但他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压倒。他借画幅抒发与寄托他胸中的苦闷与义愤。1944年他在《群鼠图》上题句说：“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炮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④又在水墨螃蟹的画上题诗说：“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⑤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的那一天，历尽旧社会无限沧桑、八十五岁高龄的齐白石跑到大街上，挤在欢呼的人群中，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一队队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愉快地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又被延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并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画研究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1952年他为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创作了大幅的百花与和平鸽的图画,赢得了国际和平战士的声誉。

1953年齐白石九十岁(虚岁)生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为他隆重举行庆祝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的荣誉奖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状。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又决定齐白石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

“一天不画画心慌,五天不刻印手痒”,解放后,齐白石的创作多得惊人,仅1953年一年的绘画作品,大小就有六百多幅。所作的《荔枝鸽子》、《和平鸽》、《牡丹》等作品,充满着老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幸福生活的歌颂。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在北京病逝。党和政府以及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整理了他的诗词、篆刻、书法和绘画,出版了《齐白石作品集》。

注:

- ① 齐白石篆刻,见龙龚,《齐白石传略》第36页,1959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 ② 同上,第56页。
- ③ 见龙龚《齐白石传略》附图版手迹影印。
- ④ 见《白石老人自传》第100页,1962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 ⑤ 同上。

阮 玲 玉

查建瑜

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女演员阮玲玉，原名凤根，学名玉英，艺名玲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10年4月26日（清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浦东亚细亚煤油公司机器部的工人，在玲玉五岁时，因贫病交迫死去。母亲在电影公司老板家做佣人，玲玉随母充当小婢女。

阮玲玉从小天资灵敏，富于表情，爱看戏，喜欢摹仿剧中人的动作。稍长，要求读书，她母亲多方设法，1917年把她送入一家私塾，1918年转入崇德学校。1925年曾在崇德登台演剧，初次显示了她的表演才能。就在这时，她的母亲因病被解雇，她被迫辍学。

1926年阮玲玉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第一次参加拍摄的影片是《挂名的夫妻》，她扮演一个没有过门就守活寡的少女，很成功。接着在《北京杨贵妃》、《血泪碑》中充任要角。1928年转入大中华影片公司，主演《劫后孤鸿》等六部影片。她塑造的人物都很逼真，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从此在影坛崭露头角。1929年冬她转入联华影片公司。1930年主演《故都春梦》。后来相继主演《野草闲花》（1930年）、《恋爱与义务》（1931年）、《三个摩登女性》（1932年）、《城市之夜》（1932年）、《新女性》（1935年）等片。在《野草闲花》中，阮玲玉饰演

一个倔强的卖花女,把一个贫穷的卖花姑娘表现得很有性格,获得观众的一致称誉,成为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三个摩登女性》和《新女性》是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中出现的比较进步的影片,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社会影响比较广泛。影片中的反帝场面和罢工作场面曾被电影检查机构强令剪去。《新女性》一片中,揭露了一些黄色报刊助纣为虐的卑鄙行径,曾引起当时反动的“上海记者公会”的所谓“抗议”。他们向联华影片公司施加压力,提出剪去影片中的某些片断、登报向全国新闻界公开道歉等无理要求。阮玲玉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刻苦努力,对《新女性》中受迫害人物的性格和发展过程,塑造得很深刻,她的艺术才华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时的电影是无声片,创作方法也很简单。一部影片开拍前,导演只交待剧情梗概,全靠演员的表情和动作表达人物的性格和语言。阮玲玉一经导演说明,便能准确地掌握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自然流露;而且不论反派正派,少女或老妇,只需服装一换,她便表情毕肖,往往超出导演的预期效果。^①从1926年到1935年,阮玲玉共拍摄二十九部影片。她以认真的态度,丰富的感情,加上她的表演艺术,塑造出许多不同类型和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被誉为最有希望的天才艺人。

1925年阮玲玉还在上学时,被她母亲所服役那家主人的弟弟张达民引诱,1926年与他同居。张不务正业,挥霍好赌。阮玲玉进入影坛后,他把她当作摇钱树,索取无厌;阮玲玉在影坛出名后,交际渐广,他对她十分嫉妒。彼此意见日多,经

常发生口角，阮忍无可忍，曾与张分居三次，并曾服毒自杀，幸抢救及时未死。后经亲友调解，两人仍住在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们同赴香港。4月，阮返沪拍《续故都春梦》，张留香港。这时，茶界富商唐季珊经常找阮玲玉，乘机大献殷勤，骗取了阮的爱情，与他同居。1933年4月张达民返沪，阮玲玉委律师和张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订立离异契约，阮每月给张一百元，两年为期。两人正式脱离了同居关系。

1935年2月，两年快到期时，张达民见无利可再图，就借口说阮玲玉背夫和唐季珊私姘，合谋侵占他的财产，投诉于上海地方法院。经人出面调停，张索款万元，阮同意六千，张坚持不减，调停中断。

讼案在上海传开后，新闻界有些人因阮玲玉主演《新女性》，早已怀恨在心，他们抓住阮的讼案，乘机在报纸上大加张扬，着力渲染，对阮进行人身攻讦。阮精神大受刺激，十分悲愤，曾对她母亲说：……一个孱弱女人始终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工作，不是受丈夫的束缚，就是受社会上的诽谤攻击。而眼前讼案又导致我誉丧名裂。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她还说她有时想起《新女性》影片中的那个韦明受迫害而服毒自杀的情景，不寒而栗！她这些话曾引起她母亲的警惕，也曾注意防范，但终于没有防范得住。3月7日夜里，阮玲玉服了过量的安眠药，经抢救无效，第二日下午6时38分逝世，年仅25岁。

阮玲玉自杀前写了两封遗书：一给报社，一给唐季珊。她给报社的遗书中说：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

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②。

阮玲玉的遗体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的人络绎不绝。3月14日下午出殡时，灵车所经之处，踟立路旁为她默哀的人达十万之多，不少人为她的冤死流泪，灵柩落葬于上海广肇山庄。阮玲玉的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映，艺术界为她的卓绝才华惋惜，舆论愤愤不平，大多数人认为新闻界无休止的张扬和攻讦是迫使阮玲玉自杀的主要原因，新闻界也有人出面抵赖；也有人认为是有缺陷的法律制度迫害阮玲玉致死。不少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5月5日，鲁迅发表了一篇《论人言可畏》的文章，斥责了当时新闻界欺凌弱者的可恶嘴脸。文章中说：

“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她被额外地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③

注：

① 蔡楚生：《追忆阮玲玉》。

② 《良友画刊》1935年3月号。

③ 上海《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五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署名赵令仪，
现辑入《鲁迅全集》第6册261页。

* 附记：写作中曾参考陈协星：《阮玲玉》一文。

薛 觉 先

张 洁

薛觉先，原名作梅，别号平海，觉先是他投身舞台后的艺名。广东省顺德县龙江人。1903年4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出生于香港。父亲薛恩甫是个秀才，早年曾充幕僚，后退居香港设堂讲学。

薛觉先的母亲喜爱粤剧，他从小经常跟母亲看戏，看后就咿哑学唱。还常常偷偷出门，站在戏院门边或爬上戏院窗口看戏。戏院的人逐渐熟识了这个“小戏迷”，遂不收门票放他进去。他对粤剧的兴趣，也就与日俱增。他十岁左右的时候，香港青年会的“青年话剧团”吸收他参加话剧演出，担任主要童角，是他最初尝试舞台生活。

薛觉先自幼随父读书，很勤奋。稍长入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计无着落，只得退学谋生。初随人沿街卖药，后又受雇于九龙英商经营的绍昌皮厂，寄人篱下，备受折磨。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薛觉先十六岁，受到爱国热潮的影响，用“傲岸少年”的笔名，向香港报刊投稿，宣传反日救国。他参加了广州、香港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讲演，遭到了香港英国当局拘捕，数日后获释。这时，他认识到爱国教育的重要，更感到失学的痛苦，就和几个青年朋

友在香港开设了一所“平民进化学校”，以帮助失学青年，自任教师，讲授国语。

1921年薛觉先十八岁的时候，通过姐夫新少华（粤剧演员）的关系，进入香港“环球乐”粤剧团学艺，很有收获。后跟随著名演员朱次伯上台跑龙套。当年，“环球乐”每次演出之前，照例必先演一出“文明新戏”。自此，演新戏的任务，多半落到薛的身上，而且多是由他自编自演的。于是，薛觉先的名字很快为观众所熟悉了。后来，朱次伯在广州被刺身死，“环球乐”解体，薛被香港“人寿年”剧团聘为丑生，并被该团名演员千里驹收为徒弟。薛在唱腔、动作上模仿朱次伯，维妙维肖，使人看了不禁有朱次伯再生之感。不久，香港“梨园乐”剧团班主靚少华以重金聘他为正印丑生。他在该剧团日演丑生，夜演小生，大得观众好评。一时，誉满粤东和港澳。

那时，一个成名的艺人，往往受到“黑社会”分子的敲诈勒索，敲诈不遂，会遭到绑架、暗杀。朱次伯就是这样被暗害的。1925年，薛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安全计，他避往上海，化名章非。不久，组织了一家“非非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导演，与粤籍女演员唐雪卿合作，分任男女主角，拍成无声片《浪蝶》。薛在沪除从事银幕生活外，用很多时间观摩地方剧种，感到京剧的表演，确乎精湛细腻，大有可学习的地方。他以票友的身份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艺人，吸收了不少京剧的表演艺术，对京剧的锣鼓、武工以及身段等，也有了深刻的领会，开始认识到粤剧有不少地方必须大加改革。曾说：“今日的戏剧艺术，应该跟着时代同行并进，那才不至落伍而至泯灭。”①

1927年，薛觉先回到广州、香港，重新登台。适值广州

“大罗天”剧团改组，他被原班主敦请加入，将“大罗天”改名“觉先声”剧团，由他出任班主，从此，不再受雇于人了。这为他日后革新粤剧提供了方便。

薛主持“觉先声”剧团后，作大胆革新的尝试。首先破除了干扰演出的各种剧场恶习。如场内小贩叫卖，台上“饮场”、更换坐垫等。各种进出台上的闲杂人员，概予禁止。随后，在灯光布景上、化装上、服装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演唱方面，他试增加了些江浙剧的曲调，也吸取了一些京剧的唱腔，特别运用了京剧武场的技艺，开创了粤剧“北派”的场风。此外，在乐器上，他采用了小提琴和一些中低音乐器伴奏，吸收了京剧的锣鼓，使粤剧在音响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薛觉先的这些大胆改革和创新，使粤剧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面貌。于是粤剧界竞相仿效，一些年轻演员，更是亦步亦趋，以学“薛派”、“薛腔”为荣。但这些改革也难免有些生搬硬套，损伤了粤剧优美传统的地方。后来薛觉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既融化了京剧的长处，又保持了粤剧的固有风格，从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薛觉先主持“觉先声”剧团时，是他的全盛时期，经常一身而扮各种角色，所谓声、色、艺皆有独到之处，因被称为“粤剧伶王”，享有“万能”的声誉。当时英国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曾聘他为该会会员。

薛觉先在带徒传艺上，善于启发、诱导，他肯将自己的技艺和经验全部传授给徒弟，毫无保留，同时要求徒弟有所发展。由于他重视奖掖后进，经他手培养出不少的粤剧名演员，成为“薛腔”、“薛派”的发扬人和继承者。他还废除了旧剧界

的所谓“师约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徒弟向师傅递交“卖身契”，终身受束缚和剥削。由于废除了这种制度，跟薛学艺的人，都心情舒畅，对他十分爱戴。

1934年，为重度银幕生活，薛觉先带着全家迁居上海。他组织了一家“南方影片公司”，与“天一影片公司”合作，拍了一部粤语有声影片《白金龙》。这部影片是滑向庸俗和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伶人”，他还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戏剧商业化的趋势。

薛觉先在上海时，各种筹款“义演”很多，他对各方要求从不推辞。有一次，有个租界捕房华籍侦探借薛强令他“义演”筹款，实为向他敲诈，他未及时承诺，竟被那些分子撒石灰伤了眼睛，就医八个多月，双目才逐渐复明。

1936年初，薛觉先离沪回港。当时，广州、香港、澳门一带的粤剧团已出现男女合班。薛也组成男女合班，重登舞台。不久，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邀他到新加坡演出，他组织了一个旅行剧团，于8月到新加坡演出，随后在南洋一带巡回演出三个多月，场场满座，十分轰动。年底回港，除继续演出外，还与人合资经营“南粤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编导。由于缺乏电影演员，他曾设立“演员训练所”，培养电影人才。影片公司筹备就绪后，拟将《西厢记》拍成电影，正从事配景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因而搁置下来。

“七七”抗战后，薛觉先在港选演爱国戏剧多种，宣传抗日。他在《咬碎寒关月》一剧中，自撰一首爱国歌，词曰：“歼彼凶仇，歼彼凶仇，纵苦辛与艰险，勿更忍受；要坚心来图强，共同努力来争斗；人人同心，快快救。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

佑，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灭了日寇，快哉！我国锦绣河山，永保毓秀！”^②他还在港多次举行义演，将筹得之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日。

1941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薛未及走避，1942年春节时，被日本帝国主义威逼演出一个多月，而内心殊苦。5月初，薛佯称到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巡回演出，逃离香港。抵广州湾后，立即登报声明：因受日寇压迫，曾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回归祖国大陆。日本侵略军见报大怒，派便衣宪兵十余人潜入广州湾，将薛绑架，企图押解回港，幸赖有爱国船员帮助，化装成渔民，转入内地。随即带领“觉先声”剧团赴广西玉林、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等地演出，所余除伙食开支外，全部捐献，支援抗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薛和“觉先声”剧团回到香港，由于操劳过度，健康大不如前，不得不处于半休息状态。

解放以后，1954年春，薛觉先由港回穗，离港时对友人说：“我要将三十多年所学的带回去，献给国家和人民。”^③

薛回到广州后，深得政府和人民的信任，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广州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随着觉悟的提高，他对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有了些新的认识，虽已年老体衰，仍深入农村，为工农兵群众演出，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1956年10月31日，薛觉先在广州一次演出中，患脑溢血，虽勉强终场，但不幸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党政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及各界人民的隆重悼念。

注:

- ① 《觉先悼念集》，第 15 页。
- ② 1937 年 8 月 12 日香港《公平报》。
- ③ 《觉先悼念集》，第 70 页。

马 师 曾

张 洁

马师曾，著名粤剧演员，又名关始昌，凤华子，广东省顺德县龙潭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商人家庭。七岁时跟祖父、父、母避债到武昌，投靠他的曾叔祖马贞榆。那时，马贞榆是两湖书院的经学馆馆长。马师曾到武昌后，就在两湖书院跟曾叔祖攻读四书五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师曾一家又辗转逃回广州。马先入小学读书，十五岁那年，又考入敬业中学。他是一个喜玩好动的学生，特别爱好音乐、戏剧。每逢校庆演戏，他都积极参加；假日或课后，经常瞒着父母去看粤剧，暗地里摹仿一些演技。

1918年马师曾中学毕业后，父母把他送到香港一家收购店里当学徒，从早到晚不得休息，工作稍出毛病还要挨骂受罚，日子很不好过。三、四个月後，与店主闹翻，不辞而行。

马回到广州后，不敢回家，偷偷进了一间教戏馆学戏。可是学戏要钱，他没有钱。一天，有个南洋客来戏馆招徒到新加坡做戏，马想到有个姓陶的同学在那里，极愿应招。教戏馆师傅觉得马无油水可捞，就代他订了卖身契，以三十元代价，将马转卖给南洋客。

马到新加坡后，被交给“庆维新”粤剧团，仅学了几次台

步，团主就要他登台扮演《六国封相》的一名马旦，马只好硬着头皮登场。后来，剧团的人知道他是读书人，很敬重他，并劝他不要做戏，还是转入学界好。有个演员，人们称为“小生全”的，对马的遭遇格外同情，劝他找那个姓陶的同学另谋出路。不久，马果然打听到陶在新加坡一间小学当校长，“小生全”出钱为他赎回了卖身契，他入小学当了教员。但两个月后，小学因故停办，马又失业了。这时，山区小市镇文冬埠的“尧天采”剧团到新加坡招聘一名第三小生，“小生全”就将马介绍进去。马只演过两次马旦，台步、曲调均不熟练，幸得“小生全”的指点，几天内学会了小生戏的基本唱调、台步和动作。同时又得“小生全”购赠了一些小生戏服，便改名为风华子，与“尧天采”剧团签了合同。

马到“尧天采”剧团不久，“庆维新”剧团的大旗手“盲公贤”到文冬埠招聘演员，看见马写的海报潇洒而苍劲，颇有好感，便邀马仍回“庆维新”剧团。马考虑“庆维新”多舞台老手。便于学戏，乃欣然接受，即随剧团往金宝埠演出。

一天晚上，该剧团上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开演前，正印小生和第二小生都病倒，班主临时指派马来顶替。当时，主角和有些演员多表示反对，马却满口答应了。上台后，马的唱词、对白、台步、动作都有条不紊，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马自恃聪明和有“盲公贤”的赏识，有些趾高气扬，从而招惹了其他同行的反感和妒忌。后来“盲公贤”因事返广州，马就被排挤出剧团而失业了。

马离开金宝埠，到大辟历、吉隆坡、坝罗各地流浪，曾卖过膏药，挖过矿，拉过黄包车，还替殡仪馆看守死尸，用这种种办

法来维持生活，仍不能得到温饱。在生活的压力下，愤而跳海自杀，幸被渔民救起，得以不死。

不久，“平天采”剧团来坝罗演出。马前往谋职，该团第三小生恰好离班，班主便让马顶替，讲明暂不订合同，不计待遇，有戏登台，无戏打杂。经过一段时间，戏班见马工作勤奋，演技超过原来的小生，便聘为正式演员。从此，马决心献身舞台，决不再改弦易辙。这是他一生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马在“平天采”初露头角是扮演《痴、嘲、废、蠢》一剧的丑角“烂赌二”。他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但又招惹了原有丑角的妒忌，要求停止马演出，幸得该团著名演员靚少凤挺身而出，为马说话，始得平息。

随后，靚少凤与马组织新班到端洛上演《白蛇传》。马被提升为第二小生，兼丑生。“五四”运动之后，时装新剧流行，马师曾和靚少凤一起演过一些新剧。

再稍后，粤剧著名小武靚元亨来南洋演出，马从小就崇拜他的技艺，即拜他为师。马从靚那里学到一套小武的硬功夫，进一步奠定了他的舞台艺术基础。靚元亨也很器重马的才艺，组“普长春”新班往新加坡演出，邀马参加，列马为台柱之一。当时南洋戏行有个规矩，每个台柱每周要轮流献演自己的首本戏。马入行不久，没有首本戏，便连夜赶工，编出自己的第一出戏《洗冤录》。但这出戏表现不出主角的份量，演出时嘘声四起，草草收场。

挫折激发了马勤学苦练的决心，他反复钻研了《江湖十八本》，对剧中每个情节、人物性格、历史背景、曲调乐谱、台词台步及各种传统演法，都细致领会琢磨，并经常到各大剧院向名

伶偷学。于是他的技艺日进，既吸收了别人的长处，又有自己的创新。为了竞争，各剧团都须不断更换剧本，马所编的剧本不但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且有的还带一些反封建的内容。由于马的演技常常别开生面，半年后，他的戏居然比师傅說元亨的戏还叫座，成了班中的红角。但是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马的声誉遭到师傅和其他同行的妒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压制马。马感到长期在此终难出头，便偷偷离开新加坡回到广州，进了名班“人寿年”，这时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前夕。

马初进“人寿年”，由于戏路不对，曾小受挫折，但不久即声誉鹊起。有一次，马扮演乞儿，他对如何创造乞儿的腔调，苦加思索。他想起夜阑人静时，经常听到卖柠檬的人沿街叫卖声，音色沙哑，令人怜悯。从这种叫卖声中他受到启发，想到乞儿受尽饥寒，声调自不宜高吭宏亮，只有这种沙哑凄厉的声音，才能表达在饥寒线上挣扎的情景。于是他用这种声调作基础，开创了粤剧唱腔的新声“马腔”。这种唱腔适宜于表现被侮辱被压迫的下层群众的疾苦，亦易于为人模仿习唱。后来人们称之为“乞儿喉”、“柠檬腔”或“豆沙喉”，曾饮誉粤剧艺坛达数十年，并一直流传至今。

马成名以后，自恃有了“资本”，由于人事纠葛与“人寿年”闹翻，另与人组成“大罗天”新班。可是“大罗天”开锣以后，并不叫座。马为与“人寿年”竞争起见，便努力赶编一些迎合观众庸俗趣味的新剧，多是花前月下、悲欢离合一类的东西，这时已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广州，国民党宪警特务与流氓恶霸朋

比为奸，绑架凶杀，日有所闻。当时粤剧名伶都纷纷私雇保镖，向宪警交“保护费”。马几次受到恐吓勒索，但他不买帐，也不雇保镖。一次，演完戏卸装出来，突然被炸伤。不久，广州起义失败，全市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马携带全家避居香港，参加由“大罗天”更名的“国锋”剧团的演出。其后，马在港又一次遇刺，幸免于难。从此，马即闭门读书，钻研戏曲，暂时不再登台。

1929年末，马师曾应邀组班，先后到西贡与南洋各州府演出，1930年底回香港。1931年4月又应邀赴美国演出，并到美国各地旅行。1933年4月离美回港。回港后，组成“太平”剧团，对粤剧的一些陈规俗套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吸取了某些南乐与北乐，采用了电影的灯光布景和导演排练的方法，废除了男扮花旦的成规，改用女性花旦。这些改革，对粤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师曾以舞台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他编演的抗日新戏有：《爱国是依夫》、《汉奸的结果》、《还我汉江山》等。为了上演这些爱国新剧，马被港英当局多次传讯警告，日本驻港领事也多次干涉，但他仍坚持演出，并不畏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马和全家逃到澳门。不久，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就地组成“抗战粤剧团”，率领全团人员和家属百余人前往广西境内，数年之间，由郁林而容县，由容县而柳州、桂林，再到梧州。各地演出，多为抗战宣传或义演献金。但义演所得，又多为国民党军警宪特所瓜分，而全团人员反不得温饱。此后，又从梧州折回粤西德庆、都城、肇庆等地演出，易名为“胜利粤剧团”。1944年

再应邀到桂林演出，但不久日军即迫近桂林，马只得率领全团再行流亡他处。马在大后方几年的演戏生活中，备受国民党军政官吏的压榨、欺凌，当日从香港出走时的豪情壮志，反被消磨，思想上陷入苦闷。

1945年8月，马正在广东罗定演出时，听到日军投降消息，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带领剧团回到广州与香港，继续登台演出。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马立即由香港到广州演出，并参加庆祝游行。抗美援朝开始时，马又到广州参加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向人民政府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但由于思想上的种种顾虑，到1955年10月，才下了到广州定居的决心。回到广州后，看到新中国各方面的进步与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激发了为祖国献身的积极性，这时他虽已年老体弱，仍到各地为工农兵群众演出。1956年和1960年先后拍摄了粤剧《搜书院》和《关汉卿》两部舞台艺术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1959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出国访问演出，其中一次回国途经昆明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马自回国后，除参加演出外，还主持广东省粤剧院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工作，对培养新一代演员，作过不少努力和贡献。

1962年马患气管癌，经治疗后病情基本上得到控制。1963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文艺晚会。

1964年4月21日马师曾病逝于北京。

马师曾逝世后，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各界的隆重悼念。

林 语 堂

张 梁

林语堂，原名和乐，入大学时改名玉堂，又改名语堂。1895年10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板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六岁在本村从师启蒙，十岁入鼓浪屿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小学就读。越三年，免费入厦门寻源书院（教会旧制中学）读书。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林语堂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为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并养成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敬畏和生活方式的羡慕。

1912年秋，林语堂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在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中，他除了学习一些中外语文、历史等课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和一些外籍教师的思想观点和生活态度，使林语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①

1916年秋，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校方荐举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并兼授圣经课。直到1919年的三

年中，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偶而也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他的宗教信念和热情，曾有所削弱和减退。

按照清华学校规定：凡任职期满三年以上的教员，可由校方资助出国深造。林语堂遂于1919年秋赴美，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因经济支绌，于1921年离美赴法，在巴黎华工青年会工作。稍有积蓄后，又于同年夏天赴德，入殷内大学，半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潜心于中国古代语言学之研究。1923年取得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取道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仍在清华学校任教，并于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镌》撰稿，发表一些汉语古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的译作。1924年5、6月间，还发表过诸如《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短评。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语堂被邀集为该刊长期撰稿人。1925年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又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长。与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

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以“女师大风潮”为中心的进步学生运动；5月，上海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下，林语堂在政治、思想上倾向革命。在“女师大风潮”中，他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曾与反

动警察搏斗。同时,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发表《谬论的谬论》、《咏名流》、《祝土匪》等短评、杂文,声援进步学生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参加了对死难学生的吊唁、慰问,并在《语丝》第72期上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章,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屠杀学生的封建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揭露。

应该指出,林语堂在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往往采取妥协的态度。1925年11月间,当全国范围内革命形势高涨,北京市民不断举行示威,要求打倒段祺瑞执政府,张作霖的地位也发生动摇的时候,“女师大风潮”随之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林语堂和岂明(周作人)倡和,在群众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虚伪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②特别是林语堂把这种“费厄泼赖”精神当作“语丝派”的共同精神来提倡时,就不能不引起鲁迅的警惕。鲁迅曾及时地撰文予以纠正,这就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发表。

由于鲁迅及时地针砭、教育,以及“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的血的教训,林语堂对他所宣扬的有害论调,逐渐有所认识。惨案发生后一周,林语堂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不久,又在《打狗释疑》一文中不无内疚地承认:“……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③并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发微”与“告密”》等文,主张来一个“打狗运动”,表示

要继续讨伐反动势力和“叭儿狗”们的决心。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即于当年5月携眷返闽，在厦门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并先后荐请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人至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年底，因国学院经费问题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教职员中“现代评论”派势力不断膨胀，虽有鲁迅等进步教师的支持，但林语堂在教务、人事等方面，总感时被“牵肘”。1927年春，终因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而被迫辞职离闽。3月，应陈友仁之请至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林语堂回到上海，应聘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全国，因以致富。12月，鲁迅在上海接编《语丝》，不久又主编《奔流》、《朝花周刊》，林语堂为这些刊物撰稿。

1928年11月，林语堂写剧本《子见南子》，发表在《奔流》上，此剧对孔子作了揭露。同年12月，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战斗业绩，作了如实的评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林语堂所希冀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难于实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④的资产阶级政治愿望，也遭到破灭。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了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把国家与民族带进了黑暗的深渊，濒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斗争。但林语堂却游离于斗

争之外，消沉、退缩，和革命的斗士相反，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终于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他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涨，采取了“偏憎人家说普罗”^⑤的对立态度；他慑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采取了“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⑥的畏缩立场。林语堂这时期的表现，已把他在二十年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那一点革命性，丧失殆尽。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杂志《论语》（半月刊）创刊。他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该刊以提倡“幽默”为宗旨；并宣扬所谓“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⑦的处世态度。

1933年1月，林语堂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为了在政治上挽救、教育林语堂，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批评的态度。鲁迅应约为《论语》撰写过几篇文章，但同时声明，不赞成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严肃地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广大人民求生且不暇，所谓“幽默”文学，在政治上只能起到“将屠户的凶残，使人家化为一笑”^⑧的作用。另外，还多次写信进行规劝，希望林语堂迷途知返，做一些于人民、于国家有益的文化工作。^⑨对于鲁迅的严肃批评和忠告，林语堂漠然置之。

《论语》出至第27期时，林语堂辞去编辑职务（由陶亢德接编），于1934年4月另创刊《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9月又创刊《宇宙风》（半月刊，与陶亢德合编）。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林语堂变本加厉地提倡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他吹捧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鼓吹半文半白的

“语录体”，攻击白语文，反对大众语；纠集周作人、邵洵美等人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越闻。后来，他更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公开反苏反共，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人间世》第25期上还译载了宋美龄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污蔑工农红军“杀人放火”、吹嘘反动派军事“围剿”“战绩”的文章。这就彻底暴露了林语堂帮闲、帮凶的面目。

《人间世》创刊后不久，鲁迅就坚决与林语堂断绝了关系，并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林语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穿了他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⑩的“西崽”相。

1936年8月，当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林语堂以著作为名，携家移居美国。就在这一年，林语堂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大讲所谓“八百年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和所谓“世故”、“忍耐”、“冷漠”、“老猾”是中国民族的“特性”，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侮蔑。林语堂这一行径，受到了国内外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正义谴责。其后，还在美国出版了一部以1900年后北京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为题材的英文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964年，林语堂的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在美国出版。这本小说，对伟大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恶毒的咒骂。

林语堂居美期间，曾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主持该校的“中国讲座”，大肆宣扬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

以后，林语堂长期定居美国。1943年林语堂曾一度回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曾在沙坪坝讲演，劝告青年学生读《易经》。

郭沫若当时以《啼笑皆是》(见《沸羹集》)为题,撰文予以抨击和嘲讽,指出他对《易经》的根本无知与可笑。他的“西洋镜”被拆穿后,只得写打油诗以解嘲。不久,即狼狈返美。

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他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66年6月携家自美返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1972年编成《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3月26日因病死于香港。

注:

- ①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二)》,工友译,《逸经》杂志第18期。
- ② 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第57期。
- ③ 林语堂:《剪拂集》。
- ④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三)》,工友译,《逸经》杂志第19期。
- ⑤⑥ 林语堂:《四十自叙》,《论语》第49期。
- ⑦ 《论语》第50期封面题辞。
- ⑧ 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
- ⑨ 参见鲁迅:《致曹聚仁》,《鲁迅书信集》上卷,615页—616页。
- ⑩ 鲁迅:《“题未定”草》,《且介亭杂文二集》。

陈 焕 章

郑则民

陈焕章字重远，广东省高要县砚洲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父亲陈锦泉，是清朝的候补巡检^①。

陈焕章幼年在当地书院读书。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他投入康的门下受业。康有为曾主张仿照基督教的形式建立孔教，并用孔子“诞辰”纪年；陈十分赞成这个主张。1899年陈焕章在家乡设立“昌教会”，于陈氏家祠供起孔子牌位，纠“合一族之男女老少悉入会中”^②。

1904年他到北京应特科考试，中了进士。1907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这时，陈焕章同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联系。他为了对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扩大旅美华侨中的保皇势力，在纽约创办“昌教会”，并筹款建立孔教义学，自任校董。此后，他以当时美国社会上流行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等反动理论来附会中国的孔孟学说，用英文拼凑了一本《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全书数十万言，分三十六卷，“就理财以谈孔教”，企图“使天下之人，知孔教之切实可行，殆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也”^③。哥伦比亚大学于1911年初授陈焕章以博士学位，并

将此书编入该校法政丛书之内，在世界各地广为推销。

辛亥革命前夕，陈焕章回国，寓居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经过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去了，但在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遭受了一次打击，再也推行不下去了。陈焕章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受康有为的密信指示，提出创立全国孔教会的主张，并四处奔走，寻求支持。美国人李佳白立刻予以帮助，把在上海经营多年的文化侵略机构“尚贤堂”给他作为一个基地。1912年7月陈焕章写了《论孔教是一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文章，作为建立孔教会的纲领，在“尚贤堂”集会进行讲演，制造舆论。他伪造历史，说什么“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④。“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亡则国亡。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⑤。提倡在全国各地“遍立孔教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特设教旗……为黑白赤三色”，“以孔子纪年”，“讲经”，“发愤传教”^⑥等等。

接着，陈焕章纠合了聚集在上海的封建遗老沈曾植、梁鼎芬，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姚丙然，保皇党人麦孟华等发起组织全国孔教总会。1912年10月在上海山东会馆开成立大会，不久在上海设立干事会和总会事务所，由陈焕章当主任干事，总揽会务。孔教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立案批准，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支会和分会。1913年2月起发行了《孔教会杂志》，又由他当总编辑。

1913年夏，陈焕章到了北京。8月，他联合梁启超等人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

教为国教”，曾得到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和以张勋为首的一些军阀的通电支持，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其他宗教团体的不满，结果该案遭到否决。与此同时，陈焕章与孔丘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相勾结，于1913年秋“大成节”（孔丘的生日），在山东曲阜阙里召开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决定“每年大成节，开全国大会于阙里”，并正式确定将孔教总会从上海迁往北京，又在曲阜设立孔教总会事务所。同年冬，陈焕章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他与袁的外籍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有贺长雄等一度来往密切，共同利用孔教鼓吹帝制。

1913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陈焕章等推为孔教总会长，军阀张勋也被推为曲阜孔教总会“名誉会长”。康等早有扶植清废帝复辟的企图，他们把争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会活动的中心目标，妄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5年袁世凯在称帝前夕，对孔教会头目们有所疑忌。陈焕章赶快“韬光养晦”，关起门来，写他的《孔教经世法》^⑦。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总统，国会重新召开。陈焕章等又于1916年9月再次向国会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说什么“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⑧同时还联合国会议员组织国教维持会，由于人民的反对，再次失败。

1917年夏，张勋与康有为等一起导演的复辟丑剧中，孔教会的头目们也被加官晋爵，封为“大臣”或“尚书”。但陈焕章却是很狡猾的，他一面对这次复辟阴谋暗地支持，另方面却没有轻露马脚，以备见风使舵。复辟失败后，康有为逃走，陈

焕章投靠了重新当权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被推为孔教总会长的继承人。但他故作姿态，自称为北京孔教总会主任。当年12月他改《北京时报》为《经世报》，作为孔教会机关报，自任总编辑。1918年，在皖系军阀的操纵下，北京召开了御用的“安福国会”，陈焕章当上了“安福国会”的议员。

1919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随后，马列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更深入发展。陈焕章等对此极端敌视，进行了猖狂的反扑。5月29日，他向国会提出一个“尊孔法案”，大叫如不尊孔读经，则“俄国过激派之祸，将遍于中国矣”^⑨。1920年他又抛出《孔教会教规》，说：“孔教不明，则祸机四伏”，“惟孔教然后足以保社会之秩序，身家之平安”^⑩。为了争夺青年，他四处奔走，募款修建北京孔教大学，叫喊“今欲应时势之需要，则不得不速开孔教大学，以正人心，息邪说，拒谰行，放淫辞而承孔圣”^⑪。这一着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赏识，除拨地捐款外，还聘陈焕章为总统府顾问，又授予文虎勋章。二十年代初期，陈焕章还加入了“政学会”，担任该会的财政、交际股委员。

1922年夏，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陈焕章为迎合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急忙抛出《非联省》一文，叫嚷“今夫各省之当服从中央，此法理之公也”^⑫。次年1月他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获得了“大绶宝光嘉禾”勋章。1923年9月，北京孔教大学（校址在北京西城甘石桥）正式开学，陈焕章任校长。他标榜“以昌明孔教，培养通儒”^⑬为该校宗旨。他禁止学生谈论爱国，不准阅读一切新文化报刊，对学生思想禁锢极严。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北洋

政府的总统，陈焕章仍被聘为顾问。当年12月，陈在《请曹大总统祀天书》中无耻地说：“大总统躬膺天眷，新正大位，不知者以为议员选之，焕章则以为天选之。”^④

此后，陈焕章依旧以北京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为基地，鼓吹尊孔读经，反对人民革命，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8年山东曲阜发生了反孔府事件，他与孔德成通信密商对策，并纠合一些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保持孔德成的“衍圣公”封号和孔府的封建特权呼吁^⑤。但是，由于陈焕章与孔教会在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已经丧失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在北洋军阀旧主子垮台之后，未能博得国民党新军阀的欢心。陈焕章不得不跑往香港，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过日子。1931年，他开始从事修订《宣统高要县志》。1933年12月病死于香港。

注：

① 《宣统高要县志》（1938年修订本）。

② 《经世报》，第1卷第1号。

③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见《孔教论》附录，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④ 陈焕章：《论孔教是一宗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1页。

⑤ 《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1912年），见《孔教论》第31页。

⑥ 同上书，第59—62页。

⑦ 陈焕章：《孔教经世法序》，《经世报》，1917年12月25日。

⑧ 《经世报》第2卷第3号。

⑨ 《宗圣学报》，1920年2月版，第2卷第10册。

⑩ 柯瑛等编：《孔教十年大平》，第2卷第102页。

⑪ 陈焕章等：《筹建孔教总会堂以办孔教大学启》，《经世报》，第2卷第1

号。

⑫ 《经世报》，第1卷第6号。

⑬ 《孔教大学校章程》，《经世报》，第2卷第6号。

⑭ 《经世报》，第2卷第7号。

⑮ 《孔府档案》卷号0008437，及1929年《陈焕章致孔德成信》。

曾 琦

李义彬

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始人。原名昭琮,及长,因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末在广西作小官,全家迁居桂林。曾琦幼年时,在家中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遂与其兄变卖家业,扶柩返回祖籍四川。1909年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肄业,与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李劫人等同学。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课余为报章撰述评论,《成都商报》曾聘为主笔。辛亥革命前后,曾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于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赴重庆,追随熊克武、杨庶堪参加讨袁之役,事败潜回隆昌。1914年曾琦至上海,入震旦学院习法文,与同学左舜生、李璜等相识订交。

1916年春,曾琦东渡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秋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留日期间,与易君左等二十余名留日学生创办“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刊撰写稿件。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康有为参与其事。是时正在日本房州避暑的曾琦,曾写信给梁启超,劝梁慎于出

处，继续提倡国家主义。

1918年夏，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纷纷罢学归国。曾琦哀叹“人生最不幸之事，莫过于中途辍学”。^①但在广大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的爱国潮流推动下，亦于6月25日回到北京。到京不久，即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于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②不久，曾琦离京赴沪，执笔于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其间，受业于章太炎，章为他讲说《易经要旨》和《佛学大纲》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曾琦抱同情态度。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他以深刻影响。7月1日他在写给留法的周太玄、李璜的信中说：“我在上海前后病了三个月，真是奄奄无有生气，直到5月4日，北京学生痛击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我如饮了一付兴奋剂，……马上就启程北上，视察学界情形。……我到京后，接洽学界许多青年同志，精神上非常愉快，又亲眼看见6月3、4、5日北京政府捕拿学生二千余人，囚在译学馆的一班爱国青年，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之精神，觉得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③是年8月下旬，曾琦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与周太玄、李璜等人组织“巴黎通信社”，充当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讯稿件。

五四运动后，“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分化。李大钊等学会中的左翼分子，力图把这个成员复杂、宗旨笼统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曾琦作为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已经站到反动方面去了。他反对李大钊等人的革命主张，从法国写信给国内的同伙左舜生说：“宣言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④同时，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蒲鲁东学说，择要撰述稿件寄回国内”，^⑤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

1923年12月2日，曾琦纠集留法学生中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巴黎郊区玫瑰村召开中国青年党成立会议，被选为党务主任。会上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宣言》标榜青年党的宗旨是：“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⑥。曾琦还在《宣言》中明目张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它不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到会五十二人，曾琦被选为委员长。

中国青年党建立后，曾琦等人变本加厉地破坏旅法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他唆使其党徒邬刚如采用特务手段盗窃了中国共产党一份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文件。他亲自拿着这份文件面见旅法的国民党人王宠惠、蔡元培、郑毓琇等，极力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又托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之婿曹任远将此文件密转其岳父，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供炮弹。后来他回国后，与谢持“约定内外夹攻”，反对国共合作。

曾琦旅欧五年，曾到德国、比利时暂时停留，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1924年9月，他和李璜、张梦九一起回到上海。他

先后在大夏、同济、法政、学艺等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还是用在青年党的活动上。是年10月10日，他与李璜、张梦九以及国内的国家主义分子左舜生、陈启天（左、陈均在上海中华书局供职）、余家菊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喉舌。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醒狮》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则进行反共反苏活动。曾琦在《醒狮》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散布反动的国家主义谬论，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辱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为了反对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从1924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曾琦反对国民会议运动，甚至攻击国民会议运动是“乘机煽动，别有用心”，表示“吾人固万不能符合也”。^⑦

这年冬天，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曾琦由谢持介绍往见，劝孙“中止联俄容共”，“辩论良久，不欢而散”^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曾琦借机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反对国共合作。他胡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却海外华侨之同情”，“失却绅商阶级之同情”，“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⑨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无理屠杀我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年5月30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曾琦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他在《醒狮》周报上公开主张“今后

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只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在军阀未倒，外患未销以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遽谈‘阶级斗争’”；“非万不得已时，不宜轻用罢工手段”^⑩。

1926年夏，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青年党建立后，其党名长期保密，对外活动则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出现，因为标榜国家主义，所以被称为国家主义派。这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曾琦等人散布的谬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人上的揭露和批判，其反动面目逐渐被人们识破。一度被蒙蔽的青年纷纷觉醒，声明脱离国家主义派。自称为“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派，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曾琦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由（民国）十三年秋迄十六年春，愚虽居沪滨，而时复漫游大江南北，讲演不下数百次，为文不下千余篇，意在醒青年之迷梦，存国家之元气。顾虽瘠口晓音而终莫能挽此既倒之狂澜。”^⑪

严酷的事实，使曾琦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⑫。于是他就投靠各地封建军阀，“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⑬。从1926年起，他派出一批重要党徒与各地军阀相勾结，充当军阀的鹰犬。他本人则时而回川与四川军阀相勾结，时而到山东依附韩复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曾琦拚命反对。他诅咒“此

次北伐，不惟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忧”，“世人虽震其声威，而予则敢断言其必败”^⑭。他的诅咒没能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到1926年末，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进抵长江流域，严重威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所到之处，废除了北洋军阀的所谓五色国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于是曾琦又掀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国旗”的运动，成立什么“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

1927年1月，曾琦逃离上海，窜到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许多人积极进行营救，而当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曾琦，则成了军阀杀害大钊同志的帮凶。他“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⑮。

曾琦一再煽动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北伐前夕，蒋介石搞“整理党务案”时，《醒狮》周报就公开鼓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⑯北伐进军途中，曾琦“希望国民党……绝对不容党内有跨党分子，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貽赤化之讥”^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对蒋介石“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还提醒蒋介石“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须知共产党之基础，本在下而不在上。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何以制共产党之死命？”^⑱这是公然煽动屠夫蒋介石向广大工农群众开刀。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青年党在反共反

革命上已完全一致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异己，在一个时期内不承认青年党，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能够合流起来。因此，“四一二”后，曾琦在继续反共的同时，也曾反对蒋介石的“党治”。

1927年9月，曾琦去日本。不久，蒋介石亦“下野”来到日本。在日期间，陪同蒋介石的陈铭枢曾到横滨晤见曾琦，调解蒋介石与青年党的关系。因蒋只准青年党员加入国民党，坚持不承认青年党，故调解未成。是年冬，曾由日归国，先后到北京、香港、天津、山东等地，依附反动势力，从事反革命活动。在天津，他极力拉拢梁启超，欲拥梁为领袖组织新党。在山东，他令其党徒组成法西斯式特务组织“特别侦探队”，协助韩复榘缉捕共产党人，破坏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代表青年党“撰《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一文，载于天津《大公报》，主张政党休战。且不论国民党之反应如何，中青先自实行（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⑩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召集国难会议时，曾琦等青年党的几个头目均在被邀之列。因对会议内容、地点、仪式有分歧，曾等未去出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流寓湖南”的曾琦，策动湘桂川的反动势力“截堵迎击，并坚壁清野，严阵以待”。不久，他返回四川，支持四川军阀进攻川陕红军。还支持李璜回川组织“安抚委员会”，协助刘湘、邓锡侯、杨森等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6年前后，蒋介石与曾琦信息往还，蒋多次表示要见曾。当年冬，曾派李璜赴洛阳祝贺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并劝蒋

中止西安之行，以防张学良、杨虎城发生“腋肘之变”。蒋“围剿”红军心切，未允^②。不久蒋就在西安被抓起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于1936年12月25日从太原致电蒋介石，表示慰问，竟把蒋的获释说成是由于“积旬日之呼号，动十万之师旅”的结果。1937年1月8日，曾到浙江奉化面见蒋介石，“长谈两次，建议数项”。^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5日召开庐山谈话会，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他在16日的会议上发言，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38年，蒋介石成立国民参政会，曾被聘为参政员。1941年夏，曾赴香港。同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曾与梁漱溟合办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期间，日本驻港领事通过国社党驻港负责人对曾琦进行诱降活动，汉奸汪精卫亦与青年党的骨干分子关楚璞密谈，拟委任曾为伪铨叙部长。1941年12月，香港陷落，曾在日本驻港领事的保护下，乘敌舰潜往沦陷区上海。汪精卫劝曾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曾本人虽未公开担任伪职，但青年党的一部分人却公开投敌叛国，它的几个重要成员（如赵毓松、李守黑）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部长，曾本人也曾经从敌伪手中领取过经费。^④ 1944年冬，曾琦移居日寇统治下的华北。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他从太原接回四川，参加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曾仍被选为青年党的主席。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主张“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同年11月，青年党撕下“在野”与“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伪国民大会，曾琦被指定为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曾代表青年党与

蒋介石、张君勱(民社党)等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蒋介石反动政府，任伪国府委员。为此，曾赋诗道：“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①对蒋感激涕零。

1947年夏，蒋介石要对共产党下“讨伐令”。曾琦向蒋介石建议“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俟其明目张胆，组织伪政府时，再从而大伸天讨。犹之刘先主之讨曹魏，明知其迟早终必篡汉，仍待曹丕僭号称尊，始行讨伐”^②。这一献策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和嘉奖。1948年元旦，蒋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他又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策：严格保甲制度，在各地组织“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③以切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一再强调“军民如何互相配合，实为当前剿匪之要旨”。^④

1948年3月，曾琦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4月19日，代表青年党致电国民党，祝贺蒋介石“当选”“行宪第一任总统”，说什么“群伦爱戴，徵民主之輿情，国运昌隆，卜共和之盛世”。^⑤会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48年10月，曾琦赴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5月7日，病死于美国华盛顿。

注：

①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22页。

② 《少年中国学会規約》，《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33页。

③ 《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7月1日。

④ 《少年中国》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20年9月15日。

⑤ 同上，第一卷第十一期，1920年5月15日。

⑥ 《曾慕韩(琦)先生遗著》，8页。

- ⑦ 《醒狮》周报第15号,1925年1月17日。
- ⑧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111页。
- ⑨ 曾琦:《挽孙中山先生》,《醒狮》周报第24号,1925年3月21日。
- ⑩ 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号,1925年9月26日。
- ⑪ 《醒狮》周报第223—225期合刊,1930年10月10日。
- ⑫ 《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
- ⑬ 《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
- ⑭ 《醒狮》周报,第98期,1926年8月29日。
- ⑮ 孙永年:《青年党外传》,原载《文萃》45期,引自《狐群狗党现形记》,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25页。
- ⑯ 《醒狮》周报,第92期,1926年7月18日。
- ⑰ 《吾人对于国民党之真正态度》,《醒狮》周报106期,1926年10月16日。
- ⑱ 《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醒狮》周报129期,1927年4月23日。
- ⑲ 曾琦:《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载《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1941年版。
- ⑳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 ㉑ 同⑲。
- ㉒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6日,第一版。
- ㉓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120页。
- ㉔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176页。
- ㉕ 《与段之桓论组训民众书》,《青年中国》周报第67期,1948年9月5日。
- ㉖ 《曾琦谈剿共要旨》,《中华时报》1948年4月14日。
- ㉗ 《中华时报》1948年4月20日。

张 君 勋

江绍贞

张君勋，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省宝山县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

张君勋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籍，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勋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勋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相勾结，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

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10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勱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勱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徒(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①。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投靠段祺瑞,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又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勱又跑到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自此,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勱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

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的传播，引起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极端恐惧。张君劢伙同梁启超公开反对科学，反对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2月，张跑到清华学校作所谓“人生观”问题的讲演，大肆贩卖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宣扬“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②。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混战，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张被称为“玄学鬼”。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溜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为自己摇身应变作准备。次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表面上在燕京大学任教，暗地里为筹建政

党作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和一些封建余孽，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军阀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政治上反动，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③。1936年夏，陈济棠反蒋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勱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⑤，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党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

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⑥。对于张君勱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谬论，中国共产党对他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作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勱等入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布政纲，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政治。纲领中同时也掺入了反对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主张。1944年9月，为容纳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张均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勱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⑦头子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

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什么“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妄想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以所谓“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⑧。

政协会后,张君勱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勱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决心卖身投靠,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⑨。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伪国大代表名单。这种可耻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勱分为两派。张君勱“中立”的伪装被彻底戳穿。

1947年4月,张君勱伙同青年党头子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东窜西跑,到处宣讲伪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勱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逃居澳门,未敢就任。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逃往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极力宣扬孔孟哲学和宋明理学，攻击中国共产党“叛离”了中国传统，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国各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

注：

- ① 《张君劢慨谈时局》，《大自由报》1913年8月10日。
- ②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国泰图书局1928年10月版。
- ③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④ 张君劢：《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再生》四卷四期，1937年5月。
- ⑤ 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信，《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版。
- ⑥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十期，1938年12月。
- ⑦ 民主宪政党是美洲华侨中的一个政治组织。系由康有为在美洲所建保皇党演变而来，其领导人伍宪子、李大明等人。
- ⑧ 《中国民主社会党纲领》，《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 ⑨ 1946年11月20日张君劢致蒋介石的信，《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人物传记》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人物传记》;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人物传记》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一) 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二) 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三) 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四) 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五)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六) 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七) 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

次长最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八) 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九)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十) 国民党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十一)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十二) 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十三) 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十四) 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十五) 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十六) 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十七) 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四、只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现在还在世的,一律不写传,只积累材料。

五、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一律按笔划顺序排列。(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后 记

本卷收入的传稿中,有十四篇由所外供稿。外稿日多,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除衷心感谢外,还殷切地企望更多的同志来写稿。

本书第一卷出版发行后,陆续收到各地读者来信,或指出错误,或有所建议,特此表示感谢。需要订正之处,将于再版时改正。

本卷的辑成,除主编李新、孙思白同志通盘筹划、主持审选外,具体的编辑工作,由宗志文、朱信泉同志负责,李宗一、耿云志同志协助审阅了部分稿件。